

主編

涂肇慶 林益民

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

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



Social Change in China's Reform Era

作者

魏昂德 (Andrew Walder)

美國史丹福大學社會學系、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趙文詞 (Richard Madsen)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社會學系

邊燕傑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系、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周雪光

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陳向明

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社會學系

臧小偉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涂肇慶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Social Change in China's Reform Era

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

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

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變化對社會學家提出了許多問題，並吸引了西方社會學家的注意，西方社會學家對此也提出了種種看法。可惜的是，因為溝通渠道不足夠，西方社會學家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卻鮮有對中國內地學者的工作產生影響。本書編者和作者均為美國和香港的中外學者，本書旨在介紹近年來西方社會學家對中國的研究成果，內容包括對西方社會學家的初始研究工作的綜述，以及他們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社會網絡與求職過程、組織與制度變遷、城市化、家庭、人口轉型等方面的研究。

主編

涂肇慶 (Jow-Ching TU)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高級講師

林益民 (Yimin Lin)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

CUHK Libraries



00369629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om

ISBN 0-19-591932-7



9 780195 91932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á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Paris São Paulo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Warsaw

with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First published 1999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
——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

涂肇慶 林益民 主編

ISBN 0-19-591932-7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 錄

導言 林益民 涂肇慶	1
1 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後中國的社會變遷	
魏昂德 (Andrew Walder)	13
2 五代美國社會學者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	
趙文詞 (Richard Madsen)	35
3 現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從描述現狀到解釋變遷	
魏昂德	57
4 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 邊燕傑	72
5 社會網絡與求職過程 邊燕傑	110
6 西方社會學關於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研究狀況述評	
周雪光	139
7 中國城市化研究：理論上的「西學中用」與實證中的 「特殊模式」	
陳向明	170
8 中國家庭研究的發展與近況	
臧小偉	192
9 人口轉型——中國社會變遷的另一動力：評述西方人口 轉型理論的困境與走向	
涂肇慶	209
部分西方中國問題學者中外文姓名對照	245
英文參考文獻	246

導言

林益民 涂肇慶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實施了二十年。由此而引發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變化是相當廣泛和影響深遠的。中央計劃經濟逐漸衰落，經濟活動朝着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方向發展。隨着經濟持續成長，收入水平大幅度上升，生活素質在不少方面有所改善。同時，政治權力趨於地方化甚至社區化，國家對社會的直接控制減弱，職業、地位和空間上的社會流動增強，文化的多元性和異質性亦顯著增加。另一方面，各種公開或非公開形式的社會和政治衝突的加劇，收入差距的擴大，環境的污染和惡化，政治腐敗的蔓延，種種其他不受規章約束和違規行為在個人、羣體和組織層面的持續與擴散、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的衰減，都已經成為普遍關注的問題。

這些變化不僅大部分超出改革政策制定者的最初設想，而且也對理論研究提出許多挑戰。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東西方學術界內外廣泛存在着一個源於不同分析邏輯和意識形態的共識：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不可能在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下實現市場化，更不可能由此帶來高速、持續的經濟成長。蘇聯和東歐坎坷而成效甚微的改革經歷似乎給這一看法提供了例證。但中國 70 年代末以來的制度變革和經濟發展則構成一個反例，並且與蘇聯和東歐傳統體制解體後的發展道路形成鮮明對照。甚麼因素使得中國漸進的、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不斷深化？在中央計劃的約束下市場機制怎樣發生、發展、運作並同時侵蝕指令經濟機制的基

礎？在這兩種機制並存的條件下持續的經濟成長是怎樣造成的？經濟轉型過程中收入分配受到哪些因素的支配？國家權力對社會的影響是衰減了還是僅僅改變了形式？改革過程中種種新的有關歸屬關係、交換關係、權威關係和信息傳遞的制度安排是怎樣形成、維繫和演變的？這些彼此相關的問題固然無法涵括在認識中國二十年來的變革過程時所可能產生的疑惑，但從它們可以看出，分析和解釋這一過程是一項相當複雜而發人深省的工作。

如同許多中國學者一樣，不少西方學者力圖從各種角度尋找針對上述及其他問題的答案。結果之一，就是 80 年代中期以來西方有關研究中國社會和經濟變遷的學術文獻數量大幅度增加。以美國兩份主要的社會學期刊《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和《美國社會學學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為例。在 1978 年至 1987 年期間，它們所登載的文章中沒有任何一篇是有關中國社會的。不過從 1988 年到 1992 年，則刊載了五篇這類文章。到了 1993 年至 1997 年期間，有關中國的論文增加至十五篇。同一趨勢也可見於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如政治學和經濟學。它不僅顯示西方學術界對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的興趣逐漸增強，也說明由此所導致的研究已經開始超出傳統區域研究的範疇，與不同學科的主流理論進行對話，並充實其內容。

在過去十幾年裏，一些有影響的、出自西方學者對中國研究的成果陸續被翻譯成中文。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的《國外社會科學》、《國外社會學》等刊物中就登載了不少這方面的譯文，《讀書》(北京) 和《中國書評》(香港) 等亦不時有一些評介文章。雖然西方學者水平不一，對問題的探討也未必都全面、深入，不少研究的分析角度和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假設和結論仍有不同程度的參考和借鑒意義。

然而，中國國內學者用中文發表的研究論文和書籍卻很少提

到西方學者對同類問題的討論，也很少就其所提出的解釋做深入分析。另一方面，他們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其中許多非常獨到的發現和精闢的見解）也鮮為西方中國問題學者所評論、引用和延伸。這固然與學術訓練和研究傳統的差異以及語言障礙有關，但另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對各自研究思路的形成如何受到不同學科理論發展的影響缺乏系統瞭解。這種瞭解往往不容易從專題著作（尤其是學術論文）中對相關文獻的簡要討論而充分獲得。縮小這一認識上的差距無疑對增加雙方學術對話、促進各自的研究和加深對共同關注的問題的理解都有重要意義。

本書的目的是通過綜合、深入的文獻描述與評論為這種交流拓寬道路。我們的側重面是西方學者在社會學領域對中國社會變遷的研究成果¹。以下各章分別介紹在社會學各主要分支中的中國研究的理論架構、分析方法，以及所涉及的主要爭論，進而探討影響研究視角形成和轉移的因素，評論現有研究成果的貢獻和不足，並指出一些重要的然而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這種工作在西方學界已經開始出現。現有涉及面最廣的、以英文發表的文獻回顧可能是由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下屬的東亞文化研究中心 1994 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研究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一書 (Kuan 1994)。它收入七篇 1993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紀念大學服務中心 (University Services Center) 成立三十周年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分別對日本、北歐、法國、俄羅斯、英國及北美等地的中國研究狀況概要地做了介紹。其中包涵不少相當有價值的描述和討論。但除了一篇有關日本學者對中國經濟和對外貿易研究的綜述之

¹ 這些成果絕大部分是以英文發表的，其中也包括出自在西方從事研究工作的中國學者的著作。

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

外，這些論文沒有就不同學科的研究進行專門論述，也沒有對具體的研究課題做深入的討論。

在社會學領域，魏昂德（Andrew Walder）1989年為在美國出版的《社會學年度評論》（*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寫過一篇專文，從社會學分析的角度評論西方學者在文化革命之後、改革開放初期所做的中國問題研究。限於成文時間，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過去十年中發表的）當時不可能涉及。但這篇綜述對西方學者研究工作的初始關注和思路做了清晰的闡述。我們將它收入本書，列為第一章，為其後各章的專題討論提供背景。

魏昂德所討論的大部分著作，是西方學者利用新的研究材料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進行再認識所做的努力。它們共同關注的問題，是1949年之後的三十年期間國家對於經濟和社會的全面改造和控制。研究工作集中在評價以國家為主導的、封閉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分析國家控制社會的機制，以及解釋政治權力如何影響社會關係形態。

其結果顯示，中國當時經濟發展的效率低，雖然收入和機會相對平均，但生活素質差，城鄉差異顯著，男女不平等的制度基礎也沒有根除。通過將所有社會關係納入一套政治與經濟權力一體化的社區和組織系統之中，國家使得個人對其高度依賴，並以此作為行為控制的基礎。但這一系統內部的權威關係並不完全是按照高層決策者的理性目標所構建，而是夾雜着大量個人庇護與交換關係。在這種體制下，以政治標準對社會成員所進行的評判和歸類成為資源和機會分配的重要基礎。因此，權力佔有者如何界定和使用政治標籤對於社會流動和分層有很大影響。這些研究的社會學意義，在於它們揭示了一些西方現有理論所無法充分解釋的社會關係類型，並說明深入分析政治制度的運作過程有助於認清這些類型形成、發展和演變的機制。

在過去的十年裏，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仍然是西方中國問題研究的重點。但這一時期的研究主題已經轉為改革中所發生的變化。趙文詞 (Richard Madsen) 用知識社會學的分析方法，闡述這方面工作研究視角的轉移過程及其原因。他以 60 年代以來美國的中國學發展為例，說明研究主題和分析架構的轉變是不同時期流行的學術思潮、學者所能夠獲取的實證材料以及輿論所關注的中心問題三者之間的互動的結果。

60、70 年代現代化理論和 Parsons 學說在學術界影響的興衰，80 年代「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概念的推廣，以及 90 年代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和「全球一體化」(globalization) 思潮的風行，都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的發展和變化造成直接影響。同時，西方中國問題學者的信息來源所發生的變化(從 60 年代完全依靠官方資料，到 70 年代對在香港的大陸移民的深入訪談，以至 80、90 年代直接在中國做實證研究) 也促使他們對既有觀點加以補充、修正和發展。另外，冷戰時期及其之後美國的公眾對於國際關係的關注重點亦有不少改變(如越南戰爭以前對美國發展模式前途的憂慮，60 年代末以及 70 年代的反國家權威情緒，80、90 年代對社會和文化的多元性的反思)，中國問題研究在不同時期的導向對此有所反映。

國家與社會互動的中心問題是權威。在改革前夕的中國，這種互動是以國家對所有形式(包括社區、組織、羣體甚至家庭中)的權威關係全面和制度化的控制為特徵的。這一特徵的形成、維繫和變化一直是西方中國問題學者探討的一個主要問題。魏昂德的第二篇論文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討論這方面的文獻。這類研究在 60、70 年代經歷了從對權威關係做靜態描述到對其變化過程進行追蹤的轉變，並在 80、90 年代開始集中於對變化機制的解釋。雖然它們獲得了許多有用的發現，但有一個共同缺陷，即就

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

事論事，沒有對狹義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即官員與其他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範疇之外的因素如何影響這種關係的演變做細緻的分析。原因之一是它們在理論上長期受到西方學界對蘇聯東歐政治體系分析模式的影響。這些模式大都以利益羣體及其衝突為主要關注，但忽略了對於其他形式的互動關係的研究。

目前這一領域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超越就事論事的思維方式，進而探討新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國家權力的範圍、驅動源、運用形式以及對於社會行動所造成的影響。例如，改革過程中各種游離於國家之外的（如非公營組織、社會羣體以至鄉村社區中的）權威關係如何形成、發展並影響官員與其他社會成員的互動？官員與制約他們自己行為的制度安排（如黨政之間、部門之間、級別之間、人員之間的分工和對權力、責任的界定、協調與監督機制，激勵與約束，規章體系等）之間的互動過程有哪些變化？為甚麼發生了這些變化？對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產生甚麼後果？

深入分析這些問題不僅有助於揭示改革時期官員按照國家意志行事的程度和方式，而且對研究社會關係類型的變化也有直接意義。譬如，中國社會分層研究中的一個廣為關注的問題，是在經濟活動的市場化過程中政治權力對於收入分配的影響。如果我們把分析的視角從官員行為所影響的經濟過程擴展到直接影響官員行為的、本身也經歷顯著變化的政治過程內部，那麼就不難看出，官員是否有更大的空間利用權力為自己謀取好處與他們的行為如何影響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是既相關又不同的問題。

就收入分配而言，官員（以至其家庭成員）的實際收入可能因為制度約束弱化（而非因為其權限內所支配的資源的增加）所造成的謀私機會增加而顯著增加，但他們對其他社會成員收入的直接影響力可能同時因為國家對經濟活動的直接控制減弱而降低。反映前者的實證材料並不能清楚說明政治權力在後一種情形

下的作用，反之亦然。因此，要透徹地解釋政治權力與收入分配之間複雜的關係，就需要深入研究國家權力體系內部所發生的變化。不在這方面做細緻的分析而籠統地討論政治權力影響的消長，難免導致過於簡化的結論。這一問題在邊燕傑第一篇論文所回顧的部分文獻中有所涉及。

邊燕傑的討論包括兩類文獻：對改革前社會分層狀況的研究和對改革過程中分層機制變化的研究。前一類文獻涉及階級分化、結果（不）平等、機會（不）平等、代際變化以及影響分層的社會和經濟活動的組織系統。這些研究的共同之處，是認為對中國社會分層的認識必須與對政治經濟制度運作方式的分析聯繫起來。新中國成立後收入和機會的相對平等、文化革命中的平均化趨勢、代際之間的斷層、單位之間地位的差距和分化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個人分配上的差異，都是與國家對於資源和機會的壟斷以及通過行政手段、依照政治標準和考慮對其進行分配密切相關的。

後一類文獻以倪志偉（Victor Nee）1989年所提出的「市場轉型理論」（Market Transition Theory）所引發的辯論為中心。他的基本觀點是，經濟活動的市場化導致政治權力對收入和機會分配影響的減弱。隨之而來的相關研究大部分對這一觀點持批評或反對態度。有些學者（如林南和魏昂德）認為，這一理論將市場和政治權力定義成互斥的概念，因此「市場化」與「政治權力衰減」只是同義反覆，不構成因果關係。其分析邏輯只能對經濟轉型後的一種理想狀態提供描述，而不足以作為對轉型過程中分層機制變化的解釋。更多的學者指出，在市場化過程中，政治權力的影響可能以多種形式延續甚至擴張：在參與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活動的同時，國營單位可能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傳統資源分配機制的影響；市場也可能由於造就種種能夠給官員帶來更大利益的機

會而得以擴展，如與從事市場活動的尋租者進行權錢交易，或通過將國有資產和公共權威私有化為自己參與市場活動累積資本，或因為升遷和收入同下屬企業盈利高低直接掛鉤而努力促進這些企業的市場活動，或將國家權力與鄉村中復甦的家族體系結合在一起、公私兼顧地為下屬企業的市場活動拓展道路。

這些分析表明，市場化和政治權力對分層的影響之間不存在一種必然的零和（zero-sum）關係。但它們所指出的權力變形和持續的種種可能性仍需要由翔實的經驗材料來驗證。從現有的實證研究結果看來，這種驗證還只是初步的。一個有待於進一步探討的重要問題，是如何認識政治權力和非政治權力因素（如人力資本）對於不同社會羣體（權力的佔有和使用、租借者，以及非受惠者）在收入、機會和地位等方面的相對影響。顯然，界定這些羣體以及區分權力與非權力回報是一項艱難的工作。但不做這種努力便無法清楚地判斷政治權力影響的消長。這可能是這一研究課題所面對的最大挑戰。

與分層研究直接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權力和其他社會資源流動的途徑。邊燕傑的第二篇文章論述這方面的文獻。討論的重點是社會關係網絡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功效。他首先比較詳細地介紹西方社會學在這方面的主要理論、方法和實證研究結果。然後介紹自己如何將在西方頗有影響的強弱關係的分析架構引入對中國勞動力流動的研究，並解釋由此而得出不同研究結果的原因。在國家對資源和機會高度控制的體制下，職位的獲取或轉換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職位分配者所給予的特殊照顧程度，所以基於人情互惠的強關係的作用顯著。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信息的多樣性對於求職成功有着重要影響，所以異質信息量大的弱關係反而對求職者更有用。因此，不同的制度條件可能使社會關係網絡的使用方式和結果都呈現差異。這一強調社會網絡在中國被

廣泛用來影響權力如何使用的觀點也可見於其他一些同類研究。它們共同注意到，這種現象在改革開放以來顯得尤其突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官員和其他社會成員在各自的組織和制度環境中所面臨的激勵和約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研究中國改革過程中組織與制度變遷的文獻涉及範圍很廣，而且往往超越學科界限。周雪光側重討論社會學學者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但也兼及其他社會科學學者的一些相關成果。在他們所探討的組織和制度變化裏，有三個特別值得注意的趨勢。

第一是大量新型組織形式（如鄉鎮企業、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個體戶，以及各種股份制企業等）的出現。其結果之一，就是造成在產品以及生產要素市場中激烈的競爭，由此對新、舊企業都產生很強的推引作用（push-and-pull effect），即市場的鞭策和獎勵效應。有些經濟學者認為，這是中國漸進式制度變遷和持續經濟成長的重要驅動力。然而，企業之間的競爭並不限於投入和產出的價格方面，而且大量存在於向政府爭取資源和政策優惠。雖然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這種尋租競爭，其過程和後果仍有待深入研究。

第二是國家組織內部權力的下放和權威關係的重新構建。許多官員的利益由此同他們所管轄的經濟活動緊密聯繫起來，形成底層政府努力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因。另一方面，國家機構內部許多傳統的監督、協調機制逐漸弱化，有效的替代機制又沒有形成，導致官員謀私機會的增加，交換關係在政治過程中蔓延，侵蝕國家意志賴以得到貫徹實施的權威體系。

第三是既非市場亦非科層組織的多邊互惠網絡關係在經濟活動中的繁衍。這種互動形式可能是平等的、不對稱的或庇護性的。它廣泛存在於經濟活動參與者之間以及他們與官員之間。不少學者將這一現象歸因於政治和市場制度的不確定性和不完善，

以及在此條件下競爭、文化習性和交易費用考慮對行為方式的影響。目前還難以判斷它是否過渡時期現象。它對於揭示組織和制度變遷機制的研究意義也尚待進一步探討。

與組織和制度變遷方面的文獻一樣，西方學者對中國城市化的研究也具有顯著的跨學科特徵。陳向明系統地介紹了這方面的文獻。他指出，除少數例外，中國城市化的研究與西方主流的城市理論的發展有一定的距離。原因包括實證資料的缺乏和1949年中國革命後城市發展特殊的政治經濟制度背景。對改革前城市的研究側重分析國家靠行政力量分割城鄉，強調城市的生產功能，以及控制資源分配和社會行為。改革過程中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與經濟活動的市場化以及鄉村經濟的工業化緊密相聯。行政力量的控制隨之減弱，但國家仍對城市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具體表現在資源分配（如投資和土地使用）、經濟政策和城市法規的導向、對於流動人口定居的限制、城鄉界限的定義、鄉村政府對非農業經濟活動的扶持，以及由此形成的小城鎮等方面。

在市場和國家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關係類型，如大量沒有城市常住居民身份的流動性打工羣體及其聚居社區，傳統單位社區與商品化住房社區的並存，在某些基本社會服務（醫療、教育、住房等）補貼繼續存在的同時大量其他服務設施的社會化和商品化。另外，城市之間的競爭和差異，尤其是經濟發達與不發達地區城市之間的差異顯著增加。這些現象已經在一些西方學者的研究中有所描述。接下來需要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從理論上總結和分析它們的因果聯繫。

西方學者一直重視的另一個研究課題是中國家庭。臧小偉以「家庭革命」（即由主幹家庭和擴大型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轉變）這一論題為主線，回顧了西方有關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文獻。早期

研究是圍繞以上層社會的家庭為原型的「精英模式」(elite model)而展開的。所得出的基本共識是這種以擴大型家庭為特徵的模式並不常見於一般的大眾家庭之中，近、現代中國家庭規模的變化可能主要是從主幹家庭向核心家庭的傾斜。之後的研究發現，新中國成立後的社會重建對於家庭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家庭不再發揮基本生產單位的功能；政治因素成為戀愛和擇偶的重要考慮；工作單位和父母在促成婚姻方面作用顯著；明顯的性歧視有所減少。改革以來，家庭規模並沒有發生明顯變化。但在鄉村中，家庭恢復了獨立組織生產活動的功能，集體化時期一度衰微的父權有所回升。（文中未涉及的另一重要變化就是以血緣紐帶為基礎的家族關係重新成為鄉村經濟與社會整合以及釀成對立、衝突的重要因素。）社會流動的增強、收入和個人經濟獨立性的增加、政治意識形態的弱化以及西方文化觀念的滲透，都使得自由擇偶更為普遍，性自由的觀念也逐漸擴散。西方學者在中國家庭研究領域的一個局限，是沒有完全超出最初「精英模式」討論所關注的問題，如家庭結構和規模、擇偶、家庭成員之間的地位關係等。對於家庭生活週期、婚姻破裂、子女虐待、性行為、家庭生活方式的選擇等問題，則缺乏深入分析。原因之一在於獲取信息的難度高。但隨着中國社會的開放，研究這些問題的條件已經逐漸得到改善。

探討社會變遷的同時，不應忽略人口變遷的重要性。新中國建立後，舉辦了四次人口普查。因此在中國人口研究中，西方學者過去一直集中於探討人口統計資料的準確性、一致性。然而，對於一些廣為關注的問題，如關於中國人口的實際增長速度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約以及它對於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哪些影響，則缺乏深入的實證分析。在人口研究中，由社會學研究傳統而發展出來的「人口轉型理論」(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在西方

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

人口理論探討中一直受到相當的重視。涂肇慶探討這一理論的起源、演變及發展。通過對其批判性的回顧與評述，進而指出當前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學學者對此理論的注意以及這些學科對其發展的貢獻。鑒於此理論缺乏在中國的運用，作者特別引用了一些蘇聯及東歐解體後的經驗，作為未來探討中國人口變遷的實證研究的借鑒。

本書中大部分的論文是基於作者們在 1998 年 8 月間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行的題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的講演稿。我們感謝福特基金會和香港科技大學為研討會及論文的修改、出版所提供的資助。在此過程中我們亦得到許多人士的幫助、支持和鼓勵，尤其是北京大學王漢生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蘇國勛教授，香港大學孫文斌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丁邦新教授、蘇耀昌教授和何高潮博士，美國史丹福大學暨香港科技大學魏昂德教授，美國密西根大學梁浙西教授，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趙文詞教授，以及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編輯。香港科技大學方慧容小姐和余永逸先生在論文的翻譯和打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鑒於不少西方學者的姓名往往有多種中文譯法，在行文中我們對此用以下方法處理，以避免混淆。常見的譯名（如韋伯、黑格爾、洛克等）以慣例為準。華裔學者以中文姓名稱之。但在列舉他們的英文著作時，則以其發表時所用的西文姓氏拼法注明出處（其他學者亦然）。有些非華裔的中國問題學者為自己起了中文名字（如費正清、魏昂德、趙文詞等），我們盡可能沿用。在首次提到他們的地方加以注明，並在第 245 頁與原文姓名對照列出。其他西方學者的名字則不翻譯成中文。

1 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後中國的社會變遷¹

魏昂德 (Andrew Walder)

美國史丹福大學社會學系、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一 引言

在過去十年裏，中國研究發展很快，有了根本的變化。這本刊物的上次對中國研究綜述時 (Whyte 等 1977)，活躍在這個領域的美國社會學家大概只有三位，發表的研究也很少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加以論述的²。嚴謹的社會分層、社會流動和社區組織的研究可以說尚未開始。缺乏數據和研究機會是造成此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直到 80 年代，外國學者到中國作研究的機會還很少，基本的社會統計數據找不到，中國本國的社會科學家還不能進行獨立的研究，大眾傳媒中所包含的有價值的信息又很少。

但是到了 80 年代中期，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都改變了。有

¹ 原文為英文，經作者及出版社同意，在此以中文重印。方慧容翻譯。(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ume 15, © 1989, by *Annual Reviews*.)

² 第一代中國研究的兩位先驅那時候已不再活躍於中國研究。Franz Schurmann 曾對政黨意識形態在中國政治組織中的作用做過權威性的分析 (Schurmann 1966)，但那時候興趣已經轉移到其他方面。傅高儀 (Ezra Vogel) 就人際關係 (Vogel 1965)、政治權威 (Vogel 1967a)、科層制行為 (Vogel 1967b) 所作的研究也頗有影響，但當時也已經轉去對日本的研究，直到 80 年代中期，他才重返中國研究。

十多個社會學家活躍在中國研究領域並以中國研究作為其專業。出版物成倍的增長——大部分在 80 年代出版的研究成果是基於對在香港的大陸移民的研究³。中國有關政府機構開始搜集各種統計數據並陸續公佈。北美學者經批准可以到不同的調查點做研究（如，Henderson 和 Cohen 1984；Nee 1985；Selden 1985, 1988；Siu 1989；Yang 1986, 1987；Zweig 1989）。中國社會科學的復甦推動了系統的社會調查的發展，激發了對西方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濃厚興趣。這反過來促成了數項近來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的合作調查。數位社會學家因而第一次被吸引到中國研究的領域上來⁴。中國學生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常帶來一些數據，因而也促進了中國研究的發展（如 Lin 和 Xie 1988；Xie 和 Lin 1986）。

這些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學者們對於中國的認知和研究視角。不少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曾經風行一時的研究中國社會變遷的觀點被推翻了。直到 70 年代中期，學術研究的主流仍是收集資料，弄清 60、70 年代社會變化的真實面貌，以及解釋毛主義政策所導致的各種意外後果。進入 80 年代後，由農村席卷而來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將另一個研究課題推到前沿，即市場經濟復活和新的所有權形式對社會分層、社會流動、科層制行為和社區生活有甚麼影響？

這些研究有相當一部分涉及在社會學上有實質意義的問題，但是它們的成果在本學科內還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在這篇綜述

³ 70 年代是根據訪問香港的大陸移民作中國研究的鼎盛期。80 年代後，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到大陸作研究，訪問香港移民的研究風氣很快銷聲匿跡了。但是在我所綜述的這些方面，現已發表的，基於在大陸做的研究的成果仍然影響有限。

⁴ 如，Peter Blau，Glen Elder，Alex Inkeles，Nan Lin（林南）和 Anthony Oberschall。

中，我集中介紹四個研究領域中的最主要的研究成果，討論其學術意涵及其關注點的變化。這四個領域是：經濟發展、社區組織、科層制、社會分層與流動⁵。

二 中國發展類型

70年代，很多學者認為中國代表了另一種第三世界發展的類型。中國政府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奉行獨立自主的發展道理，既拒絕國外投資也不向國外出口。這種經濟策略造成了二十年持續穩定的工業增長，在消除大眾貧困、延長預期壽命、降低嬰兒死亡率方面獲得顯著成果。不僅如此，中國政府力圖縮小工資差別，以精神鼓勵代替物質刺激，縮小城鄉差別，重視農村發展，實現完全就業和提供廣泛的社會保障及嚴格控制城市化。在那些將第三世界的不平等、貧窮和經濟停滯歸結為依賴外資的社會科學家眼裏，中國似乎提供了一個相當有吸引力的替代模式。

現在看來，中國的確在上述的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預期壽命確實迅速提高了，傳染病發病率也確實大幅度降低，甚至達到了那些平均收入水平高於中國的亞洲國家的水平(Banister 1987；Eberstadt 1988)。中國工業、糧食產出和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都位於低收入國家的前列(Riskin 1987，第8章)。更突出的是，在城市實現了廣泛的社會保障和全面的就業保障(Davis-Friedmann 1983；Walder 1986，第2章；Whyte和Parish 1984)。城市化得到嚴格控制，措施之一是強制高中畢業生到農村落戶，以此減少城市失業(Bernstein 1977；Kirky 1985)。由

⁵ 限於篇幅和作者的能力，我們對人口學的發展省略不談。這方面的研究值得單獨寫一篇文章討論。

於嚴密的街道組織和控制城市流動，泛濫於世界上大多數城市的犯罪和混亂在中國並不突出（Whyte 和 Parish 1984）。

但是，到 70 年代末，這種發展模式遇到了許多困難。惹人羨慕的增長率掩蓋了一些嚴峻並日益惡化的問題。當中國領導人重估過去的發展策略時，他們公開了大量有關過去成就的數據。結果發現，雖然糧食產量自 50 年代以後增加了一倍，人口也翻了一番（政府基於政治考慮，拒絕生育控制所導致的災難性後果）（Banister 1987）。更大的問題是，農業自給自足政策強制所有地區實行糧食自足經濟，這導致不經濟的播種計劃和曾為許多農村地區帶來高收入的傳統小商業和經濟作物的衰退（Lardy 1983）。結果，從整體上說，人均糧食消費在過去二十年裏實際上還略微降低了。不僅糧食消費的數量降低了，糧食的質量也惡化了。植物油、魚、糖和水果的消費都顯著降低（Lardy 1983）。飲食的質量，以從糧食中所攝取的卡路里的百分比作指標低到同埃塞俄比亞和孟加拉同一水準（Eberstadt 1988，第 7 章）。到 1978 年，百分之二十的農村人口，糧食消費尚達不到中國政府所規定的最低生活標準。糧食消費可能從 1949 年就開始下降（Lardy 1983）。在掃盲率和提高初中入學率方面，中國所獲得的成就同印尼相差無幾，比印度要好，但只及台灣和南韓的一半（Eberstadt 1988，第 7 章）。

在城市，從 1956 年以後的二十年裏，真實收入下降了幾乎百分之二十（Walder 1984）。城市人均住房面積以同樣比例下降，住房儲備惡化得更厲害（Walder 1986；Whyte 和 Parish 1984）。國家政策摧毀了小私有部門，導致新鮮蔬菜和水果的缺乏。一些基本服務設施，如小賣部、旅館和各種修理業面臨同樣的短缺。各類主副食品和工業品，從豬肉到收音機、自行車，一

概配額供應。不僅質量很差，而且供應不足（Whyte 和 Parish 1984）。

顯然，毛的策略不過是斯大林式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翻版。中國農民雖然沒有經歷像斯大林時的蘇聯一樣的政治恐怖和強徵暴斂⁶，他們依然受到了為支持城市工業發展而實行的有組織和有計劃的剝奪。農民所賣出的徵購糧的價格一直保持低水平，但是農民購買的工業品的價格卻很高（Lardy 1983；Riskin 1987，第10章）。以糧食為基本換算單位計算，中國農民用於基本消費品的總支出大大高於其他東亞國家，對同類消費品的支出也是如此（Riskin 1987，第10章）。城鄉收入和城鄉食品消費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農業基本建設投資主要來自糧食徵購和從村莊徵用勞力，而非國家預算（Lardy 1983）。城市居民則居於特權地位，但他們的生活也由於優先投資工業致使長時間不漲工資，不提高消費水平和不改善住房條件，而難以改善（Walder 1984）。即使以勞動時間論，他們花在消費品上的錢，甚至花在主食上的錢，也比台灣，日本甚至蘇聯的工人要多（Klatt 1983）。

這種發展類型同蘇聯類型一樣低效。工業生產率從50年代開始就持續下降。單位投資產出從1952年到1978年大約下降了25%。這意味着工業增長幾乎全部是由於其他部門的資源轉移到工業的結果，而非投入效益的增加（Riskin 1987，第11章）。集權式管理，投資決策的非理性化，和缺乏勞動激勵是工業發展

⁶ 大躍進時的糧食過度徵收惡化了由於對播種和耕作類型的錯誤指令而引發的饑荒（Bernstein 1984）。對1982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證明從1959年到1961年大約有兩千萬到三千萬的人死亡（Ashton 等 1984）。

失敗的主要原因(Riskin 1987, 第11章; Walder 1986, 第6章)。

同東亞鄰邦相比，中國尤其顯得發展緩慢。到 70 年代末，不僅日本，而且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都實現了工業化而且成為比較富裕的社會。同台灣相比更能看出問題所在。台灣的發展截然不同於依附理論和早期的不發達理論所描繪的發展圖景。台灣不僅在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上比中國發展快得多，而且它在收入平等、健康保護、降低嬰兒死亡率和控制生育率上所取得的成就也與中國不相上下，甚至還超過中國(Amsden 1979; Barrett 和 Whyte 1982; Eberstadt 1988)。台灣的例子提供了另一種與依附理論相悖的發展模式。與中國模式不同之處是它使得許多人認識到真正適宜的做法是讓政府對本國國際化的經濟活動進行有效的管理，而非閉關自守或袖手旁觀。

1978 年後的經濟改革所產生的直接效果使毛模式下的停滯不前更加突出。自從回歸家庭耕作，採用物質獎勵，實施管理改革和允許城市中少量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經濟發展是驚人的。糧食和其他副食品的年增長率隨即翻了一番以上，並且持續了六年。農業多元化和人均產量的增加使飲食結構大大改善(Riskin 1987, 第 11 章、第 15 章; Lardy 1984)。在城市，真實收入增加了 65% 以上，在鄉村，增長了一倍多(Walder 1987; Riskin 1987, 第 15 章)。基本生活用品和高檔用品的消費翻了幾倍。從 1978 年到 1986 年，城市建房自 1949 年以後的三十年裏第一次和人口增長同步增長(Walder 1987)，農村建房率更高(Riskin 1987, 第 15 章)。雖然新的發展策略面臨許多尚待認識、解決的問題，但是毫無疑問，今天的策略已經鮮明地襯出中國早期發展道路的缺陷。

參照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從 1949 年到 1979 年的發展，中

國的發展模式並不令人羨慕。它建立了大規模的重工業基礎，但是浪費、低效益、虧損也很嚴重，輕工業不發達，農村基本建設薄弱。中國在健康保護、預期壽命、識字率、嬰兒死亡率，和其他生活質量指標上獲得了真正的進展，但是這些發展同其他市場經濟下的東亞國家的發展相差無幾或者還比不上它們。通常的評價是中國在這些方面的成就比在同一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國家要好。但是這種以劃一標準做的比較只會產生誤導，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中國自身的發展模式本身使得它與鄰國的收入差距拉大。在一個社區內，中國能夠使其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化，但是卻允許社區間的收入差距膨脹。社區內的平等無助於五分之一最窮的農村人口的生活改善。在1959到1961年，大約有二千萬人死於人為的饑荒。直到70年代末，一部分農村人口依然生活在貧困線上。飲食結構在整整三十年裏並未顯著改善。

中國儘管很貧窮，但是從50年代開始它就有一個優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特徵：它的政府有不同尋常的組織能力，並且能將其政治意志貫徹到最基層，實現其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在以後約三十年裏，隨着走入歧途的政策左右搖擺，這一優勢無用武之地。儘管80年代取得了明顯的成功，中國對發展道路的探索還遠未結束。今後是會持續80年代的經濟增長，還是過去靠拋棄舊政策所輕而易舉獲得的成功已走到了盡頭？國家能否控制通貨膨脹，保持外匯收支平衡，確保國家最窮的那一部分人的基本生存和福利？還是國家喪失對宏觀經濟的控制，加大收入不平等，窮人陷於更糟的境地？很可能，管理不善的中國經濟會對國家提出比70年代的中國經濟更難以對付的問題。70年代的中國經濟畢竟治理起來還比較容易。

三 地方社區結構

70年代基於香港的研究主要依賴對移民的深度訪談。這些研究大量集中在對城市工廠、居委會和村莊組織的研究。80年代的研究則依據對長居大陸的人的訪談材料（如，Henderson 和 Cohen 1984；Gold 1985；Yang 1986, 1987）。這些材料所描繪的社區組織類型的特徵是流動率低，對單位在物品和服務的分配方面的依賴程度高，以及注重個人忠誠、義務和互相幫助的關係網分布廣泛。在毛的發展模式影響下，社區生活中產生了一種新的迥然不同於其他現代組織形式的社會組織類型。

這個組織類型第一個突出的特徵是高度缺乏居住和職業流動。在60年代和70年代，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和食品配額制度將農民束縛於其所在的村莊，將城市居民束縛於其所在的街道。這個系統有效地限制了向城市遷移，還賦予政府權威迫使一千六百萬的城市年輕人到農村安居。中國城市的居住流動率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要低得多（Whyte 和 Parish 1984）。雖然人事調動的頻繁程度難以準確測定，除了在極少數部門以外，大多數職工都認為直到退休都會呆在其所工作的單位（Walder 1986，第2章）。

這個類型的第二個突出特徵是工作方式和居住方式的結合程度。在農村公社中的生產小隊，工作的地方當然和居住的地方是完全混合的。城市工作單位擁有30%到40%的中國城市住房，他們是僱員新房的主要提供者。許多大工廠（尤其是處於城市郊區）、醫院、學校，和政府機構都是幾近封閉的社區，在社區裏，大多數僱員都居住在工廠大院裏（Henderson 和 Cohen 1984；Whyte 和 Parish 1984；Walder 1986）。

集體消費類型是工作單位的另一個重要特徵。來自企業盈利

或國家預算中的資金用於補貼給僱員各式各樣的服務或物品。新房、醫療設施、學校、幼兒園、小賣部、文娛設施和食堂都由集體提供。在城市裏，配額或不配額的消費品、僱員的工作單位宿舍，還有基本的食品供應，也都由工作單位分配。

在這些地方社區裏，政治、經濟權力和大量的政治組織幾乎完全融合成一體（Nee 1983；Whyte 1974b）。結果是，在工作單位的每一個辦公部門和研究室都有黨和共青團的代表。宣傳部門、安全部門，和人事部門由黨支部操縱。工作單位有每一個僱員的政治檔案（Walder 1986，第3章）。每一個村莊也有同樣一整套組織，只不過政治組織的力量沒有那麼強，檔案也只針對少數目標，如以前的地主（Parish 和 Whyte 1978）。除了極例外的情況，領導位置都由黨員擔任。

在這樣的社區裏，官員不僅在其管轄權內有相當大的政治權力，而且還在分配住房、消費品、漲工資和提升等方面有廣泛的處置權。有些學者已經發現此情況已滋養了一種人治類型，領導者用其可自由處置的權力建立個人對他的忠誠（Chan 等 1985；Madsen 1984；Oi 1985, 1989；Walder 1986）。它同樣提供了一個很容易滋生政治腐敗的環境。進而，在工作單位裏對行政分配的依賴和官員在分配物品和那個時期的各種緊俏貨上的自由處置權導致個人紐帶在社會生活中非常活躍，人們依賴個人紐帶獲得緊俏物品、各種服務和機會（Gold 1985；Walder 1986，第5章；Yang 1987）。

這種發展類型同城市化理論所描述的隨着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居民日益分化和孤立的景象完全不同（Whyte 和 Parish 1984）。它亦沒有印證早期研究所預見的情形——政治制度對基層社會強有力的滲透會將人們分隔成單一個人為基礎的大眾社會

(Walder 1986, 第 1 章)。相反，它看起來朝不斷增加社區整合的方向發展。

雖然人們對 60、70 年代社區組織的基本特徵有很一致的看法，但是對 80 年代新的經濟政策執行後，這種社區組織會發生甚麼變化卻有不少分歧。有些人認為市場和生活富足弱化了對工作單位的依賴，同時也使依賴個人紐帶獲取物品和服務不再那麼必要 (Gold 1985; Vogel 1989)。另一些人指出社會流動依然很缺乏 (Davis 1988b) 及工作單位的控制力還在不斷加強 (Walder 1986, 第 7 章; 1987)，這些學者還強調市場和個人紐帶並不是對立，不可並存的。

我們現在所分析的問題是經濟變遷在多大範圍上會改造社區權力，以及多大程度的經濟變遷才能對社區權力加以改造。由於集體農業解體和所有農民都很深的捲入市場活動中，鄉村成為研究這一問題的一個有利場所。有些學者發現幹部抵制變遷，他們還認為幹部的權力和相對經濟地位在改革後下降了 (Nee 1988; Zweig 1986)。另一些學者發現農村官員利用政治權力投身企業活動，成為企業家或同新富起來的農民結成新的庇護關係 (Oi 1989; White 1987)。從經驗材料來看，既有支持前一種觀點的證據，也有支持後一種觀點的證據，因此兩種觀點都有一定的事實基礎。進一步的研究應說明社區權力之所以有不同命運的決定條件。

最後，也是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在甚麼條件下市場能夠摧毀城市的社區組織類型，或在多大範圍內社區權力類型束縛了城市市場的發展或扭曲了其運作。雖然勞動力流動越大，物質越富足，城市居民便會越少依賴他們的工作單位這個說法，從邏輯上看是正確的，但是事實上工作單位在提供集體消費上比以前更活躍，從現有的情況看，由工作單位提供僱員住房和社會保障正成

為勞動力市場發展的重要障礙 (Walder 1987)。在這方面的系統研究，正如變遷本身一樣，還處於起步階段。

四 官僚體制

70年代，學者對毛推行的反官僚制運動有廣泛的興趣。文化大革命在摒棄科層官僚方面是冷酷無情的。所有級別的國家機構都遭徹底清洗，大批人員被送往勞動改造，組織人員最初縮減得很厲害，專業技術和證書被踩到腳下，讓位於政治忠誠。所有規章程序都被取消，許多機構被裁撤或合併。毛主席者還聲稱要建立一種參與民主制，讓大眾都能批評領導，由革命委員會代表大眾行使職權 (Nee 1973; Whyte 1973)。

這些成果為70年代早期的研究設定了兩個問題：(1) 一個大的行政機構能否只靠少量的正式規定和專業人員就有效地發揮功能？(2) 一個有效的科層體制能否和大眾民主的實踐相容？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的例子質疑了科層體制在現代管理體制中不可避免的看法 (Nee 1973; Walder 1979; Whyte 1973, 1974a)。

由這些問題所引發的研究很快變得無關緊要，因為70年代末的研究表明毛主席者反官僚體制的公開面目同實際的組織頗不一致。早期的人員縮減只是臨時性的，被清洗的官員最後都回到了他們原來的位，但是他們要同新的一代一起工作，新的一代沒有甚麼專業知識，只在政治上積極和忠誠。在現實中，官僚體制進一步膨脹。各種規章程序被取消了，但是既然權力掌握在非專業人員手裏，拖延、懈怠、玩忽職守變得比以前更普遍。在取消各種規章、只看重政治忠誠和意識形態的順從的情況下，大眾民主制的實踐變成空洞的儀式，專斷權力比以前更集中在各級組織的政治官員手裏 (Walder 1982; Whyte 1989)。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研究表明毛主席者確實建立起了。

個替代法理科層制的政治模式，卻不是甚麼新模式。反思這種社區組織類型，許多觀察者開始用「家長制的」或「新傳統主義」來描述這一管理體制（Kraus 1983；Walder 1986）。摧毀已有的程序和監督系統，在職位提升時貶低專家只重政治忠誠，以及仰仗政治上純潔但缺乏專業訓練的人作最後的決策，致使人治系統很快墮落為專斷和腐敗。到 70 年代末和整個 80 年代，中國的輿論不懈地將裙帶關係、腐敗，和其他諸如此類的「封建殘餘」斥責為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障礙。

初看起來，毛主義者所推行的替代模式的失敗和後毛時代呼籲更理性的官僚管理程序似乎證明了理性組織對經濟發展是不可缺少的進化理論。但是 80 年代的發展表明腐敗和人治很難根除。更理性和非人際的組織方式確實能更好地推動經濟發展，但是它們不會以進化的方式產生：大量致力於變遷的努力只獲得了部分成功。80 年代的報導譴責市場機制和唯利是圖的動機是腐敗嚴重的重要原因，但是研究表明腐敗已經根深蒂固。這說明腐敗的日益嚴重雖然是經濟變化提供的新機會所致，但腐敗卻不是甚新的官僚現象。

研究者現在面臨着一個課題：市場機制的擴展能在多大範圍內侵犯官僚權力實施的領域，或人治類型能在多大範圍內延緩經濟改革的發展（如，Walder 和 Ruan 1988；Walder 1989）？

五 社會分層和流動

毛的平均主義政策很自然引起人們對社會分層和流動的興趣。70 年代中期，第一次有可能對遷移人口作系統的抽樣調查，研究結果似乎表明中國確實是一個相當平等的社會，但是其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平等程度要看度量的是哪一方面不平等，以及同哪類國家相比。這以後，官方數據、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所作的調

查，以及有時中國和外國學者的合作調查未從根本上質疑早期的發現，但這些研究揭示出毛的發展類型確實加劇了許多方面的不平等。隨着而來的新的經濟模式似乎容許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在這種情況下，舊的分層模式會如何變化因而成為學者們進一步關注和爭論的問題。

1. 收入和消費

70年代，中國城市的收入分配比市場經濟下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平等，收入不平等即使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是最低的（Parish 1981, 1984；Riskin 1987，第10章）。70年代末，絕大多數收入差異是生命週期造成的（Davis-Friedmann 1985；Riskin 1985，第10章）。雖然中國城市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將鄉村貧民排斥於城市福利之外實現的，許多觀察者還是認為這是一項突出的成就（Parish 1984；Whyte 和 Parish 1984；Riskin 1987，第10章）。中國模式提供給專家和官僚在住房和商品消費方面的特權看起來也比較少。收入、商品消費和住房標準三者間的相關程度，中國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要低（Parish 1984）。雖然村際間收入分配的數據很不全面，這些數據還是證明了一個類似平均主義的分配類型（Blecher 1976；Selden 1985；Riskin 1987，第10章；Unger 1985；Vermeer 1982）。

後來的研究修正了以上的研究結果。越來越清楚的是雖然城市間和農村間的收入平等很明顯，農村區域之間和城市和鄉村之間的收入差距，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卻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顯著的擴大。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距從50年代的大約二比一擴大到三比一，甚至六比一。差距的多少取決於是否將國家對城市住房和食品消費的補貼包括在內（Parish 1981；Whyte 1986）。食品消費、食用油、棉布和耐用消費品方面的差距更驚

人 (Lardy 1983 ; Riskin 1987 , 第 10 章) 。在不同農村區域間的收入和消費差距也增加了 (Vermeer 1982, 1988) 。到 70 年代末，中國卡路里攝入量的區域差異已大於印度、巴西，和印尼 (Eberstadt 1988 , 第 7 章) 這些區域間和鄉村和城市間的差異遠遠大於其他國家在這方面的差距，它抵銷了社區內部的平等效應。結果是，若整體上看收入分配的數據，中國的收入平等並不突出。它同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南斯拉夫處於同一水準。中國百分之四十最窮的人口佔國民收入的比例同印度相同 (Riskin 1987 , 第 10 章) 。雖然毛主義者的模式在維持社區內收入低差異上很成功，社區之間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卻被忽略了。

一個重要的尚未有圓滿答案的問題是有關在城市工作單位裏，以集體消費形式構成的大量非現金收入。眾所週知，能否獲得住房、住房質量的好壞、醫療照顧，和其他由官僚體制分配的物品和服務的質量和數量都隨工作單位的規模和行政級別有很大差異。但是這種差異還沒有經過仔細測量，我們還不清楚集體消費和服務是降低還是惡化了收入不平等。由於 80 年代市場分配和更大的個人生活富足可能導致這一領域的某些重大變化，這一研究空白就顯得更為突出和重要。

隨着集體農業的解體和城市私有部門的逐漸膨脹，許多學者假定中國將邁進一個收入更加不平等的新歷史時期 (如 Whyte 1981) 。已有清晰的證據表明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有所增加 (Riskin 1987 , 第 11 章) 。同樣有證據證明在城市勞動力之間和不同年齡段的職工間的收入差異也加大了 (Davis 1988a, b) 。但是在某些方面收入不平等是降低了。比如說，城鄉間的收入差距隨着改革後農村收入的劇增明顯縮小了。官方數據表明這種收入差距從 70 年代末開始大約縮小了 25% ，但也有人認為城市生活補貼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城市居民相對收入的下降 (Whyte

1986；Lardy 1984）。農村糧食和耐用品消費、新建住房面積和銀行儲蓄都比城市增長得快（Whyte 1986）。農村區域間的收入差距在某些方面增加了，某些方面縮小了（Selden 1988；Vermeer 1988）。一項對城市工薪者的調查表明，在1976年至1986年的十年間，恢復獎金支付和增加基本工資降低了大約25%的收入差距。在工資增長停滯了十多年後，1976年到1986年的增加工資是縮小收入差距的一種方式（Walder和Ruan 1988）。這一研究內容對以後幾年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從概念上說，它與在不同歷史背景下，市場和官僚組織在維持和或降低收入不平等中的角色等問題直接相連。

2. 性別差異

從文獻資料來看，毛時代中國的兩性平等程度並不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高。研究者現在都一致認為中國在兩性平等上的進展不大。更甚的是，儘管還沒有作系統的研究，初步的研究資料表明中國婦女的地位在改革後進一步惡化了。

70年代對在香港的大陸移民的調查表明，在中國城市，以收入和職業隔離來看，中國的兩性不平等類型同經濟發達國家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沒有顯著不同（Whyte 1984）。80年代開禁的數據表明中國在初中入學率和識字率上的兩性不平等比香港、台灣、南韓要高兩倍，甚至比印尼還要高，同印度差不多（Eberstadt 1988，第167頁）。婦女就業並未降低兩性不平等，反而產生了新的更複雜的問題。大多數人依然認為家務負擔主要是婦女的事（Whyte和Parish 1984）。

大多數分析者現在認為，關鍵問題不是提高婦女就業，而是改造家庭結構。在農村，儘管婚姻法的最初實施改造了舊式家庭的許多惡習，農村社會主義體制對家庭制度中的父系家長制特徵

並未觸及。不少學者認為這些家庭特徵之所以未被觸及是因為它們會破壞農民對黨的支持以及使經濟發展計劃更難以展開。鄉村的集體農業制度是以下列一些條件為前提的：給男性勞力高工分、男性家長制、新娘能在丈夫所在的社區獲得居住權、後代可繼承居住權、以戶為單位，以及男性獲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換句話說，農村社會主義制度強化了傳統家庭制度和對婦女的價值觀（Andors 1983；Johnson 1983；Stacey 1983；Wolf 1985）。70年代對農村家庭的研究支持這種對鄉村生活的理解（Parish 1975；Parish 和 Whyte 1978）。

80年代對中國的研究發現，有關婦女角色的傳統觀念在中國依然根深蒂固。最令人吃驚的是，婦女在生理、智力和道德上低人一等的傳統觀念依然很流行，甚至一些中國的女大學生也如此認為（Wolf 1985；Honig 和 Hershatter 1988）。恢復家庭農業後，傳統婚禮再次興起，村外收入機會明顯由家庭中的男性成員壟斷，這些都使人們預期經濟改革會進一步降低婦女地位。一項對城市勞動力的研究表明，性別隔離正變得越來越明顯（Honig 1988）。我們拭目以待更有系統的研究。

3. 社會流動

60年代和70年代針對在香港的大陸移民所作的調查表明，地位代際傳遞並不普遍。60年代早期，從父親向後代的地位傳遞率比波蘭和芬蘭這樣的國家低很多（Parish 1984）。此外，相鄰年齡羣的地位差異也沒有太大變化，這表明地位代際傳遞降低已有一段時間。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代際地位傳遞完全停止了。這可歸結為幾個不同尋常的原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校的學制縮減到初中，學生被送往農村，不知甚麼時候可以回來。大學只到70年代初才重新招生。這些政策幾乎完使地位獲得的

機會完全平等，不過這是在關閉學校、凍結工資和職位提升的情況下，中止年輕一代地位獲得的結果（Parish 1984）。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直到 70 年代末，按照政治標準所劃分的地位歸屬羣體對各種生活機會的分配有全面影響。全體社會成員根據其父親或祖父在 1949 年的職業和政治面貌劃分為不同的類別：政治類別按照父系血統傳遞。名義上，被剝削的階級、黨員和紅衛兵在學校招生、分配工作和提升上有優先權。以前的中產階級、技術專家和知識分子，屬於中間地位羣體。以前的剝削階級、國民黨分子、政治犯的親屬則飽受歧視（Kraus 1981；Whyte 1975, 1985）。

地位分類對受教育程度有全面的影響。一項對年輕移民的大型抽樣調查發現有兩個羣體更可能上好的高中：一個羣體是共產黨幹部和軍隊幹部的子女，另一個羣體是有文化的中產階級的子女。第一個羣體受益於他們的歸屬地位，第二個羣體受益於他們的父母為他們提供的家庭環境。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子女進好學校的並不太多，甚至升不了高中。歸屬地位類別可拿來作裙帶關係的幌子：有權勢的人可以在一開始，就以成分好的名義送他們的子女進好學校，沒有權勢的人則很難如願。另一方面，被標以「壞」地位類別能有效地限止以前剝削階級和反動派的孩子的人學機會（Rosen 1982；Unger 1982）。類似的優勢和劣勢也影響當時的職業流動。

學生和一些工人強烈的意識到這些人為的地位標記，這對友誼類型和後來的紅衛兵運動中的政治派系的形成有重要影響（Blecher 和 White 1979；Chan 1985；Chan 等 1980；Lee 1978；Rosen 1982；Unger 1982；White 1976）。由於這些標記對成年人所能獲得的生活機會有決定性影響，它甚至成為女性擇偶的一項重要標準（Croll 1984a）。在農村，對以前地主和富農的歧視

甚至嚴重到使屬於這個羣體的男性很難娶到妻子：他們無法娶到其地位之外的女性為妻，婦女不會願意讓她們的後代受歧視。另一方面，大多數地位低的女子渴望嫁一個地位高的男性（Unger 1984）。

一些同樣由政治限定的特殊主義的標準對流動機會有類似的影響。共青團員、黨員和積極分子在高中和大學錄取、分配工作和職業提升上很受照顧（地位高的人在加入黨和共青團組織，和在組織內獲得晉升方面有優先權）。高中學生對這些政治標籤相當重視，在 60 年代早期，在名牌學校裏，政治表現上的競爭就十分激烈（Chan 1985；Shirk 1982）。其原因可從共青團員和黨員的構成看出：黨團員比例隨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加，好學校的黨團員比例較高（Rosen 1982；Unger 1982）。對 1949 年以後的年齡組按照教育水平分類，結果發現受教育越高，黨員比例越高。按照職業地位對所有年齡組分類，得到類似的結果：職業地位越高，黨員比例越高（Walder 1985）。利用中國抽樣調查第一次對後毛時代的地位獲得進行分析，結果表明黨員依然是職業地位的一個重要指標，儘管並不像 60 年代的研究所揭示出來的那麼強（Xie 和 Lin 1986；Blau 和 Ruan 1989）。

很明顯，中國 60 年代和 70 年代地位獲得的途徑是相當獨特的。70 年代早期，父母和子女地位的明顯斷裂以及 60 年代早期通過歸屬地位實行有歧視的生活機會分配，給所有主張政治對社會流動的干預是有限的學者提供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反例。中國研究不同於美國的地位獲得研究還在於它主要是靠對個案的制度背景進行分析。由於長期缺乏抽樣調查數據以及政治標準對地位獲得的明顯影響，中國研究對那些影響流動的社會和政治過程更敏感。雖然美國最近對社會流動的研究也試圖重新將工作制度引進

研究框架裏來，細緻的個案研究仍沒有在中國領域中運用得那麼廣泛。

目前在社會流動體制裏所發生的變化仍有待澄清。毛的平均主義的時代結束了。在共產黨的新政策下，競爭性考試和技能對能否獲得入學資格和在工作崗位上提升又變得至關重要。歸屬階級標籤被取消了。從70年代末開始，個人檔案中不再包括階級成分這一欄。政治忠誠和響應號召的積極性雖然不是無關緊要的，但也不再是凌駕一切的考核標準。城市所開辦的私有部門雖然規模還很小但生機勃勃，農村向家庭耕作復歸，財產和財富因此有可能在代際地位傳遞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反之，政治特權在代際地位傳遞中的作用則逐漸縮小。

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城市的地位獲得受父親地位和教育水平的影響比美國要低（Blau 和 Ruan 1989）。無論是父親的地位還是教育水平對兒子的地位獲得都未有直接的影響。只有父親的教育水平，以兒子的教育為中介變量，對兒子的地位獲得有間接影響。這項調查和最近的其他幾項抽樣調查使我們能比以前更準確地描繪中國社會流動體制的變化類型（如 Lin 和 Xie 1986）。

新的流動體制會是怎樣一個體制？有些學者主張強調競爭的擇優制將會出現（Shirk 1984）。有些學者試圖論證新的注重教育和能力的選拔標準會同溫和的要求政治忠誠的選拔標準同時起作用，二者交織在一起。接着這種觀點推論，隨着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黨在優先提拔政治積極分子和忠誠者時，會較少像以前一樣不得以降低用人能力為代價（Walder 1985）。隨着有更多的機會用系統抽樣的方法分析社會流動，在未來十年裏，很有可能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而前一代提供的以制度分析來理解中國的社會流動過程的研究思路則會對新一代的研究者產生很大助益。

六 總結

中國在 1949 年革命勝利以後的頭三十年裏發生的社會變遷頗有些諷刺性的意味。一方面毛提倡的不同於西方的替代發展模式的確已經付諸實施，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它也的確對西方理論構成一種挑戰。另一方面，真正構成這一挑戰的社會現實既不是毛主義倡導者們自以為已經造就的那種，也不是學者們在早期的研究中所爭論的那些。而真正面臨挑戰的也並不都是當初人們所以為受到挑戰的那些理論。

從根本上來說，毛的發展模式對早期贊賞這一模式的那些專門研究不發達國家的發展形態的理論家們提出了挑戰。孤立於世界體系以及自給自足的發展策略所導致的是大量的浪費、遲緩的經濟發展，以及許多嚴重的社會失衡。生活標準遠遠落後於鄰近的發展中國家，重工業投資過剩，浪費嚴重，農業組織的非理性，一些過去存在的不平等雖然降低了，但是新的不平等加大了，最貧窮的農民的物質條件並沒有多大改善。三十年的發展經驗（包括中國和台灣）既挑戰了將發展中國家的貧窮、不平等、停滯主要歸結為其在世界經濟秩序中的位置的理論家們，也挑戰了那些宣揚以脫離世界體系作為發展中國家出路的理論家們。

中國地方社區的發展也包含了不少具有挑戰性的現象，如：封閉的、自給自足程度相當高的社區；大量的以集體消費的形式直接向社區成員提供的物品和服務；全面的就業保障；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融合；建立在個人忠誠上的權威和廣泛的個人關係網下的社會互助。與那些以短期工、高社會風險和大量的就業和人口流動為特徵的近代中國城市相比，這些發展代表了一種決定性的轉變。它同流行的城市化理論、大眾社會理論（無論是集權主義還是多元主義）和社會分化理論所提供的論述相抵觸。這促

使我們重新思考政治和經濟結構對現實中的社會分層和社會平等類型的影響。

研究者最初認為中國的官僚體制試驗引發出了能否降低等級制和引入民主制之類的問題，但是現實卻證明中國的政治體制走向的是傳統家長制和現代科層制的混合。這一發展暗示 Robert Michels 所講的寡頭政治的鐵律有了現實的續篇：也許 Michels 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看到的寡頭政治不過是後一個發展階段的前奏，在後一個發展階段，「家長制的鐵律」困擾着領導中央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政黨。而在當今的中國，按照更加理性——法制的模式去改造官僚制度在政治上則難免會遇到既得利益的頑固抵抗。所有這些現象，在組織社會學中都沒有充分的論述。但他們所反映的卻是韋伯和 Michels 當初所關心的問題。

中國的社會分層和流動類型受到以政治考慮為分類和特殊對待標準的影響長達三十年。這也對比較研究提出一個挑戰。在中國研究中有不少重要的變量，如工作單位（尤其是城市中的）的集體消費、政治歸屬、政治特殊主義等。但其影響只到最近才能去測量。在受它們影響的分層系統裏，單靠收入很難測出實際生活方式的差異。需要瞭解制度過程及個人行為才能準確把握社會流動的政治層面。僅用聲望和收入來做分層研究有其局限性。比較流動研究通常注重比較各國的流動率，而政治和制度過程可能是國際差異的最重要方面，因此不可忽略。

最後，80年代的經濟變遷也帶給我們一些挑戰：市場和私有部門能在多大程度上同中央計劃經濟相結合？市場和私有部門對鄉村貧民的影響是甚麼？市場經濟導致收入差異的擴大和不平等還是降低內在於中國早期官僚體制中的不平等？在集體結構之外成長起來的替代機制能在多大程度上打破自給自足的地方社區？

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

經濟變遷在多大範圍內改造了官僚體制，使其向更理性的方向進化？家長制在多大範圍內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新經濟機會是否只增加了政府官員的腐敗？在多大範圍內，現有的這些變化消除了社會流動的政治標準，使中國的流動過程更趨向其他地方的流動過程？這些問題將成為 90 年代中國研究的熱點，我深信其答案將會在社會學界引起廣泛興趣。

2 五代美國社會學者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¹

趙文詞 (Richard Madsen)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社會學系

一 引言

如同所有知識分子，美國的社會學者與他們的同行，他們所研究的對象，以及最終支持和應用他們研究成果的社會大眾進行複雜的三邊對話。依我所見，好的社會學總要有我們這個專業認為可以接受的理論與我們在外部世界所搜集的資料，以及影響學術工作的道德倫理方面的輿論環境之間的協調。在北美，這種三角協調所帶來的壓力和緊張感在對當代中國的學術研究表現尤為突出，在這個領域的早期則更是如此。

當代中國研究——即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來的中國——是美國社會學中一個較新的分支，至今不到四十年。這個領域是由福特基金會於 50 年代末期到 60 年代初期創立的（主要通過美國學者協會理事會以及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的聯席委員會來發放資金）。起初，資金撥給三位在名牌大學任教的年輕有為的學者，包括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校區的 Franz Schurmann，哈佛大學的傅高儀和康乃爾大學的 William Skinner，以從事研究、組織研討會，和資助研究生為主。（因為 Skinner 當時的研究是以 1949 年以前搜集的資料為基礎的，而且其影響主要是在人類學而不是社會學，這裏我就不以其為重點了。）

¹ 原文為英文，趙軍翻譯。

起初，中國問題專家，其中包括社會學者，所關心的主要問題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這與當時冷戰不無關係。美國公眾當時對中國一無所知，卻因為一些有爭議的問題而產生分歧，譬如，中國是否會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構成威脅，如果會，將是何種威脅。美國政府和主要美國基金組織（諸如福特基金會和洛克非勒基金會）感覺受到共產黨體制國家崛起的威脅。那些以其資金主導中國研究議題的機構最希望瞭解的是新中國國家的起源、其結構與功能，以及其未來的發展方向（Schambaugh 1994；Madsen 1995）。

所有涉及現代中國的主要學術領域——歷史、政治學、經濟學——都以此為目標。這不僅是贊助者的希望，也是範圍更為廣闊的公眾的關注所在。大約在幫助建立起社會學中國研究的同時，這些基金會也向其他學科提供類似的支持。由於當時每個領域裏僅有寥寥無幾的學者，因而形成了一個延續至今的學術傳統。中國研究是跨學科的領域。特別是在初期，它受到的特定學科理論的影響遠不如廣大公眾關注點的影響。

但這一點後來發生了變化，因為一些年輕的中國專家感覺到了研究內容受到本學科主流的壓力（其原因是，他們主要是由社會學同事而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來鑒定可否獲得終身職位和提升級別）。不過，在北美，大多數從事中國研究的社會學者都受到其他學科理論的影響。這一點對於那些先驅者做的研究來說，尤為如此。

60年代進入中國研究領域的社會學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理解中國共產黨體制的國家之起源與發展。他們當時關注的，與政治學者和歷史學家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側重點。作為社會學家，他們感興趣的不僅是這個國體的內部運作，而且還包括了更廣闊的社會環境。

現在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研究仍然是研究中國的社會學者關注的一個問題，當然還有許多其他關注點，其中不少本書其他章節有所討論。自從 60 年代以來，此類研究描繪出的中國圖景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然而，這種變化不是簡單的新數據的增加的結果，也不僅是對中國社會變遷的直接反映，而是理論、數據、輿論之間三方面對話的結果。

我先討論環繞社會學研究，促使其建立起研究議題，並且影響研究資金分配的輿論。這種輿論提供了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 Alvin Gouldner 說的「學術研究的潛存氛圍」(metaphysical pathos of research)。他所說的「學術研究的潛存氛圍」是指那些影響研究議題並限定研究範圍的隱含的道德和政治世界觀。這種「氛圍」是一種未經檢驗的、模糊感覺到的隱蔽假想，而不是經過明確分析的思想 (Gouldner 1955)。

二 第一代：現代國家取代傳統社會

在北美，特別是 50 年代和 60 年代期間，這些假想中最重要內容是確信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普遍性。現代化勢必進行韋伯所稱的「理性化」，即將單一的、以傳統驅動的關係，有系統地變革為以有組織的方式達到經濟與政治目的。儘管在它初次使傳統社會受到影響時，必定會造成混亂並激發反抗，這個源自西方啟蒙的理想是勢不可擋的。現代化具有不同的形式，美國代表的理性化是一種將社會關係變革為達到經濟目的之手段的理性化。而以蘇聯為主要代表的國家社會主義，則將合理化最優先指向政治目的。大多數美國學者確信他們國家那種形式的現代化將很可能被普遍接受。至今大多數美國社會學著述的背景仍然隱藏着一個假定，即現代化是不可避免的。隨着蘇聯的瓦解，他們認為美國式的現代化是唯一可行的模式。只是在最近才有一些學者對這種

觀點提出質疑。在過去幾年，這種反思才開始影響他們研究中國的方法²。

當然，除了當時輿論的潛存氛圍以外，研究中國的社會學者還受到其本學科的理論架構的影響。而大多數研究中國的理論框架都是派生的。研究中國的社會學者大都陷於學習語言和尋找獲得資料的途徑的實際工作中，既無暇又無力從事創建和宣揚能夠影響社會學主流的理論。因此，他們的理論通常「取自書架」並加以修改，而不是從根本上改變它，使之符合中國國情。

60年代主要的社會學理論來自於 Talcott Parsons 的結構功能主義 (Parsons 1951, 1966, 1971)。Schurmann 和傅高儀兩人的研究都深受其影響。根據 Parsons 的理論，人的行動受到三種「體系」的影響，即文化、社會，以及性格。儘管這些體系彼此緊密交錯，但仍可以將他們區別開來分析。社會是一個「社會體系」，包括相互依存並趨於平衡狀態的角色和地位。如果其中一部分發生變化，其餘部分也會隨之變化，創造出新的平衡狀態。社會體系受文化體系指導。文化體系是指象徵意義體系。這些意義對構成社會制度主要階層和角色加以限定並提供合法性。因此，價值觀確定家庭、國體、經濟的導向。正如 Jefferey Alexander (1990) 所說，「價值觀是以象徵的、抽象的方法談論中心社會制度的問題。它們涉及的問題包括平等與不平等、自發與紀律、尊崇權威與批評行為等。」在具有不同價值觀的社會中，平等程度不同，政府專制程度不一，家庭管教嚴格程度各異。價值觀還通過規範具體化，確定一個人如何扮演其社會角色——如何當個好

² 例如，Eisenstadt (1996) 認為日本的現代化方式在不少重要方面都與美國的不同，因為前者在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是不同的。

工人或好公民或者好的家庭成員。誰按照規範和價值體系扮演角色，將獲得地位、權力、財富。誰若不能扮演好其角色，將受到制裁。除了受到社會的主導價值的影響，如何扮演社會角色也受到性格體系的影響。性格體系指的是佔主導地位的兒童撫養和教育方式使行動者發展出來的心理動機型。

最後，除了受輿論和他們學科的主導理論的影響之外，社會學者從事的研究也受到他們所接觸的數據的影響。當中國研究在社會學領域中開始時，資料非常有限——主要是官方報紙和在香港收到的無線電廣播，加上有時從一些來自大陸的難民口中聽到的故事。

Franz Schurmann (1971) 的經典著作《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是第一本出自一位社會學者筆下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著作，其資料來源便是如此。Schurmann 的理論有許多是從 Parsons 那裏得來的，並受到「潛存氛圍」的影響。這種「潛存氛圍」告訴他和美國公眾，現代化的進程是無可避免的、是無處不及的。《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這本書探討的是共產黨體制的國家如何從傳統中國社會制度的瓦解中產生。據他分析，歷時一個世紀的革命進程（此進程至少開展了一個世紀）摧毀了傳統中國社會行動的所有三個層面的中心成分：文化、社會體系、性格體系。他指的文化是儒教。他說的社會體系是使士紳成為統治精英的地位體系。他講的性格系統則指家長制動機、中國家庭的父權。他強調的是社會體系。他認為，這個體系在政治上的層面來自士紳階層擁有的自然權威，儒家價值體系為這個權威提供了合法性。隨着這個價值體系的瓦解，加上士紳階層沒能通過領導國家解決政治問題（帝國主義）和經濟問題而獲得新的權威，社會

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

體系失去了平衡狀態，再也不能抑制反叛的力量。最後，通過土地改革，中國共產黨人將士紳階層這個實體和心理上的社會階級摧毀了。

舊的社會體系完全消失了。正如 Schurmann 所說，「傳統的有關中國的文獻，能為學者研究共產主義中國提供很少準備。在準備書稿時，我不時強烈感覺到，現在的中國多不像『中國』。在這一切進程中，中國到哪裏去了？中國文化猶在，但中國的傳統社會體系卻蕩然無存」（Schurmann 1971）。Schurmann 認為，儒教（他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基礎）已經壽終正寢，士紳階層已被摧毀，「新婚姻法象徵着婦女解放以及家長制的最終土崩瓦解」（Schurmann 1971，第 7 頁）。要在崩潰的社會體系的廢墟裏建立起社會秩序，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創建「組織」。社會體系是自我調節，自我平衡的。一個組織是有意識地建造的產物，有其設計的一套角色作為實現其目標的途徑。一個組織的目標不是由文化——即一套人們習以為常的思想——來制定的，而是通過意識形態、一套新的、有意創造出來的思想來制定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的發展與維護是由領導人來進行的。他們用自己創建和管理組織的能力，而不是以其在該體系中的地位而獲得權力（Schurmann 1971，第 1—16 頁）。「真是出現了新中國，」Schurmann 說道，「一個有組織的中國」（Schurmann 1971）。

當然，這個新組織是中國共產黨及其國家機器。其意識形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Schurmann 對黨和國家組織的描述至今仍然是此類英語文獻中最系統化的、最全面翔實者之一。他對於這個組織與其指導思想之間的關係提出了不少精闢見解。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對「控制」者與「管理」者之間矛盾的觀察（其中部分是基於 Philip Selznik 的管理理論）（Selznick 1952, 1957）。管理者是具有創造性的領導人，他們在不斷地調整

組織以適應新的形勢。控制者則是行政官員，致力於維持組織現狀。Schurmann 看到，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組織裏，持續進行着那些想進行行政控制的人和要不斷革命的人之間的衝突。與之相聯繫的是在黨組織中革命幹部與專業知識分子之間的分歧。早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公開之前，Schurmann 洞察到這一切。

組織是有意進行的理性化採用的形式。韋伯稱此理性化為現代社會的特點。傳統的中國社會體系已不復存在，組織起來的中國是個現代社會。Schurmann 與當時其他的有名望的學者所見不同，他認為，在中國，現代化不一定受到韋伯式行政系統的束縛。黨組織可能成為靈活的、不斷更新的工具。

然而，他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黨和國家組織上，並且對潛伏在中國社會中的其他趨勢無所感知，這使得他難以理解文革中黨組織為何癱瘓。文革開始以後，Schurmann 看到，黨組織不能照常運作。在評論紅衛兵時，他寫道，「社會階級已難以被組織所駕馭，以至於它們正在形成自成一體的力量」（Schurmann 1971，第 591 頁）。

他對中國的見解之所以未能預料到這一點，部分是因為它的指導理論過分強調舊社會體系的徹底瓦解以及舊社會體系中主要功能機制受到現代新組織的全面取代。此外，他之所以過分強調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也應歸咎於經驗材料的限制。正如我已指出的，Schurmann 部分的資料來源於在香港的聯合研究所（Union Research Institute）裏保存的黨和政府文件。雖然他走訪了一些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的人，他的書中卻沒有直接用到這些訪談材料。總的來說，他的資料局限在黨有關自己本身所做的公開報導。儘管他從這些報導的字裏行間中洞察到黨的內部的矛盾，見解極為精闢，但他卻沒有能使他的觀察超越黨及其國家機器的信

息。因此，在 Schurmann 看來，中國共產黨體制的政府改造了社會，卻沒有受到社會的重大影響。

大約在 Schurmann 發表他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一書五年之前，傅高儀發表了他的《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 (Vogel 1969)。該書沒有 Schurmann 的書展現出在理論上的雄心。它沒有明確採納 Parsons 的體系理論和 Selznick 的管理理論。它試圖提供出一本實際資料豐富、紮實精深的廣州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歷史，並從中得出能夠概括整個中國的見解。(當時在美國學術分工上，歷史學者一般以 1949 年為下限，而讓社會學家去寫中國 1949 年以後的歷史。但這種分工現在已逐漸不明顯。) 但是，傅高儀的書也仍是以 Parsons 的框架為主，只不過沒有 Schurmann 一書那麼明顯而已。

該書完作於中國文革的頂峯時期。它談論的是「對社會的政治征服」。該章總結書中其他部分的觀點，其重點是共產黨人如何構建了一個足以控制和變革社會的龐大的政治體系 (Vogel 1969, 第 350—354 頁)。如前所述，其深層假定似乎是，舊的 (也許是自我平衡) 社會體系已被席卷而去，新的政治體系提供了全新的功能機制。

與 Schurmann 的書相比，傅高儀的書中含有較多的「社會」。這是由於傅高儀獲得了不同的、更為豐富的社會生活資料。60 年代末期，他在香港從事研究，能夠很好地利用省報，其中包含了一些比 Schurmann 用作為主要資料的《人民日報》略為切合實際的關於當地社會問題的報導 (儘管這些還是經過黨的控制的過濾)。他還大量採用了與大陸移民的訪談。並且，他對社會進程的「感知」超過 Schurmann。因此，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州》中，各式各樣有關廣州當地事件的細節比比皆是、豐富多彩、發人深省。其中包括將「紅河游擊隊」重新納入政治體系

的問題；本地官員一貫背離甚至抵制中央政府的指示；黑市、移民失控以及其他形式的國家難以有效控制的社會活動。但整體圖景展現的是社會變得越來越被動，受控於一個日漸強大、組織日趨完善的國家。儘管該書事實豐富，但傅高儀的分析受當時本學科主導理論的影響大大多過實際材料的影響。

該書發表於 1969 年（因此，寫作可能完成於文革動亂戰猶未酣的 1968 年）。人們可能以為，文革的動亂大概會給一黨體制的國家逐漸強化其改造世界的力量蒙上一層疑雲。但傅高儀卻不是這樣看。在這一點上，他與 Parsons 的理論更趨一致。沒有看到在新的政治組織中的職業行政官員與革命幹部之間的根本矛盾。在他看來，理性化的進程無可避免地增強職業官僚的重要性。「早期的變革者、具有超凡魅力偉大革命領袖正在衰老並失去權力……接替他們的人則不那麼吸引人。由於權力分散了，個人發揮主動性的機會受到限制，英雄的空間便縮小了。」革命領袖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並建立起了一個將使他們成為過時人物的政治組織。從長遠的觀點來說，這個結論可能是正確的，但它卻與寫此結論時正在中國各地開展的轟轟烈烈的事件不相關（Vogel 1969，第 354 頁）。

到了 70 年代，新的關於中國的社會學觀點開始出現。他們也受到當時主導理論的新架構、來自中國的數據與資料、以及公眾的關注的影響。到這個時期，Parsons 理論在美國社會學中的主導地位顯然已衰退。年輕一代的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學者批評它太保守。新一代左派社會學者採納了馬克思，甚至毛澤東的理論模式。在研究中國時，這些理論被用來贊頌文革。比如在 70 年代初，倪志偉（Victor Nee）和 James Peck（Nee 和 Peck 1973）（現在倪志偉的觀點已截然不同了）發表了一本書，強烈抨擊曾被用於討論中國的「現代化理論」。他們認為，通過「革命」的馬

克思主義，中國展示出一條嶄新的通往富裕、強盛、人民福利的道路，不同於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對現代化的臆見。此種分析的首要問題在於它依據有限的數據，並且不瞭解文革給人民帶來的苦難。第二個問題在於它沒有真正駁倒現代化論點的基本假定，即發展中國家註定將以新形式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來取代傳統文化和社會體系，而且這些新形式將會具有普遍意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不過是舊的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倒影。

三 第二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妥協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雖然並沒有為社會學研究中國作出有持久價值的貢獻，但的確有助於推動美國學術界裏的社會運動。我於 1971 年開始在哈佛讀研究生時，Parsons 仍在任教，但大多數最聰明、最能言善辯的研究生都自豪地宣稱他們唾棄 Parsons 的思想。總而言之，Parsons 理論的終結，意味着社會學者再也不把社會看成是一個整合的、自我平衡的體系。他們較傾向於把社會看作各種社會結構形式的混合體——包括家庭、當地社區、利益羣體、地位羣體等等。它們由某種權力結構組合起來，這些權力結構不具有普遍性，而是針對各個歷史環境的反應中發展起來。如果沒有大體系的瓦解，則「傳統」的、前現代社會不會因革命性的變革而消失。從這個理論角度出發，研究中國就將展示一幅許多社會羣體的圖象，一些舊社會的殘餘仍然存在，並且與現代國家的權力相抵觸。這個國家的權力結構本身就是與其之下的社會羣體的妥協。

與此同時，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從大陸湧入香港，其中常有一些曾作過下鄉知青或紅衛兵。這些人帶來許多有關文革期間生活的生動故事。與這些人的廣泛訪談，提供了豐富的關於實際社會

的信息，而這些資料在公開的文件中不易找到。因此，便有可能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作更為精湛細膩的分析。

一個較早的例子便是懷默霆 (Martin King Whyte) 的《中國的小羣體和政治儀式》(*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原為在傅高儀指導下撰寫的博士論文) (Whyte 1974b)。該書運用 Amatai Etzioni (1961) 的遵從結構來揭示中國國家要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改造中國公民是何等不易。Etzioni 認為有三種不同類型的服從，即強制的（基於威逼）、功利的（基於獎勵）、和規範的（基於信仰）服從。其所需的組織形式也是不同的。毛時期的國家力圖通過廣泛採用小羣體組織制度使得國民達到很高程度的規範服從。但 Whyte (1974b) 指出這一做法很少能實現預期目的。當國家能夠對身處難以脫身的組織（如軍隊或監獄）中的人給予重大獎勵和懲罰時，則對國家的服從程度相對增加。但在獎勵相對少的地方（例如農村），服從便大為降低。城市工作單位則處於兩個極端中間。國家通常只能依靠強制的或功利的服從。

這個觀點被沿用到懷默霆與白威廉 (William Parish) 於 70 年代後期合著的《當代中國的鄉村和家庭》(*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rish 和 Whyte 1978) 和《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hyte 和 Parish 1984)。關於農村一書（以 70 年代初期的研究為基礎），作者列出一個圖表標明自 1949 年以來變化較大的地區以及變化甚小的地區。在有些地方，儘管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行政壓力，變化仍然無幾。而有些地方，儘管政府施加很少或沒有施加壓力，卻發生了不少的變化。因此，政府促成社會變革的作用遠不是以前所想的。那幅在中國舊社會體系被現代政治組織所取代的圖景已不復存在了。

當時流行的看法是，雖然中國共產黨體制下的國家是一個現

代組織形式，但它所駕馭的是一個頑固的前現代社會。他們發表於 1984 年的關於城市生活一書是以 1977 年到 1978 年間在香港所作的研究為基礎的，在這本書中，他們進一步論證國家有可能難以在其與社會的角逐中獲勝。政府對城市生活的控制引發不少負面反應。國家亦面臨一些棘手的難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促成經濟平等與效率之間的平衡。然而，國家還是作為社會變革的啟動者，社會則是逆反應者。

除了受到新數據與新理論的影響，這種觀點還受到變化中的美國公眾情緒的影響。隨着美國國內的社會機構遭到反正統文化的衝擊，加上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的局限性因越南戰爭失敗而暴露出來，過去認為現代化不可抗拒的假定因而遭到質疑。

四 第三代：國家與社會相互滲透

到了第三代學者，中國的圖景開始出現了更大的變化。我本人所著《一個中國鄉村中的道德與權力》(*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Madsen 1984) 試圖比白威廉和懷默霆較有機地將理論融匯到中國國家和社會關係中。由於 Parsons 的最有名的一位學生 Robert Bellah 對我的影響，我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受益於 Parsons。Bellah 試圖把社會行動視為受到彼此連結的文化、社會，和性格系統。但我反對他將這些體系看作相對平穩地結合、在功能上相互依賴，並趨向於平衡狀態。就以中國社會而言，它的確是一盤散沙。其命運常常受歷史意外發展的擺布，並非遵循某種有序的宏大歷史進程所致。不過，在尋找適當方法研討中國共同社會經歷的領域中各部分之間的鬆散聯繫，我集中精力於文化系統。我認為，文革時期中國文化系統絕非渾然一體，相反的，它包含了許多不協調、有時矛盾的部分。其中有毛主義、劉少奇的務實馬克思主義，以及在我看來是多層面的而不是

單一的儒教傳統。有些文化主體被國家全力推廣，但其他的則得到農村社區機構，特別是家庭和親屬關係的支持。在一個廣東農村中，幹部和羣眾在不同的政治運動中以不同的方式將這些文化構件重新組合。然而，儘管存在多元性和不統一狀態，一種共同文化畢竟存在。它構成人們辯論、爭執甚至有時暫且達成共識的共同語言。

在不同具體歷史條件下，這些文化構件的互動發展出各種影響到每個幹部或普通公民的行動方式。因此，這一圖景所展現的是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相互滲透。農村幹部的行為表明（在我看來，其中有些人的行為方式類似舊中國的上紳階層），國家深受傳統中國社會的影響，而社會亦被國家所改造。國家和社會都不是西方模式「現代」政治組織或「傳統」鄉村社區。但兩者都極具中國特性，是一種獨特的、不斷變化的、包含昨日和今天的中國文化的各種成分的混合體。《一個中國鄉村中的道德與權力》問世的同時還有《陳村》(*Chen Village*)發表(Chan等1984)。此書是我與陳佩華(Anita Chan)和安戈(Jonathan Unger)合著，寫的是《道德與權力》中同一村莊，描述較多而理論探討略少。在《道德與權力》發表不久，魏昂德發表了《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alder 1986)。這本書描寫城市工作單位體制，強調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互滲透。正如書的標題所示，它揭示傳統文化和社會已經以許多方式在中國國家結構中自我再生——尤其表現在國家是部分建立在庇護人與受護人的個人關係之上，而不是普遍性的行政系統規則。

魏昂德和我的書都是以70年代從大陸逃到香港的難民的訪談為基本材料。我們所掌握的資料，其質量與懷默霆和白威廉所掌握的沒有多少差別。我們之所以採用不同視角，是由於美國社會學界當時些微的理論視角轉移。我本人在開始進行研究時，沒

有有意識地構思新的理論範式。我實際看到的中國社會和國家中「新」的和「現代」的情況，遠不如原先所預期看到的那麼多。當我的預料無法兌現時，便尋找新的方法來解釋這個差別。我開始進行這項工作時，許多我最仰慕的同行都在尋求文化分析新方法。受到他們的激勵，我也研討我自己的分析方法，以更透徹地理解中國數據，這使我受益莫淺。

我那本書是以 70 年代末所作的研究為基礎的，發表於 80 年代中期。它受到一種潛意識的影響，那就是想丟棄在過去幾個年代中指導美國社會學的現代化「潛存氛圍」。我們此時能夠認為中國在尋找自己的現代化，它和西方的模式不同，但也不能概括延伸到中國以外。

但是，80 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的變遷很快使得這個新的綜合分析方法變得過時。改革創造了蔚為壯觀的社會發展：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中創建了新形式的企業；新形態的家庭生活在農業的非集體化過程中應運而生；政治控制上的鬆動使得知識分子，甚至工人的結社成為可能；新的種族和宗教認同得以萌生。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似乎第一次在以自己的（混亂的）邏輯發展，至少已部分脫離了國家的控制。1986 年的學生抗議活動和 1989 年的北京之春就是這方面的表現。

社會學者和其他學科的中國問題專家現在的注意力將集中在社會而不再是國家。在 1989 年發表的一本短書《非官方中國》（*Unofficial China*）（Link 等 1989）中，Perry Link、Paul Pickowicz 和我三位編輯批評中國研究過去一味把注意力集中在權力結構和政策進程方面，很少研究一般百姓的「非官方」文化。我們指出，外國學者之所以對 1989 年的社會運動感到如此意外，說明他們對中國生活的最重要的方面缺乏瞭解。該書敦促中國問題學

者利用他們在中國的新的研究條件，較全面地研究這個非官方的、非國家控制的生活層。書中也舉例討論如何進行此類研究。

與此同時出版的傅高儀的《在中國先行一步：改革下的廣東》（*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Vogel 1989）不再以「對社會的政治征服」為主題，而是研究「過渡中的社會」（Vogel 1989，第 395—425 頁）。書中所展現的是一幅社會力量逐漸脫離國家控制的圖景。不過，傅高儀卻認為這不一定是件好事。他認為，東亞模式的發展要求國家與社會之間彼此能施加更有力的、協作性的相互作用，超出美國所能習慣的程度。他並建議中國的決策者尋找新的、更切實際的、更積極的方法來控制和引導經濟和社會變革的力量。

五 第四代：公民社會改造國家？

可是，更年輕一代的社會學者則熱衷於研究中國社會對中國國家進行根本改造的潛力，而不是國家能如何更有效地駕馭社會變革的力量。這幅關於中國的新圖同樣是受到理論、資料、公眾思想傾向的影響。

其理論大都源自於「公民社會」的概念。雖然在 18 和 19 世紀時西方哲學家廣泛使用這一名詞，但它在 20 世紀美國社會學中很少被用到。20 世紀 80 年代當東歐一些較著名的不同政見者，諸如波蘭的 Adam Michnik 開始使用它，這個名詞才又流行起來。到 1989 年，Jürgen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Habermas 1989）一書譯為英文，美國社會學者由此開始廣泛地將「公民社會與有關『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發展的理論聯繫起來。

1989 年東歐共產黨政權的瓦解使得公民社會理論倍受重視。

想研究天安門示威的中國問題學者也開始廣泛使用這個概念。在有些人眼裏，這個概念有如 Heath Chamberlain 所說的「西方與非西方政治經歷之間所『缺少的一環』」。針對亞洲的政治文化基本上與民主相悖的觀點，有人反駁說，不久前在東歐共產黨政權下出現的公民社會目前正以類似形式在中國出現，隨之而來的是「民主」（帶有「中國特色」）（Chamberlain 1993）³。因此，美國社會往日的「潛存氛圍」又再度出現：現代化是普遍的進程，是註定要席卷全球的。如果美國在越南的失敗似乎否定了這一點，那麼，共產主義的瓦解好像又證明了這一點。不過，當今現代化不是從政治結構的理性化來觀察，而是探討發展是否引發了某一特定類型的社會體系，即一種由活躍的公民社會導向民主的公共領域的社會體系。

但是，使用這一理論框架的問題在於「公民社會是一個棘手的概念，充滿理論與道德含義」（Chamberlain 1993）。舉其一點，在西方，對公民社會的思考有着不同的傳統。一般而言，公民社會指的是位於小的、單一的、原始的羣體，如家庭和大的、普遍的、理性結構的現代國家之間的社會生活領域。但是，各個傳統對於究竟甚麼樣的羣體構成公民社會，以及公民社會與國家的關係應是如何定位，有着不同的觀點。

具有英美傳統，起源於洛克的哲學，強調公民社會應獨立於國家。按照這個傳統，構成公民社會的羣體是個人的自願結社。傳統的家庭不屬於公民社會之列，因為這是非自願結成的，人們

³ 《近代中國》（*Modern China*）1993 年第二期刊登了一組以「中國的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為研討主題的文章。包括 Frederick Wakeman, Jr.、William T. Rowe、Mary Backus Ranki、Richard Madsen（趙文詞）、Heath Chamberlain 和 Philip C. C. Huang（黃忠智）等若干作者的論文。

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和親戚。根據這個理論，一個運作良好的公民社會包括許多自願結成的羣體，各個羣體之間有重疊的成員。每個羣體都有自身的利益。但是，由於公民屬於很多羣體，這種多元化的結果會開闊公民的意識並有助於他們瞭解這個社會的共同利益。通過這些羣體，公民構成民主公眾的基礎。

與此並存的是一個歐洲大陸的傳統，起源於黑格爾和其他一些哲學家。這個傳統強調國家在發展公民社會以及確保公民社會促進社會共同利益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根據這個傳統，有必要運用國家的權力把人們從附屬於單一的，諸如傳統的大家庭之類的初級羣體中解放出來。國家進而以提供保護與支持的方式促使各種中介羣體的形成，同時亦允許這些羣體在其領域裏擁有大量的自主權。可見，英美傳統趨於無視國家，而歐洲傳統則設想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正面的、相互支持關係。

最後，還有第三個傳統。它以建立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 Antonio Gramsci 的理論為基礎。此傳統視公民社會為國家的對立面。依據這個傳統，公民社會是在反對文化和政治霸權的社會運動中逐漸形成的。

有一些較年輕的美國社會學者，懷念 60 年代的社會運動，對 Gramsci 的著述抱有強烈的興趣。這些中國問題學者把天安門的社會運動視為公民社會崛起，向國家挑戰。其他學者批評他們對於這樣的社會運動如何能夠導致一個穩定的、自治的民主公共領域提出一套成形的看法。1989 年東歐社會運動之後許多地方出現的社會動蕩便說明這種批評的確是值得注意的 (Calhoun 1994)。

對 1989 年第一次民眾運動的熱情消失之後，研究中國的社會學者常傾向於尋找洛克式的英美型的公民社會。他們研究獨立於國家的羣體。當然，在中國很少有幾個完全獨立於國家的「非

地下」羣體。因此，想描述中國公民社會出現過程的理論家便把目光放在至少部分獨立的羣體。他們研討這些羣體的獨立程度以及它們是否能夠發展得更為獨立。正如丁學良在研究 80 年代形成的改革派知識分子羣體時所說的，這些羣體有「兩棲性」。雖然他們與政府結構有正式聯繫，但他們卻至少能部分獨立於國家制定自己的議題。因此，在環境「難以預料、模稜兩可、模糊不清、撲朔迷離」之時，公民社會可能在國家結構之下形成 (Ding 1994a, 1994b)。

然而，有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是，在互動關係難以捉摸的情形下，很難確定一個羣體獨立性的程度。因此，這種研究公民社會的方法往往很難導致明確的論斷。另一個問題是，這種方法反映出許多美國人的反國家偏見。它使我們無法充分地研討國家如何能夠更良性地促動和支持公民社會。

東亞文化傳統對於國家正面作用的強調遠超過英美傳統。當東亞國家如日本、南韓、和台灣成功地把西方政治形式與它們的文化傳統相結合時，他們所借鑒的是歐洲民法（許多情況下從德國經由日本傳播來的）而不是英國普通法 (Yamamoto 1995)。在這個框架下，大多數的公民社會羣體必須向國家登記，國家應向它們提供資金和其他協助，使其在公共秩序許可的範圍內發展壯大。如果中國大陸要發展一個更開放的公民社會，假如它要借鑒西方傳統為基礎的話，可能會建立在這個歐洲傳統之上。因此，在我新近發表的《中國的天主教：一個萌發中的公民社會裏的悲劇與希望》(*China's Catholics: 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 (Madsen 1998) 一書中，我並未集中探討各種天主教會獨立於國家的程度，而是在何種情況下天主教社區可能或不可能培植一種民間文化，使宗教信仰者能夠為建立起一個有秩序的、公正的、多元化的社會而進行建設性的工作。

我還試圖探討哪些歷史的偶然因素和文化的特異將使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有別於美國或歐洲的一般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簡而言之，我試圖突破那種認為西方形式的現代化註定會成為中國的範例的假定。許多研究中國論著的社會學者在這方面的工作獲益於華人知識分子。因為我們的著述越來越多地是與他們合作進行的。除了瞭解他們的觀點之外，我們還向他們學習，超越自身的民族中心主義。譬如、通過與杜維明所進行的對話，談論新儒家對於家庭這樣的初級羣體與被西方視為公民社會的中介社團之間的關係的觀點，我已經開始重新構思我自己對公民社會的思想。

六 第五代：全球秩序中的後自由主義和後社會主義世界

至此，我所談論的是已經發表或即將發表的關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著述。在此之外，還有一些新的中國研究已見端倪。其成果仍將受到理論、資料，以及公眾之間的新的相互作用的影響。在這裏，我只能嘗試性地概述一些正在萌發的趨勢。

一些最時髦的新理論都打着「後現代主義」的旗幟。後現代主義拒絕承認任何絕對真理並堅持社會進程的多元性和獨特性。（我本人認為這些理論有其重要性。但是，它們經常倡導一些荒唐的相對主義和危險的虛無主義。）在 Paul Rabinow 和 William M. Sullivan (1987) 主編的書中，Frederic Jameson (第 255—278 頁) 就後現代主義做過重要的評論。同書還有 Jürgen Habermas (第 141—156 頁) 和 Michel Foucault (第 157—176 頁) 爭論後現代主義的重要文章。加上現有更多的機會去探索中國社會的多樣性，這些理論強調中國歷史上（尤其是現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多元複雜性。此外，圍繞社會學的輿論氣候也變得更為複雜。舉例而言，影響我們的輿論範圍已經擴大，不僅包括美國民眾，也

包括中國民眾。我們目前比以往更多地與中國同事一起從事研究，而不僅以他們為研究的對象。這個擴大的輿論氣氛在世紀交接之際顯得躊躇不定。我們曾希望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變革導致和平、有秩序的結果，但所得到的卻是失望。新的全球通訊和商業力量正以與舊式理論不相符的方式影響着我們。正如詩人 Arnold 在評論另一個時代時所說的，「我們站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已經死去，另一個尚未出生。」

在這個新環境裏，整個社會科學似乎有一種傾向，它把現代化看作一套各式各樣的途徑，由其成為相互依賴的全球經濟和政治體系的一部分。比如，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的歷史學教授葉文心組織了一系列跨學科的研討會，主題為「中國化：通向現代社會和未來世界的多種道路。」（加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的教授 Germaine Houston 則組織了一個議題集中在日本的類似系列，名為：多樣類型的現代社會〔alternative modernities〕）。從這些研討會得出的基本論點是，中國革命不是唯一的通向現代社會的道路，而且，1949 年並不像人們所習慣的看法，在各方面都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時刻。在整個 20 世紀初，曾出現過許多思想流派和實踐。它們以不同於五四時期的文化和政治革命者所明確提出來的的方法使中國與全球秩序聯繫起來。例如，1949 年以前，面對近代營銷傳媒中形成的新消費觀念，中國城市居民結合中西方理念，發展出一套有關「美好人生」的新概念⁴。基於「科學」管理的新思想，他們創造適用於自己的工業規程。在與全球性宗教組織掛鈎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大學裏，他們發展了新型的信仰和禮拜

⁴ 如欲瞭解新的消費方式在如何改變 90 年代中國社會的性質，請參閱戴慧思 (Deborah Davis) 新編的《中國消費者革命》(The Chinese Consumer Revolution) (Davis 1999) 一書中 Richard Kraus 所寫的一章，該章直接分析消費革命與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活動，以及適合現代世界的道德約束的新概念。儘管 1949 年後，這些東西都被共產黨壓制了，但在改革開放時期，它們又重新出現，其生命力甚至可能會比所有共產黨國家所締造的理想更強。

這些觀念的歷史命運為我們認識中國如何能夠在不實行西化的情況下實現現代化提供了線索。從這一視角看來，多元的現代化進程主要是由社會而不是由國家推動的。政治的影響固然重要，但民族國家已被視為許多政治行動者其中之一，國際政治體制以及其組織的作用更為顯著。目前流行的這種學術思潮似乎在強調國際經濟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賴，甚或在「全球化」規則下的統一性，並同時強調對此全球化進程的反應的多重性和特殊性。

雖然，新一代的研究生似乎對此觀點有相當強烈的興趣，由此而導致的對中國的社會學研究尚未有成果。目前，在這方面最有見地的著述大都出自人類學者和歷史學者，而不是社會學者。

七 理論、輿論、資料、事實

在討論過去幾代社會學對研究中國所描繪的圖景時，我強調了理論和資料之間的不斷相互影響，以及潛存在所有研究工作背景中的、影響無所不及的輿論。然而，我並非要暗示中國研究中沒有甚麼客觀真實性可言，或者我們描繪的中國圖景的基礎是臆造的理論建構（也許出於地緣政治的動機）而不是實際觀察到的事實。我引述的所有著述都是建立在認真的實際研究基礎之上的。它們是否有持久價值取決於其研究的徹底性與準確性。因此，Schurmann 的論著仍不失為英語資料中有關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共產黨和國家機器的正規結構的最佳文獻之一。傅高儀的《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州》仍屬最佳 50 年代和 60 年代省志之列。但是，任何合乎邏輯、有條理的社會研究都不應當僅是事實的堆砌。它必須建立在一個理論觀點之上，這無可避免地會帶來一定

程度的失真。如果要產生影響力，它必須針對讀者大眾切實關心的問題發表看法。

我的老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八十三歲時去世。在他七十八歲那年，他出版了一本書，題為《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Fairbank 1986）。其中綜合了他編輯的《劍橋現代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我曾撰寫了其中的一章。在他給我和其他作者的一封信中，告訴我們他已將此新書獻給我們，他並談到對寫歷史的過程一些想法。他說，「歲月的智慧，似乎在於忘卻許多東西，以便於你能夠對真正記得的事情建立起一種虛假的信心。這便允許某些主題和臆想充斥於著述中，造成對事實的歪曲，而我們則稱之為系統知識。現在我認為，我們教授大部分時間都過於謹慎。我們尋找事物發生的緣由、理性和平衡，然而，人類在歷史上的行動一般是狂熱的，即使不是瘋狂，也常常是歇斯底里的。也許我們不應該指望從中理出甚麼頭緒來，可是，這卻是我們的使命。」

儘管我們盡最大努力發展有系統的知識，但失真是不可避免的。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應當停止爭取獲得這樣的知識。這僅僅意味着我們要更努力縮小理論與數據的差距，特別是要解釋那些與我們最簡單的理論預測相悖的資料。這還意味着，我們必須將我們的著述置於學術界，使其接受廣泛的檢驗和建設性的批評——這個檢驗批判範圍越廣泛、越國際化，我們的理論觀點就越可能接近事實。

3 現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 從描述現狀到解釋變遷¹

魏昂德

美國史丹福大學社會學系，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一 引言

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在本質上是對政治權威的研究，也就是對領導者和被領導者關係的研究。它討論的是這樣一些問題：一個政府如何貫徹實施它的法律和指令？國家貫徹實施的是甚麼樣的指令？政府代理人用甚麼樣的手段貫徹這些指令？政治學的比較政治領域最早研究這些問題。這是因為，世界各國的政府在推行甚麼樣的指令及如何貫徹這些指令上有很大的差異。在我看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所涉及的一個首要方面是對權力運用的研究。

無疑，沒有政府的權威是不受挑戰的。統治者總要面對來自個人或羣體的抵制。這種抵制有時是顯形的，有時是隱形的。「由上至下」的政府權威的運用也就難免受到發自「社會」普通成員的「由下至上」的影響。這些影響可以來自衝突和抵制——通常緣起於人們試圖避開或不執行政府及其官員的指令。也可以意味着公民或臣民對政府行為影響的各種方式，例如選舉、行賄、罷工威脅或其他集體抗議形式。

國家與社會關係因此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可以用它來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有的學者強調抵制和衝突；有的則側重討論

¹ 原文為英文，方慧容翻譯。

地方政治組織，以及在地方社區裏政府貫徹權威的複雜性。有人關注有組織的羣體間的政治；也有人分析人際關係網如何發生作用；有人強調集體抗議的潛在效果；另外一些人則致力於說明個人如何在此過程中施加影響並從中獲益。一些學者強調正式的政府組織或公民團體的運作方式，另一些人則關注非正式的，較少組織化的影響過程。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中的絕大多數歧義都是由於強調側面不同所致。

雖然「國家－社會關係」涉及的方面很廣，它卻未能涵括以下幾個重要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要屬政府自身是如何運作的：即國家內各個機構間的關係、各個政府級別間的關係、政府組織的內聚性和有效性，如何立法，或更廣泛地說，政府如何形成各項政策。對這些重要問題的忽略與國家－社會關係這一研究傳統的起源有關。國家－社會關係這一研究視角起源於英、美等競選民主制國家之外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在 50 年代，美國的政治學大量研究的是美國的政治體系或與之相類似的競選體系和法律體系。對立法、選舉行為、法律或審判體系的研究獲得了很大進展。但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是以不同的方式組織起來的，這些國家的政治體系是怎樣運作的呢？如何分析這些國家的政治呢？又怎樣比較這些國家呢？答案之一是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概念來考察這些不同於西方競選民主制的政治體制。在這個視角下，政治體制不再僅僅是競選制度和法律體系，而有了更廣泛的內容。

從一開始（60 年代中期），對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就同對蘇聯和東歐政治體制的研究密切相關。從 50 年代中期開始，東歐集團的政治運作方式發生了明顯和重要的變化。斯大林時代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大眾動員和國家恐怖讓位於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較為平穩的行政管理方式。不滿、衝突，甚至羣眾抗議的

跡象常常可見。很明顯，在這段時間，共產黨體制內的政治不局限於獨裁者的專斷以及紀律嚴謹的黨組織如何層層貫徹上級領導的命令。波蘭、匈牙利（1956）、捷克（1968）所實施的改革和爆發的抗議運動提醒研究東歐的學者們注意利益集團和羣體衝突的重要性。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學生和工人運動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研究的取向產生了類似的效果。從 60 年代末期開始，研究中國的學者們開始致力於尋找在秩序井然的表像下，集團利益是如何爭奪和衝撞的。

在一段長時間裏，這種側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獲得了顯著成果。在為比較各種不同類型的政治體制提供一套概念和一個研究着眼點方面尤有成效。它使我們能夠更精確地描述政府和公民是如何相互聯繫的。中國、秘魯，還有蘇聯政府間的相似和差異是如何形成的？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旗幟下，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研究，包括社團主義、庇護主義、政策實施、政治參與、集團政治、集體抗議，以及最近受到關注的隱蔽的抵抗、「公民社會」的興起、「國家－社會衝突」等問題。

然而，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不無缺陷。其中之一是研究者傾向於不斷「重新發現」衝突或自下對上的影響，並且賦予其新的名稱。他們孜孜不倦於此，批評以前的學者過分的假定「自上而下」的控制。從 70 年代早期開始，這類論述就很常見，直到今天仍彼彼皆是。另外一個缺陷是這些學者傾向於用「集團政治」、「庇護主義」這些概念來描述和界定整個政治體系並且不斷地爭執哪個概念是「正確」的。如爭論「庇護主義」、「派系鬥爭」、「集團政治」這三個模式哪一個描述中國的政治體系最合適，或者是否中國正在出現了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大量的時間都浪費在這些爭執上。我認為這些問題意義不大。我會在後面解釋我的理由。

今天，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的最大挑戰在於它不能很好地描述和解釋正在發生的社會變遷。我們剛對毛時代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類型有所瞭解，鄧的改革卻已經在幾個基本的方面改變了它。我們於是越來越致力於描述正在變化的社會事實。但是這仍不足夠，因為所探討的學術問題完全不同了。目前的關鍵問題是正在發生的政治變遷，而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的視角當初是應描述和比較不同類型的政治和社會系統的需要而形成的。用來描述改革前的政治和社會系統的概念對於描述和分析不同的社會類型是有益的，但是它不適用於分析今天的社會變遷。為甚麼一種政治行為類型出現了，而另一種政治行為類型衰退了？這些是我們以前所不曾遇到的新問題。而且越來越明顯的是，回答社會變遷的問題常常需要到外在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領域中去尋找。因此，如果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還想繼續作為一種有益的知識探索，它就必須改變過去的研究重心，從對現實的描述到對變遷的解釋。

二 最初的問題

從一開始（大約 60 年代），中國研究的學者們就面對一個特殊的政治體制類型。中國的一黨專制建立於 50 年代，沒有西方的代議選舉制度。它有很嚴密的組織，其組織一直深入到基層和村莊。它控制了所有的生產資料和職業流動的機會。在毛的領導下，這個體制不但要治理中國，還力圖通過大眾政治動員的方式迅速地改造中國。在這種一黨獨裁的體制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甚麼呢？是否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就是社會完全不抵抗，順從集權國家所發出的一切指令？這是否又意味了「常規」意義上的政治在這種體制下並不存在？從一開始，研究中國的學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幾乎都是否定的。

60年代末，研究中國的學者追隨那些研究蘇聯和東歐的同行對隱形的政治鬥爭形式進行挖掘。在那個時候，政治學中新流行的模式是「利益集團」模式。Gordon Skilling最先闡明了「利益集團」模式的基本邏輯：在共產主義體制內，如同在其他政治體制內一樣存在着利益集團和集團衝突，只不過被這個體制的結構遮蔽了（Skilling 1966, 1970）。在那個時候，有兩種與利益集團模式不同的觀點。一種在Franklyn Griffiths的著作中得到充分闡明，我稱之為「表達趨同」的觀點。另一種Jerry Hough所主張的科層多元主義的觀點。Griffiths提出了集體行動的問題。他指出蘇聯的利益集團並不是通過有組織的集體行動產生影響。在大多數情況下，集體行動所產生的影響不是協調一致努力的結果。相反，有共同利益的個人傾向於表達同樣的觀點，或大都以自發的方式對政府政策作出相同的反應（Griffiths 1970），以此構成利益集團的影響²。Hough則認為最好將蘇聯政治概括為科層政治，而非集團政治。他認為蘇聯是一個多元主義的政治體系，官僚部門之間和上下級之間都存在着公開的利益之爭（至少在斯大林去世後）（Hough 1977a；Meyer 1970）。普通公民能夠追求其利益的程度取決於他們與科層官員或科層組織的聯繫（Lieberthal 1992）³。

當研究中國的學者剛從文化大革命的衝突中注意到國家與社會關係這個議題時，研究其他共產主義體制的同行已經着手發展模型來描述這些衝突（Schurmann 1968）。研究中國的年輕學者如歐邁可（Michel Oksenberg）和傅高儀建議將文化大革命理解

² 有趣的是周雪光在二十年後對同一現象作了更複雜的分析，雖然他似乎並不知道Griffiths的早期研究。見Zhou (1993)。

³ Kenneth Lieberthal後來的「分裂權威主義」模式同Hough早期的觀點有很多的相似。

為中國社會各種利益集團間的衝突 (Oksenberg 1968) 。 Hong Yung Lee 後來從利益集團的觀點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說明衝突結構如何反映了不同大眾羣體和精英間的不斷變動的聯盟 (Lee 1978) 。其他學者對中國社會中擁有不同利益的子羣體如何激發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和造反運動作了更仔細的研究 (Rosen 1982 ; Unger 1982 ; Chan 等 1983 ; White III 1976 ; Walder 1978) 。他們因此開創中國社會分層和社會不平等研究之先河 (Watson 1984) 。從 60 年代到整個 70 年代，逐漸成為主流的觀點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中包含了許多由於各利益集團在爭奪利益所導致的衝突。

文化大革命似乎表明，在中國的政治系統，精英間的衝突常常要動員普通公民中的各種派系。而普通公民一旦被動員起來，便會去追求與精英不同的利益。在 80 年代，興趣日益集中於研究在中國政治體系下的基層官員在日常活動中的政治行為。這一興趣所帶來的一個後果是一系列對中國政治參與的研究。其基本的思路是，儘管缺乏西方的競選制度，中國的普通公民通過取悅官員、送禮、家庭紐帶、講理，以及迴避等各種方式影響政府政策的實施 (Falkenheim 1978, 1987 ; Burns 1988) 。這些研究主要是以村莊為背景，闡述農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追求他們的利益和影響政府官員 (O'Brien 1996 ; Shi 1997) 。

與之相關的另一些研究着眼於決定現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那些制度性特徵，而不是描述或列舉市民影響政策實施和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戴慕珍 (Jean Oi) 分析了中國農村的政治庇護系統。在中國，村級領導人通過對集體資源的控制，建立個人忠誠網 (Oi 1985) 。這種制度系統同世界其他地方和中國過去所存在的政治庇護系統並沒有甚麼本質的不同，權威的實現通過庇護和忠誠的交換。在中國的政治系統中，村級領導人扮演代理人的

角色，他們一方面要執行上級的指令，另一方面要為村民的利益不斷向更高一級政府討價還價，村民得以不受國家太多徵收之苦 (Oi 1989；Walder 1986)。一些最近發表的文章持類似的觀點，它將中國的政治體系比為社團主義的政治形式。在科層制內部，官方指定某一集團代表集團利益，但同時這一被指定的機構要負責控制和限制其所代理的集團以自身的利益為導向的活動 (Chan 1994；Unger 和 Chan 1995)。

從 60 年代到 80 年代，研究中國的學者認定，在中國，伴隨着政府權威的運用，有大量的衝突和自下而上的影響。在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中，同「集權主義」概念相連的國家對社會的高度控制從未成為一個重要主題。幾乎可以肯定，絕大多數研究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學者假定在權威的運作中有大量的討價還價和自下而上的影響。問題只是如何去描繪這些活動的特徵。強調集團政治的學者將這些活動類比民主競選制下的多元主義政治，他們稱中國的各種自上而下的影響活動為「沒有選舉下的多元主義」。另一些學者援引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政治」的研究，強調這些抵抗活動往往缺乏協調一致的集體行動，是個人的討價還價。強調庇護主義的學者，將現在的政治體系類比中國歷史上的和其他國家的庇護—代理人政治，他們的研究集中於個人聯盟和關係網。持社團主義觀點的人以其他政治獨裁或一黨專制下的利益代表形式類比中國的現代政治。

所有這些研究都致力於比較中國政治和其他國家政治間的異同。在國家與社會關係方面，一個像中國這樣的一黨制國家，即使在文革期間爆發了大規模的清洗和大眾動員，其國家與社會關係也沒有甚麼獨特的地方，在中國所發生的政治過程在其他國家也能找到。這些研究也沒有聲稱哪一個特定的模式就是中國的政治體系。他們從來沒有說只有一種方式來描述中國政治或國家與

社會關係，做這樣的聲稱也沒有甚麼意義。我們無法相信中國所有的政治就只是庇護主義、社團主義，或集團政治。舉例而言，在比較政治學的教科書裏，庇護主義是一種無所不在的現象（Dogan 和 Pelassy 1984）。幾乎在每個國家和許多背景下都有其表現形式。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是各種政治行為的混合，中國也不例外。因此爭論哪一個政治模式能概括中國政治過程的全貌是無意義的。因為能找到其他政治形式的存在而批評一種模式的有效性同樣是無意義的。只有聯繫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政治、社會背景，一個模式才有意義。

三 對變遷的研究

以上我所描述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基本上都是靜態的。其主要目的是回答中國的政治和影響如何運作，並且要從比較的觀點來理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儘管他們都意識到中國已經發生變化了，卻並不將描述和解釋變化放在注意的中心。

共產主義的一黨專制的國家已經發生了變化這一事實並非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當研究東歐的學者們眩目於歐洲共產主義體制內的衝突和自下而上對權威的影響時，他們就已經開始關注變遷問題。很明顯，斯大林去世後，東歐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一直從 50 年代持續到 60 年代。為甚麼會有非斯大林化？為甚麼會有波蘭的造反、匈牙利的暴動，以及中國的百花齊放運動？為甚麼會有政治反對運動出現？為甚麼會有政治和經濟改革的要求？

在 60 年代末，主要的答案來自現代化理論：即經濟發展需要穩定行政管理體制和重視專業知識。但是這些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大眾動員的政治形式極不調和。如果共產主義政權想實現工業化和建立一個強大富饒的國家，它們就必須採用更現代的

政策，強調專業知識而非意識形態，強調職業獎勵而非強制 (Kassof 1964；Johnson 1970)。結果，它們發現滿足某些集團的利益，尤其是知識和科技精英的利益是非常必要的。任何現代化措施都必須依賴他們。共產主義系統內的變化因此造成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現代化的使命間的矛盾 (Lowenthal 1970)。但是赫魯曉夫時期所發生的迅速社會變遷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就停滯了。因此，解釋東歐所發生的社會變遷的興趣也就一度中斷。直到戈爾巴喬夫時期，研究東歐的學者們才又將研究的重點放到解釋社會變遷的任務上來。

由於兩個原因，研究中國的學者沒有對政治變化問題給予很大的注意。第一個原因是，「現代化的驅動」對解釋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中國並沒有甚麼說服力。在毛統治時期，不同於赫魯曉夫時的蘇聯東歐，任何現代化的要求都被忽視。第二個原因是，一直到毛去世，中國沒有發生蘇聯 50 年代末和整個 60 年代所發生的那種政治變遷。而當變遷真的發生時，政治改革伴隨着有深遠影響的經濟改革，遠遠超過了蘇聯東歐歷史上所發生過的任何變遷（儘管匈牙利的改革和中國 70 年代末所發生的改革有很大的可比性）。

80 年代末，政治變遷問題再次引起注意。波蘭的團結工會和圓桌談判、匈牙利的以協商方式結束一黨制，戈爾巴喬夫的改革，1989 年的東歐的政治解體及最後蘇聯自身的解體都使研究蘇聯和東歐的學者將變化置為研究的中心。在中國，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走得更遠，包括結束集體農業，外資和私人企業的興起。這些變化可能使國家與社會關係也發生重大變化。1989 年的政治風波使人們懷疑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化是否已到了能組織大規模的羣眾抗議和顛覆共產黨的統治的程度。

自 60 年代起，蘇聯和東歐研究的取向就影響着中國研究。

當時，「公民社會和國家」或「公民社會對抗國家」是一個新的研究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視角，它最先出現在對波蘭團結工會的研究（Arato 1981）。對許多東歐的觀察者來說，1989年至1991年所發生的重大變化是一個連續不斷變化的過程的頂峯。在這個過程中，獨立和自發組織的公民社會從出現到同集權主義國家對抗，爭取政治權力，直至最後推翻國家。按照這種觀點，集權主義國家試圖取消社會的任何自我組織，完全支配社會。80年代末所發生的變化因而代表了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開闢自主性空間，最終創造出新的自我組織形式從而能夠有效地抵制，直至最後推翻國家本身的過程。由此，所有這些一黨專制的國家不斷弱化下所發生的政治變化被稱為「公民社會的興起」。

然而，「公民社會和國家」的模式倡導者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所描述的80年代的變化實際上是50年代已經開始的各種變化的延續。對50年代的變化，學者們已經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今天的「公民社會和國家」的倡導者所忽視。這些新概念的倡導者並沒有問自己為甚麼公民社會在過去很多年裏，一直發展得很緩慢，突然間竟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能推翻國家。

當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模式被用來研究中國社會時，所有自下而上的影響均被標之為「公民社會的興起」或「公民社會的萌芽」。在許多情況下，那些很早以前就被另一套術語描述過的現象又被描述了一遍，只不過換了一些新名詞。「公民社會的興起」暗示了一個比以前中國學者所描述的政治形式有更高自主性的自我組織。但是那些使用「公民社會的興起」這一新詞的學者幾乎並未用心思索過這一新術語同以前用來分析和描述的術語，如集團政治、政治參與、庇護主義和社團主義等有甚麼區別⁴。中國

⁴ 比如，收入戴慧思等人編的書（Davis等1995）中的文章都着眼於對

研究很不幸同東歐研究一樣，忽略了前二十年的研究成果，致使我們不清楚這種新的視角到底對中國研究有其麼貢獻。80年代末期所發生的政治變遷在根本上不同於過去二十年所描述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形式，還是不過是同一趨勢的延續？如果是不同的，甚麼導致了這種不同？熟悉這一領域的學者不無理由懷疑這些新的術語不過是新瓶裝舊酒，複述過去對基層政治的看法。

「公民社會的興起」的觀點的一個重要的缺陷是它看起來在暗示中國的社會自主性採取了與歐洲相類似的形式，而且這樣變遷的結果也會導致同東歐的各種政治鬥爭一樣的後果。由此而論，公民社會的興起最終會導致共產黨領導的垮台和政治民主制的出現。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則懷疑，像「公民社會」這樣一個描述西歐早期民主制發展的概念是否適用於研究中國這樣一個非常不同和具有很長歷史的社會。由此所致的關於公民社會這一術語是否適用於中國的社會條件的爭論，偏離了如何分析正在發生的政治變化這一問題，而將注意力投向怎樣看待和理解中國和歐洲史。在爭論的過程中，越來越明顯的是並沒有一個清晰的達成共識的有關公民社會的定義。一些人用它來描述政治生活中任何提高自主性的政治形式或組織。另外一些人則將其等同於某些特定的西方制度，如法律。對公民社會是否興起問題的回答於是要看你對公民社會的定義。縱觀這些爭執，我認為，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稱現在的變遷為「公民社會的興起」。要研究和分析的是變遷，而不是命名它的標籤。對中國和歐洲歷史的討論將我們引向錯誤的方向。從開始用公民社會這個術語描述中國社會的變遷到現在已經有十年了，這個研究視角的價值似乎依舊是模糊的。

懷疑「公民社會的興起」這一觀點的另外一個原因在於，「公

社會自主性的研究，卻忽視了早期學者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

民社會的興起」的觀點暗含了一種對變遷的解釋，這種解釋在現在中國的環境下是很令人懷疑的。很明顯，這種視角將政治變遷理解為普通公民為從國家那裏得到更大的自主性，維護自身的利益，而同國家鬥爭的結果。也就是鬥爭迫使「國家」發生變化。一些學者聲稱最近幾年所發生的劃時代的變化是普通公民隱秘鬥爭的結果。但是問題在於，研究已不斷表明，大量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中所發生的變化同社會反抗國家的鬥爭沒有太大關係。事實上，90年代所發表的研究表明，國家與社會關係中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來自中國經濟的重組，是中國經濟的重組改變了在不同層面的政府官員間的利益和權力，改變了不同國家機構間的關係。我個人也贊同這一看法。發生於國家與社會關係上的重大變化要歸之於國家與社會關係這一領域之外的一些社會過程。在此情況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需要從兩方面調整。我們必須將我們的研究伸展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未考察的領域，我們還需要將研究的重心從對社會變遷的描述到對社會變遷的解釋。

四 現在面臨的挑戰

變遷是現在關注的中心。我們不再描述國家與社會關係而是描述其變化。我們也不再爭論哪一個模式適用於描述政治參與和衝突，我們轉而討論在國家與社會中正在發生甚麼變化和如何解釋這些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對變遷的解釋來自外在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領域。

當我說對變遷的解釋主要來自國家與社會關係之外的領域，我指的是（舉例而言），不能僅僅通過村級領導人和村民間的互動來解釋村莊領導人和農民間關係的變化；不能只通過詳細的研究代理人和庇護者之間的關係解釋代理人和庇護者之間關係的變化。要想解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化就必須尋找某種外生的因

素，即外在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東西。我們需要擴展我們的研究領域到那些我們以前忽略的研究對象。

現在讓我們回到前文所提及的 60 年代末的中國研究中，實際上也是對蘇聯和其他一黨專制的共產主義國家的研究中的中心關注點：在這樣一類政治體制下，國家能夠完全控制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能夠分配就業機會給那些忠於自己的人。這些體制把紀律嚴明的組織體系從政治中心擴展到社會基層。這一體系不僅支配社會，而且在意識形態的鼓動下，以激進的方式改造社會。在這個前提下的問題是：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中，是否只是國家的強令和公民恐懼的服從？還有沒有其他的現象？如果有，怎樣去描述它？它又是如何發生作用的？

現在，從根本上來講，所有這些前提都改變了。在中國經濟改革將近二十年，國家不再獨斷所有生產資料。農業的非集體化、地方政府企業的興起，及相應的私人 and 外資企業的興起有效地瓦解了國家獨斷的根基。新的所有制形式的興起還意味着國家對就業機會的控制被削弱了。黨組織不再像毛時代一樣要求它的成員保持高度的忠誠和嚴格的紀律，黨組織也就不再是原來的那個紀律嚴謹的組織（Walder 1995c）。國家不再尋求以激進的方式改造社會。像其他國家一樣，它主要承擔維持社會秩序和促進經濟發展的職責。

這就引向我們目前研究中所關心的問題。在中國社會中，國家對生產資料的控制的變化如何改變了國家與社會關係？地方政府企業，或私人企業、外資企業興起的社會影響是甚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因為黨不再對其成員進行嚴格的控制而且也不再動員和改造社會而發生甚麼變化？變化的外生源泉要麼是經濟的重組，要麼是國家自身的內在調整。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變為對政治變遷及其原因的研究。

新的問題是富有挑戰性的，它將我們引向全新的爭論。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如何理解經濟改革中，國家下放其對企業產權的控制。一些人的觀點是，這一過程把對資源的控制權從國家及其官員轉移到普通市民手中。權力從而從計劃經濟下再分配收入的官員手裏轉向市場經濟下的企業家和普通市民手中 (Nee 1989b)。另一些人的觀點正好相反。他們認為權力下放意味着權力從較高一級的官僚向較低一級的官僚的轉移；而較低一級的官員很可能截留相當一部分市場經濟中的權力和特權 (Oi 1986, 1989; Wank 1993)。這兩種觀點的爭論構成了近十年研究的主體。

另外一個例子是對中國農村的研究。一些人強調農村改革使對土地和農業的控制從幹部轉到農戶手中，這種轉變導致了農村權力的重大變化，權力從幹部轉到企業家手中 (Nee 1989b)。另一種觀點則強調，雖然農業控制權轉到農戶手中，村幹部還經常保留對村企業的控制權並經常由此使公共資產重新集中到幹部手中 (Oi 1992; Lin 1995)。前一種觀點預示了從幹部向村民的權力轉移。後一種觀點則指出新的鄉村幹部權力形式的興起。

再有一個例子是關於在日益走向市場導向的經濟中，庇護主義是否會下降的問題。一些學者認為過去所描述的庇護主義基於幹部對經濟機會的控制，而當私人部門中的經濟機會增加時，庇護主義就會下降。另一種觀點則反駁，即使在私人部門中，私人企業家需要各行官員的支持和幫助才能致富。結果是舊的「依賴型」的庇護主義下降，新的「共生型」的庇護主義興起。在前一種觀點認為庇護代理關係在政治中衰退，而後一種觀點指出在新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中，庇護關係依然存在，只不過轉換了形式，甚至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Wank 1995)。

最後一個例子是有關中國的政治穩定性問題。許多觀察者的觀點是在過去十五年中國家對社會控制的下降是國家與社會關係

的主要特徵。他們認為這種從毛時代就開始的國家對社會控制的削弱在隨後的若干年裏使政治穩定會成為一個嚴峻的問題。另一些人以不同的眼光看待這些變化。他們否認從毛開始的國家控制的減弱必然有政治不穩定的危險。在毛時代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是極端和不正常的，在過去二十年裏，國家控制的「喪失」僅代表了向更正常的國家權力和社會利益間平衡的進化。這些觀察家進一步指出，中國的政權並不一定像鄰近一些政權那麼虛弱，新出現的和形成中的問題也並不那麼嚴重。因此政治動蕩一觸即發的說法缺乏充分的說服力（Walder 1997）。

以上對國家與社會關係中幾個新的議題的簡短總結表明，在過去三十年裏這個領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誠然，舊的術語和概念依然在新的研究中出現，只不過換了種形式：比如，Wank使用的「共生庇護主義」的概念和戴慕珍的「地方國家社團主義」的概念。但是這些概念的使用背景同過去有很大差別。新的研究不再局限於描述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與其他國家的政治類比，而是描述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中那些新的複雜的變化以及外生原因如何導致了這些變化。對今天研究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學者來說，這是一項更複雜也更富有學術挑戰的任務。同時與過去相比，國家與社會關係也成了一個更有趣也更引人入勝的研究領域。

4 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

邊燕傑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系、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一 引言

在美國社會學界，中國研究是「區域研究」的一個較大的分支。但無論是多大的分支，它一直是在主流社會學之外的研究領域。這種局面自 80 年代末以來有了根本的轉變。其重要標誌就是有關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關係的討論，涉及了主流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如社會變遷的規律性問題、社會經濟制度變化會不會引起社會分層體系的變化的問題。除了這些理論層面的原因，中國經歷着重大的社會經濟變革，向社會學理論提出了空前的挑戰，為社會學家提供了絕好的理論實驗場。在中國能進行大規模的資料收集工作，也使有關中國問題的實證分析成為可能。

關於中國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關係的研究，發軔於倪志偉教授在《美國社會學評論》上的一篇重要論文（Nee 1989a）。這篇論文雖然是分析廈門農村地區 1985 年戶均收入的結構，但文章的理論指向是社會主義國家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社會分層體系同時發生變化的規律性問題。為此，文章的題目是《市場轉型理論：國家社會主義從再分配到市場的過渡》（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而「中國」並未出現在題目中。關於倪志偉的市場轉型理論，本文將專節介紹。這裏要指出的是，這個理論將再分配經濟和市場經濟看做兩個不同的社會經濟型態，認為從前一個

型態向後一個型態轉變過程中，必然引起社會分層體系的規律性變化。由於文章具有高度的理論概括性，同時對社會分層體系如何發生變化又做出了明確的判斷、假設和分析，所以，為以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開闢了宏偉的前景。熱愛中國又長期從事中國研究的社會學家積極參與關於市場轉型論的爭辯；關心中國發展但不甚瞭解中國的「主流」社會學家也密切注視這一爭辯，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開始研究起中國來了。這一局面導致了《美國社會學學刊》於1996年8月號專輯探討中國和東歐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的問題，為這一研究做了歷史記錄。現在，這一研究仍在熱烈地進行着，新的觀點不斷湧現，新的研究問題也不斷地被提出來，特別是這一研究已經引起中國本土學者的關注，我相信他們的加入將大大提高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我分四個方面對這一專題做介紹。第一，市場轉型論發表前美國社會學家研究中國社會分層的主要成果。第二，倪志偉市場轉型論的主要內容和他對該理論在1989年以後所做的修正。第三，與市場轉型理論相左的理論觀點及其研究發現。第四，關於市場轉型論仍在爭辯的一些問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本文介紹的都是英文學刊上發表的研究，不涉及中國國內以漢語發表的論文、著作。

二 關於改革前社會分層的研究

1. 懷默靈的最初研究

對改革前的中國社會分層較為系統的社會學研究，最早的文章是懷默靈教授在《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上發表的《中國的不平等與分層》(*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Whyte 1975)。在該文發表的70年代，中國剛剛向西方開放，西方學者在中國做深入的社會研究，尚屬困難。可行的研究途徑

是閱讀報刊文獻，有一些學者被允許進入企事業單位做訪談，也有一些學者被允許住在農村一段時間，進行觀察研究。這些在中國做短期訪問的各種各樣的西方人，回到本國撰寫了觀後感和記述，發表在報刊上。懷默霆的文章就是分析這些二手資料的結果。

懷默霆所用的二手資料，主要記錄了中國居民在文革期間的狀況以及他們對文革前、文革初的狀況的回顧。懷默霆選取的分析角度是革命後中國的分層和不平等，對資料在認真分析了可信度之後做了取捨。他採用當時美國社會學界得到公認的社會不平等的分析框架，即從階級分化、結果不平等、機會不平等三個方面分析中國的分層體系。

在階級分化方面，他認為 50 年代的土地改革運動、集體主義的農村政策、社會主義的工商業改造，成功地鏟除了革命前的上層階級，但毛主義中國的辦法不是像列寧、斯大林的蘇聯對舊有的剝削階級進行大規模的人身迫害，而是用羣眾鬥爭的方式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同時剷除他們藉以存在的經濟基礎。

從結果不平等的角度，懷默霆集中考察了經濟收入的不平等狀況，特別是 1956 年以後城市工資收入者的狀況。他用大量篇幅說明 50、60 年代工資制度的前後變化，一些細節情況，今天年輕的社會學學生未必瞭解。比如，他介紹了毛澤東將自己的工資從行政一級調到行政二級，成為工資平均化鮮明的例子。當然，懷默霆的分析並沒有側重於一兩個範例，而是測量了幾個重要的工資尺度的結構和可能的人員分布。他的結論是，雖然當時實行的工資制度保留了一定的差別，但同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比較，中國的工資收入差距是最小的。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更不能相比了。他的這一結論在 1984 年他的另一篇研究中國性

別差異的文章 (Whyte 1984) 中重新提及，並分析了中國的最新統計資料，與西方、蘇聯等東歐各國做比較，對這一結論做出較為透晰入理的數量分析論證。

對於中國當時機會不平等的結論也是類似的，即：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國家比較，毛主義下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機會比較均等的社會。所謂的機會平等或不平等，西方社會學的教科書中主要指一個社會裏人的就學、就業等是否機會均等，或在多大程度上不平等。在美國，人們認為最不平等的機會結構就是黑人和窮人的孩子不能像白人或富人子弟一樣上大學，即他們上大學的機會被剝奪了。懷默霆研究中國的機會不平等沒有涉及就學、就業的機會不平等的問題。他的着眼點是新的上層階級的特權如何。他列舉了毛主義下的中國上層階級確實享有一定量的特權，如獨立管理的住宅、有專供商店、子女被送到特別設立的學校等等。但他着重指出，享有這些特權的上層階級的人數不多，其享有的特權也比蘇東社會主義國家要小。為此，通過階級分析、結果不平等的分析，以及上層特權的機會結構的分析，懷默霆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毛主義下的中國比之舊中國，比之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更為平等的社會。

2. 白威廉的平均化的觀點

與懷默霆持相同觀點的另一位社會學家是白威廉。這兩位同時代的社會學中國專家，曾長期合作，共同發表了兩本非常有影響的研究著作，一本是《當代中國的鄉村和家庭》(Parish 和 Whyte 1978)，另一本是《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Whyte 和 Parish 1984)。白威廉有關中國平均化的觀點，雖然也見著於 1984 年那本書中，但他獨立著文 (Parish 1981, 1984)，系統地提出、論

證這一觀點，所以學術界均以白威廉為這一觀點的提出者。這裏着重介紹他 1984 年《中國的非層化》(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一文中的觀點和分析。

白威廉的研究問題是：文革十年與文革前相比是不是真的更平均化了？這樣一個表面看上去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對於一個美國學者來說是非常難搞清楚。因為，幫助他搞清楚這一問題的資料對於他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白威廉從事這一研究的 70 年代中、後期，中國的統計資料尚未公開，外國人到中國境內做大型調查尚不允許。為此，白威廉的資料收集工作是在香港進行的。他和他的同事先後訪問了 133 名從大陸各省 50 個城鎮到香港的移民，通過他們對鄰居的介紹，搜集了一個擁有 2865 個鄰居的樣本。他的平均化觀點就是通過分析這個樣本得出的。這是美國社會學者第一次用大型調查資料來分析解放後的中國社會的分層狀況。

白威廉分析了結果不平等和機會不平等兩個方面。分析結果不平等是從收入和消費兩個角度入手的。他發現，中國 70 年代的收入不平等，無論家庭收入還是個人收入，都比市場型的發展中國家低。如個人收入，中國的基尼係數是 0.20，而市場型的發展中國家是 0.54；這兩個係數在家庭收入方面分別是 0.25 和 0.46。與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比較，中國的不平等程度相近，略低。

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許多物品並不是從市場流通的，而是從行政渠道分配的，所以，白威廉特別重視消費品的分析。首先，住房的消費是半福利性的。他發現，領導比工人住較寬敞的房子，而高級專業人員的住房面積比工人還小。與其他國家相比，他發現中國城市平均每入居住的房間數總是小於 1（這個發現，在中國老百姓來看是多麼的平常，而對於住慣多房間寓所的西方教授是一個重要的比較社會學的發現！）。其他的發現也很有意

思，比如中國的洗澡設備「可能只是在廚房或廁所內裝一個水管龍頭。」家庭耐用消費品的分析發現，風扇、照相機、電視機擁有量，城市越大其戶均擁有量就越高，哪怕中小城市與大城市的家庭收入一樣也還是這樣。另外，收入水平和戶均人口一樣，但幹部行政級別高，則擁有自行車、縫紉機的家庭的比例就高。相反，高級專業人員在任何耐用消費品方面都和工人大致一樣，沒有特權。

白威廉的分析重點是機會平等與不平等問題。首先他做了代際比較。從1930年到1978年，每十年算一代，共有五個代際羣體。以1930—39這個時期羣體為基點，受教育的年限逐代增長，而職業等級和收入則逐代降低。美國的情況是，受教育年限逐代有增長，職業聲望大體保持不變，收入是中年人高，青、老年低。那麼，中國城市居民是如何獲得教育、職業和收入的機會的呢？白威廉採用了美國社會學界的地位獲得模型分析這些問題。

這一模型的背後假定是：如果一個人在獲得社會地位時（如教育、職業、收入），完全靠得個人努力，而完全不靠家庭背景和個人先附性特證（如年齡、性別、階級、種族等），說明社會的機會分布是極為平等的。反之，如果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不是靠個人努力，而只靠家庭背景和先附性特證，則這個社會的機會分布是極為不平等的。當然，任何社會的機會分布都不可能是這兩極，而是在這兩極之間有着程度不同的機會不平等。所以，分析兩個社會之間哪個較平等，或者分析一個社會內部兩個不同時期哪個較平等，可以通過地位獲得模型來進行。白威廉就是用這個模型來分析中國文革和文革前的兩個時期，人們獲得教育、職業、收入三個重要的社會地位的機會不平等問題的。

白威廉將他的樣本按照二十歲生日時是1966年以前還是

1967年以後分為兩組，然後，用父親的教育、職業、階級成分測量一個人的家庭背景，用年齡和性別測量一個人的先賦性特徵，用個人的教育水平和職業作為個人努力程度的指標。他對教育地位獲得過程的分析發現，文革前獲得高教育水平，其父親往往也是受過較高教育、從事較高職業的，但這兩種聯繫在文革中被割斷了。另外，文革前男性比女性優先獲得受教育的機會，而文革後男女受教育的機會大體一樣。這些發現說明，文革對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狀況有了很大沖擊，以後的情況是更平等的。

職業地位的獲得過程有些不同。文革前，父親的職業地位高其子女的職業地位也高；文革後，這一點未有改進。但是，文革前職員、商人、資本家出身的青年往往比工人、農民的子女更能獲得地位高的職業，而文革後這一情況顛倒了。這說明從一種階級不平等向另一種階級不平等的轉變。最後，在文革前，教育水平高的人往往更有機會獲得較高的職業地位，但是文革後這一情況不復存在了；無論你的教育水平如何，與從事甚麼職業沒都有太大關係！這說明是機會平等向機會平均的倒退。

收入地位的分析未有如比精彩的發現。比較有意義的分析結果是，對教育程度的收入回報，文革前是正的，但文革後是負的。這說明，白威廉 70 年代的樣本已表現出 80 年代中國城市收入結構的腦體倒掛的現象。

白威廉用許多表格、圖示證明，文化革命對中國社會分層結構進行了徹底的洗理，將中國從一個革命後比較平均的結構推向幾乎是「非階層化」的大平均主義的結構。他對這一趨勢，結合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表示了他的擔憂。他結論道：全社會內實行極端平均主義的前景並不令人看好。1966 年之前的中國的比較溫和的平等狀態，其前景倒是令人看好的。如果這些就是可能的適當模式，未來的平均主義的國家將不但像資本主義社會

那樣更好地切斷代際繼承的鏈條，而將為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提供高度平等的條件，以及某種程度的安全保障。這是值得認真研究的。

3. 戴慧思的代際層化觀點

雖然懷默霆和白威廉都分析了中國社會存在的不平等，但是他們的研究結論強調，毛主義下的中國平等化或平均化是根本特徵。這一特徵在白威廉看來是一個非階層化的趨向。與強調這一趨向相反，戴慧思分析了中國城市職業結構內部存在的代際層化的問題，集中體現在她於《現代中國》(*Modern China*) 學刊上發表的論文《代際不平等與中國革命》(*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ie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Davis-Friedmann 1985)。

代際層化觀點所要指出的問題是代際之間存在着職業機會的不平等。戴慧思依據以往學者的研究發現（如懷默霆、白威廉等的研究），以及她本人對中國統計資料的分析和對南方一些城市的實地考察，指出 1949 年以來，中國城市職業結構的重要特徵是，年長的一代佔據地位較高的職業，而文化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一代則從事較低職位的工作。這種現象，在白威廉的研究中已見端倪。但戴慧思試圖進一步解釋這一現象，並探討它對革命後的中國的意義。

戴慧思是從科層制和「職位空缺鏈」(*vacancy chains*) 的理論來分析中國代際問題的。職業社會學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導致大企業組織的出現和發展，應運而生的是產業組織的科層制。在科層制組織當中，勞動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因為用於尋找新的勞動力以填補空缺職位的費用相當大。同時，新的勞動力往往需要在職培訓，才能上崗任職，而培訓費也是非常昂貴的。當然，流出的有經驗的勞動力，很有可能將本公司的技術

帶走，並傳遞給有競爭實力的公司，這部分潛在的代價往往是不可估量的。出於這三方面的考慮，科層組織下的企業公司力求保持其現有勞動力的穩定性。因而，一方面，企業公司用職位、報酬的階梯結構促使勞動力在職位不變的情況下向上流動（級別和報酬），另一方面，除非僱員退休或偶爾流出本公司，職位是沒有空缺的。

所謂「職位空缺鏈」理論指的是，當公司的某些職位出現空缺之後引起兩種變化。一種變化是公司從其他公司挖人填補空缺，而被挖的公司也可能用同樣方法向其他公司挖人，所以形成了一個職位空缺鏈。在毛主義的中國，由於職業流動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一方式的空缺鏈現象並不適用。另一種變化是，當公司某些職位出現空缺，公司可以提拔低職位的人補缺，而將最低職位空出，從勞動力市場僱用新工人補足。這是公司內部勞動力市場的職業空缺鏈現象，而從外部勞動力市場僱用的新人永遠是進入最低職位。這一方式適用於對中國職業結構的解釋。

這種職位補缺方式的結果就是，老一代佔據高職位，年輕一代從低地位做起。這一方式一般來說是符合勞動力成長過程的規律的。但是，科層制的僵化教條，有可能將無能的老年人留在重要的高職位上，而將許多有能力的年輕人長期滯留在低職位上。戴慧思對中國解放後城市職業結構的考察發現，這已是中國的一個固疾。問題是，由於中國實行公有制經濟，所有企事業單位都置於政府科層制的體制內，而勞動力的過剩供給，造成中國很難逃避這個怪圈。為此，戴慧思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以科層制為組織方式的企事業體系都會發生「早到者優先」的現象，不但影響勞動力的有效配置，而且持續創造代際層化問題。

4. 林南、邊燕傑的單位地位研究

社會分層研究必須首先確定按照甚麼社會地位來看待社會分層體系。在市場經濟中，最為重要的社會地位是職業。這是美國及西方社會學的普遍認可的觀點。比如，從 1967 年 Peter Blau 和 Otis Duncan 的《美國職業結構》(*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以來，「地位獲得」研究一直是以分析職業地位的獲得為中心的。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條件下，這一觀點真的成立嗎？

Donald Treiman 似乎是這樣認為的。他研究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地位獲得過程，提出在工業化程度低的社會，職業地位獲得很大程度上依賴家庭背景，因為職業的分化程度不高，父子的職業知識、技能、機會的傳遞比較容易。但在工業化程度高的社會，職業分化的程度也高，父子職業知識、技能、機會的傳遞比較困難，求職者往往需要一定的教育水平和前期職業培訓，才能獲得較多的機會，謀求一份稱心的工作。所以，工業化程度高的社會，將打破父子職業地位繼承關係，代之而起的是以教育為中介的職業地位獲得模式。這一理論被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的實証資料所證明（見 Treiman 1970）。

林南和邊燕傑利用天津 1985 年問卷調查資料，在《美國社會學學刊》發表論文（Lin 和 Bian 1991），闡述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不同見解。他們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同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徵之一就是，經濟資源不通過市場進行分配。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當資源通過市場分配時，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通過市場分配時，職位的人力資本投資和經濟回報都是通過市場調節的，所以，以職業為核心的地位分層體系就產生了。在這一社會中，地位獲得分析自然應以分析職業地位為核心。可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條件下，資源是國家通過國家科層組織，按企事

業的各系統進行分配的。享有和使用資源的不是個人，而是通常所說的工作單位。不但財、物等一般經濟資源被單位佔有、使用，勞動力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資源也被單位支配。勞動力是由國家分配給單位的，勞動力不允許自由流動，勞動力市場不復存在。在這種條件下，勞動分工只表明工作性質的不同，而職業分化並不一定說明職業可以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社會經濟地位，因為勞動報酬（工資、待遇、福利、向上流動的機會等等）並不一定有相應的職業分化。相反地，單位之間的分化往往表明地位的不同，因為單位所佔有的經濟資源不同，而這些資源往往是各單位職工勞動報酬的基礎。換句話說，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條件下研究地位獲得過程，應該着重研究「單位地位」，而不僅僅是職業地位。

天津 1985 年問卷調查資料涉及了一個重要的單位地位指標，即所有制性質——國有、非國有。林、邊的分析就是圍繞這個指標進行的。（在以後的研究中，邊燕傑又探討了其他的單位地位指標，如單位的行政級別、行業地位、人員規模等等，在他的著作《中國城市的工作與不平等》〔*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Bian 1994b〕中有詳細論述和分析。）他們發現，當用這個指標測量父親和子女的社會地位時，父子單位地位的傳承關係是非常強的，雖然父子的職業地位的繼承關係已不復存在。這一發現具有兩點理論意義。其一是證明 Treiman 的工業化地位獲得理論也適用於社會主義國家，所以，社會主義國家並不能偏離工業化的道路來創造機會平等的職業結構。其二，社會地位的確定和測量，必須考慮社會的政治經濟型態，而不能依賴從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發現出來的所謂「通用指標」。因此，社會地位指標的特殊性，將是跨國分析的必要前提。

5. 魏昂德的單位依附和單位層化理論

在市場轉型論發表之前，對中國社會分層研究最有影響的學者可能就是魏昂德了。他最重要的成果莫過於提出了單位依附理論和單位層化理論，並對這兩個理論都做了深入的實證分析。

單位依附理論是魏昂德在他的著作《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Walder 1986) 中提出的。這部著作於 1987 年獲美國亞洲學會最佳著作獎，1988 年獲美國社會學學會最佳著作獎。1995 年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本。該書的中心問題是探討中國國有企業內部的權威結構。與社會分層研究相關的單位依附理論包括三個命題。第一，當單位佔有和使用經濟資源的條件下，商品市場不發達，許多生活消費品是通過單位分配給職工及其家庭的，所以造成了工人對單位的依附。第二，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有制體系，事實上是經濟資源由勞動者創造，但由國家統一分配的體系。這種統一分配又稱「再分配」。但是，國家的再分配功能是由單位實現的，因為沒有單位，國家完全不能進行再分配。所以，國家依附單位組織進行再分配。第三，社會主義國家是在共產黨一黨領導下進行統治的。統治的手段是通過各級組織，特別是工作單位組織，對人民進行政治控制。所以，政黨依附單位組織實行有效的政治控制。

單位依附理論說明了工作單位在中國作為政治經濟地位是何等重要。在 1986 年的著作中，魏昂德只研究了大型國有企業。但是，中國的其他類型的單位組織也是如此重要嗎？如果是同等重要，那麼，單位地位的分化可能是很小的。但事實上，單位地位的分化是很大的。正像魏昂德在 1986 年就已經意識到的，單位地位分化在國有和集體所有制之間很大，而在國有單位中，大、中、小企業的地位分化也很大。地位越高，三種依附就越

重。究竟如何測量單位地位呢？換言之，單位是如何「階層化」的呢？

魏昂德在《美國社會學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社會主義再分配經濟中的產權與分層》(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的論文(Walder 1992)，透徹地分析了單位層化的規律性。他首先說明，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企業的層化是由盈利能力來決定的；有能力盈利，就可能使資本積累和集中，擴大再生產，增加勞動報酬，發展成壟斷性企業。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企業也是可以盈利的，可是單位的層化並不是以盈利與否來決定的，因為盈利的單位並不一定享有利潤，而不盈利的單位往往可以從上級主管部門獲得補償資金，以保證它們的存在。

為甚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呢？魏昂德認為，那是由於公有制下的單位沒有賦予明確的產權，即佔有生產資料、轉移生產資料、使用生產資料、分配從生產資料轉化出來的利潤的權利。由於沒有這些產權，單位必須交出它們的利潤，而單位在公有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也不由其生產的利潤（或對國家貢獻大小）來決定。那麼單位地位是如何來決定的呢？魏氏認為，那是由單位與其上級主管部門的關係來決定的。

「上級主管部門」，即國家機構中主管經濟組織的某一級機關，在魏氏看來是真正的產權擁有者。這些主管部門決定所屬單位的命運——它們的經濟計劃、預算、人事調動、工資、獎金和福利等等。最重要的，這些主管部門代表國家收繳單位的經濟所得（利潤），也代表國家保證盈利和非盈利、運行良好和運行糟糕的所屬企事業的存在和發展。所以，「上級主管部門」的地位低，則所屬單位的地位也低。由於「上級主管部門」的地位是由所屬政府組織的行政層次決定的（中央、省、市、區、街），所

以，單位地位也應該按照這層關係而測量。魏氏將這些行政層次稱為「預算級別」。

為了證明他的單位層化理論，魏昂德分析了 1986 年天津的問卷調查資料。結果表明，職工的住房、工資、集體福利確實是按單位的「預算級別」來排列的。調查資料列舉了十一項單位辦的集體福利項目（醫療服務、托兒所、幼兒園、食堂、圖書館、班車、旅游活動等等），除一項外（運動設施），每個福利項目都與單位的預算級別成正比；而單位預算級別對每個福利項目的淨影響（剔除單位規模和行業的影響）是很強的。另外，單位級別越高，單位辦的集體福利項目就越多。最後，單位級別越高，單位建房的能力就越大。這些結果表明，再分配經濟的社會分層體系，單位地位是很重要的分層標準。

三 市場轉型論

倪志偉發表他的市場轉型論是在 1989 年。在這之後，他連續發表了許多相關的論文，或進一步說明這個理論，或做更深入、廣泛的實證分析，或對其理論做出修正。這裏着重介紹他最有代表性的三篇論文。

1. 1989 年的最初論點及其實證發現

發表在《美國社會學評論》1989 年 10 月號的論文題目是，《市場轉型論：國家社會主義從再分配向市場的過渡》(Nee 1989a)。《美國社會學評論》是美國社會學學會會刊，聲望和影響力極高，而該論文放在首篇位置，說明主編對其學術價值寄予厚望。以後有關市場轉型論的爭辯證明了此篇論文的重要性。今天介紹此篇論文，可以從一個假定、三個論題、兩個一般性假設來概括它的內容。

倪志偉所做出的假定是，市場經濟與再分配經濟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經濟型態，與之相聯繫的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分層機制。他的這一假定深受 Karl Polanyi 和 Ivan Szelenyi 的影響。

Polanyi 在他的名著《偉大的轉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olanyi 1957) 中對人類的經濟生產方式做出了三種類型的概括，即市場經濟、再分配經濟、互惠經濟。市場經濟的特徵是，生產者與消費者建立橫向聯繫，其聯繫橋樑是價格和貨幣。再分配經濟的特徵是，生產者與消費者沒有橫向聯繫，所有生產者都納入經濟管理的「中央」指揮下的縱向網絡，產品和生產盈餘自下而上交給「中央」，而「中央」按照縱向網絡中的權力關係自上而下地對產品和剩餘進行「再分配」。互惠 (reciprocity) 經濟的特徵是，雖然生產者與消費者可以直接見面，但價格和貨幣並不是中介，代之而起的是信任和禮物。由於倪志偉要分析的是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他着重分析了再分配經濟與市場經濟中社會分層機制的不同。

社會主義是一個再分配的經濟，並有其一套獨特的與再分配經濟相適應的分層機制。這是 Szelenyi 對比較分層研究的重要貢獻。他在一篇文章 (Szelenyi 1978) 中提出，社會主義再分配經濟可能從形式上是平均主義的，但是在如何分配公共物品上是很不平等的：有再分配權力的幹部享有特權，佔有住房等公共物品，而無再分配權力的一般工人則只能享用分配給他們的那一很小的份額。所以，擁有再分配權力是獲得精英階級地位的必要條件；沒有再分配權力則表明被拋棄在精英階級之外。

從 Polanyi 和 Szelenyi 的觀點出發，倪志偉提出，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將根本改變再分配經濟中以權力做為分層機制的狀況。這是因為，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可以在市場中直接見

面，生產者售出產品，利潤不再需要通過縱向的再分配體制進行「再分配」，而可以直接被生產者佔有、享用。所以，再分配權力在市場經濟中將不能像再分配經濟那樣發揮作用了。那麼，怎樣概括市場轉型後的社會分層機制呢？倪提出了三個論題。

論題一：市場權力論題。如果生產者的剩餘產品不再由再分配機構佔有，而是由市場交換來配置，那麼就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控制資源的權力會更多地存在於市場交易中，而較少地存在於再分配的系統中。第二，當勞動力和商品的價格是以買賣雙方的相互契約為基礎，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政府法令而調配，直接生產者對其產品和服務進行交換的權力會擴大。因此，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將伴隨着權力基礎的轉移，即權力從再分配官僚轉移到從事市場交換的直接生產者一方。這意味着對直接生產者的經濟回報將高於對再分配者的回報。

論題二：市場刺激論題。由於直接生產者不能交換他們的產品和勞動力，再分配經濟壓抑對直接生產者的刺激，而一實行市場經濟，對直接生產者的刺激就將增強，因為這時的直接生產者有權處置自己的產品和勞動力，其結果是直接生產者更多地分享剩餘產品。由於勞績與報酬是直接掛鈎的，而勞績的優劣又是與人力資本的優劣、多寡直接相關的，因此，市場刺激命題意味着對人力資本的經濟回報的提升，對權力資本的經濟回報的下降。

論題三：市場機會論題。從再分配向市場的過渡是再分配經濟讓位於市場經濟的過程。這預示着向上流動的機會結構從再分配體制的獨霸向市場體制的偏向的轉變。換言之，向上流動的成功之路不僅僅是成為再分配官僚，而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名私營企業主。機會結構的變化標誌是，企業家成為一種類似於官僚的社會成就的指示器。

根據這三個論題，倪志偉推導出十個可待驗證的假設。具體的假設對於許多讀者可能過於繁鎖。但倪志偉的文章中明確表述的兩個一般性假設是必須提及的。

假設一：市場轉型將降低對政治權力的經濟回報。這可簡稱為權力貶值假設。

假設二：市場轉型將提高對人力資本的經濟回報。這可簡稱為人力資本升值假設。

現在讓我們瞭解一下倪志偉是如何檢驗這兩大假設的。他使用的資料是 1985 年福建省 30 個自然村 624 戶的抽樣調查。分析的因變量是家庭收入。關於政治權力貶值假設，他的發現是：在人力資本和家庭組成因素一致的情況下，現任幹部家庭收入低於一般農戶。與企業主家庭相比，現任幹部家庭、離任幹部家庭，其家庭收入水平都有相當大的差距。比較 1985 年和 1975 年的收入，市場改革前後幹部家庭收入平均值略高於非幹部家庭的平均值，但是家庭收入的增長並不比其他家庭快，並大大低於農民企業主家庭。

對於人力資本升值假設的檢驗，有兩項發現值得敘述。第一，市場改革後丈夫和妻子合計教育程度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是正向的，且有統計顯著性（說明此項發現可以代表抽樣總體）。也就是說，丈夫、妻子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家庭收入越高。第二，市場改革剛剛開始的 1980 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前的 1975 年，丈夫和妻子的教育總和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是負向的，即教育越高，收入越低。雖然這兩個係數在統計上不顯著，與改革後的正係數比起來，改革前後的變化已反映出來了。

2. 1991 年的修正：局部改革的觀點

市場轉型論發表後，倪志偉教授在進一步分析 1985 年福建

農村調查中發現，有幹部背景的家庭比一般農戶在「收入流動」中仍顯優勢。所謂收入流動，是將人口按其收入分成若干層次，然後觀察人們在收入層次之間的流動。根據收入流動資料的分析，倪志偉提出了「局部改革」的觀點，強調在改革尚未完成之前，由於再分配經濟體制仍發揮作用，所以政治權力不是一夜之間貶值，而在局部改革中仍然得到相當程度的經濟回報。這一觀點和分析發表在《美國社會學評論》上，題目是《改革中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不平等：處於再分配與市場之間的中國》(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Nee 1991)。

我們必須首先明瞭倪志偉的新的分析發現是甚麼。他的 1985 年的農戶調查提供了三個時點的收入資料：1975 年、1980 年、1985 年。福建省農村經濟改革是 1978 年前後開始的，所以 1975 年被看作再分配經濟模式，1980 年被看作改革初期的模式，1985 年被看作改革開始向縱深發展的模式。在三個年頭的每一年，農戶都可以按戶均收入進行排列，每隔 20% 的農戶分組，則得到五個組，即最高五分位組，次高五分位組，中間五分位組，次低五分位組，最低五分位組。這五個分位就是五個「收入階層」。所謂「收入階層流動」的概念，就是指某一農戶在 1975—1980—1985 三個時點上從一個收入階層向另一個收入階層的流動。市場轉型論認為，從再分配向市場的轉變伴隨着權力、實惠、機會向直接生產者的倒向，而對再分配權力擁有者無利。這就是說，企業主農戶的收入流動應完全是向上趨勢，一般農戶的收入流動也應有此趨向，而新老幹部家庭的收入向上流動的機率較低。但是倪志偉發現，有幹部背景的農戶，向上收入流動是非常明顯的，因為許多這類戶已經成為企業主了。這是市場轉型論未預測到的情況。

倪志偉的解釋很簡單：中國正處於再分配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再分配機制沒有退出社會分層體系，與市場機制同時起作用，所以擁有再分配權力的幹部，無論新、老幹部，都有一定的政治資源，並依此從再分配體制和市場同時得到經濟回報。簡而言之，中國的市場改革尚未完成，即只是局部的；當全面的改革到來特別是完成之際，市場轉型論所預示的分層模式，就將最後出現。

3. 1996 年的再次修正：相對變化的觀點

截至 1996 年，倪志偉的市場轉型論已經引起學術界的極大重視。研究東歐、中國社會分層體系的學者開始發表新的與市場轉型論相左的觀點，並將他們的觀點建立在各廣泛的實證資料基礎之上。與此同時，倪志偉教授也佔有了更多的實證資料，主要是 1988 年中國城鄉家計調查和 1994 年廈門、上海等地的調查。這些資料為檢驗市場轉型論提供了新的機會，但也提出了許多挑戰，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評價幹部收入隨市場改革的深化而上升的事實。倪志偉在《美國社會學學刊》上的長篇論文，題目是《一個市場社會的出現：中國社會分層機制的變化》(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Nee 1996)，依據他的新的資料，回答了上述問題。

他堅信，幹部收入隨市場改革的深化而上升的事實，與市場轉型論沒有衝突，因為市場轉型論並沒有排除各階層收入均將上升的可能性，並且，在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 80 年代和 90 年代，包括幹部階層在內的各階層的收入上升是非常自然的。市場轉型論指出的趨向不是說幹部階層的收入與其他階層的收入相比，特別是與企業主階層相比要下降；而是說，幹部階層的收入上升速

度相對慢。這一相對變化觀點，倪志偉認為在他 1989 年論文中已有提及，但這次他集中論述這一點，並用新的資料檢驗它。

倪志偉首先將他的全國樣本資料分為內地和沿海兩個分樣本。與沿海省份相比，內地的改革開始得晚，所以再分配經濟的因素要強。在沿海地區，倪認為由於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改革措施在各地的推行不一致，所以存在再分配、合作主義、自由放任三類不同的經濟類型。因此，就全國來講，有四個經濟類型：(1) 內地是一個較傳統的再分配經濟，那裏再分配權力應有最大的經濟回報；(2) 沿海再分配經濟，市場改革在這裏已見端倪，但主要成分仍是再分配性質的，所以擁有再分配權力的幹部將有可觀的經濟回報；(3) 沿海合作主義經濟，這裏是國家、社區和市場三種力量結合的地區，雖然經濟資源也通過市場流通，但是幹部保留着對資源的極大控制，因此幹部應有可觀的經濟回報；(4) 沿海自由放任型的經濟，這是市場發展比較充分的地區，再分配經濟已不再是主導了，所以，再分配權力已貶值，幹部的經濟回報應無優勢。

倪志偉發現，在所有的四個類型中，企業主的收入回報都是相當高的，而幹部的經濟回報則沒有那麼高。具體地說，在內地再分配經濟中，在個人、家庭和制度環境條件一致的前提下，幹部的經濟回報只是企業主經濟回報的三分之二。在沿海再分配型經濟中，企業主和幹部身份對經濟回報都沒有獨立影響，只有幹部同時兼任企業主的情況下，他們的收入才比一般戶高。倪認為這一發現支持他權力轉移論題：市場改革來臨時，權力從再分配者手中轉移到直接生產者手中，所以後者是獲利者。但是為甚麼這種情況在再分配型的經濟中出現呢？倪未有解釋。在沿海合作主義型的經濟中，幹部的收入回報只是企業主的三分之二。最

後，在沿海自由放任型的經濟中，幹部與一般農工一樣沒有經濟回報優勢，而企業主的經濟回報相當大。

四 與市場轉型論相左的觀點及其研究發現

如上所述，市場轉型論發表之後，引起學術界的極大重視。截至 1996 年，許多學者提出了與市場轉型論相左的觀點，並進行有針對性的實證分析。總的說來，爭論的焦點是如何評價轉型經濟中再分配權力及其收入回報。再分配權力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它是隨着市場改革而日益衰落呢？還是以其他方式仍然發揮效力？或者它依然存在於再分配和新生的市場經濟中，只是我們的研究者忽略了它？假定它是持續存在並發揮效用，又怎麼解釋它與市場經濟的相容性呢？一句話，再分配權力還有沒有，對它的經濟回報究竟怎樣理解？我介紹五種有代表性的觀點，並對主要研究發現做扼要敘述。

1. Rona-Tas 的權力變型論

對市場轉型論首先公開置疑的是 Akos Rona-Tas。他在《美國社會學學刊》發表對匈牙利研究的結果（Rona-Tas 1994），其針對性從文章的題目可見一斑：《領先者將會落後》（The First Shall Be Last），其副標題是《社會主義轉型中的企業主和幹部》（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Rona-Tas 的研究對象是 1989 年共產黨國家解體以後的匈牙利。這個研究對象的選擇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匈牙利在共產黨政權解體後，實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市場經濟成為全國的主導經濟。那麼，如果市場轉型論是正確的，在匈牙利這樣的社會應該能找到強有力的資料證據。但結果是相反的。Rona-Tas 對 1989

年前後的匈牙利考察之後發現，幹部階層沒有像市場轉型論預示的那樣退出歷史舞台，而是在私有化過程中大獲其利，昔日的共產黨企業經理和政府官員，是今天的股票持有者，私有或聯合經濟的當家人。

怎樣解釋原共產黨的幹部在私有化過程中保持優勢的現象呢？Rona-Tas 認為，再分配權力發生了兩次變型。第一個變型是擁有再分配權力的人將權力轉化成了社會網絡資源，這是權力向網絡資源的變型。由於這一變型，當匈牙利政治結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時，一個政府官員的職位在一夜之間可以丟掉，一個企業經理在一夜之間可以被罷免，但是，長期在權力結構中的經營，已使權力擁有者建立了深厚的權力網絡和社會網絡。這些網絡就是社會資源。第二個變型是社會網絡資源變型為私有財產。這一轉變的外部環境條件是，匈牙利面臨全面的私有化。從公有制到私有化的轉變，是在外國資本的加入下進行的，但外國資本需要本土買辦協助，而昔日的官員、經理是最好的利用對象。在外國資本未涉及的領域，公有財產向私有財產的轉化也是在社會網絡的環境中進行的。所以，對擁有網絡資源的昔日官員、經理來說，在這一過程中成為首批私有財產的佔有者，其機會比其他階層要多得多。

2. 邊燕傑、Logan 的權力維續論

邊燕傑與 John Logan 在《美國社會學評論》發表的權力維續觀點，是他們研究中國天津 1978 年到 1993 年改革進程及其收入變化的結論（Bian 和 Logan 1996）。文章明確指出，中國的改革是在兩大制度未發生動搖的前提下進行的。一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沒有受到動搖，因此保持了政治權力在控制社會方面的涵義不變。二是城市單位制度未發生根本的動搖，因為截至 1993 年，

單位仍然是控制經濟資源的關鍵部門，單位仍是再分配的代理人。這兩種制度的持續存在和發生作用保證了政治權力對資源的控制和分配，使得政治權力得到繼續。

政治權力的繼續在再分配和市場兩種體制中都有體現。在再分配體制中，比如國家機關、國有事業、企業單位，再分配的機制一直在起作用。勞動報酬的分配都受政治權力的制約。在市場體制的條件下，政治權力之所以能得到繼續，是因為市場是在政治權力結構的影響下崛起、成長的。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可以優先到市場體制中獲得實惠。此外，邊、Logan 還指出權力繼續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場機制往往是在再分配體制內部發育、成長、壯大的。比如，國有企業內部的浮動工資、與成效掛鈎的資金，都是按市場機制的刺激原則進行的。因此，在再分配體制內部成長的市場，對擁有再分配權力的人最為有利，他們的經濟回報不應隨着市場的發展而減少，而應得到保持和提高。

邊、Logan 分析了天津市 1978 年、1983 年、1988 年、1993 年四個時點的調查資料。由於市場改革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加深的，所以，如果市場轉型論是正確的，對再分配權力的回報應是逐年減少的。但是，如果權力繼續論是正確的，對再分配權力的收入回報應該在四個時點上至少是不變的，可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有提高。

如何測量再分配權力的概念呢？邊、Logan 在組織和個人層面分別設計了兩套指標。在組織層面的指標是單位的所有制性質（國有、非國有）和單位的行政級別。相應的假設是，國有單位比非國有單位擁有更大的再分配權力，級別高的單位比級別低的單位再分配權力大。研究發現，對單位級別的經濟回報是逐年提高的，而與集體企業相比，對國營企業的經濟回報也是逐年提高的。這是在組織層面對權力繼續論的強有力的支持。

在個人層面測量再分配權力的兩個指標是中共黨員身份和是否從事擁有再分配權力的職業。後一指標的設計是借助了職業編碼分類，當確定某一職業可以允許在職者進入本單位的再分配決策過程時，該職業即被確定為擁有再分配權力的職業。他們的發現是，對黨員身份的收入回報從 1978 年到 1988 年是下降的，但當市場改革全面展開的 1993 年是上升的。對再分配權力職業的收入回報則是逐年提高的。這些發現是在個人層面上支持了權力繼續論。

邊·Logan 的天津研究也發現了支持市場轉型論的資料。首先，對年齡的收入回報是逐年遞減的，說明以再分配為體制背景的年資效應在減弱。第二，對教育的收入回報是逐年上升的。第三，對市場關聯性高的職業的收入回報在 1988 年以後迅速提高。最後，對市場化或類市場化企業的經濟回報在 1993 年超過了對任何其他類型單位。最後一點應該證明了市場轉型論中的市場權力論題。這些結果說明，中國天津是一個雙軌制的經濟，權力和走入市場都是向上流動的渠道。

3. 白威廉和麥誼生的政治市場觀點

再分配與市場雙軌並行的觀點，似乎隱涵着市場就是完全的經濟市場的概念。雖然邊·Logan 指出再分配體制內已有市場產生的思想，但是他們的市場概念還是存留在經濟市場的圈子裏。白威廉和麥誼生突破了這個框框，大膽提出在經濟市場發展的過程中，轉型經濟中出現了重要的政治市場。他們合著的論文在《美國社會學學刊》的市場轉型爭辯專輯上發表，提出經濟、政治二元市場的結構和互動規律，是解開市場轉型論爭辯的鑰匙。白·麥合著的論文題目是《政治與市場：雙重轉型》(Politics and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 (Parish 和 Michelson 1996)。

甚麼是政治市場？白、麥指出三種形式。第一是工人與幹部的關係，第二是企業與政府主管部門的關係，第三是地方與中央的關係。為甚麼這三種關係是政治市場呢？他們認為，由於在市場改革的進程中，這三種關係都處於雙方的討價還價之中。討價還價的雙方的資源是政治性的，如工人對幹部的評價往往是工人願意接受領導的前提，而幹部對工人指揮、領導，往往要看工人的反饋態度、企業環境、大的社會政治氣候來定。企業與政府的討價還價，地方與中央的討價還價，也是有政治資源為背景的，在一定的政治關係和氣候中進行的。由於這些政治市場關係影響着利益分配，並且影響着經濟市場的運行，所以政治資源、政治權力在市場轉型過程中將不會被貶值，對政治權力的經濟回報將會持續保持優勢。

白、麥分析了 1988 年中國家計調查資料，共 9062 戶，橫跨 27 個省的 244 個縣。這個資料在倪志偉 1996 年的文章中使用過，但白、麥提出了地區經濟類型劃分的新的見解。他們反對倪對「沿海再分配型經濟」的劃分，因為該組的地區是大城市的近郊區。白、麥認為，「這些地方的特別之處不僅在於集體和國家所有制的層次較高，而且村民們亦有機會去城裏上班」。也就是說，參與市場活動的機會高，不被鎖在再分配的體制內部。另一個不同的見解是有關幹部的定義。由於再分配權力的概念是指參與決策的權力，所以白、麥認為，倪志偉將一般行政人員歸入這一概念的做法是不適當的。他們只考慮農村中的行政官員，並對官員的層次、分類及其政治資源有精闢的闡述。

在對地區和幹部分類做了調整之後，白、麥重新分析了經倪使用過的 1988 年的資料。結果是，在所有四類地區，對幹部的經濟回報都是正向的，在剔除了其他影響因素之後，幹部家庭幾乎要比平均農戶收入高 40%。因而，就絕對量而言，官員的收入

優勢截至 1988 年還未消失，而且，官員收入的絕對量在更趨市場化的地區亦未開始下降。有一點需要說明是，一般辦事人員的收入低於其他非農勞動者，但不包括這類辦事人員在內的領導階層收入處於領先地位。他們結論道，在農村改革過程中，「地方官員將會靈活地審時度勢，使自己和家庭努力適應新形勢，以謀取最高的回報」。

4. 魏昂德的政府亦即廠商的論點

白、麥的政治市場論點指出了政治與經濟的聯繫，但政治市場的概念將政府排除在經濟市場之外。魏昂德在《美國社會學學刊》以《地方政府即廠商》(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Walder 1995b) 為題著文闡述政府已是經濟市場中的必要一員，因為地方政府已經從事經營，以廠商的角色參加市場活動了。用經濟學家常用的語言，政府本來是「球賽」的裁判，但是現在裁判已經作為球員參加球賽了。

政府作為「裁判」和「球員」的雙重角色參加市場改革過程，引起了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比如「尋租」問題、經濟公正問題、政府腐敗問題等等。但是魏昂德對政府亦即廠商的分析側重不同，與市場轉型和社會分層研究的關聯有二。一是，它解釋了為甚麼政府的權力作為政治權力的重要形式在改革中是得到繼續的。道理很簡單，因為政府不但通過法規培育、管理市場，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直接參與市場活動，影響市場的發展。參與市場活動不但成為政府發揮權力作用的機會，而且，政府通過參與市場和權力運作，為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直接獲得經濟回報。

政府亦即廠商的論點對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研究第二個有關聯的思想是，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有同樣的能力和動機成為廠商。魏昂德認為，越是遠離中央權力的政府越有能力成為廠商，因為

遠離中央權力意味着自主權力的能力提高，因此可以用多種方式將政府機構變為廠商。還有，遠離中央權力的政府也有充分的物質誘惑力成為廠商，因為中央對這些政府的監控能力下降，使它們對從事廠商經營所獲利潤有比較直接的控制、享有，這將給這些政府提供相當的刺激機制。

遠離中央權力在魏氏看來並非一個地域概念，而是一個科層概念。所以，級別低的縣、鄉政府比級別高的省、市政府更遠離中央權力。他的實證分析為此選擇了山東鄒平和直轄市天津，前者遠離中央，後者靠近中央。分析發現，的確鄒平在各種政府即廠商的指標上都超過天津。

5. 林南的地方市場社會主義的論點

最後我要介紹的是林南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地方市場社會主義》(Local Market Socialism) (Lin 1995)，發表於《理論與社會》(*Theory and Society*) 上。文章以天津大邱莊為例說明了地方政治權力結構不一定依市場轉型而發生根本變化，因為該結構的基礎是很難發生變化的家族網絡。

地方市場社會主義中的「市場」，指的是地方經濟的協調機制是市場原則，即價格原則、競爭原則、優勝劣汰原則。地方市場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主義」，指的是地方經濟的組織模式是集體性質的，這表現在產權的管理不是私有的，而是社區集體的。運作這樣一個市場化的集體經濟需要有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結構。林發現，天津大邱莊從一個再分配性質的集體經濟發展到一個市場化的集體經濟，其政治權力結構未發生根本變化，主要的領導人都未離職，而新的領導人又都是「老幹部」的家族網絡中提拔的。這一情況是對市場轉型論的挑戰，因為該理論預測，擁有再

分配權力的幹部應該在市場轉型過程中喪失權力基礎，成為失敗者。

林南認為，政治權力結構能夠超越市場經濟體制，原因就是這一權力結構所依賴的是家族網絡。家族網絡的特徵是它的連續性，因為家族關係是隨着代際傳承而持續發展的，所以政治權力可以繼續下去。林南介紹到，大邱莊「總公司各部門安排年輕幹部都是老一輩幹部的孩子或晚輩親戚，這樣，家族勢力的傳承不僅發生在最高領導人身上，而且適用於整個董事會。也就是說所有『圈內』的家族都留在了權力結構以內」。雖然這種權力傳承方式能繼續幾代尚待觀察，家族網絡成為村落政治權力的基礎，是轉型經濟中的重要現象。

五 理論爭辯與研究課題

理論爭辯可能永遠不能得到最終解決。但是，瞭解理論分歧之所在有助於我們確定有理論價值的研究課題和方案。1996年《美國社會學學刊》專輯討論了市場轉型論。五篇評論之一是白威廉、麥誼生的關於政治市場的論點，本文已做介紹。有兩篇評論是泛泛之論，不宜介紹。我着重談談魏昂德和 Szelenyi 的評論，然後對未來的研究課題談談我個人的見解。

1. 市場與社會不平等有必然聯繫嗎？

魏昂德在評論中提出這個問題，並做了否定的回答。他用中國農業集體化做例子，提出制度安排相對獨立的論斷。他認為，「市場」是一個定義不清的概念，而 Szelenyi 所定義的市場並不一定存在於經濟現實中。現實中有多種多樣的市場，或曰市場制度，而與之相聯繫的分層機制也可能不完全是「市場」的或「再

分配」的。所以，主觀確定市場經濟必有一套與之相適合的分層機制和分層體系，那只是主觀臆想，無助於對現實的研究。

制度安排相對性並不表明制度安排無規律可循。魏氏倡導分析兩個方面的規律性。一是產權制度的安排。產權制度分為佔有、使用、收益、轉換四個方面，又有完全產權和殘缺產權之分。產權的不同安排，不太會影響經濟運行是不是市場化的，但可能會影響哪些人可以謀取經濟剩餘，用甚麼方式謀取等等。所以，要想確定轉型經濟的社會分層變動，必須分析產權制度。

二是路徑依賴問題。路徑依賴的概念是經濟史學家 Douglass North 提出的，指的是一項經濟制度的選擇，往往受社會的政治、文化等歷史因素的影響，即所謂依賴歷史發展軌道而變化。魏氏引用這一概念提出，中國之大，各地方在毛澤東時代已有很大程度的分權模式，到了鄧小平時代地方自主權也越來越大。所以，地方往往選擇不同的產權形式組織經濟，選擇不同的分層機制解決勞動報酬和經濟剩餘的分配問題。單單從理論上強調市場經濟有一套確定的分層機制與之相配合，往往忽視了豐富多彩的社會事實。解決方案之一就是分析各地方的制度選擇是如何受「路徑依賴」的影響的。

2. 市場的發展有階段性嗎？

Szelenyi 提出這個問題，並做了肯定的回答。這是在他與他的學生合寫的評論《關於市場轉型的爭辯》(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Szelenyi 和 Kostello 1996) 中提出的。由於這一理論思想是 Szelenyi 的，以下我簡而不提他學生 Eric Kostello 的名字。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Szelenyi 一直是美國社會學界研究共產主義國家的理論權威。他 70 年代發表的著述大多成為這方面研究的必讀物。他的「再分配經濟」的概念，以及「再分配精英階

級」的理論框架，一直影響着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研究，也是倪志偉市場轉型論的理論基礎之一。Szelenyi 在 70 年代曾堅信，再分配經濟中的階級不平等，將在市場經濟出現時得到削弱，因為再分配權力再不能阻礙人們自由地進入市場，為個人謀福利。也正是基於這一判斷，他提出了再分配經濟在向市場經濟轉變時，社會不平等程度將有所下降。

時值 1996 年，東歐和中國都發生了巨變。新的研究成果向 Szelenyi 最初的預言提出了挑戰。在改革初期不平等略有下降之後，改革深入的 90 年代，新的不平等出現了，全社會不平等也加大了。同時，市場轉型論預測的權力貶值情況也只發生在較小區域的較短時間內，而在更大範圍的更長的時間裏，權力未有貶值，反而，許多研究都表明權力階層重現優勢。Szelenyi 的「市場滲透和擴張階段論」就是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些矛盾提出的。

該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再分配經濟走向市場有一個市場侵蝕再分配經濟、市場擴張的過程。這一過程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地方商品市場階段。在這一階段，再分配經濟無論在全社會還是在地方的層次上，都佔有絕對的主導地位。換言之，人、財、物的配置不是通過市場，而是通過行政命令進行的。但是，在地方的層面上，商品市場，特別是小商品市場由於得到國家的許可而存在。活躍在商品市場上的售銷者，可能是直接生產者如農民、漁民、食品加工商，但大量是小商人進行短途販運生意。幹這些事情不需要太高的人力資本，又是苦不堪言、大家瞧不起的職業，所以從事這些活動的人往往是再分配經濟中的下層農民、城市貧民。但是報酬卻是不錯的。因此，從結果上看，地方商品市場為社會的下層提供了經濟機會和回報，起到了縮小不平等的作用。Szelenyi 以為，他最初關於市場縮小再分配經濟中不平等的推斷適用於這個階段。

市場發展的第二階段是社會主義混合經濟階段。這一階段中，商品市場進一步發展，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開始出現。Szelenyi 以為，1980—1989 年的東歐和 1985 年後的中國處於這一階段。由於私有經濟合法化了，新的市場滲透類型出現了。在此階段，市場競爭開始加大，但從事市場活動的社會、政治風險有所下降，從而吸引素質較高的人從事經營活動。一些受教育程度低，處於社會最邊緣的較早進入市場的先行者被擠到了一邊，或者銷聲匿跡了。一些幹部也開始傾向於市場經濟，一部分技術官僚開始建立起通向新的私有經濟的橋樑，將他們的官僚特權商品化。這時，市場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補償性的機制，雖然再分配經濟在社會仍佔有主導地位。社會主義混合經濟可以更精確地被描繪成一個「不平等的二元體制」。這時，新的不平等由於市場的發展而出現，權力優勢階層開始進入市場獲得初步的回報。

市場發展的第三階段，也是最後階段，是資本主義導向的經濟階段。Szelenyi 以為，1989 年以後的東歐開始了這一階段的市場發展，但他對中國是否進入了這個階段持不確定的態度。這一階段的標誌是全社會規模的私有化，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也在全社會的層次上發展。幹部的優勢顯出來了：一部分技術官僚變得非常有勢力，並已成功地與新的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他們用自發的私有化作為一種向大資產階級轉化的手段和策略。但是舊官僚精英，即那些曾專職黨務和行政，又沒有技術的那部分人，損失是相當大的。他們與窮人和大多數工人一樣成了市場改革的輸家。贏家是先前的技術官僚精英和來自原來中等和中等偏下階級現在已經成為新興小資產階級的那部分人。不平等大幅度上升，對人力資本的回報提高，而促使社會平等的機制則是再分配。

3. 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模式及其對社會分層的涵義是甚麼？

這是擺在中國社會分層研究者面前的首要問題。為了便於與國際學界接軌，不妨從 Szelenyi 的市場滲透和擴張階段論入手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他的理論符不符合中國的情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他對市場發展的階段性及其對社會分層、社會不平等的影響的判斷是否適用於中國？這是一個實證問題，需要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改革的歷史做深入瞭解之後才能得出令人滿意的回答。

研究者可以完全拋開 Szelenyi 的理論框架來分析中國的市場發展模式。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有幾個特點已得到公認：漸進改革而不是「休克療法」；公有、私有二元經濟的共存和互相交叉、滲透；地方政府直接參與市場經濟，既當「裁判」又當「球員」；地區發展不平衡和市場經濟多元化、特區化；國有企業單位制的削弱與新生經濟內部單位制的上升；農民工進城促使城鎮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形成。這些「中國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它們對社會分層體系的變動又有甚麼涵義呢？由於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在地方層次上研究這些問題可能是較好的突破口。

這並不表明從全國層面上研究這些問題就不可能。這是可能的並且是有意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的進程是由中央政府來協調、把握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大特色，與東歐相比，就是共產黨的領導沒有變。那麼，從全國層面研究市場經濟發展及對社會分層的影響的思路是甚麼呢？人民大學李強教授曾提出過我稱之為「條塊發展」的思路。中國的市場經濟是按權力系統管轄的「條塊」來進行的。所以，先發展生活資料的商品市場，然後是生產資料的商品市場，然後是資金市場，最後是勞動力市場。這個思路與 Szelenyi 的市場滲透與擴張階段論有相似之處，但在一點上有質的不同。Szelenyi 的市場滲透和擴張的概念潛含着，

市場從邊緣經濟一步步向再分配經濟進逼，最終促成全社會私有化。相反，「條塊」市場發展的觀點潛含着，再分配經濟出於某些政治、社會成本的考慮而向市場經濟「放權讓利」。兩種過程不同之處在於市場發展的主導角色前者是「社會」，而後者是「國家」。如果真是這樣：對誰贏誰輸的社會分層的問題，有非常不同的制度安排就不奇怪了。

4. 轉型期中國社會分層的特點是甚麼？階級分化如何？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必須對中國國情有廣泛、深刻的瞭解和認識之後才能回答。我以為，能夠得出令人滿意的答案的學者在中國國內。1998年8月在香港科技大學研討班上李路路教授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做了上述回答。我現在仍然堅持這個判斷。但我一直在思考李路路教授這個問題，想借整理講稿的機會談談我個人的一些思考。

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分層觀。一種是定性的階級劃分思路，一種是定量的層化思路。前一種思路假定，社會上存在這樣一種狀態：某些人佔據資源，其他人不佔資源；佔據資源的人利用其資源優勢控制沒有資源的人，可能對後者進行剝削、壓迫，成為社會矛盾、衝突的原因。相反，後一種思路假定，社會上的人都佔有資源，其差別是多少問題。由於是多少問題，西方社會學確定的研究包括兩大方面。一是究竟佔據多少資源就成為「上層」，多少資源就是「中層」或「下層」。劃分這些層次的主觀性極大，但如果理論或政策作為評價尺度，就可以判定有些劃分可能好於其他劃分了。二是佔據更多的資源是否可能（即向上流動是否可能），機會的分布是否平等。一個良性循環的社會是向上流動的機會更加平等的社會。究竟中國的社會分層體系是按

哪一種思路去研究呢？這必須看我們對中國轉型期國情的判斷是甚麼。正確的判斷是比較瞭解國情的研究者做出的。

改革開放以來的階級分化如何？我曾讀到某些學者對中國階級分化的論述。許多人從職業劃分的角度看問題。我認為，階級劃分與職業劃分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理論概念，雖然他們之間有聯繫，統計上相關。我不能對中國目前階級劃分做任何具體的分析，但我堅持階級分析的兩個理論原則。

階級分析的第一個理論原則是把階級當作一個社會範疇。這就意味着將人看作社會人，看作與其他人發生聯繫的人。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人們社會聯繫的最基本的形式是共同勞動。從事共同勞動，每個勞動者必備最基本的資源：即勞動力。雖然每個勞動者都擁有一定的勞動力，但與他人共同勞動的時候不見得能夠完全支配自己的勞動力。有三種可能性：自己的勞動力被他人支配，自己的勞動力由本人支配，自己的勞動力由本人支配同時支配他人勞動力。我個人以為，如何支配勞動力是階級劃分的最根本的基礎，因為無論人類社會發展到甚麼階段，只要人類需要共同勞動，就必然發生勞動力被他人支配和支配他人勞動力的問題。這一形式的階級劃分究竟會不會導致矛盾、衝突、革命，還是會促使協調、合作、進步，那將是不同社會裏的實證問題。當今轉型期的中國現實如何？這可以是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課題。

階級分析的第二個理論原則是把階級看作一個經濟範疇：即把人看作經濟人，看作與其他人發生經濟聯繫的人。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人們之間的最根本的經濟關係是財產關係，特別是人們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馬克思當時設想了兩大階級——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就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制度經濟學已經揭示，財產產權關係包括對財產的佔有、使用、收益、轉換四個方面，所以，在當代經濟體系中的階級狀況恐怕比馬克思劃分的兩

個階級要複雜得多。但是無論具體情況有多複雜，不能忘記階級分析的要害是「有」與「無」的關係問題。如果凡是對生產資料有佔有關係的人都程度不同地對財產有使用、收益和轉換的權利；而凡是對財產沒有佔有關係的人都喪失了這些權利，那麼馬克思的兩個階級的論述就符合今天的現實。如果現實並非如此，則要求我們深入分析產權關係，對轉型經濟條件下的階級關係做出新的判斷。無論如何，從經濟財產關係劃分階級，是借此概括人們對自己的勞動成果的控制、支配、享有的經濟能力，或在甚麼條件下自己的勞動成果為他人所佔有。

上述兩個理論原則的結合，可以用作分析轉型時期中國階級分化的理論框架。我對分析結果的期望是，無論現實有多複雜，中國有多大，階級的數量不應很多。多了就失去了理論的概括性了。

階級分析與市場轉型論有何關係？市場轉型論或與之相衝突的各種觀點沒有直接涉及階級關係的分析。但是這些理論觀點都明確地關注着一個問題：經濟轉型中社會的精英階級成分可能變化，通往精英階級的道路與過去不同了。市場轉型論認為，市場的發展使機會分布變得平等了，但獲得機會的人是那些擁有較高人力資本的人。這預示着精英階級的成分是以高知識高技術的人員構成的。權力變型論和權力維續論認為，政治資本在轉型經濟中仍是通往精英階級的必要條件，所以，這些論點預示着精英階級的政治化是不發生變化的。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在分析各個階級狀況的同時，分析他們的形成過程、途徑、影響因素。相衝突的理論模型建立在對這些方面的認識、判斷的不同，而識別哪種理論模型更接近於現實，就必須求助於實證資料和分析工具。

5. 幾個具體的研究課題

第一，對教育程度的經濟回報。市場轉型論堅信，當市場發展之後，對人力資本的回報應提高。由於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本，所以對教育的經濟回報是檢驗市場轉型論的一個重要視角。許多實證分析表明，對教育的經濟回報在中國各個時期都很低，雖然市場發展得很快。謝宇、Hannam 在《美國社會學學刊》上的文章（Xie 和 Hannam 1996）認為，對教育的經濟回報是隨着勞動力市場的發展而變化的。這可以作為今後實證檢驗的一個論點。但同時必須看到，在大陸以外的中國人社會，如台灣，對教育的經濟回報也不高（見 Parish 等 1995）。這說明，分析對教育的經濟回報問題，不但需要考慮勞動力市場的狀況，而且需要考慮社會文化環境以及歷史背景（路徑依賴）。從實證分析的角度看，在中國大陸的範圍內，做地區之間的比較、地區內部的歷史比較，將是有意義的研究方法。

第二，對性別角色的經濟回報。有關這方面，西方社會學者對中國的實證分析，其結果是非常不一致的。理論問題的實質是，當市場經濟發展之後，性別歧視、性別不平等（機會和結果）是得到緩解了呢還是將問題加重了？換言之，在市場和再分配之間，哪個更是性別平等的經濟制度條件？讀者的答案可能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為了有助於理論探索，我還是將市場轉型論與權力維續論對性別不平等的預示做個說明。市場轉型論預示，市場的發展有助於緩解性別不平等，因為市場經濟促使機會分布的更平等，對婦女並不專門設置障礙。權力維續論的預示相反。它認為，婦女在政治權力結構中一直處於弱勢，而市場經濟發展無助於改變這種狀況，由於政治權力在轉型經濟中一直是重要的資源，所以市場改革不能幫婦女的忙。這一論點預示，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性別不平等將持續，或有加重。

第三，非貨幣的再分配經濟實惠及其在社會分層研究中的作用。所謂非貨幣的再分配經濟實惠，是指某些公共物品或福利待遇，無須從市場上買賣，而從單位或政府獲取。例如，醫院、食堂、幼兒園、托兒所、交通安排、住房、各種保險和福利，這些在改革前多以福利品從單位分配。改革以後，有多少變成商品通過市場才能得到呢？周雪光和他的同事對全國 20 個城市的調查研究表明，許多幹部、職工在改革過程中沒有離開國有部門，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繼續享有這些公共物品，也就是說繼續享有非貨幣的再分配經濟實惠（Zhou 等 1996, 1997）。有的研究發現，新生的非國有經濟實體也開始提供包括住房在內的公共物品了，目的是保證技術管理精英的穩定性（Francis 1996）。大家知道，單位制的特徵之一就是再分配功能，而這一功能又是魏昂德指出的「單位依附」和「單位層化」的物質基礎。如果這方面的情況未發生重大變化，那麼社會分層的研究就必須分析非貨幣收入問題。如果這方面的情況發生了變化，非貨幣收入下降到無關重要的地步，那麼社會分層研究將注意力專注於貨幣收入上就可以理解了。這是一個實證問題。

第四，如何測量權力與收入。這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白威廉與麥誼生的文章在「農村幹部」的問題上提出與倪志偉不同的定義，那是關於權力概念的外延的爭論。邊燕傑、Logan 用中共黨員身份和「再分配權力的職業」測量再分配權力，如果有些研究者認為這並不是好的指標，表明與邊、Logan 對再分配權力的內涵的理解上有差別。權力或政治權力的內涵與外延究竟在中國如何確定呢？甚麼指標的效度、信度都很高呢？中共黨員身份是不是？「幹部」或「領導幹部」是不是權力地位？「管理精英」、「技術精英」、「官僚精英」又是怎樣的權力概念呢？幹部的行政級別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權力概念？權力的形式和基礎正在發生哪

些變化？工會、婦聯或其他「羣眾」組織構不成權力的基礎？這些都需要研究。

收入測量的問題更大。從個人層面看，非貨幣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佔比重是需要弄清楚的問題，不然，根本無法確定「總收入」的概念。貨幣收入的測量也困難重重。主要問題一是收入做為隱私，調查研究中的受訪者可以拒答任何有關個人及家庭的收入問題，他們也有權回答某些收入問題，而拒答其他的收入問題；二是不公開的收入，所謂「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在高收入羣體中佔很大比重，而這部分收入在正式的資料收集過程中是不報告的。這兩個方面的因素相加，使得很難收集反映實際收入狀況的調查資料。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如果未報收入是非系統性誤差，即不報告收入的人是隨機分布的，那麼這種誤差只影響收入總量的報告，而不影響平均值和標準差，所以對收入分層的研究影響不大。如果未報收入是系統性誤差，比如高收入層少報、不報，或年輕人少報、不報，等等，那麼應該有辦法找出影響系統誤差的變量，並精確地估測各變量對個人收入的影響係數，算出預測方程。有了這個方程，研究者就可以比較準確地對大型調查的收入數據做調整，估算出各階層、各羣體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收入水平。問題的核心是預測方程的產生，靠有心人認真仔細的探索。能成功地創造這個方程的青年，應授予博士學位。

5 社會網絡與求職過程

邊燕傑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系、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一 引言

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s) 是西方社會學的一個分支領域，一種關於社會結構的觀點，一套分析方法和技術。求職過程則是社會網絡研究的一個課題。本文介紹有關這個課題的理論和實證分析的一些成果，共分五個部分。第一，社會網絡作為社會結構的觀點。第二，弱關係假設及實證發現。第三，對弱關係假設的理論擴展和修正。第四，與弱關係假設不相一致的研究發現。第五，強關係假設的提出及最初的證明。最後我對該研究做一小結，並就社會網絡分析在研究中國社會中取得的其他成果略作提示。

二 社會網絡作為社會結構的觀點

1. 地位結構觀

社會網絡分析作為一個社會學的分支領域，其鮮明的旗幟是它對地位結構觀的批判，提出了與之不同的網絡結構觀。為了說明這一點，讓我們簡略回顧一下社會網絡分析的發展軌跡。

社會網絡分析發軔於英國人類學。本世紀 20、30 年代，英國人類學家在社區研究中發現，限定社區的界線往往只是一種主觀的意向，並不能反映現實，因為，現實生活中的社區與其他社區發生種種聯繫，社區的界線並不像主觀判定的那樣清楚。社會

網絡分析就這樣應運而生了。英國學者 Elizabeth Bott 1957 年的著作《家庭與社會網絡：城市百姓人家中的角色、規範、外界聯繫》(*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 Roles, Norms, and Relationships in Ordinary Urban Families*)，被今日美國社會學界視為英國社會網絡分析的範例。

在美國，社會網絡分析是 60 年代開始的，在兩個不同的分支領域裏平行發展。一個領域是社會心理學的小羣研究。在分析人際互動交往和交換模式時，該領域產生了一系列網絡分析概念，如緊密性 (closeness)、中距性 (betweenness)、網絡中心性 (network centrality) 等。這一領域的代表性人物是 Linton Freeman。Freeman 和旅美華裔學者阮丹青 (Ruan Danching) 合作曾在天津進行了社會網絡研究，與西方的研究結果比較，發現家庭網絡關係對人生大事的影響並沒有西方那樣強。比較分析的結果在《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 等學刊上發表 (見 Freeman 和 Ruan 1997)。

另一個孕育社會網絡分析的領域是結構社會學，其代表人物是 Harrison White 和 Mark Granovetter。在從事結構社會學的理論研究時他們發現，自 Parsons 以來，人們力圖解釋社會行為如何受社會結構的制約，但社會結構的概念卻是從地位觀點定義的。他們認為，地位結構觀使我們看到的是，人都具有某些屬性 (attributes)，人是按其屬性而分類 (categories) 的，人的社會行為就是用所屬的類別來解釋的。比如，階級分析就是一種典型的地位結構觀的分析方法：人們的階級屬性是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按這一屬性人們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階級類別是解釋剝削行為的理論基礎。再比如，60 年代興起的地位獲得模型也是一種地位結構觀的分析方法：人們獲得怎樣的社會經濟地位是由其先附性地位和個人努力的教育地位決定的。80 年代對這一模

型的批判和修正，仍然是從地位結構觀的角度看問題的：人們的工作單位所處的經濟結構對人們的職業地位和經濟地位的獲得產生重要的影響。

地位結構觀並不是錯誤的，但僅僅從這一觀點看社會結構則是片面的，有礙於我們把握社會結構的全貌，從而發生理論誤導。例如，階級分析的觀點使我們看到「親不親、階級分」。但是，這一觀點忽視了不同階級地位的人們也是有接觸、有來往的，甚至比同一階級內部的人還「親」。在一個企業工作的老板、經理、秘書屬於不同的階級，但三個人的工作和工作以外的交往可能使他們互相影響，行為、態度往往一致。這種一致性不能從階級分化來理解，而社會網絡分析則提供了可能的理解途徑。在這三角關係中，社會網絡分析看到的是三者之間的聯繫、接觸、交流、交換，從而產生的紐帶關係（tie）。

2. 網絡結構觀

網絡結構觀就是把人與人、組織與組織之間的紐帶關係看成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結構，分析這些紐帶關係對人、組織的影響。這裏必須說明的是，社會網絡分析指出的紐帶關係並不是抽象的關係，而是現實發生的聯繫，即甲與乙有接觸、互相認識、相互交往的一種紐帶聯繫。這樣的一種紐帶聯繫怎會成了「社會結構」呢？社會結構在這個意義上是客觀存在的非文化因素的涵義。文化因素是主觀世界的產物、過程，而紐帶關係是身外物，是一種客觀的條件、過程。

網絡結構觀認為，任何主體（人、組織）與其他主體的紐帶關係都會對主體的行為發生影響。例如，一個公司的老板，按照階級分析的觀點是唯利是圖的，剝削得越多越符合老板的階級本質。按照網絡分析的觀點，老板投資辦廠、經營企業，攫取利

潤，所有這一切都是與經理、秘書、其他企業人員相互接觸中進行的。老板與上述這些人的角色關係可以按照正式制度的條款來規範，但是長期共事、相互接觸、非正式的交往和交換使老板與他們發生了紐帶聯繫。這些聯繫是一種客觀存在，老板做任何決定，凡對上述角色有所涉及，就不能不為這些紐帶聯繫所左右。這就是說，老板與經理、秘書、其他企業人員形成了一個社會網絡，網絡是一個結構，對網絡中的老板和其他主體發生影響作用。

網絡結構觀在五個方面與地位結構觀分道揚鑣。第一，地位結構觀看到個體的特徵（年齡、性別、階級等），網絡結構觀看到個體與其他個體的關係（親屬、朋友、相識等）。第二，地位結構觀將個體按其屬性特徵分類，而網絡結構觀將個體按其社會關係分成網絡。打一個比方，前者看到某人是屬於哪個階級、階層的，後者注重的是這個人是在甚麼社會圈子裏「混日子」的。第三，地位結構觀注重人們的身份和所屬感，網絡結構觀分析人們的社會聯繫面、社會行為的「嵌入性」。前者提出的問題是「你是香港人還是廣東人」，後者提出的問題是「你經常接觸香港人還是廣東人」。第四，地位結構觀強調人們是否佔有某種資源，佔有多少，網絡結構觀關心人們對資源的涉取能力（access）。前者提出的問題會是，「您在北京幹甚麼工作，房子有多大？」後者提出完全不同的問題，「您在北京有關係嗎，他們能為您辦甚麼事？」第五，地位結構觀將一切都歸結為地位，如階級地位、階層地位、教育地位、職業地位等等。網絡結構觀認為人們在其網絡中是否處於中心位置，其網絡資源多寡、優劣是十分重要的。

必須指出的是，地位結構觀與網絡結構觀是互補的，二者的分析單位的載體都是個體（個人、組織），個體必有角色地位，

而必然在一網絡中活動。所以，兩種結構觀的綜合才是分析的正確方向。我在這裏主要介紹的是網絡結構觀以及它在求職過程研究中的一些理論和實證分析的成果。

3. 市場即網絡的觀點

中國正在走向市場經濟。美國社會學家、網絡結構觀的重要學者 Harrison White 曾撰文《市場從何而來？》(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 (White 1981)。他的回答是市場從社會網絡發展而來，提出市場即網絡的觀點。這是網絡結構觀的一個重要思想，這裏做簡短的介紹。

White 1981 的論文有三個重要的觀點。第一，生產商們在一開始就處於同一社會網絡中，他們互相接觸，相互觀察對方在做甚麼，特別是對方在同類和相關產品上是如何定價的。所以，生產商的社會網絡為生產商提供了必要的經營、價格信息。第二，處於同一網絡中的生產商相互傳遞信息，並互遞暗示，從而建立和保持一種信任關係，在這一關係的條件下，大家共同維持共識，共守同一規則，幹生意按照這些規則去做。第三，市場制度事實上產生於同處一個網絡圈子裏的生產商，而不是生產商按照憑空而起的市場制度來行事的。換言之，市場制度只是生產商網絡內部相互交往產生的暗示、信任、規則的反映。

網絡是各式各樣的，個體與其他個體的紐帶聯繫也是千差萬別的。如何從理論上把握人們的紐帶聯繫呢？White 在哈佛大學的弟子 Mark Granovetter 提出了關係強度的概念，至今影響着社會網絡的實證研究。

三 弱關係假設

《美國社會學學刊》發表了 Granovetter 的著名論文《弱關係

的強度》(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Granovetter 1973)。這篇論文的題目非常新奇：本來弱關係的特點是「弱」，可是作者要論述的是弱關係如何又是「強」關係。論文的精彩之處並不是它的新奇的題目，而是它新穎的觀點、鮮明的「弱關係假設」、有力的論證，以及對結構社會學研究深刻的理論意義。文章的結論聽起來是非常簡單的：弱關係之所以是強的，因為弱關係是傳遞信息的有效的橋樑。該論文中譯文請見《國外社會學》1998年第二期。我在這裏根據英文原文做扼要介紹。

1. 弱關係的涵義與測量

文中的關係一詞其原文是 tie，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由於交流和接觸而存在的一種紐帶聯繫。這種關係，與社會學分析中的變量關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階級關係 (class relations) 是不同的，因為後二種關係只是人們的屬性、類別的抽象關係，處於這一關係中的現實的人並不一定有相互的交流、接觸。而「弱關係」文中所指的是實際發生的，由於交流、接觸所產生的那種紐帶關係。

關係的變異性可以從多方面考察，如從類別、數量等方面考察，但 Granovetter 提出關係強度的概念，將關係分為強弱，認為強關係與弱關係在人與人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個體與社會系統之間發揮着性質根本不同的作用。簡單地說，強關係維繫着羣體、組織內部的聯繫，而弱關係則使人們在羣體之間、組織之間建立了紐帶聯繫，從而使社會系統成為可能。

怎樣定義關係的強弱呢？Granovetter 提出了四個維度。一是互動的頻率；互動的次數多則為強關係，互動的次數少為弱關係。二是感情強度；感情較強、較深則為強關係，感情較弱、較淺為弱關係。三是親密程度；親密到了無話不談的程度就成為強

關係，反之就是弱關係。四是互惠交換；互惠交換多而廣則為強關係，互惠交換少而窄就是弱關係。Granovetter 認為，關係強弱是這四個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他還認為，關係強弱很可能是一個連續性的變量，但他的理論興趣則是分析強、弱兩種關係的社會學意義。Marsden 和他的學生對 Granovetter 的關係強度定義做了數量分析，證明 Granovetter 的觀點是有實證根據的。

雖然 Granovetter 從四個角度定義關係強度的概念，但在 1973 年的論文中，他採用的分析工具則是日常生活中流行的術語，即將朋友看做是強關係，相識看做弱關係。在中國社會裏，朋友一詞用得很廣泛。但在 Granovetter 分析的美國社會中，朋友 (friends) 的範圍要小得多，大概相當於中國社會中的親密朋友，所以 Granovetter 用朋友來做強關係的指標是可以理解的。在美國社會，人們的交往是很廣泛的，並且有許多非正式の場合與他人交往，而人們與生疏者的交往比起中國人較大膽、無思想包袱。這類交往大多停留在「君子之交」或「點頭之交」的程度，即美國人說的相識 (acquaintances)。所以，Granovetter 用相識做為弱關係的指標。

2. 弱關係做為信息橋的判斷

在 Granovetter 看來，朋友做為強關係通常是在相似的人羣中發展起來的，而相識關係之所以沒有成為朋友關係，其重要原因就是相互接觸的個體往往是不相似的。這裏提到的「相似」和「不相似」，指的個體的特徵，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身份、工資收入等等。Granovetter 提出的個體之間的相似和不相似，最重要的是羣體屬性，包括親屬羣體、宗教羣體、社區羣體等等。為此，他進一步提出，強關係是羣體內部的紐帶，而弱關係是羣體之間的紐帶。

由於強關係是羣體內部連結相似者之間的紐帶，那麼，通過強關係所得到的信息重複性很高。道理很簡單：羣體內部相似性較高的個體所瞭解的事物、事件往往是相同的，所以他們可以傳遞的信息往往也是雷同的。這是 Granovetter 斷定強關係為甚麼「弱」的根據。

弱關係就不同了。在 Granovetter 看來，弱關係是在羣體之間發生的，是聯繫不相似個體之間的紐帶。這些來自不同羣體的不相似的個體所瞭解的事物、事件也往往是不同的。為此，他們負載的信息異質性高。這就說明，某一個體通過弱關係所得到的信息重複性小。不但如此，弱關係的最大特徵就是，它可以將其他羣體的重要信息帶給不屬於這些羣體的某個個體。就是說，弱關係是溝通不同羣體之間的信息橋。Granovetter 斷定，雖然不是所有弱關係都可以充當信息橋，但是，能夠充當信息橋的必定是弱關係。這個信息橋的判斷，是 Granovetter 提出「弱關係強度」假設的核心立論。

3. 對弱關係假設的最初證明

Granovetter 以職業流動為題對其弱關係假設進行實證檢驗。這一檢驗記述在《謀職》(Getting A Job) (Granovetter 1974) 一書中。該書 1995 年再版時，Granovetter 寫了長篇後記，總結從 1974 年到 1995 年之間對其弱關係假設的理論和實證分析，並依據新的實證發現提出了他的見解。這裏，我只就 Granovetter 1974 年的著作對他的實證分析做概要介紹。

首先，Granovetter 的選題十分精彩。在市場經濟中，職業是至關重要的社會經濟地位，而職業流動是社會經濟地位變遷的主要手段。如果弱關係假設是有其實證根據的，那麼，弱關係應該在職業流動中發揮作用。比如，同樣能力、同樣背景、資源相當

的人們，如果甲通過弱關係瞭解到很多不同的就業信息，從而把握機會，謀求最佳的職位，而乙通過強關係只能瞭解重複性很高的職業信息，使乙的選擇面小，謀求最佳職位的機會也少。事實真是這樣嗎？

Granovetter 在做研究時是哈佛大學的研究生。他選定的調查地是距校園不遠的波士頓郊外的牛頓鎮（Newton），隨機訪問了鎮子裏的 300 名白領就業者，包括專業技術人員和經理人員。如上所述，Granovetter 的着眼點是職業流動。為此，他詢問了被訪者最近一次職業變動的經歷。他發現，57% 的人在最近一次職業變動中是通過親屬和社會關係瞭解職業信息的，而不是通過所謂的正式市場渠道。這一發現表明，世界上最發達的市場經濟社會的美國，就業信息的傳遞也不是完全市場化的。反之，親屬關係、社會網絡則是傳遞就業信息的重要機制。

Granovetter 對資料的進一步分析發現，在所有使用親屬和社會關係收集職業信息的被訪者中，通過相識得到信息的人往往流動到一個地位較高、收入較豐的職位，而通過親屬和朋友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大大減少了。Granovetter 沒有資料證明，前者是否曾獲得重複性小的大量職業信息，而後者是否得到重複性極高的較少職業信息。但從職業流動的結果看，前者比後者的向上流動機會高。Granovetter 將此發現解釋為對弱關係假設的實證證明。

4. 「嵌入性」的概念

1995 年 Granovetter 的《謀職》一書再版時，收入了他的兩篇重要論文。一篇是上邊介紹的弱關係的強度。另一篇叫做《經濟行為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Granovetter 1985）。

後一篇發表於《美國社會學學刊》，是結構社會學領域又一重要文獻。由於該篇論文提出了與弱關係假設相關的問題和論點，在此一併概括介紹。

「嵌入性」的概念，英文的涵義是「根植於」的意思。這是 Granovetter 從 Karl Polanyi 的《偉大的轉折》一書中借用的概念。Polanyi 用嵌入性的概念想說明，經濟行為、經濟模式往往根植於社會行為、社會生活方式的深層結構之中。換言之，經濟行為模式無非是人們的一種選擇，選擇的根據就是社會生活方式及其結構。Granovetter 在文中進一步說明 Polanyi 的觀點，認為經濟行為是嵌入於社會結構的，而核心的社會結構就是人們生活中的社會網絡，嵌入的網絡機制是信任。

最基本的經濟行為就是交換。無論是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換，還是通過一般等價物貨幣作為媒介的現代社會交換，Granovetter 以為交換的雙方必須建立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否則交換就不可能實現。以物易物的交換，雙方必須首先互相瞭解，相信對方有交換的誠意，信任對方對交換條件的認可和守則，然後才進行交換。以貨幣為媒介的現代社會交換，交換的雙方也必須有一定的信任程度，如賣方相信買方有能力付款，買方相信賣方的物品符合自己的要求。如果這種信任感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每一次交易，不管是多小的交易，交易雙方都必須在獲得了監督保證之後才能進行（如合同簽約、中間人監督等等），從而提高交易成本。信任從何而來呢？Granovetter 認為，是從社會網絡而來。換言之，信任嵌入於社會網絡之中，而人們的經濟行為也嵌入於社會網絡的信任結構之中。

嵌入性的概念預示，經濟交易往往發生於相識者之間，相熟者之間，而不是發生於完全陌生人之間。Granovetter 在文中列舉了許多例子，引用了許多前人的研究發現，並沒有對嵌入性的概

念做第一手的實證證明。比較嚴格的實證證明在 90 年代末才開始見諸了學刊。比如，Granovetter 的學生現在西北大學任教的 Brian Uzzi 分析了一家芝加哥銀行的貸款業務，發現貸款對象並不是願意承受較高貸款利率的陌生客戶，而往往是需要降低貸款利率的長期客戶。為甚麼銀行不要高利率呢？道理就是，銀行與長期客戶有深厚的人情關係，有相互協助的信任感，以及攜手處理突發事件的歷史背景。這些就是 Granovetter 強調的嵌入性。

✓ 嵌入性的概念強調信任而不是信息。信任的獲得和鞏固要求交易雙方長期的接觸、交流、共事。這就隱涵着強關係的重要性。Granovetter 以後的一些學者曾就此提出 Granovetter 弱關係假設與嵌入性概念的衝突。在本文的最後一節，讀者可以發現，當信任和人情是社會網絡資源時，強關係在中國城市職業流動中確實顯得比弱關係來得重要了。在此之前，讓我們首先瞭解一下 Granovetter 的美國同仁是如何擴展和修正他的弱關係假設的。

四 對弱關係假設的擴展與修正

Granovetter 的弱關係假設於 1973 年發表後，對學術界產生了極大影響。這一假設的實證研究在北美、西歐各國普遍展開。對該假設進行認真的理論思考也不乏其人。我介紹幾個比較站得住腳並有一定影響的理論。

1. 林南的社會資源理論

林南是第一個對弱關係假設進行理論擴展與修正的社會學家，提出了社會資源理論。該理論在最新的美國社會學百科全書中有詞條解釋，並在中文的書刊中做過多次介紹。這裏，我介紹的角度是該理論對弱關係假設的擴展與修正，所依據的材料是林南論述這一理論的文章 (Lin 1982)。

Granovetter 的弱關係假設所指的社會是羣體的組合，弱關係的作用是羣體之間的信息橋。林南的社會資源理論的出發點是，人類社會是一個分層的體系，職位在上的個人數量少，但每個人擁有的權力大，財富多，或聲望高；而職位在下的人數量多，但每個人擁有的權力小，財富少，或聲望低。同一階層的人們在權力、財富、聲望三個分層指標上相似性極高，他們之間的聯繫為此往往是強關係。不同階層的人們在權力、財富、聲望等指標上的相似性很低，相互的聯繫往往是弱關係。換言之，弱關係將不同階層擁有不同資源的人們聯繫在一起了。

在 Granovetter 的論述中，弱關係的作用是溝通信息。在林南的論述中，弱關係的作用超越了信息溝通的作用：由於弱關係連結着不同階層擁有不同資源的人們，所以資源的交換、借用、涉取，可以通過弱關係紐帶來進行。注意，由於強關係連結着階層相同、資源相同的人們，類似資源的交換並不十分重要的，也不是有實際意義的，所以，強關係在此並不重要。而弱關係的意義就是幫助關係的擁有者，從對方涉取所需資源。資源是他人佔有的，但通過社會關係紐帶可以借用、涉取，所以林南稱這種資源為社會資源。

社會資源的概念是社會結構分析的一大突破，因為它否認了資源只有佔有才能使用的地位結構觀。社會資源的概念表明，資源不但是可以為個人佔有的，也是嵌入於社會網絡之中的，所以可以通過關係網絡涉取。而林南認為，弱關係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弱關係是涉取社會資源的有效通道。

基於上述考慮，林南推出了社會資源理論的三大假設。他認為，當人們追求工具性行動時，社會職位越高則涉取社會資源的機會越多（職位強度假設）；通過弱關係涉取社會資源的機率越

高（弱關係強度假設）；社會資源越多則工具性行動的成功率越高（社會資源效應假設）。

✓ 2. James Coleman 的社會資本概念

James Coleman 在《美國社會學學刊》上發表了專述社會資本的論文 (Coleman 1988)。70 年代，法國學者 Pierre Bourdieu 首先使用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將社會資本看作是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成員資格以及社會網絡聯繫，這一成員資格和網絡聯繫有助於個人的各種目標達成的行動，並像經濟資本一樣可以獲得回報。我們知道，本世紀 60 年代經濟學家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指人們所受教育、在工作中積累的經驗、所受的技術培訓等等，是一種投資，因為個人由此可以積累「人力資本」，今後在勞動力市場進行人力投資，獲得經濟回報。人力資本顯然是個人性的：由個人積累，由個人佔有，由個人收取回報。現在，社會學家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指出除了人力資本以外，還有一種社會性的資本，個人未必佔有它，因為它潛藏在社會團體之中，社會網絡之中，只能通過成員資格、網絡聯繫才能涉取，通過利用這一資格和聯繫才能得到回報。

Coleman 對社會資本的概念做了兩大貢獻。第一是將社會資本的概念做了比較系統的論述，從三個角度做了定義：(1) 社會團體即社會資本，如個人參加的社會團體多，其社會資本就大；(2) 社會網絡即社會資本，如個人的社會網絡大而廣，其社會資本就大；(3) 網絡涉取即社會資本，如個人能從社會網絡涉取的資源多，其社會資本就大。第二是將社會資本的概念與人力資本的概念聯繫起來，認為社會資本是積累人力資本的條件。在這方面，他集中論述了種族和宗教團體做為社會資本是如何成為個人積累人力資本的社會條件的。

社會資本與社會資源異曲同工，都指出了個人可以利用周圍的社會關係實現工具性目標。從概念的最初涵義來看，社會資源是與社會網絡相聯繫的概念，而社會資本超出了這個範圍。1995年以來，社會資源概念的創用者林南，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資本兩個概念的關係做了重新探討。首先，他將兩個概念都看做與社會網絡相關的概念，但他未排除「社會團體成員資格」的角度，因為在他來看，所謂社會團體無非是成員的一種社會網絡而已。其次，他認為所謂社會資源是在社會網絡中嵌入的，可涉取的 (accessible)，而社會資本則是從社會網絡中動員了的 (mobilized) 社會資源。打一個比方：甲有親屬、朋友、相識等各種關係 100 人。對林南來說，這 100 人的權力、財富、聲望等是甲可涉取的社會資源。當甲有具體工具性目標和行動時，甲可以接觸 100 人並通過他們接觸其他人，這些被「動員了的」關係擁有權力、財富、聲望等資源，當這些資源被甲利用時，就是甲的社會資本了。這一闡述，尚未獲得學術界的廣泛回應。

3. Ronald Burt 的結構洞理論

Coleman 的社會資本概念與關係強度問題無涉。林南將社會資源與社會資本聯繫起來，使社會資本概念與關係強度的概念有了間接關聯，即弱關係能導致較豐富的社會資本。Ronald Burt 的著作《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 (Burt 1992) 第一次明確地提出，關係強弱與社會資源、社會資本的多少沒有必然的聯繫。

Burt 以為，社會網絡，無論主體是個人還是組織，從根本上說有兩大型態。第一種型態是社會網絡中任何主體與其他每一主體發生聯繫，所以關係斷阻是不存在的，從整個網絡來看就是沒有洞，是無洞結構。這種型態只有在小羣當中才能存在。第二種型態是更普遍的一種，即社會網絡中的某個或某些個體與有些個

體發生直接聯繫，但與其他個體不發生直接聯繫。無直接關係或關係間斷（disconnection）的現象，從網絡整體看好像網絡結構中出現了洞穴，Burt 稱這些關係間斷所形成的洞穴為「結構洞」。比如在 A、B、C 的網絡中，如果 AB 相聯，BC 相聯，而 AC 不相聯，則 AC 是一個結構洞。

以 ABC 網絡為例，AC 結構洞的存在表明，AC 如果需要發生聯繫，必須通過 B。在 Granovetter 看來，B 與 A、C 的聯繫必然是弱關係。在 Burt 看來未必。對 Burt 而言，B 與 A、C 的關係有可能強，也可能很弱，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A、B、C 假如處於資源競爭的狀態，AC 結構洞的存在，為 B 提供了兩大優勢。第一個優勢是 AC 之間的信息一定通過 B 來折射。換言之，A 的信息 B 知道，C 的信息 B 也瞭解，而 A、C 互相並不瞭解有關對方的信息。這種狀態給了 B 信息優勢。第二個優勢是控制優勢，即 B 可以決定在怎樣的情況下將 A 的信息傳遞給 C，又在怎樣的情況下將 C 的信息傳遞給 A。在怎樣的情況下 B 做信息傳遞呢？對 Burt 而言，在一個資源競爭的條件下，當然是 B 有利可圖的時候，B 才會做信息傳遞。為了保持信息和控制優勢，B 必然傾向於保留 AC 結構洞，所以，即使 AB、BC 是強關係，B 也不會輕而易舉地將 A、C 聯繫在一起了。

依據結構洞的理論，Burt 提出了經濟競爭的社會學新觀點，認為，競爭優勢不但是資源優勢（有權、有錢、有地位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關係優勢。所謂關係優勢就是，佔有結構洞多的競爭者，關係優勢就大，獲得較大經濟回報的機會就高。換言之，一個人或一個組織，要想在競爭中獲得、保持和發展優勢，就必須與相互無關聯的個人和團體發生廣泛的聯繫，以爭取信息和控制優勢。

結構洞理論發表以後，獲得了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管理學

家的熱烈反響，由此理論引發的實證研究也在這些學科領域裏展開。由於該理論的應用性很強，也獲得企業界和經理階層的重視。

五 一些值得思考的實證發現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有關弱關係假設的實證發現。1995年Granovetter《謀職》一書的再版後記中，詳細地總結了自1973年以來有關弱關係假設的實證研究。大部分研究都是支持該假設的。實證研究發現最重要的不是證明，而是證偽，因為證偽可以幫助研究者識別謬誤所在，修正和發展理論。為此，我在這裏列舉四項實證發現，對弱關係假設有證偽效應。

1. 70年代的奧本尼研究

弱關係假設預示，通過弱關係可以獲得信息優勢，從而提高向上流動的機會。弱關係對向上流動的直接作用，在林南的社會資源理論來看是不正確的，因為該理論認為，弱關係的作用是提供社會資源，而社會資源才是促使向上流動的直接原因。證明弱關係是通過社會資源而發生作用，就表明弱關係在影響向上流動的過程中只是間接條件。

70年代的奧本尼（Albany）研究，隨機抽取了奧本尼地區的在職者600多人，發現半數的受訪者是通過社會關係來搜集職業信息而改變職業的。很多人用了弱關係（相識，而不是親屬或朋友）。但是，使用弱關係不一定必然流向較好的職業。如果用了弱關係，一個趨勢是可以從地位較高的人那裏獲得幫助，而該人的職業地位又為謀職者的流動提供了潛在的影響力。這些發現證明了弱關係的作用是導致了優厚的社會資源，而社會資源才是目標達成的直接原因。這一實證研究由林南主持，分析結果分別在

《美國社會學評論》(Lin、Ensel 和 Vaughn 1981) 和《社會力》(*Social Forces*) (Lin、Vaughn 和 Ensel 1981) 上發表。

2. 1970 年底特律地區調查

底特律地區調查是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主持的持續性的研究項目。1970 年的調查內容包括了謀職過程。Peter Marsden 和 Jeanne Hurlbert 於 80 年代對這一資料進一步分析時發現，就業者在換工作時通過強關係和弱關係獲取職業信息，尋求其他幫助，但強、弱關係所導致的社會資源（幫助者的職業地位、權威地位）大體上無差別。這一發現與弱關係假設是相違背的。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幫助者的職業地位高、權威地位高（是管理者），那麼關係使用者的工作變動所帶來的向上流動機會也就大。這印證了社會資源的作用。這一實證分析發表在《社會力》學刊上 (Marsden 和 Hurlbert 1988)。

為甚麼關係強弱所導致的社會資源沒有差別呢？分析者沒有提出明確的理論解釋。但是，他們將底特律與奧本尼地區做了比較。奧本尼是紐約州的州府所在地，工作職位多是白領，職業地位偏高。這與 Granovetter 研究的牛頓鎮大體相近。底特律地區是汽車製造業的大本營，在業者的主要成分是汽車製造業的工人，雖然白領職業佔一定比例，但藍領是主要成分，職業地位較低。分析者指出，工人階級為主的底特律調查樣本可能表明，藍領工人可以通過強關係尋求社會資源。

3. 1987 年西德職業流動調查

西德社會學家 Bernd Wegener 對上述解釋進行了認真的探討，並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在 1987 年西德職業流動調查中設計了諸多變量，包括職業流動者流動前的職業地位和流動後的職業地

位。他發現，在流動前地位較低的藍領工人可以通過強關係找到社會資源，而流動前地位較高的白領職業、經理階層則通過弱關係找到社會資源。這兩組人的目標都是向上流動，而只要他們的社會資源質量高（幫助者的職業地位高），則向上流動的機會就大。怎樣解釋這一現象呢？

Wegener 求助於網絡異質性來解釋這一現象。他認為，任何社會網絡異質性都是很高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網絡是由不同地位的人組成的。所以，處於較低地位的人能夠通過強關係在網內尋求到地位較高的人的幫助，這就是為甚麼西德藍領工人可以通過強關係獲得社會資源的道理。處於較高地位的人是不能通過強關係尋求社會資源的，因為在網絡內部的其他人其地位比起他們來說都低。對於高地位的人來說，要想獲得優厚的社會資源，只有通過弱關係跳出本人的網絡圈子，到他人的網絡裏尋求幫助者，以獲得有用的社會資源。這是為甚麼高職業地位的人利用弱關係的道理。

Wegener 的解釋是比較有說服力的。但是他的實證分析有明顯的欠缺。他的解釋要求對職業流動的個人網絡邊界做明確的測量，可是這一測量在他調查中並未涉及。Wegener 用以替代的測量是流動前的職業地位，而職業地位是以全社會為參考的，所以不能精確地說明個人社會網絡的地位尺度。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項實證研究精確地測量了被訪者的個人網絡邊界與地位差。這種測量在其他的社會網研究中已經提出來了，只是未和謀職過程的研究聯繫起來罷。Wegener 的西德職業流動的調查分析結果發表在《美國社會學評論》學刊上（Wegener 1991）。

4. 1985 年東京地區調查

在美國就讀社會研究生的日籍學者渡邊深（Shin Watanabe）

於 1985 年在東京地區主持了一項大型調查，樣本規模是 2500 多人。調查的中心內容是重複 Granovetter 1974 年《謀職》一書中的分析。有意思的是，在一些關鍵點上，東京調查反映出來的結果與 Granovetter 的美國調查結果大相逕庭。在搜集職業信息方面，大部分美國白領在業者利用弱關係，而大部分日本白領在業者利用強關係。在關係作用方面，美國白領如果用了弱關係往往提高向上流動的機會，而日本白領則相反，越是通過強關係換工作，越能得到較豐厚的報酬，流動者對新企業越投入，對新工作的滿意度越高。

渡邊深發現，造成上述情況的背景有二。一是日本大型企業在招收僱員時有嚴格的考試制度，而社會網絡關係能發揮作用的是中小企業的勞動力市場。中小企業一般在招收僱員時，審查手續不是非常嚴格，往往主管一人說了算，這就給社會網絡關係、特別是強關係發揮作用提供了可能。二是中小企業為了減低僱員申請、審查的成本，提高人們對企業的效忠，往往在本地通過社區網絡招收僱員。社區網絡提供了僱主和僱員的相互信任，人情關係也使僱主和僱員的交流全面化，非形式化，所以，僱主願意在一開始就提供較高的收入，以使新僱員提高信心，增強滿意度，有意在企業幹下去，而不向福利好的大企業流動。這些事實說明日本中小企業能利用社區網絡，調整企業行為，實現與大企業競爭勞動力的目標。渡邊深的研究記述於他的博士論文 (Watanabe 1987)。

六 強關係假設

以上研究發現，特別是渡邊深的日本研究，令人對弱關係假設的普遍意義產生懷疑。1988 年，我本人在中國天津市進行了一項千戶調查，設計了一組謀職過程的變量，檢驗 Granovetter 和林

南的弱關係假設。天津的資料使我提出與弱關係假設完全相反的強關係假設。之後，我和新加坡學者合作，又在獅城再次收集這方面資料，印證了強關係假設。目前，我將強關係假設的實證研究進一步推廣到香港。下面介紹天津、新加坡和香港研究的情況。

1. 1988年天津調查及強關係假設的提出

弱關係假設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社會網絡的作用是傳遞信息。弱關係在傳遞信息上的優勢，Granovetter認為是跨越羣體界線的橋樑，林南認為是連結不同階層的紐帶。在以倫理為本位的中國社會條件下，信息的傳遞往往是人情關係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換言之，沒有一定的人情關係，信息未必能夠傳遞。甚麼是人情關係呢？以往的中國研究表明，就是人情交換關係，而這種關係通常是強關係，而不是弱關係。特別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短缺的物品在市場上是買不到的，而通過人情關係則可以得到；人情關係越強，託人辦事的成功率就越大。這種社會情況是怎樣影響謀職的呢？

首先，謀職在計劃體制下並不是一個自由自願的過程，勞動力是靠計劃來調配的。在這一體系中，職業信息並不在社會上公佈，而是在國家部門中有規則地控制的。由於每個就業者首先必須服從國家分配，所以，得到職業信息並不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兩點上。一是個人多方面的條件優越，從而分配到一個「好」單位從事一個「好」工作。如果個人的條件不夠優越，則可借助關係的力量瞭解就業去向，設法通過關係為個人分配到一個好單位、好工作。在這一點上，得到工作分配主管部門的瞭解，得到工作分配決策人的照顧，是關鍵。在後一過程中，人情關係的強弱是非常重要的。人情關係強，得到照顧的可能性就大；人

情關係弱，結果不得而知；沒有人情關係，除偶然例外，不會得到照顧。

為甚麼人情關係的強弱會產生上述結果呢？道理有二。一是義務問題。人情關係的實質是情意、實惠的交換。強關係往往表明這種交換已經在主客雙方長久存在，相互的欠情、補情的心理，使得有能力提供幫助的人盡力在對方請求下提供幫助。二是信任問題。人情關係的交換是違背正式組織原則的，但如果是強關係，主客雙方的信任度提高，就能降低由「東窗事發」所引來的不必要的麻煩。所以，強關係應比弱關係「強」而不是「弱」。

自 Granovetter 以來的學者都強調弱關係的重要性，並着眼於直接關係。在中國工作分配的條件下，強關係的作用大，但許多人並不能和主管部門、分配的決策者建立強關係。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必須通過中間人找到主管部門、分配的決策者，而中間人與謀職者與最終提供幫助的人應是強關係，不然人情關係弱，中間人未必盡力，最終提供幫助的人也未必願意提供幫助。這說明，檢驗強關係假設就必須考慮間接關係。

我在 1988 年天津千戶調查中發現，在 900 多名在業者中間，45% 的人的第一個城市工作是在他人幫助下得到的。在這些人中，絕大多數是使用了親屬和朋友關係，而 70% 以上與最終提供幫助的人「熟極了」或「很熟」。有三分之一的人使用了間接關係。使用間接關係的人，往往能尋找到職位較高、權限較大的人提供幫助，而這些幫助者的單位、職業背景對就業者的工作地位、單位性質有很大的正面影響。有一項發現是至關重要的：中間人與就業者的關係越熟，與最終幫助者的關係越熟，則最終幫助者的資源背景越高，對就業者的工作安排也越有利。這是支持強關係假設的有力證據。

2. 1994年新加坡調查

天津 1988 年調查說明，當經濟環境、經濟體制變化之後，強弱關係對職業地位獲得過程的影響發生了變化。在市場經濟的美國社會裏，弱關係有助於傳遞信息，所以使用弱關係的人可以把握機會，謀求最佳職業地位。在計劃體制下的中國天津，強關係有助於交換人情，所以使用強關係，或直接或間接地取得分配者的協助，得到一份較理想的工作。在中國大陸以外有許多中國人的社會，那裏是市場經濟，情況會是一樣的嗎？我選擇新加坡作為調查點。

新加坡是以中國人為主的社會，華裔佔七成以上。經濟、政治、文化的主導都是中國人。她自二戰以來是一個市場經濟，70 年代後成為發達國家，是亞洲四小龍之一（與香港、台灣、南韓並列）。這些條件使她與中國天津成為鮮明的對比：一方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一方是有幾十年歷史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雖然天津的 80 年代正在經歷着市場經濟改革，但截至 1988 年該市勞動力市場尚未開放，勞動力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計劃經濟的原貌。

1994 年新加坡調查選擇八個有代表性的行業，隨機抽取了 500 多個在業者，詢問他們最近一次職業流動的經歷。近七成的人是通過親屬、朋友、相識等非正式渠道搜集就業信息，或取得親友幫助而變換工作的。大部分人利用強關係（「熟極了」或「很熟」）。很少的人用了間接關係；但如果用了間接關係，中間人與被訪人、與最終幫助者的關係往往是很強的。而這種間接的強關係能使被訪者找到一位地位較高的幫助者，協助被訪人流動到一個地位較高的職業中去。這一發現與天津的情況近似。

為甚麼市場經濟的新加坡與計劃體制很強的天津有同樣的發

現呢？我和新加坡的同事做了深入的訪談，瞭解到兩個有意思的社會事實。一是社會關係網絡在新加坡是生活的重要方面，人情關係的圈子比較廣，社會又小，強關係較多。二是新加坡長期以來勞動力短缺，僱員換工比較容易，對僱主壓力很大。為了培養僱員效忠企業，在招工時，僱主發動僱員提名應徵者，如被選中，提名者可得到獎金。由於有了物質刺激，僱員提名時慎重從事，往往提出他們非常瞭解的人，這就是強關係的比例大、作用顯著的直接原因。這和日本的情況比較相近。有關新加坡調查的分析見《社會力》上的文章（Bian 和 Ang 1997）。

3. 1998 年香港調查

天津和新加坡的調查都表明，勞動力市場的體制背景、勞動力供求比例，以及市場化程度是決定強弱社會關係在謀職過程中的作用的環境因素。為了進一步分析這些環境因素對關係強弱程度的作用的影響，我正在主持一項香港調查。香港的人口主體是中國人，長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 80 年代勞動力似有短缺，但九七年回歸以後，由於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失業率陡升，勞動力供給大於勞動力需求。此種條件使香港與 1994 年的新加坡成為對照，而與內地的天津相比，勞動力供給的狀況相仿，但體制條件不同。改革中的天津，勞動力市場開放，但是國有企事業的比例仍然很高，勞動就業、勞動力流動仍然受原計劃體制和政府干預的影響頗深。最關鍵的，在經濟轉型時期，體制漏洞頗多，勞動力市場有待完善。香港的市場經濟已很發達，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已很規範，政府的干預也是在制度渠道的範圍內進行的。

香港調查正在進行，尚無結果可介紹。但香港調查目的在於提供比較社會學資料，與天津、新加坡及其他社會的求職過程的

資料進行比較分析，對三個假設進行檢驗。第一個假設是制度安排假設。社會主義公有制強調縱式網絡溝通和協調，為國家對微觀經濟的干預、控制提供了制度保障。相反，資本主義私有制強調產權所有者的自主權限、權益，注重與其他產權所有者、經營者的橫向聯繫和協調。前者的制度安排為強關係為主的人情網提供了天地，後者為以弱關係為主的信息網開闢了前景。為此，在個人求職過程中，前者的制度安排突出強關係的作用，而後者顯示弱關係的作用。

第二個假設是市場化假設。在任何一個制度安排的大環境裏，經濟交換的市場化程度可能是不同的，勞動力配置和流動的市場化水平也是不同的。在公共物品、一般物品、勞動力三者的配置方面，政府參與、決定的程度做為非市場化的指標，由市場直接決定的程度做為市場化的指標。越是市場化的經濟，越要求信息的多方傳遞，弱關係的作用越大，而市場化程度越低，人情關係越重要，強關係的作用就越大。

第三個假設是勞動力供給效應假設。在制度安排和市場化程度一定的情況下，勞動力的供給大於需求，給求職者造成壓力，他們將努力使用各種網絡關係尋求就業機會。由於職位相對短缺，人情交換關係的作用應加大，所以在勞動力供大於求的條件下，強關係的作用提高。與之相反，勞動力供給如果小於勞動力的需求，求職者將相對容易地找到新的工作機會，使用人情關係的必要性下降，從而提高弱關係的作用。同時，勞動力短缺對僱主產生壓力，使得他們動員僱員廣泛推薦僱員的朋友和相識。這種力量可能提高強關係的作用。勞動力的供求應分職業、行業來測量，因為求職者往往在同一職業類別或同一行業中選擇職業。

就業問題分為兩大方面。一是從全社會範圍內增加就業機會，實現全面充分就業。這不是本文的主題。二是勞動力的合理

配置，「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求職過程及其網絡機制的研究涉及的是這個主題。如果謀職機制合理，則會限制不合理的配置，減少人才浪費，降低結構性失業的比率，這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業問題。

七 華人社會的網絡與關係研究

求職過程是社會網絡研究的一個課題。Granovetter 於 1995 年再版他的《謀職》一書時，寫了一篇很長的後記，回顧有關求職過程的社會網絡研究的成果。在後記中，Granovetter 認為，推動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是跨經濟體制、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從而揭示和測量制度背景的差異及其對社會網絡作用的制約。目前，求職過程的網絡分析除在香港收集定量資料外，也在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包括美國、荷蘭、俄羅斯、匈牙利、台灣。

另一個研究方向是僱主行為的分析。為甚麼僱主能允許或主動使用社會網絡來選拔受僱者？目前已提出三種不同的解釋。第一種解釋是降低招工過程的交易成本。用所謂市場辦法招工，用於招工廣告、審查入職申請、遴選優秀者等方面的費用是相當高的，而通過僱主、僱員的推薦、從他們的社會網絡中產生入選名單，將減少費用。這一解釋已得到實證支持。第二種解釋是提高申請人的質量。用市場的辦法招收新職工，申請者來自四面八方，質量不一，而用社會網絡散布招工信息，由於信息散布者對工作性質的瞭解，往往將招工信息傳遞給有能力勝任工作的人，所以申請人的平均質量會提高。這一解釋尚未獲得實證支持。第三種解釋是「關係理性」效應。前兩種解釋假定僱主是理性經濟人，利用網絡是為了滿足經濟理性（減少費用、提高質量）。關係理性預示，僱主生活在社會網絡關係之中，是理性社會人。所以，為了保持和發展社會網絡關係，僱主會樂於接受通過網絡推

薦的新僱員，這樣產生的新僱員對企業原有的僱員社會網絡也是正面效應，加強社會凝聚力。這一解釋尚待實證資料的驗證。

關係理性可能是分析華人社會的重要概念。「關係」是華人社會的流行用語，人與人之間建立的私人層面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往往是支配人們行為的準則。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1949)提出，人際關係始於家庭親屬，而家庭親屬關係是以倫理為本位的，即人的行為是以家庭親屬的倫理關係為準則的。人不能按個人的經濟理性行為，而要按照家庭親屬的倫理關係的理性行為。在家庭親屬之外，以尊重個性和個體之間的功能關係為特徵的團體生活沒有成為社會生活的組織原則，倫理關係走出家庭親屬來規範社會行為和社會秩序。為此，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的關係社會。在費孝通看來（見《鄉土重建》，或所引的英文譯著 Fei 1992），人際關係從家庭親屬向外擴展，從強變弱、倫理、親情、義務的關係約束也減弱了，但是在這一關係擴展的過程中，個人與社會的聯繫結構也發生了，他稱之為「差序格局」。梁、費在 40 年代對中國社會結構以及「關係」的中心作用的這些論述，一直受到後人的重視。

與梁、費同時代的兩位美國學者對關係的中心性做了實證研究。一位是人類學者 Morton H. Fried，他寫過一本書《中國社會組織》(*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Fried 1953)，研究 1949 年以前安徽省滁縣縣城的社會生活，證明人際關係網絡是社會組織的神經。另一位是社會學者楊慶堃，他就廣東省農村的考察出版了《中國共產主義社會下的家庭與鄉村》(*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 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 (Yang 1959)。他發現解放以後，雖然農村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家庭倫理和關係社會的性質並沒有受到本質的動搖，說明關係的中心性在中國社會的維續。

兩位華裔學者對關係的中心性做了理論探討。一位是香港社會學家金耀基教授，於 80 年代發表諸多論文，分析人情、面子、關係等等與儒家社會觀的聯繫。儒家社會觀強調社區整體的和諧、推己及人的「恕道」，以及施恩拒報的社會道德，都是人情社會中「面」、「恥」及中國人行為的思想基礎。

另一位是台灣學人黃光國（Hwang Kwang-kuo），他在《美國社會學學刊》上發表了《面子與人情：中國的權力遊戲》（*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Hwang 1987）。他指出資源配置大體有三種原則，按需分配、按貢獻分配，以及按人情分配。後一種是關係社會的特徵。但關係又分為完全情感化的、完全工具化的，以及二者綜合的，他認為華人社會的關係是最後一種。在這種關係社會中，人們為了獲得更多的資源，必須通過人情手段與有關係的人保持情感聯繫，從而贏得獲取人情的面子。面子和人情為此是在關係社會中取得資源優勢的權力。

進入 90 年代，有兩位旅美華裔人類學者對中國大陸的城市和農村社會做了實地觀察，各發表了頗受關注的著作。研究城市社會的是楊美惠（Mayfair Yang），她的一本著作是《禮物、人情、宴請：中國社會關係的藝術》（*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Yang 1994）。她出生於台灣，在美國加利福尼亞長大。當她於 80 年代初來北京留學時，被人際關係在北京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之大觸動了，由此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觀察研究。她的結論是，再分配經濟造成的物資、商品的短缺，是人際關係普遍化的經濟條件，而當市場化改革開始以後，雙軌制的存在也為人際關係作為資源配置的調節器進一步提供了條件。

研究農村社會的是嚴雲翔（Yan Yunxiang）。他的博士論文是《禮物的流動：從一個中國村莊觀察互惠與社會網絡》（*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Yan 1996)。以往的研究認為，關係社會是以互惠為原則的，以獲取資源為最終目的。但嚴雲翔在東北一個村莊的實地考察發現，雖然互惠是人們之間交往的特徵，但是，互惠交往的目的並不完全是為了獲取資源。以他的觀察，互惠交往的直接的長期性的目的是認同和鞏固人們的社會關係，以保證人們在和諧的社會秩序中生存、享樂和發展。

如果楊美惠、嚴雲翔的研究與改革大潮的聯繫並不緊密，那麼 David Wank 是從市場化過程的研究中觸及社會關係問題的。他於 80 年代末在廈門市實地考察私營經濟的成長，發現漸進式改革的社會特證之一就是庇護關係 (patron-client relations) 的延續。庇護關係是政治學常使用的概念，指前工業化經濟中的主僕之間的相互依賴、主人對僕人的庇護、僕人對主人的效忠。魏昂德曾用這一概念分析了毛時代的國營企業中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 (見前一章)。Wank 認為，許多私有企業就是在這種關係中發展起來的。他們一方面是國有企業的項目承包人，視國企和政府領導人為他們的庇護人；另一方面，他們又可能將項目承包給與他有庇護關係的其他個體、集體企業，在這種關係中，他們是後者的庇護人。由於這種庇護關係提供發展的機會和條件，而最終的庇護角色往往是正式組織的科層體系，所以他把中國的市場化過程歸納為「科層化的資本主義」。這些思考記錄在 Wank 的著作《共產主義之商品化》(*Commodifying Communism*) (Wank 1999) 中。

以上這些有關「關係」的研究，都不是從社會網絡分析的理論出發的，他們的分析工具也不是社會網絡的學術概念。唯一的例外是旅美中國學者阮丹青女士。她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時，從師於 Harrison White、Ronald Burr，任教時又和 Linton

Freeman 同事，並合與之作研究中國人的社會網絡特徵。阮丹青的研究之一是將美國社會網絡分析中的「討論網」應用於中國社會網絡的分析。所謂「討論網」，是 80 年代 Burt 和 Marsden 等人提出的，他們認為：人們在生活中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需要找知心人交流、商量，並求得幫助，換言之，是需要「討論」。經常被邀請參加「討論」重大的生活問題的人，則形成了某人的「討論網」。所以，「討論網」就是美國人的社會關係網。美國實證研究的發現是，親屬在人們「討論網」中所佔比重最大，朋友次之，相識、同事等再次之。這很像費孝通描述中國社會結構的「差序格局」。

阮丹青依據天津 1986 年問卷調查資料所發現的結果與美國相距甚遠。在天津，進入人們「討論網」，同事所佔比重最大，朋友次之，家庭、親屬再次之。一種解釋是中國城市社會家庭網絡作用的下降。這和常識相悖。另一種解釋是工作單位組織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突出，所以同事在討論網中佔重要地位。這可能是正確的。但為甚麼家庭、親屬所佔比重甚低，似須認真探討。這可以做為比較研究的一個課題。阮丹青的有關研究發表在《社會網絡》等學刊上。

「關係」似是中國社會結構的突出現象，應當引起社會學者的注意。在研究中我反對兩種偏向。一種是將中國社會中的關係現象特殊化，無視社會網絡理論和概念的應用。另一種偏向是將西方的社會網絡概念照搬到中國來，忽視中國社會中「關係」內涵。在弄清關係內涵和變化規律的前提下，將關係的研究提高到概念化、理論化、模型化的層次，是值得提倡的。如果在概念化和理論化過程中，研究者能有意識地與西方社會學中的網絡概念相聯繫，則中國關係研究將對社會學的網絡理論做出跨國度的學術貢獻。

6 西方社會學關於中國組織 與制度變遷研究狀況述評

周雪光

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一 引言

中國二十年來的經濟改革導致了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巨大變化。中國的政府組織、工業組織、生產要素以及社會利益的分配組織形式都發生了重大的演變。這些組織與制度的變遷保證了社會經濟改革的穩定性和持續性。與此相應，已有制度和組織的內在機制同時也制約着社會變革的方向和速度。因此，研究和解釋制度與組織變遷的原因和過程對認識和理解中國改革道路和未來的發展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中國改革的獨特道路以及高速增長的經濟引起了各國社會科學界的廣泛關注。組織與制度的研究是社會科學界近年來的一個熱點，也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改革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本文旨在對這一領域的研究作一簡要的介紹和評論。我的述評主要限制在 1980 年以來英文文獻中關於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的研究。由於組織與制度變遷是一個交叉學科的研究領域，雖然我的評述主要注意社會學的領域，但我的討論也會涉及其他的社會科學學科。

以下我首先介紹一下在西方社會科學研究中「組織與制度變遷」這一課題的地位與狀況，以及不同的理論取向。然後集中介紹這一領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最後談一下我對今後研究方向和課題的一些看法。

二 組織與制度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地位

自 70 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社會科學最為重要的理論流派的變化是制度學派的興起。在經濟學界，Douglass North (1981, 1990)、North 和 Robert Thomas (1973)、Oliver Williamson (1975, 1985) 的研究工作導致了新制度學派的發端；在政治學界，James March 和 Johan Olson 的「新制度主義」的文章 (1984) 引起了廣泛注意；John Meyer 和 Brian Rowan (1977) 一文開創了組織學的新制度學派。這些不約而同的理論發展反映了西方社會科學界的新近演變，也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的重要學術背景。

組織與制度研究的興起與西方新古典經濟學面臨的困境有着直接的關係。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思想是認為市場經濟是最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形式。在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下，消費者和生產廠家通過市場價格來協調雙方的關係，達到需求和供給的平衡。市場參與者按其自身利益，隨着價格信號而採取最優化的行為。在這樣的假設前提下，經濟制度設施的角色不僅是有限的，而且是市場經濟的派生物。這一理論模式在近年來受到了挑戰。第一，North 的一系列研究指出，市場經濟本身的運行需要制度設施的保障。政治權力、社會文化，以及歷史演變的途徑都對經濟形態有着重要的制約作用。這意味着市場經濟並非一個自行演化的過程。不瞭解其特定的社會制度設施，我們也就無法解釋諸多的經濟現象。

第二，Williamson 從交易成本的角度提出，市場經濟並非總是最佳的經濟運作形式。在不充分競爭和有限理性的條件下，市場運作的交易成本可能會大於科層組織這一運作形式的交易成本。按照效率規律的經濟學原理，科層組織就會成為替代市場的

經濟組織形式。在這一理論框架中，組織和市場具有同樣重要的理論意義。

第三，社會科學的學者們對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的局限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例如，許多公司之間需要建立長期的合同關係進行資源交換。假設在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公司可以通過市場機制選擇最佳的合作伙伴，簽訂長期合同。但是，合同雙方一旦進入合同執行期，這種合同關係就不再受市場競爭規律的制約。這是因為合同雙方有了信息的不對稱性和「談判」地位的不平等性。假設一個小公司簽訂長期合同向一個大公司提供某種產品配件。在合同執行期，合同雙方產生了相互的依賴關係。但是這種依賴關係是不平等的。大公司可能有着更為有利的競爭地位，因此要求「重新談判」合同條件。而小公司由於對大公司的依賴地位而不得不接受「重新談判」的不平等條件（按同一邏輯，小公司在不同條件下也可能具有「重新談判」的優勢）。這種情形導致了「市場失敗」（market failure）。由此看來，合同關係這種市場經濟形式的運作也必須通過「非市場」的機制來維持和制約。正因為如此，學者們逐漸意識到制度設施（信任、社會關係、社會信息傳遞方式、法律制度）對防範合同執行中的「投機行為」，選擇可靠合作伙伴，解決市場失敗等一系列問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讀者也許注意到以上談到的制度學派的興起原因，我主要列舉了經濟學界的理論動向。這是因為在其他的社會科學學科中，制度設施的重要性從未受到懷疑，且一直是研究的中心問題。例如社會學中對社會分層、社會羣體、集體行為、家庭諸課題的研究都是以制度設施為基本出發點的。但是，經濟學界的上述變化促進了制度研究的兩個重要發展：第一，人們對「市場失敗」以

及社會制度設施重要性的認識強化了社會學對經濟現象的解釋能力，從而促進了經濟社會學的迅速興起。第二，經濟學家試圖按經濟學的理論邏輯解釋制度設施，對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原有理論模式提出了挑戰。這場持久的跨學科的重大爭論推動了不同理論流派的新發展。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制度」通常指穩定重複的、有意義的符號（symbols）或行為規範。在這個意義上，制度包括正式組織、規章制度、規範、期待、社會結構。組織是制度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制度分析的主要任務是解釋各種制度的產生與變遷，以及制度對人們如何組織經濟、社會生活的影響。但是制度學派只是一個籠統的招牌。學術界中對制度產生、變遷及其作用的解釋有着不同的理論邏輯。這些不同的思路導致了研究取向的不同、材料取捨的不同，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把握這些思路的脈絡對於瞭解和評價具體研究的成果有事半功倍之效。下面我簡單介紹一下這一領域中的兩個主要流派。

1. 理性選擇流派

這一流派的基點是認為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動機和行為是制度產生和變遷的主要源泉。從這一觀點看，制度變遷的機制在於社會成員的理性計算以及他們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這一思路的解釋邏輯接近於社會學中的功能主義，即用「後果」來解釋「原因」。例如，某種社會制度的產生可以從它對受其影響的成員的利益來解釋。經濟學家 Paul Milgrom、North 和 Barry Weingast (1990) 在研究「私立法官」這一制度如何在中世紀歐洲貿易中產生時提出，這一制度可以防範經商者的欺騙行為，從而維持長距離貿易所帶來的共同利益。這些良性「後果」與經商者的長遠利益一致，使得他們有動力去建立和維持這一制度。Andrew

Schotter (1981) 也是從這一角度分析各種社會組織制度的產生原因。理性選擇學者強調市場經濟制度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市場經濟為追求個人利益提供了最大的選擇範圍，由此有助於社會經濟資源最優化分配，是諸多經濟制度中最為有競爭力的制度。經濟學家大多從這一思路研究中國制度變遷。

2. 新制度學派

這一流派強調社會制度之間的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受這一學派影響的學者認為經濟過程的運行並非為機械均衡所支配，而是一個在歷史過程中不斷演化的開放系統。個人生活在不斷變化的社會文化中，並隨之相應變化。他們的利益偏好的形成並非固定不變，而是一個持續的適應變化的過程。因此，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反對個人中心論或還原論，而主張從整體上分析制度的產生和演變。另外，這一學派特別強調歷史的依賴性以及演變過程的重要性。這是因為制度演變的不同過程會導致不同的結果，不瞭解演變的過程就無法解釋演變的結果（參見Hodgson 1994）。這一觀點與理性選擇流派以後果解釋原因的邏輯大相徑庭。當然，在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的研究取向不一，或強調現有制度，或強調歷史過程，或強調文化背景，常常因人而異，莫衷一是。

下面舉一個例子將這兩個不同理論思路的解釋邏輯加以對照。金融經濟學的研究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在美國金融界諸多投資銀行中有着穩定的聲望（reputation）等級制度。怎樣解釋這種等級制度的產生呢？經濟學家從理性選擇的理論邏輯認為，由於公司聲望有利於其產品銷售和獲取超額利潤，這就促使公司在提高自己的聲望上投資。這一理性行為（以及企業間投資行為的不同）導致了企業間聲望的差異，形成了等級制度（Shapiro 1983；Chemmanur 和 Fulghieri 1994）。這樣，理性選擇的理論

從個人（公司）追逐自身利益的動機和行為的角度解釋了金融界「聲望」等級制度的產生。

Podolny（1993）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釋。他認為，金融界等級制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非經濟性的社會機制。例如，銀行間社會關係網絡的結構以及銀行在其中的地位使得不同銀行與顧客的接觸的方式、程度不同。這一社會關係結構成為信息流動的重要渠道。這些因素為不同公司獲取聲望提供了不同的條件。從這一角度看，如果我們不研究這些穩定的社會結構、社會地位的分布，而僅僅從個人行為去解釋聲望等級制度的產生，不僅無法有效地解釋這一現象，而且可能得出十分荒謬的結論。

應當指出，理論思路的不同沒有是非之分。一種理論思路可能會成功地解釋某些現象，但無法解釋另外一些現象。不同的思路也可能從不同的角度解釋同一種現象。因此，學術研究不僅需要嚴謹的思辯能力去區分不同思路在解釋邏輯和實證意義上的差異，還應該以包容的態度對待不同的學術流派。在這個意義上，理性選擇和新制度學派在組織和制度變遷的研究領域中有着各自的地位和貢獻。

三 解釋中國的組織與制度變遷：文獻評述

1. 引子：社會學界的一場爭論

近幾年來美國社會學界的中國研究領域有着一場大的爭論。儘管這場爭論的焦點集中在社會分層研究，但是爭論的基本分歧點在於對制度變遷機制解釋的不同思路。這場爭論涉及了很多方面：制度變遷的動力和機制、制度變遷的方向等等。我以這場爭論的理論邏輯的分歧作為介紹西方研究的引子。

這一爭論的一方是倪志偉的「市場轉型理論」。倪志偉是最

早試圖從理論上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美國社會學家之一。他的市場轉型理論也是目前美國社會學界最為明確的一個理論模式。我以為倪志偉的理論邏輯有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的特點。均衡分析的基本思路與理性選擇是一致的。它的起點是按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理性選擇和市場經濟運作的基本理論找出一個「最佳結果」(best solution)。這一思路的特點是注重「均衡」時的狀態，而對達到這一狀態的過程注意不多。具體來說，倪志偉(Nee 1989a, 1991, 1996)的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如果市場經濟在中國得以發展，它比再分配經濟（即計劃經濟）在生產要素的分配和生產過程的組織上更有效率，更有競爭性（「後果」）。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新的利益集團也會相應產生，並在政治舞台上形成勢力，導致社會制度與組織的相應變化。所以，最終市場經濟會取代再分配經濟。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社會的分層機制和過程也會隨之變化。

在我看來，倪志偉的觀點有其內在的理論邏輯。他提出的市場經濟對社會主義再分配體制的衝擊的看法已為大家所接受。他強調的市場經濟發展對社會政治制度轉型的重要意義的觀點是他在制度研究領域中的重要理論貢獻。但是，他試圖用市場經濟作為唯一邏輯解釋中國社會變遷，則幾近偏頗。

這場爭論中的其他學者的觀點（參見《美國社會學學刊》1996年第101卷第4期）則反映了不同的理論思路。許多學者提出市場經濟不是一個獨立的運行過程，它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已有的社會制度的制約，從而有着其特定的形式和意義。這些學者的主張大致可以分為內在演化過程和外動力兩大方面。

內在演化過程的這一理論思路強調社會變遷不存在一個「最佳狀態」。社會變遷的方向、速度，以及「最終狀態」是由其具體的演化過程所決定的。因此，不研究具體的過程就無法解釋社

會變遷。這並不是說內在的演化過程沒有規律可循。但這些規律與理性選擇並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例如，如果沒有「文革」這一經歷，中國改革的道路可能會與今天的現實大相徑庭。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組織演變是通過「結構化」來實現的。例如組織規章制度的演變，不但促進了過去制度的變化，同時也保存了現有制度，從而對今後的制度變遷有制約作用。中國學者注意到的「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新的利益集團」的重要性即在於此。

強調其他動力的觀點特別重視現有社會經濟制度，特別是國家與地方政治權力的作用。社會制度的變遷是在這些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相互競爭，相互依存的過程中實現的。因此僅僅強調某一過程會導致片面甚至荒謬的結論。這一理論思路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到了對現有制度的分析上。倪志偉（Nee 1996）在近來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現有制度的制約性，並試圖將這些因素引入他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中。

8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學界對中國改革的研究集中在社會分層這一領域中。近年來，新的研究開始注意到了制度變遷的各個方面。但是這一領域中的研究剛剛起步，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論觀點或系統的實證研究。

2. 關於組織與制度設施的研究

(1) 經濟學家的困惑與探索

中國的改革首先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組織與制度變遷也起源於經濟領域。所以經濟學家對組織與制度變遷這一課題尤為關注。經濟學家研究中國改革有兩大困惑：

一、突變與漸變。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運作和制度形式做了深入的研究，發展了一整套的理論模式。但是，經濟學家無法解釋為甚麼俄羅斯和東歐國家按照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實行的

「市場制度設計」方案在實施中問題重重，而中國改革的「漸進」道路卻卓有成效。按照「均衡分析」的思路，東歐的道路應該在經濟發展上遠勝於中國的漸進道路。因此，這一現象對西方經濟學提出了一系列挑戰，促進了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研究。

在經濟學的研究中，我以為羅斯基 (Thomas Rawski) 的研究特別與中國現實貼切。羅斯基 (Rawski 1994) 主張，解釋中國改革，必須從歷史入手，考慮中國經濟改革的初始條件，要研究改革的過程以及各種制度實施的相互作用。例如，Gary Jefferson 和羅斯基 (Jefferson 和 Rawski 1994) 在評述有關中國工業企業改革的研究時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對舊體制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經濟的獨特條件。與俄羅斯與東歐不同，中國的中央政府在經濟領域中未能達到全面控制、全面管理，改革前多種所有制的企業制度並存共生。這些條件為突破舊體制提供了基礎。他們主張從各種制度設施的相互影響中研究制度變遷。他們認為中國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是其對國有企業的依賴，國有企業的「創新」作用推動了非國有企業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對非國營企業模式的有效性持懷疑態度。(他們的研究也注意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也可以解釋中國企業的一些經濟行為。例如市場經濟和改革政策導致企業結構和行為的重要變化，誘發了追逐利潤的企業行為。)

羅斯基的研究對現存制度設施及其相互作用的強調以及對改革過程的關注與新興的制度學派的思路不謀而合。另外，經濟學家 Barry Naughton (1995) 的研究也具有這一特點。這些研究的思路取向與社會學中的制度變遷研究十分接近。

二、所有制問題。經濟學家的第二個困惑是如何解釋中國鄉鎮企業的起飛。按照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所有制制度對經濟組織的效益至關重大。在所有制界定不清的經濟制度下，經濟組織的

運作和效益必然受到影響。但是在中國改革過程中，發展最為迅速的鄉鎮企業的一個基本特點恰恰是其所有制界限不清：許多鄉鎮企業打着「集體企業」的牌子，但實質上是私營企業。而許多私營企業也與當地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Martin Weitzman 和 Chenggang Xu (1994) 對這一現象的研究有獨特見解。他們認為，所有制制度的一個主要功能是解決「合作」的問題。西方經濟學的「所有制」理論認為明確穩定的所有制制度和法律制度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備條件。但是，這一理論忽略了社會羣體內部在沒有明確法律和規則情況下自行解決內部潛在衝突的能力。他們提出中國鄉鎮企業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其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借用博弈論的一個概念，他們提出 λ -因素的概念。 λ -因素指社會羣體自行解決衝突與合作問題的能力。在中國文化中， λ -因素高，因此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強。合作的一個重要形式是隱形合同，即非正式的理解和約定俗成。在 λ -因素高的社會，隱形合同更為有效率：它可以比正式合同的形式節時省力；隱形合同建築在信任基礎上，導致了責任感。他們認為，正是這些因素推動了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

這一研究的主要貢獻是引入社會因素（文化、信任）來解釋經濟現象。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工作與社會學的研究課題十分接近。但是，應該指出，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受多種因素的制約，例如它們與地方政權的關係，它們的合法性與爭取資源的途徑等等。以上研究只是集中在「所有制」這一主題上。

在我看來，上述經濟學領域中的研究頗有新意。這些研究大多涉及了社會學的研究課題，強調社會的歷史演變過程或者文化背景。這也反映了這一領域的交叉學科研究的特點。但是大多數經濟學家的基本看法仍然從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出發，認為中國的改革是不徹底的，最終要走向全面市場化才能真正解決目前改

革中面臨的困難。經濟學家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主要是建立理論模型和統計分析。西方經濟學家為俄羅斯及其他國家提供的市場經濟制度轉型方案在實踐上的失敗使我們有理由對這一思路的基本假設前提和邏輯提出懷疑。

組織與制度變遷領域中最有貢獻的是對中國組織制度的具體實證研究。這些研究主要是中國學的研究學者的工作。下面我集中介紹一下這些研究。

(2) 對中國組織中「庇護」關係的研究

「庇護」(clientele) 關係是封建社會以來的一種重要社會制度設施(Wolf 1966)。在中國組織制度的研究中，庇護關係的概念很早就在研究文獻中出現，但是直到 80 年代中國學學者戴慕珍(Oi 1986, 1989)、魏昂德(Walder 1986) 等人的一系列研究才提出了一個完整的理論模式，用以解釋當代中國組織內部的人際關係及組織間關係。這一模式的主要觀點是：(1) 指令性經濟賦予下層幹部在資源分配上的壟斷權力。普通羣眾只能通過與這些幹部建立庇護依賴關係才能獲得益處。這樣，庇護關係成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個主要紐帶。(2) 單位的封閉性以及社會關係的感情紐帶導致了這種關係的穩定性。(3) 這種關係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它加強了國家滲透與協調社會的能力；導致了人們對現有制度的認可；促進了社會羣體的分化；減弱了社會自主的集體行為的能力。

這一理論模式主要是針對改革前的中國單位制度的分析。由於當時實證資料的匱乏，這一理論未能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加以系統檢驗。在中國經濟改革以後，學者們關心的問題是，這一理論模式在改革後的中國是否還有解釋能力？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一理論模式對改革前的中國是有解釋意

義的。但是，在改革前的中國，這一理論有兩個重要的約束條件：(1) 在平均分配思想主導的中國社會、下層幹部的資源分配的權限極小、資源有限；而且在「鐵飯碗」的公有制制度下，一般工人的基本利益受到制度的保障（公費醫療、福利等等），從而制約了領導幹部的控制權限；(2) 在政治動蕩的中國歷史上，幹部的政治地位變動不居。常常有「站錯隊」，「這次運動你整我，下次運動我整你」等現象。因此，這種庇護關係的穩定性、有效性受到了一定約束。

在改革後的中國，這兩個約束條件都有了極大變化。第一，組織管理者的權力有了極大的擴展，而一般工人或職員的權益的制度保障相對下降；第二，改革後中國的政治運動衝擊明顯減少，為庇護關係的產生和鞏固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環境。由此推論，這一模式可能對現在社會的某些領域中的情況更具有解釋能力。當然，管理階層與再分配體制的關係也有了實質上的變化，需要在理論模式中重新加以思考。一些學者在這一課題上做了研究。在這一領域，David Wank 的研究很有新意。他的研究集中於私營企業與政治權力的關係，提出了兩者的「共存庇護」即從「單向依賴」變為「共存依賴」關係。在他看來，這一關係仍然具有庇護的特點。這是因為這一關係是建立在人際關係上的。此外幹部與企業主之間的權力是不平衡的，幹部仍然擁有分配資源和機會的權力。Wank 也指出這種關係正發生重要變化：私營企業主對幹部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了，而幹部對私營企業主則產生了新的依賴關係。

Wank (1995) 在研究廈門的私營企業時通過對私營企業主的訪談，分析了私營企業仍然依賴於政治權力的原因：第一，利用權力關係可以得到資源。這是因為地方政府仍然具有很大的控制權力：例如對稀有資料、不動產、金融資本、貿易機會、公共消

費單位的控制，以及對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地位的影響。第二，利用權力的庇護關係可以避免政治和政策的任意干涉：例如地方官員的干涉、任意處罰、國家政策的突變，以及政治運動的不利影響。他的研究同時也指出了在新的階段政府官員對私營企業的依賴：例如賄賂受益、解決當地的就業問題、促進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合作關係等等。這一研究思路關注現有的制度，強調改革過程中的各種關係的演變。

Scott Kennedy (1997) 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的研究集中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像四通這樣一個公司的成功究竟是因為它受到政府庇護的關係，還是市場經濟的產物？這一研究的特殊意義在於四通公司是中國改革初期最為引人注目的私營公司，它與政府又有着密切的關係。作者的個案研究提出，儘管四通在早期受益於政府的偏愛，但這一公司的發展和成功主要取決於其內在的發展戰略和市場競爭能力。因此，這一研究的結論指出了庇護理論模式的局限性。

邊燕傑 (Bian 1997) 關於「關係網」的研究強調了現有的制度設施對資源機會的佔有和分配的機制，導致了社會關係網絡在中國「工作市場」上的重要性。社會關係網絡是社會關係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反映了社會資源配置、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基本特點。但是，Douglas Guthrie (1998) 對關係網的重要性持有異議。他根據在上海與企業經理的訪談的資料認為，關係網在勞動力市場的作用正在下降，中國經濟組織正向理性的組織結構轉變。這一領域中的工作對瞭解認識中國社會中的制度設施以及變遷提供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度，有可能導致重要的理論貢獻。

以上涉及的研究主要分析了中國改革過程中，政治權力與市場機制的相對地位和影響。這一主題貫穿了美國社會學界對中國改革過程的諸多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在理論上尚未有重大發

展。學者們大多各執一端，或強調政治設施的持續性，或強調市場機制的突破性。西方社會科學界近年來在科層－市場(hierarchies-markets)的兩分法上一直有着不斷的研究與爭論。在實際研究中，學者們面臨的主要困難在於如何將政治與市場的作用在實際的經濟運作中區分開來。一個進一步的問題是：將兩者在概念上或實證上區分開來是否可行或者必須？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和回答有可能在理論和研究設計上引起重大的突破。

(3) 對組織制度的研究

下面，我介紹一下西方學者對中國組織制度的研究。因為組織學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這些研究涉及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

官僚政治與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及其變化是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個熱點。政治學家 Kenneth Lieberthal 和 David Lampton 在 1992 年編輯的論文集反映了這一領域 80 年代末的研究水平和成果。如 Lieberthal 在導言中提出，這些研究的基本結論是，中國官僚政治體制並非鐵板一塊。中央政府對各種官僚利益集團的控制不力，這種鬆動的政治管理制度為中國改革突破舊體制提供了有利條件。在這一領域中的另一主要成果是 Susan Shirk (1993) 對中國經濟改革中政治過程的研究。她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反映了中國政治設施的運作特點。她特別強調政府各部門及地方政府的利益集團參與改革決策過程的重要性。由於中國改革建築在這些利益集團的妥協的基礎上，改革的進程表現出了漸進性。這一過程的益處是，由於各種利益集團在改革過程中不斷獲取利益，改革的政策得到了他們的支持。但是，其隱患是推延解決改革的棘手問題，導致了重大制度問題積重難返。

對改革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係的研究中，學者們的一個共識是後者的作用大大增強了。但是一個重要的分歧是如何看待地方政府的性質：地方政府究竟是新型經濟關係的「中心主角」還是「協助促成」的角色？按西方經濟學的概念說，究竟地方政府為經濟利益集團所控制，還是作為主導者積極參與經濟活動，成為經濟活動的重要組織者呢？強調市場經濟的學者認為是前者，而強調現有制度的學者則認為是後者。

魏昂德 (Walder 1995b) 提出中國地方政府具有一個龐大工業組織的特點。他提出在改革過程中地方政府成為當地經濟運作中的主導力量。地方政府與當地經濟社會生活的利益的不可分割的關係為其積極參與經濟領域的運作提供了巨大動力。地方政府在國有組織中的領導地位使得它們可以對當地的經濟組織進行較直接有效的監督管理。他認為，地方政府的這一角色是中國改革中經濟迅猛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魏昂德的觀點和倪志偉的看法顯示了兩條不同的思路，對今後實證研究的設計有着指導作用。

單位的等級制度

中國單位等級制度早已引起社會學和組織學學者的關注。早期研究有 Parish 和 Whyte (1984)、Walder (1986)、Lin 和 Bian (1991)。邊燕傑 (Bian 1994b) 對這一制度做了最為詳盡的介紹和分析。這些研究已為中國社會學界熟知，這裏就不再贅述。

最近，Oded Shenkar 在《組織研究》(*Organization Studies*) 雜誌對「完全性組織制度」(total institution) 作了進一步的研究。他的研究起點是美國社會學家 Erving Goffman 對完全性組織的分析。Goffman 在 1961 年的一文中提出，現代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是人們活動約三個領域——衣食住行、娛樂、工作——互為分離：這三個領域的地點不同，參與者不同，管理機構亦截然不

同，而不是出自於一個全面的理性設計。但是，「完全性組織」的特徵恰恰在於通常分離這三個領域的疆界被打破了。作者比較了中國國營企業與 Goffman 筆下的完全性組織的異同，把中國的企業制度放在各種完全性組織制度中作了比較研究。（其他的類似制度包括工作單位的共同工作環境、宗教組織的認同感、監獄組織的強迫性，和寄讀學校的共同生活）。他認為，中國的單位具有這四種完全性組織的特點。

Corinna-Barbara Francis (1996) 在研究北京海淀區高科技行業時，強調了組織制度的繼承性。她的研究發現海淀區高科技企業在企業福利、人際關係、以及對企業依賴等方面「再生」了中國單位制度的特徵。Francis 提出：導致這一再生現象的原因在於（1）管理者的動機在於將人才「鎖入」現企業；（2）地方政府迫使私有企業承擔社會功能；（3）政府將其管理控制的機制交予私有企業的管理人員，以圖將原有機制延伸於私營企業；（4）社會文化固有的對於企業的期待造成了企業承擔社會福利的責任。

以上兩項研究也反映了西方的中國研究的兩種不同的特點：Shenkar 的研究是從西方已有的理論為起點，着重描述中國企業制度的特點。但是，他的研究也提出了多種概念。其研究角度大異於中國學學者的取向。Francis 的研究是從現有制度着眼，強調已有制度對新興組織制度的制約性。她的研究思路尤其注意到已有制度的穩定性、繼承性和滲透性，認為大的社會環境塑造了內在的組織制度。這一解釋十分接近「制度學派」的思路。與組織學中的制度學派如出一轍。

另外，中國等級制度的特點也為研究制度變遷提供了一個起點。周雪光 (Xueguang Zhou)、Nancy Tuma 和 Phyllis Moen (1997) 以單位等級制度為出發點研究分析制度變遷的方向和程度。他們研究的理論前提是，如果單位等級制度是社會主義再分

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於邏輯上說，人力資本在不同單位之間的流動反映了制度變遷的方向和程度。如果市場經濟在人力資本的分配上起主導作用的話，人們就業和更換工作的方向就應該趨於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企業（非國有企業）。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市場機制在中國城市經濟中特別是在人力資本的分配上的作用還是很有限的。

（4）對新產生的制度形式的研究

在中國改革中許多舊的組織制度形式消失了，或者退居次位；新的組織形式替而代之，作用日益增長。研究中國的組織與制度的變遷，一個主要的課題是認識和解釋這些新型制度形式的實質和作用。

地方社團主義

社團主義（corporatism）這一理論模式最早起源於政治學家對拉丁美洲及南歐權威主義國家中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這一模式主要解釋強權政府與大的社會利益集團（如工會）相互依賴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在組織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作用。

在研究中國改革過程中，一些學者提出了地方社團主義（local corporatism）這一理論模式來描述改革中權商結合這一新型的制度形式。這一研究領域的代表作是林南（Lin 1995）發表的研究天津大邱莊的文章，以及政治學家戴慕珍對中國農村中政權與各種利益集團關係的演變過程的一系列研究。與強調科層—市場兩分法的理論取向不同，這些學者提出，在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地方權力與穩定的利益集團的結合產生了一種新的制度形式——一種既非市場、亦非正式組織的形式。這種形式反映了現有政體、社會關係，和文化背景的滲透結合。由於學者的取向不

...，對不同因素的強調也因人而異。陳致柔 (Chen 1999) 的研究發現在不同的地區，地方政權與地方利益集團的結合的程度和方式差異很大，產生了不同的地方社團主義的模式。目前這一方向的研究集中在個案分析上。

改革中的組織制度變遷

社會學家對中國工業組織制度變遷的研究剛剛起步，這裏簡單介紹幾項研究成果。

倪志偉 (Nee 1992) 從理論上討論了在改革中中國組織制度演變的途徑和方向。他從「市場轉型理論」出發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組織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經濟效益和發展規模。他認為國有企業由於受舊體制的約束，市場競爭能力遠遠不如更為適應市場的私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隨着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具有市場競爭能力的企業類型會取代競爭不力的國有企業。在這一過程中，「混合型」企業 (hybrid firms) 應運而生。混合型企業指有着不同所有制關係的企業 (例如鄉鎮企業具有集體和私有的混合特點)，或者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聯營合作。倪志偉認為這種混合型企業是一種重要的過渡組織形式。

Guthrie (1997) 研究了改革過程中中國工業組織對市場機制的適應方式。通過對 1995 年上海的 81 個企業的資料分析和訪談，他注意到許多企業近年來分流資金在服務行業投資。他的基本觀點是市場經濟的不確定性誘導了企業行為的相應變化。中國新興市場經濟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尤為突出。這些條件誘導了企業向低利潤、低風險的領域進行投資，以圖創造出一個穩定的市場環境。Guthrie 認為企業行為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受到了現有制度設施的制約。

另外，Keister (1998) 對中國 80 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企業

集團進行了分析。根據中國 40 家大型企業集團的資料，她分析了集團內部企業間關係、相互間董事會的參與方式，以及財務關係對其經濟效益的影響。她的研究發現集團內部的等級制度妨礙了經濟效益。據此她提出企業間高度整合的組織形式並非最佳的發展途徑。

Guthrie 和 Keister 的兩項研究都是實證研究。這兩位學者的基本出發點是從已有的西方組織理論的角度研究中國組織形式的特點。也許正因如此，儘管企業分流資金，企業集團這些現象已為中國學者所熟知，他們的研究從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新穎的觀點和解釋。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們對中國經濟運作過程的微妙和多元性的瞭解還不夠深入。他們的文章讀來有勉強圖解的感覺。

「關係網資本主義」

在組織學領域中，對中國的研究興趣主要為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發展所驅使。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階段、理論水平不高。但是，Max Boisot 和 John Child 這兩位學者的研究鶴立雞羣。下面，我對他們的研究工作作一介紹。他們的工作集中在《管理科學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上發表的兩篇文章上 (Boisot 和 Child 1988,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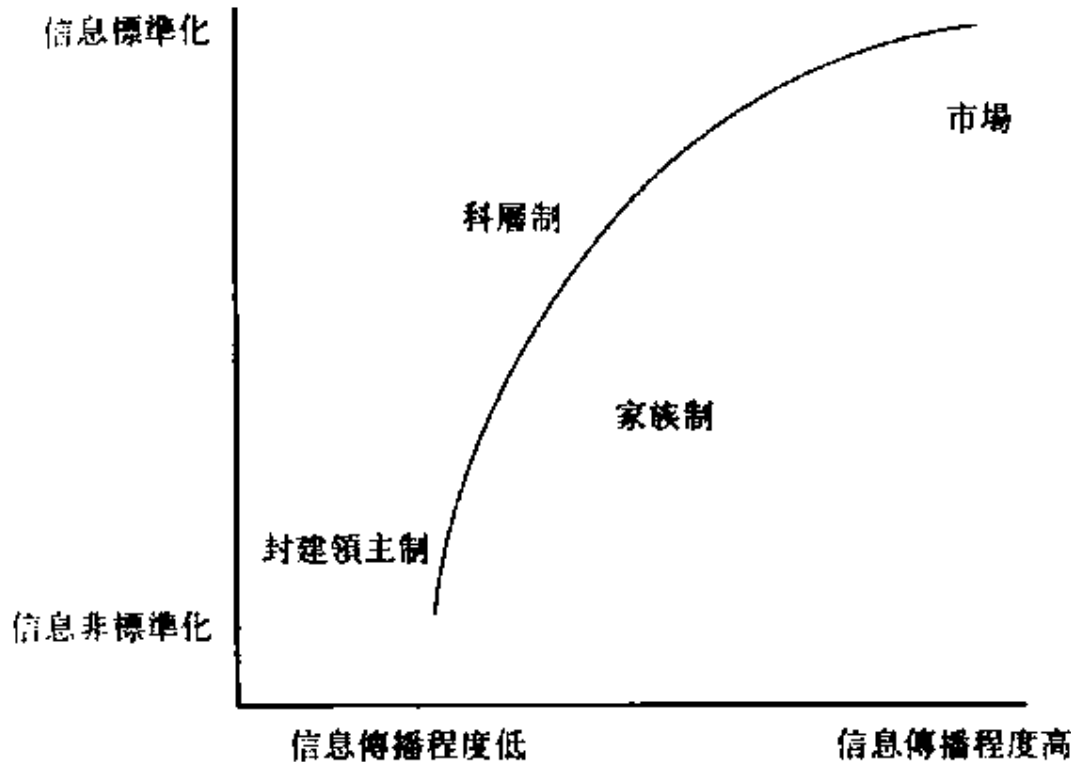
在 1988 年的文章中，他們提出了「封建領主的鐵律」(the iron law of fiefs) (fiefs 一詞意指封建領主)。這一文章的主題強調了地方性權力機制的強大生命力。他們研究的起始於對「科層－市場」兩分法的批評上。這兩位作者的主要論點基於這一認識，即信息在組織經濟活動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在中國制度變遷過程中，我們可以從現有的制度結構對信息流通的影響來分析制度變遷的形式和方向。

他們以為，不同文化、社會制度對信息的處理是不同的。這可以從兩個維度來分析：（1）信息的加工，標準化；（2）信息的傳播程度。例如市場價格就是一種非常標準化的信息，可以說老幼咸知。但是國家指令性政策只能由各級幹部解釋，標準化的程度很低。與此相反，通過電視廣告的信息傳播極廣；但是口頭傳授的信息傳播有限。由於不同社會文化中對信息的傳播，加工不同，人們為了利用信息而發展出了不同的組織形式。從信息的這兩個維度，作者劃分出以下四種制度模式：科層制、封建領主制、家族制，以及市場制度（見表1）。這四種組織形式可以隨着信息標準化和傳播程度的變化而相互轉化（見圖1）。

表 1

	傳播有限的信息	傳播廣泛的信息
標準化的信息	<p>科層制</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信息的傳播有限，受集中控制 • 關係正式，等級分明 • 服從更高目標 • 通過等級制度協調 • 無需有共同的價值、信念 	<p>市場制度</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信息廣泛滲透，不受限制 • 人際關係正式，競爭 • 沒有共同目標，各謀私利 • 平行層次的協調 • 無需有共同的價值、信念
非標準化的信息	<p>封建領主制</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信息非標準化導致信息傳播限制在面對面的互動 • 人際關係密切，但有等級制度 • 服從更高目標 • 通過等級制度協調 • 需要有共同的價值、信念 	<p>家族制</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信息傳播廣泛，但仍限制在面對面的互動 • 人際關係密切，非等級制度 • 通過談判達到目標共識 • 通過談判達到平行協調 • 需要有共同的價值、信念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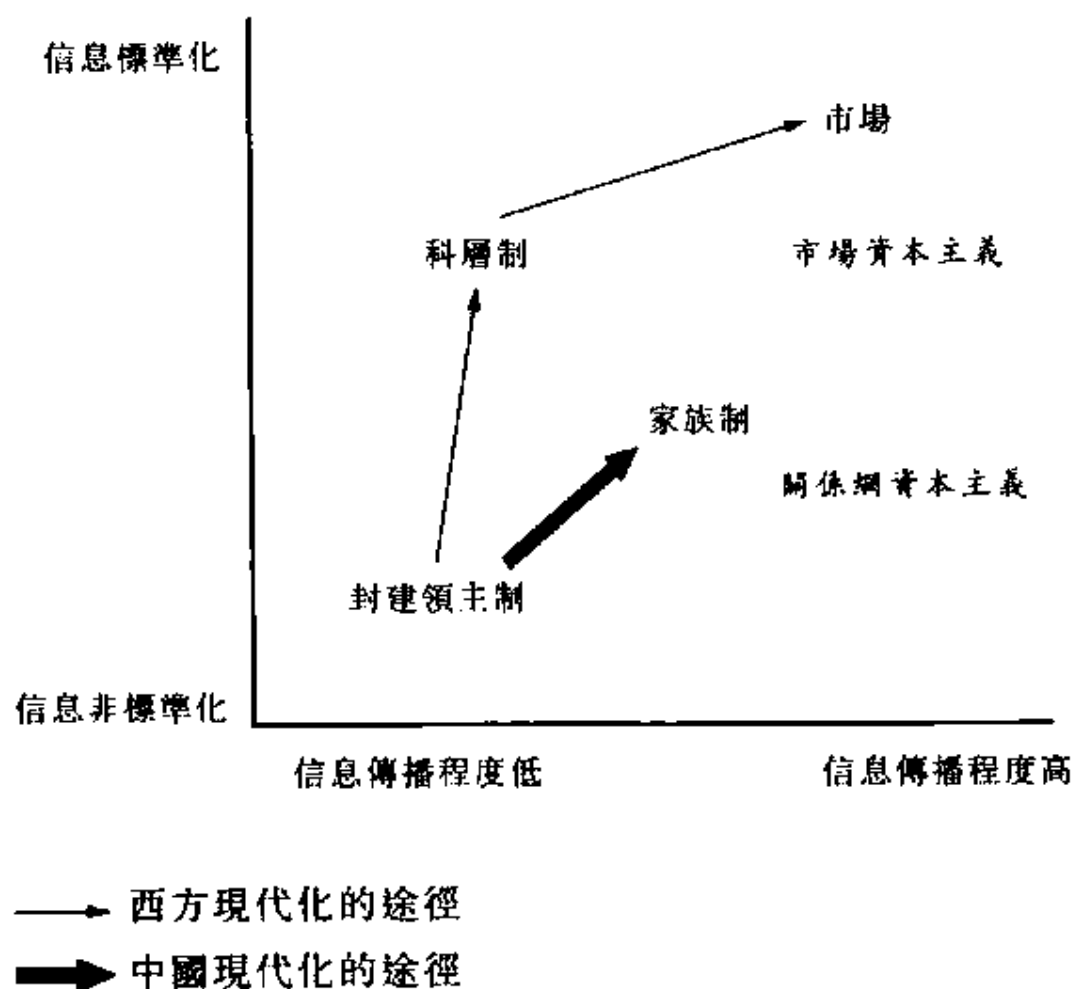


作者的主要觀點是，在中國社會中，信息不標準化，傳播程度低，因此相應的組織形式是「封建領主制」。從宏觀上，他們指出，在改革分權的過程中，地方權力日益增強，為「封建領主制」提供了組織基礎。從微觀角度上，他們從企業的層次論述了管理行為，生產責任制等方面的特點，指出企業對地方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依賴關係。因此，他們論證了為甚麼中國新型組織關係是以「封建領主制」為特徵的。

在他們 1996 年的文章裏，這兩位作者進一步提出了「關係網資本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組織形式並非總是在科層、市場之間轉換。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一種新型的組織關係是「關係網資本主義。」他們指出，在中國「許多的經濟交易看起來是通過關係網的關係系統內部的「討價還價」的談判而實現的。這

一關係網系統是建築在人際間互惠的責任觀念上，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了資源供給、促成交易、稅收的重要角色。中國的關係網資本主義通過人際關係的隱秘的、靈活的動態過程而運行。一方面，這一過程費時耗力。但另一方面，這種關係尤其適合於複雜、不穩定的經濟過程。關係網對提供和傳播新信息十分有效。當這種關係網建築在相互信任基礎上時，它可以緩衝由於不穩定性所導致的失誤。」在這一基礎上，他們認為中國經濟關係的演變不是簡單地向市場經濟過渡，而帶有「家族制」的許多特點（見圖 2）。

圖 2



3. 關於制度行為的研究

雖然制度變遷本身是近來研究的一個熱點，但是大多數研究集中於描述和解釋制度行為，即從現有制度的制約性解釋個人和團體組織的行為。這些行為可能是制度設計所預期的行為，但也可能是制度設計所未及所料的「非預期行為」。下面我介紹一下在這一領域裏的一些研究動向。

從組織學的角度看，公有制制度的一個主要難題在於如何使得組織管理者與組織的擁有者之間擁有一致的利益。以前的中國研究集中在各級權力結構的關係，尤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一現象。

這些研究可以很順理成章地納入委托—代理 (principal-agent) 的關係的理論框架中。這一理論首先是在金融經濟學領域中提出的 (Jensen 和 Meckling 1976)。其主要觀點是，理性選擇意味着受權者的行為受個人利益支配。由於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受權者的行為必然常常會與所有權主人的利益相衝突。由於這一理論起源於新古典經濟學，所以這些研究的取向是以理性選擇的理論邏輯為特徵的。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課題是怎樣進行「組織設計」使得受權者的行為與所有權主人的利益一致。當然，理論研究的首要任務是研究受權者的偏離行為的特點和規律。在此基礎上才能進行組織設計。在西方學者的研究中，對中國企業投資行為、獎金分配制度、獲取資源的途徑手段的許多分析都受到這一理論框架的影響。

在這一理論取向中，政治學家 Melanie Manion 研究了制度設計與政治腐敗的關係。她的研究是基於對中國企業獲得營業許可證的經濟行為的實證分析之上的。她從博奕論的角度提出了在中國現行制度下，其制度結構與非預期的行為導致了賄賂現象的盛行的觀點。她強調在現有制度下，賄賂是最佳的理性選擇。

John Child 和 Yuan Lu (1996) 從制度約束條件的角度分析了改革階段中國國營企業的投資行為。他們通過對六家國營企業的有關投資的決策過程的研究提出，這些企業受到上級主管部門和市場經濟的雙重制約。由於國營企業對政府部門的資源依賴以及合法性的依賴，它們的投資決定更多的反映了政府主管部門的意願。

與此相反，另外一些研究強調了現行制度下的「非預期行為」。Keun Lee (1991) 對這一現象作了詳盡的闡述。他的起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效率水平不僅受制約於資源條件，更重要的是受制約於人的因素。中下層官員、經理、工人受自身利益的約束，並不一定忠誠於社會的整體利益，而可能表現出投機的行為。由於這一原因，各級政府機構與各種利益集團相互利用，以謀取或保護自己的利益，從而損害了國家政策和社會整體利益。例如在國有企業中，有兩級欺騙行為，使得初期的改革措施無法順利實施。在高一級的層次上，企業與地方和國家權力機構之間串通降低國家在利潤留成中的比例；在低一層次上，管理人員與工人之間串通導致平均主義的獎金分配。而企業經理地位十分微弱，無法滿足各級政府機構，企業內黨委領導及工人的不同要求。Lee 將這一理論模式用於分析為甚麼不同階段的改革政策未能如期實施。他用這一模式解釋了中國國營企業改革失敗的原因，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業類型的經濟行為，並將中國的經歷與日本、南韓加以比較。這些理論觀點大多在實證資料的基礎上加以驗證。其他學者亦採用了這一理論模式對中國國營企業的改革進行了分析（參見 Cauley 和 Sandler 1992）。另外，魏昂德 (Walder 1989) 對 80 年代早期的工資獎金制度改革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樣的結論。魏昂德提出由於企業經理與工人利益的十分接

近，導致了兩者相互作用，按其自身利益來解釋和實施國家政策。

筆者（Zhou 1993）研究了現行政治制度下誘導的「非預期」的集體行為這一現象。我在該文中提出，中國政治的集權性以及組織制度對人的約束性導致了人們行為的同步性。這集中體現在（1）各羣體、個人「不約而同」採取共同行為的「大數現象」；（2）這些行為的目標集中到中央政府；（3）國家政策的不斷變化為誘發這些行為提供了機會。這樣，沒有組織的個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在一定的制度條件下表現出了集體行為的形式。

另外，魏昂德（Walder 1986, 1995a）對組織內部依賴關係，以及升遷的研究，以及筆者（Zhou 1995）對幹部分配現象的研究，都屬於對中國社會組織制度下制度行為的認識與分析。

4. 小結

西方學者對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的研究反映了西方社會科學界研究的一些基本特點。我扼要總結如下：

（1）研究課題，研究角度的多樣化。這些研究或基於大規模的抽樣調查，以求發現規律性現象，或基於細微的個案分析以小見大。在我看來，在目前階段個案研究的貢獻尤為顯著。在社會制度變遷的複雜過程中，泥沙俱下，難以把握其脈絡。以小見大，可有獨到見解。

（2）大多數研究的理論性很強，即有着明確的理論假設和研究取向。這些研究有着明顯的理論思路的差異，這一方面是由於各學科自身研究方法、研究邏輯的不同，另一方面在於個人的從師修道不同。作為一個學者，對理論取向的選擇取決於個人的理論偏好、對不同理論流派的認同。理論流派的前提、邏輯、研究

角度不同，常常導致不同的結論。但是僅僅在理論層面是無法確定理論的對錯優劣，這只能通過實證分析才能驗證。

(3) 綜觀這一領域的研究現狀，有兩種基本傾向。第一，一些學者的研究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有限，其研究主要是將西方已有理論用於解釋中國現狀。因此這些研究讀來有「生搬硬套」之感。但是，也許正是因為他們不熟悉中國情況，不受過去研究的束縛，常常有獨到見解。第二，許多研究是用中國的獨特背景和條件來解釋中國社會的現象。這些研究常常有深入貼切的分析。但是理論解釋的力度和範圍有局限性。將兩者優勢結合起來的研究在目前階段尚屬鳳毛麟角。

四 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研究的課題與方向

在最後這一部分，我想談一下我對研究中國組織和制度變遷這一領域的意義、方向、課題的想法。

1. 研究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的意義

在美國社會學界，衡量研究水平的一個主要標準是一項研究的理論意義。那麼，研究中國組織和制度變遷的理論意義在哪裏呢？從一個學者的角度看，我以為有以下兩點：

第一，中國制度變遷的龐大規模與深刻程度都是當代世界舞台上罕見的。西方社會在資本主義革命後雖然政府頻換，亦經歷了世界大戰、多邊戰爭、民權運動、學生運動的衝擊，但總的來說，西方社會學是在相對平和的市場經濟社會的漸進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大多理論模式着重於對市場社會的靜態分析。中國以及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變遷對已有的理論模式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戰。中國的改革經歷為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和更新提供了新的動力。

第二，長期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界的研究主要是建築在對西方市場經濟的分析之上的。與此相比，中國社會制度設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多元所有制）、改革道路的錯綜複雜（漸變、多層次、多方位、混合所有制）都是獨特的。這就為新的理論研究、新的理論突破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

這些條件使得研究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這一課題有着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在這個意義上，比較研究尤為重要。瞭解和認識西方學術界的研究是進行比較研究的重要一步。這不僅是因為西方學術界有一整套研究方法值得借鑒，更主要的是我們應該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作出突破性貢獻。

2. 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研究的課題

(1) 市場與政治的關係

市場與政治（科層組織）的兩分法是西方學術界研究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這一思路認為市場經濟的機制與政治主導的機制截然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從這一角度認識中國改革，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社會的變遷是一個由計劃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的過渡過程。就目前社會學的主流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來看，學者們或強調新型市場的力量，或強調已有制度特別是政治權力的作用，各執一端，互有偏頗。這一爭論的基本假設仍然是市場與政治的兩分法。

制度學派為重新認識兩者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制度學派認為，市場經濟的運行本身需要制度設施的保障，如國家的司法制度、金融制度、所有制制度等等。而這些制度設施的建立和運作常常與政治制度、政治過程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市場與政治不是簡單的對立關係。即使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國家與市場經濟的關係也各有不同。換言之，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不存在一個唯一的理想模式。

這一認識對研究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有着重要意義。中國的政治權力與新生的市場經濟是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的主要動力。但是市場機制與政治機制的關係並不是二者的簡單相加或者相互對立。探討認識二者關係對理解和預測中國改革的進程和方向很有意義。

在我看來，從一個互動演化（coevolution）的理論模式來認識市場與政治的關係尤有啟發意義。從這一角度看，政治與市場不僅僅對立，二者融合的餘地很大。兩方是在衝突的過程中促使對方的演變。這裏的一個基本研究課題是如何認識市場與政治相互作用的演變過程：兩者在哪些領域是互為抵銷，互為制約，或者互為強化的？這一演化過程的機制是甚麼？國家權力的兩重性——政治分配機制和市場制度基礎——在中國改革中是如何變化的？關於這一課題我在其他文章中有更為詳細的敘述（Zhou 1999），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2）組織與制度變遷的機制是甚麼？

不同的理論思路對這個問題有着不同的回答。理性選擇學者強調個人的最優化行為和市場競爭淘汰的機制；制度學派認為社會組織、社會制度一旦建立就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而且，制度的演變是一個各種制度及其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從制度學派的角度看，以下幾個問題對於認識組織與制度的變遷機制有密切關係。

已有社會制度與新的制度之間的關係

中國改革是一個各種新的制度不斷建立的過程。例如中央政府與國營企業之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經歷了一系列的制度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制度的設想和提出是理性選擇的

結果。但是這些制度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的作用和效果受着其他制度設施（如規範、習性、社會記憶系統）的制約。不認識這些制約條件，就無法解釋和預測某一新制度的運行結果。

利益集團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作用

制度設施為利益集團提供了組織基礎，而利益集團的行為或推動或阻止新的制度設施的建立和運行。任何制度變遷最終是通過政治領域中的集體行為而實現的。這是因為任何制度設施的建立都取決於在政治領域中的妥協和共識。在這個意義上，利益集團本身也是制度設施。因此，對利益集團的研究認識是理解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方面。

對組織內在機制的認識

如韋伯指出的，任何組織一旦建立，就有其內在的生命力。經濟學家 Kenneth Arrow (1974) 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了組織的一個重要特點，我稱之為組織的學習過程中的「近鄰效應」。我們知道組織的改進和演變是通過自身不斷獲得新的信息，不斷學習而實現的。但是獲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代價的。現有制度為信息獲得的成本效益提供了穩定的結構。在「減少成本」的經濟規律制約下，組織為了更有效率地獲取和加工信息，往往在自己已經熟悉的領域的「近鄰」獲取新信息。因此，「近鄰效應」必然表現組織行為的歷史依賴性，即過去的行為（領域）對新的行為方向有着重要的制約性。在這個意義上，Arrow 指出，組織在最為需要變遷的時候，其行為常常反而強化了其現有的結構。因此，研究制度變遷，我們需要對這些組織內在的規律特點有深入透徹的認識。

(3) 新興制度形式的研究

我認為研究中國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課題是對新興制度形式的認識分析。西方社會科學在這一領域中的討論長期以來環繞在科層制和市場制度的兩分法。但是，任何制度形式的產生必然與其特定的社會文化歷史環境有着密切的關係。即使市場制度在美國和西歐各國的實施也是各有特色，反映了特有文化環境的制約性。可以想像，中國改革這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革過程會造就出一些不同於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新興制度形式。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中國改革實踐對世界社會科學的重大貢獻之一。因此，研究這些新興制度形式是如何產生的、這些制度的性質和作用，以及與其他制度設施的異同，是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研究領域中最為令人興奮的課題。例如，合同制度在制度經濟學上有着重要的理論意義。在中國的經濟活動中合同的作用也日益增強。但這一制度在中國經濟運作中的實際意義是否與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吻合呢？如果有差異的話，我們是否可以在理論上提出一個滿意的解釋呢？我想，新的理論必須能夠回答以前的主導理論提出的問題。同時理論的突破也在於走出已有概念的框架，研究新問題，提出新的解釋。

(4) 研究方法的考慮

以上介紹的西方學者的工作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一些研究是基於大規模的抽樣調查的統計分析；另外一些研究以「個案調查」為主。在我看來，在目前階段，「個案研究」有着獨特的優勢。中國改革的進程導致了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重大變化。許多已有的概念已經與變化中的中國社會相去甚遠。例如，社會學家常常使用「幹部」這一概念研究中國社會的分層狀況。但是在現在的中國社會中，幹部這個羣體已經高度分化，因此這一概念在

研究中的意義是有很大疑問的。目前的抽樣調查的基礎常常是這些已有的概念。如果這一研究方法的基礎是陳舊的概念，它的有效性就是可疑的。而個案研究對於認識理解社會羣體的分化組合、制度設施間的相互作用、微妙和多元的演變過程、新制度形式的產生和運作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優勢。我對「個案研究」的偏愛還出自於另外一個原因。在我鍾愛的學術著作中，大多數研究是個案研究的成果。以小見大，微言大義，這是許多學術大家的共同特點，也是比較學術功底、學術水準的一個重要標準。

方法的嚴謹性是促進研究深入發展的一個必備條件。由於這一領域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大多理論模式只是粗略的勾畫，在理論的前提、邏輯、假設等方面尚很粗糙。這對學者考慮研究課題，設計研究方案、選擇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大多數研究僅就某一思路、某一觀點，或某一側面加以闡述，有以偏概全之嫌。中國改革過程曲折複雜，欲找到支持某一論點的實證材料，並不困難。但是這種作法把學術研究變成了學術遊戲。要在理論和知識上有所建樹，必須做深入細緻的研究工作。尤其是要對其他解釋思路的可能性予以充分的考慮，並在研究中加以驗證。

中國改革為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遇。近年來中國社會學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這些學者的眼光敏銳，對中國社會的新情況、新發展有着很深刻的認識。這些研究中涉及的許多問題也是西方社會學學家關心的課題。有一些西方社會學家還在爭論不休的問題，其實中國學者的研究或者已經提出了答案，或者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在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的背景下，中國社會學家處於一個有利的地位，可以在這一領域中作出開創性的工作和貢獻。我也希望這裏介紹的西方社會學界的研究成果可以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

7 中國城市化研究： 理論上的「西學中用」與實證中的「特殊模式」¹

陳向明

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社會學系

一 引言

二十年來，隨着中國城市化受改革開放的推動而不斷演進，西方社會科學對這一課題的研究也不斷發展深化，不同學科發表的文獻無論在質量和數量上都已提高。雖然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對關於這一領域的西方文獻作一介紹和評估，但首先強調從中國城市化特定的歷史背景看待西方文獻的重要性。忽略這一歷史背景，我們就很難對西方文獻作出公正和客觀的評估，並難以意識到西方文獻對今後中國城市化研究的指導意義。

二 中國城市化研究的歷史與現實

中國城市化之所以長期停滯，到改革開放開始後才逐步加快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的。最顯而易見的解釋是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和主導的國家，沒有大規模的工業促發城市化。然而，在看到這一城市化發展的根本障礙的同時，我們也應充分意識到中國歷史上亦曾有過城市發展的高潮。比如早在公元12世紀時，南宋京城杭州人口就已超過百萬，成為當時世界上人

¹ 在本文的撰寫期間，作者受到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大城市研究所教授獎勵基金的資助，特表謝意。本文的資料收集和打字修改受到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的資助和孫嘉明先生的大力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口最多的城市。應當看到，中國一些大城市的早期繁榮沒有促進整體城市化發展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當時的大城市主要是政治、文化和商業中心，缺乏真正經濟中心的擴散滲透作用；同時也缺少能夠發揮次經濟中心和聯繫大城市和小城鎮的中型城市。二是城鎮的發展受制於農村經濟。城鎮只是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的交易點，當年的杭州也完全是個消費中心，主要交易品種來自農村的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²。這兩種主要歷史原因的並存，不僅導致了中國城市化的長期緩慢，而且給中國城市化研究帶來了持久的影響。

首先，中國大城市的多元性和非經濟專一性引起了西方各個學科專家的研究興趣，從一開始就給中國城市化研究這一專業領域帶來了很強的多學科、跨學科的色彩。初期西方學者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具體的中國城市，而不是把中國城市化作為一個整體過程來分析。這個分析傳統一直保持到近幾年發表的西方文獻中（見第四節）。另外，由於中國城市發展的過程與小城鎮密切相關，對小城鎮的專門研究已成為西方文獻中的另一持久重點。中國城市的歷史特點尤其給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及地理學家帶來了研究素材和基地，費孝通先生早期的小城鎮研究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範例。由於研究方法和數據分析處理不同，西方社會學家對中國城市化研究起步較晚，但近些年來發展較快，今後會在各學科研究中佔有影響力的一席之地。

本文首先提出中國城市發展歷史的特點以及對西方關於中國城市化研究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各個不同學科注重一些大城市的個案分析和小城鎮發展與農村關係等問題上。第三節摘要性地介

² 王春光、孫暉著，《中國城市化之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紹西方關於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不同理論，為瞭解評估西方關於中國城市化的研究文獻打下一個理論基礎。第四節系統地介紹評價西方關於中國城市化的理論和實證文獻。在最後一節中，我根據對西方文獻的平衡綜合與評估，提出幾個今後中國城市化研究應注重和關鍵的課題。

三 西方城市化理論的演進和意義

西方城市化理論是否對中國改革開放後城市化的過程有分析意義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西方城市化理論自身的演變過程。系統的西方城市化理論可以說是起源於美國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在20和30年代，R. Park、E. Burgess和R. McKenzie等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城市社會結構互動和發展的重要理論概念，如競爭(competition)、衝突(conflict)、適應(accommod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這幾個概念間的關係，可以概括為：社區和社區內的自然狀態是競爭的結果，社會控制和個別成員對社區的相互服從起源於衝突，但在遷就妥協的過程中變成有組織的形態，並在同化中得到鞏固和定位(參見Park和Burgess 1921)，競爭的概念反映了芝加哥學派汲取和借用了生態學形成的理論核心和精華。使這些社會學家把人類組織兼有的經濟和生態形態置於當時社會學的研究核心。Burgess提出的城市空間演變的「同心圓」(concentric zone)模式就是建立在土地使用競爭機制的基礎上的。McKenzie(1927)也根據競爭的原理，提出了城市系統由於不同城市的規模和功能差異出現垂直分層、相互依賴，和相互支配的特點。總體來說，芝加哥學派認為城市發展變化受(1)人口增長出現的競爭和繼承的影響；(2)自然資源分布和空間位置優劣的影響；及(3)市場調節平衡機制的影響。

以城市生態學為根基的芝加哥學派雖然出現在城市化和工業化已高度發達的美國，其主要理論成分卻被納入在 50—60 年代具有強大影響力的現代化理論，開始指引第三世界國家城市化研究。生態/現代化理論首先認為某國家目前城市化和城市發展受制於其在現代化初期的起步階段。傳統社會的農業經濟基礎有持久力，會不斷制約工業現代化促發的城市化過程。生態/現代化理論還把技術發展和文化擴散看成促使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兩個主要動力（Kasarda 和 Crenshaw 1991）。從根本上來說，生態/現代化理論認為儘管發展中國家有不同的城市歷史和傳統結構，現代化帶來的工業進步、技術發明和物質文化的擴散最終將導致發展中國家城市化趨同於發達國家。

進入 70 年代後，美國一些城市社會學家開始用國際政治經濟學和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s Theory）來重新分析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問題。這一新的理論首先把焦點移到如何解釋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積累、階級矛盾、分配不均對城市化的影響。城市政治經濟學同時關注的是國家和各級政府的各種政策（如產業布局、稅收）對城市化的影響。從世界體系論的觀點看城市化的格局是由不同國家不同城市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位置決定的，因此出現大多數位於發達國家的「核心」（core）城市和處於發展中國家的「邊緣」（peripheral）城市。前者把後者當作自己的資本積累點或傳送帶；後者包括為數不多的一些「超大主導」（primate）城市、過多的控制有限資源，給國內的腹地邊緣地區造成發展困境，從而維持了很大的社會和空間不平等。伴隨這些現象的還有「過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衰落導致的大量人口移入，出現了城市人口超過城市體制結構可以接受的能力（Smith 和 London 1990）。屬於社會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還有一種城市偏重觀點（urban bias）（參見 Lipton 1977），它強調的是第三世界國家

的精英和利益羣體依賴城市資源，通過宏觀和微觀經濟政策，注重發展城市而忽略農村地區。同時，政府和壟斷資本通過人為降低食品和原料價格來補貼城市。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隨着經濟進一步全球化，受國際政治經濟學和世界體系理論影響的城市化研究，邁進了以「世界」或「全球」城市為重點的新階段。John Friedmann (1986) 提出了有關世界城市是全球經濟的控制中心的種種假設，並選用了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主要城市作了描述性的說明。Saskia Sassen (1991)的專著全面系統地闡明了全球城市理論，並通過對紐約、倫敦、東京三個城市的比較個案研究，論證了其理論。Sassen 把全球城市定義為：(1) 世界經濟結構的居高控制點；(2) 金融、信息和其他專業服務機構的集中點；(3) 佔主導地位的高級第三產業的創新發明地；(4) 高級第三產業的主要市場。全球城市形成的原因包括大型跨國公司和銀行的集中控制功能的加強、製造業的衰退並反映在空間上的擴散和多點化、電訊和信息領域裏的技術發明和所謂製造業者服務業 (producer services, 包括金融、法律、會計、諮詢、建築設計) 的快速發展。全球城市理論對西方城市化研究另一個重要貢獻是闡明了全球城市本身的兩面性，一方面是金融資本高度集中、中心商業區的復甦和繁榮、製造者服務業的高薪階層；另一方面卻出現了市政財政困難、貧困失業增加、職業工資的兩極分化、城市部分空間的衰落，和貧富居住更加隔離。

以上幾個理論觀點雖然明顯不同，但大都以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一般經驗為依據。T. G. McGee (1991) 的連綿大都市區 (extended metropolitan area) 或城鄉一體都市化 (urban-rural process) 模式則描述和解釋了亞洲國家一些地區出現的特殊城市化過程。連綿大都市區往往帶有這樣幾個特點或伴隨現象：(1)

大量人口利用可行的運輸條件從事小農式的稻米生產；(2) 從農業經濟向非農業經濟的過度和轉型；(3) 人口大量地帶有季節性的流動和遷移；(4) 農業、作坊加工業、工業區、郊區發展和其他活動混合使用土地。這些連綿大都市區的例子包括中國以上海為中心的江蘇南部、台灣的台北—高雄走廊和日本的東京地區等。與西方發達國家的以中央商業區為中心的聚集型大都市區相比，亞洲的連綿大都市區反映了一種截然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和道路。

四 西方對中國城市化的研究

正如同西方城市化理論一樣，西方關於中國城市化的研究已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這個領域從一開始就面臨西方理論是否適用的問題，在西方的中國城市化研究的發展階段中，與西方理論的對話和聯繫也時有時無，有緊有鬆。只有通過對早期的回顧，我們才能充分瞭解評估改革開放以來西方中國城市化研究文獻的現實意義。

為了總結概括的方便，我把 1978 年發前發表的文獻粗略地歸為早期研究，從中找出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為更詳細地評估改革後的文獻提供一個參照系統。

1. 早期西方對中國城市化的研究

早期文獻有幾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偏重採用歷史的觀點和方法觀察分析中國城市的歷史狀況和演變。二是比較注重影響中國城鄉經濟結構的地理或空間因素。三是傾向於對單個中國城市進行具體研究。四是突出建國後和改革前政策對城市發展和城市化的影響。另外，從事研究的學者雖然學科背景不同，但絕大多數都是資歷較深的「中國研究」專家。這些特點的形成與當年的研

究環境和學者背景有密切關係。中國社會的封閉限制了實地調查的機會，迫使大部分研究偏重歷史過程，系統數據的缺乏也迫使學者依賴有限的歷史資料，研究局限於為數不多的幾個主要城市。從事研究的學者大多受傳統「中國研究」領域注重歷史的影響，缺乏對所在學科的全面瞭解，往往是就中國城市而研究中國城市，忽略了西方一般城市化理論對中國的潛在適用性。

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以上一般的特點，又有其特殊地位的是美國著名中國人類學家 G. W. Skinner 關於中國鄉鎮集市的研究。首先，Skinner (1964) 把地理學的中心地理論 (Central Place Theory) (Christaller 1972) 巧妙地應用於傳統中國社會上。該理論認為，任何一個中心地 (城市或鄉鎮) 可以按其在幾個相互連鎖的空間系統中的位置來分類劃分，因為每個中心地都有層次性的經濟功能。Skinner 發現在清朝結束後的中國鄉村，中心地的分布和功能是由其在有規律性的多層集市結構中的地位決定的。他用畫圖的方式顯示了不同地區 (特別是在四川) 不同類別的但功能性很強的集市空間結構。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Skinner 更重要的貢獻是發現了集市空間結構的社會結合功能，並把其稱為標準集市社區。農民成年累月地按時到標準集市趕集，從中建立鞏固了包括婚姻、信貸、接生、僱工等一整套社會關係網，帶有一定的庇護與被庇護 (patron-client) 的色彩。Gilbert Rozman (1974) 則認為和日本相比，中國清朝以眾多小城鎮為寬底的城市結構不適應現代化。Skinner 的研究擴展了人類學家研究中國社會只限於農民在農村的狹隘觀點，為重新研究改革開放後城市化中出現的城鄉關係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除了 Skinner 借助中心地理論進行的具有較強社會學意義的系統研究，改革前發表的西方文獻的幾個一般特點基本上反映在 70 年代問世的三部編著中。它們是 John Lewis (1971) 編的《共

產中國的城市》(*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Mark Elvin 和 Skinner (1974) 編的《兩個世界之間的中國城市》(*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和 Skinner (1977) 編的《中國王朝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儘管發表時間的順序顛倒了，這個可以稱為三部曲的系列比較完整地有代表性地描述反映了從鴉片戰爭開始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一百多年中國城市的特點和變化。三部書中大部分章節是美國中國歷史學家撰寫的，但也包括一些地理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的文章。由於本文篇幅有限，無法能對三部書中的文章作具體介紹和評估，下面只是簡單涉及其中一兩個有代表性的觀點。

美國著名的中國地理學家 Rhodas Murphey (1974) 關於「通商口岸」(treaty ports) 和中國現代化關係的論述特別值得一提。Murphey 首先肯定了鴉片戰爭後因不平等條約被迫開放的港口城市帶來了西方商業文明、製造技術和國際貿易的影響。具體來說，「通商口岸」系統促使中國絕對和相對貿易量的淨增，特別是推動了包括像茶葉、絲綢等傳統工業品的出口。「通商口岸」的出現和功能迫使中國城市等級系統經歷了重組，逐步形成了類似歐洲和美國以少數幾個大都市和港口中心為控制的局面。上海和香港成了中國外貿的壟斷港口，位於城市系統的頂端。天津、漢口和廣州在中國北部、中部和南部起着同樣的作用，佔了城市系統的第二等級；而長沙、重慶和福州則起到地區服務中心的作用，處於城市等級體系的第三層。但 Murphey 的最終結論是這些「通商口岸」只代表一種新的類似西方模式的都市現象，其空間上的相對隔絕嚴重限制了對改變中國內地的廣大農業經濟和與農業連綿的傳統城市的功能的影響。關於中國王朝末期城市的專著還有 Linda Johnson (1993) 著的《中國王朝晚期的江南城市》(*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兩個世界之間的中國城市》(Elvin 和 Skinner 1974) 中的其他文章基本上是關於共和時期中國主要城市(如上海、廣州、天津、重慶)經濟、商業、行政、教育方面的個案研究。這些文章使用了較充分的地方史料，對我們今天瞭解這些在改革後城市化中起重要作用的中心城市的早期狀況仍有一定的價值。但由於這些研究只涉及某一個具體年代，不可避免地帶有時間的局限性。

《共產中國的城市》(Lewis 1971) 中的文章多數不僅限於個別城市，而就法律和秩序、領導和官僚機構、城市現代化及城市危機等題目進行一般性的描述和分析，其中包括兩位資深的社會學家的文章。傅高儀(Vogel 1971) 分析了建國後二十年中政府為了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逐步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公安制度和條文。Janet Salaff (1971) 分析了文革開始後政府通過加強街道革命委員會的基層政治控制和城市行政管理下放分權來維持政體。這些注意政治改革作用的早期研究為改革後研究城市行政管理機制的削弱提供了鮮明的對照依據。遺憾的是這些文章的作者雖然受過系統的中國研究的訓練，在當時卻無法涉足他們研究的中國城市，使他們的分析和結論缺少詳細的數據支持。這一障礙只是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城市研究中才被逐步克服。

2. 改革後西方中國城市化研究

1978 年以後發表的文獻在數量上和種類上都大大超過了上面介紹的早期文獻，給逐文逐書的介紹評估帶來了不可逾越的困難。我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對大量的文獻按研究方法、主題、作者學科作分類介紹，從中概括總結出有代表性的觀點和文獻，使讀者能夠比較清楚方便地把握文獻的精華。在這一過程中，我在強調不同學科的相互交融和促進時，盡量突出社會學家或社會學觀點鮮明的代表作，但對整體文獻難免會有忽略遺漏。

代表文獻第一類對中國城市問題研究影響最大的應屬白威廉和懷默霆 (Whyte 和 Parish 1984) 的《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一書。雖然在 1984 年發表，但白威廉和懷默霆的專著帶有承前啟後的特殊作用，主要是因為該書使用的基本數據雖然只到 70 年代中期，但研究立論、目的、方法和結論上都對改革後的中國城市研究有持久的意義。白威廉和懷默霆從西方古典社會學理論 (包括芝加哥學派的 L. Wirth) 關於現代城市正反兩面的論述出發，提出了中央集權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城市有哪些特點和社會影響的研究問題。白威廉和懷默霆在 1977 年和 1978 年對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的 133 人 (其中 94 人來自廣東省) 進行了半結構性的深度訪談，讓被調查對象對在大陸所在城市社會和街道生活作全面回顧，然後把個人層面上的數據進行重組和不同層次的統計分析。他們的分析結果證明了「中國模式」城市化的一些特殊性，如嚴格控制人口流動、城市生產功能突出、消費功能受壓制、相對比較平衡的分配系統、統一嚴格並滲透社會最基層的居住組織等。這些結構特點帶來了明顯的社會和空間後果：(1) 基本消費和社會服務有所保障，但某些商品有所缺乏；(2) 中國城市的社會和街道既穩定又相當多樣化；(3) 街道鄰里關係比較密切和諧，社會網絡比較窄小。白威廉和懷默霆最後預斷這些「中國模式」的特點將隨着市場改革逐步演變或削弱。

白威廉和懷默霆關心的中國城市問題成了近年來美國社會學家不斷研究的對象。隨着中國的開放和其帶來的研究環境的改善，美國幾位社會學家通過和中國同行的合作，在幾個主要城市特別是天津和上海進行了若干次抽樣調查，並在社會學權威雜誌和城市研究專業雜誌上發表了分析結果 (Lin 和 Xie 1988；Lin 和 Bian 1991；Logan 和 Bian 1993；Bian 和 Logan 1996；Logan 等

1998)。這些文章的研究題目和使用數據、方法不同，本文篇幅限制，不可能作詳細介紹。但文章的結果和結論有一些基本的共同點：改革政策和市場機制在城市就業機會、工資福利、住房分配領域裏帶來不同程度的不平等，和白威廉與懷默霆的發現形式構成鮮明對比。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文章的作者認為造成這些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是與以往的政治權力結構和傳統分配制度的持續作用，比如黨員身份繼續是獲得高收入的資本，大企業的員工更容易得到條件好的住房。這些文章帶有預測性的結論是，儘管市場機制影響城市資源的分配作用越來越強，但以政治權力和行政手段為基礎的再分配制度仍將通過演變繼續存在下去，這將使中國社會向市場轉型的混合結構變得更加複雜。分析這些問題的還有戴慧思（Davis 等 1995）編著的一些文章。

以上介紹的社會學文獻比較緊密地聯繫了西方理論，在微觀（個人）層面上分析了中國城市內的狀況和特點、假設鮮明，數據翔實，分析手法先進，可以說是代表了美國社會學主流的風格。但這些文獻的分析焦點和實際發現又充分反映了「中國模式」城市化在改革前的特殊性和這一特殊性在市場轉型中只是消弱但沒有消失的過程。如果為種研究方式能夠在更多的中國城市研究中加以應用，增加抽樣調查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其理論意義會更加廣泛深刻。

文獻中可分出的第二大類是以地理學家為主的對中國城市化宏觀政策的研究，主要目的是對比探討改革前後不同的城市化模式、過程和影響。這一類研究直接或間接地涉及改革前後城市化政策之別是否反映了一種歷史遺留下來的「反城市」（anti-urban）傾向。這方面的研究中廣為接受的觀點是，改革前的城市政策之所以注重控制人口增長，突出生產功能，是因為：（1）中國歷史上就有贊頌農村美德和不滿城市邪惡的兩極觀點；（2）憎恨鴉片

戰爭「通商口岸」給中國帶來的恥辱；(3)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個人的農民出生背景（參見 Muphey 1980，第二章）。Susan Mann (1984) 把這種觀點稱為中國城市化的「本土觀」(nativist paradigm)，以區別於城市幫助農村的「再造觀」(reconstructionist paradigm) 和強調城市化發展重要性的「實證觀」(positivist paradigm)。Richard Kirkby (1985) 第一章從幾個方面反駁了中國不存在真正的反城市情緒，指出中國反城市論是受了西方把農村理想化的影響。這位英國地理學家通過比較改革前和改革初期城市化政策及城市人口變化等問題，在該書的結論中指出今後中國城市化很可能要兼顧發展和農村緊密相連的小城鎮和起重要工業作用的大城市。從一個與這個爭論相關的角度出發，戴慕珍 (Oi 1993) 認為改革後城鄉差距的繼續存在反映了政府一貫的偏城市政策，維持城市補貼和較低的糧食收購價格不同於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是一組城市精英在為個人利益來偏重城市（和 Lipton 1977 論述的現象不同），而是政府通過維持城市人口（特別是工人）的生活水平來保障政權的合法性。關於近來發表的造成和改變「中國模式」的城市化政策的文獻，請參見 Chan (1994)、Chen (1988, 1991)、Chen 和 Parish (1996)、Goldstein (1988)、Kojima (1995)、Kwok 等 (1990)、Parish (1987) 中的若干章。

第三大類的文獻基本上是人口學家和地理學家關於中國城市人口規模和城市體系的研究。這類文獻的第一大特點和貢獻就是比較清楚和系統地解決了中國城市和城市人口的定義問題。較早開始解開中國城市人口定義這個「謎」的是美國學者 Leo Orleans (見 Orleans 1982；Orleans 和 Burnham 1984)。由於當時數據有限，分析方法比較簡單，得出的結論不甚理想。在這方面做了最系統和最有權威研究的是美國華裔地理學家 Kam Wing Chan。在

使用 1949 年到 1982 年數據定義的基礎上 (Chan 1994, 第二章; Chan 和 Xu 1985) 基本上理順了由以戶籍制為基準的農業與非農業人口之分和按城市或農村居民區分的雙重制度造成的混亂, 為重新比較分析改革前後不同時期的城市化過程提供了連貫一致的概念。涉及中國城市定義的文章還包括 Chen (1988, 1991)、Chen 和 Parish (1996)、Goldstein (1988)。中國城市研究中「都市」的定義與西方城市研究中都市的定義有明顯區別, 在本文中不易贅述³。通過中美都市定義的比較, 可以清楚看

³ 中國都市的概念分市和鎮的不同定義。1982 年時人口超過十萬是市的基本標準, 人口十萬以下的地方必須具有特殊的行政、戰略和經濟重要性才能設市。建鎮的基本標準是人口三千以上, 其中 70% 以上是非農業人口; 或者是人口在二千五百與三千之間, 但非農業人口要超過 85%。1984 年 11 月, 中國國務院放寬了建鎮標準, 由各地試行: (1) 凡縣級地方國家機關所在地, 均應設置鎮的建制; (2) 總人口在二萬以下的鄉、鄉政府駐地非農業人口超過二千的, 可以建鎮; 總人口在二萬以上的, 也可以建鎮; (3) 少數民族地區, 人口稀少的邊遠地區、山區和小型工礦區、小港口、風景旅遊區、邊境口岸等地, 非農業人口雖不足二千, 如確有必要, 也可設置鎮的建制。1986 年, 國務院又批示允許五十萬人口以下的縣, 非農業人口十萬以下的縣級鎮, 如全年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三億人民幣, 可申請設市。1990 年人口普查時, 都市的定義以居民委員會為基礎, 變得比較狹窄但更明確了。都市總人口包括 (1) 省和地級市中所有城市區的人口; (2) 縣級市中由居民委員會組成的街道居民人口; (3) 建制鎮 (位於省、地級市中的鎮除外) 中所有的街道委員會人口。相比之下, 美國都市定義則十分明瞭, 並有很強的歷史沿續性。美國 1990 年人口普查時都市包括所有在都市化區 (urbanized areas) 內或者是都市化區外人口超過二千五百的都市地 (urban places) 內的土地、人口和住房。具體來分, 都市地包括 (1) 人口二千五百以上的實體化的市、村, 或行政區; (2) 人口普查指定的二千五百人以上的地點; (3) 其他在都市化區內實體或未實體化的地段。都市化區可包括最少有五萬人口的一個或多個包括鄰近居住密集的地帶的「中心城市」。

到中國都市定義標準混雜多樣，缺乏連貫性；其中有人口數量標準，又有政治行政標準，特別是後者給設市設鎮過程帶來了不合理的人為因素。1990年前後的標準導致了大量的「撤縣設市」，帶來了都市概念淡化，城市邊界畫得過寬的後果。同時也為中國城市研究準確地區分城鄉，分類城市等級帶來了困難。1990年以後的城市人口定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個問題，但越來越多的農村流動人口長期住在城市已無形中增加了實際的城市人口。因此，關於中國都市和城市人口準確合理的定義還值得繼續研究。

這類文獻另一個特點是用改革以來的城市人口數據，對中國城市結構進行的排名—規模定律 (rank-size rule) 分析。該定律被用來區分不同城市系統在層次上的城市規模分布。許多發達國家最大城市之間規模呈現均衡依次落差 (即第二大城市人口為最大城市的 $1/2$ ，第三大城市為 $1/3$ ，以此類推)，不少發展中國家則出現最大城市超大 (urban primacy) 和其伴隨的資源壟斷現象 (見 C. Smith 1985)，美國中國地理學家 Clifton Pannell (1984) 發現中國在歷史上就沒有最大城市人口超大的現象。Goldstein (1988) 則認為由於中國面積大、城市分布不均、區域差別明顯，應在區域層次上進行排名—規模分析。他使用 1982 年的數據發現中國六大區和不同省區的最大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間的落差有很大不同。筆者 (Chen 1991) 認為除了用人口數據對中國城市做「排名—規模」分析外，還應考慮使用其他的經濟和基礎設施指標做更全面的測定。由於排名—規模只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定律和導致不同城市系統排名—規模的原因複雜多樣，這個問題的分析只有在和其他問題聯繫起來才更有理論意義。

第四類文獻的分析焦點是中國改革以來城市化過程的一個越來越突出的方面——各種形式的人口遷移。這類文獻的著者包括

社會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及政治學家，帶有各自的學科特點和交叉關係的互補性。Zai Liang 和 Michael White (1997) 從市場轉型理論 (見 Nee 1989a, 1996) 出發，使用 1988 年千分之二生育率和生育控制的抽樣調查和雙層 (個人和省級) 分析方法，分析了經濟改革和鄉鎮企業在 1983—1988 年期間對省際人口流動的影響。Liang 和 White 的特殊發現是在鄉鎮企業比較發達的省，人口外流傾向更大，但教育水平較高的農民卻更傾向於留在鄉鎮企業較發達的省。作者因此認為，中國用在小城鎮和農村發展鄉鎮企業來減少人口外流和防止過度城市化的政策效果有限，因為當地經濟發展會帶來不穩定因素，比如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從而增加剩餘勞動力，造成人口外遷壓力。Xiushi Yang (1994) 用浙江省抽樣調查數據做了省內城市之間和城鄉之間暫時人口流動的比較研究；兩個特別有趣的發現是：(1) 從城市暫流到農村的務工人口多為白領，而且教育水準偏高；(2) 小城鎮暫流到農村的人口多於大城市。Yang 認為這種暫流人口給農村帶來了一定的人力資源，政府應繼續通過發展小城鎮來促進農村的現代化。

Kam Wing Chan (1996)、Dorothy Solinger (1995) 和 Linda Wong (1994) 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暫時流動人口現象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層面及其對政策的挑戰。Chan (1996) 認為，儘管農村暫流人口為城市興旺做出了貢獻，政府卻沒有把他們和城市居民平等待遇，這樣很可能促進城市社會的兩極分化。Solinger (1995) 認為，農村流進城市的大量人口給城市福利制度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可能會逐步導致該制度的解體。Wong (1994) 認為，政府把流進城市的農村人口視為對社會穩定的威脅，是不明智的，應採取系統協調的政策來對待這一改革中出現的必然現象。另外，Harry Wu (1994) 的統計研究發現，從改革開始到 1990

年，城市總人口增長中遷移的成分增加到每年 78%，在 20 個特大城市中達到 65%。Goldstein (1990) 認為，由於交通和通訊設施的改善，城市和周圍的農村的聯繫更加緊密，農村人口已在不同程度上帶有了城市特點，暫時的人口流動也會逐步強化這些特點。關於暫時流動人口的研究雖然日益提高，但由於調查題目和過程難度較大，已做的抽樣調查偏於地方化、局部化，目前還沒有很多比較系統和全面的分析結果來促進理論發展。Wenbao Qian (1996) 對安徽、甘肅和浙江省五村一鎮的比較抽樣調查，則具有一定的區域代表性，並結合了西方遷移理論。該研究發現中國 90 年代初人口遷移的特點包括：(1) 很強的季節性，短距離、農村之間的移動（而不是農村向城市的移動）；(2) 土地耕種對農民移出起很強的牽制作用；(3) 導致促發農村人口流動就業的關係機制不僅包括直系和間接的親戚和朋友，還包括越來越重要的包工頭和當地政府的勞務輸出公司。中國農村城市人口遷移的區域差異和複雜層面，無疑將是中國城市化研究的一個持續重點。

第五類文獻包括相當數量的從區域和個別城市的角度對中國城市化的研究，作者多數為地理學家。區域層面上的研究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和發展上，而關於單個城市的研究則多以上海作為個案。在此圍繞着這兩個角度對這類文獻做一簡單介紹。

對廣東省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熱點研究和該地區開放最早、發展最快有必然的關係。但更重要的是，這一地區的城市化過程特別清楚地反映了「中國模式」城市化在改革開放和與國際經濟接軌的過程中的演變。Graham Johnson (1992) 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發現位於珠江三角洲新興的中小城市（如東莞、順德）周圍鄉鎮的企業是當地工業化的骨幹力量，主要是吸引了當地早期移民香港、澳門的華人重返故鄉，投資建廠；這些投資的弱點

偏向移民海外的華裔生長的村子所依付的小集鎮。Johnson 認為，這樣的經濟空間發展帶來了一種城鄉界線模糊的特殊的「農村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再現了 Skinner 發現的以集鎮為基礎的早期農村經濟社會結構。根據對廣東小城鎮的重點研究，Laurence Ma 和 Chusheng Lin (1993) 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小城鎮自身的快速發展代表了一種「自下而上」的基層城市化，可以產生與以大中城市為基礎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模式相輔相成的作用。涉及這個地區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文獻還包括 Chen (1994, 1998)、Fan (1996)、Henderson (1991)、Ikels (1996)、Siu (1990)、Xu 和 Li (1990)、Vogel (1989)。和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沒有直接關係但就中國區域發展為研究重點的文獻有 Goodman (1989)、Linge (1998)、Zhou (1993)。

對單個城市的個案研究在 80 年代比較注重深圳特區的城市和經濟發展（見 Chen 1987；Osborne 1986；Sklair 1985）。但在 90 年代中卻越來越集中在上海 / 浦東的發展變化上，近兩三年出現了幾部比較系統全面的著作。Tian (1996) 對改革開放後上海的外貿、運輸、外資和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等各方面做了綜述和分析，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上海有規模和聚集經濟的優勢，又有教育和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的人力資源，應着重發展技術和知識密集產業，成為長江三角州和全國經濟中心城市。Shahid Yusuf 和 Weiping Wu (1997) 給中國個案城市研究帶來了一個突破。這兩位學者主要借助於地理經濟學理論，強調規模經濟和凝聚力量。地理位置的鄰近效用、工業組織的效率和城市生命週期是影響大城市發展的交叉因素。在這個鮮明嚴謹的理論框架指導下，Yusuf 和 Wu 把上海、廣州、天津做了均衡的比較分析；他們的結論是上海雖然有工業傳統、較為紮實的製造業基礎、豐富的人

力資源和戰略位置的比較優勢，但同時應抓緊解決基礎設施的壓力、製造業的某些薄弱點和有效的公正地處理年齡老化的就業隊伍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關於上海的文獻還包括不少編著和文章，如 Foster 等 (1998)、Hook (1998)、Jacob 和 Hong (1994)、Li (1996)、Luo (1996)、Murphey (1988)、Yeung 和 Sung (1996)。

以上五類西方文獻雖各有鮮明的學科背景和分析特點，但之間也有不同程度的內在聯繫。第一類以抽樣調查和定量分析為基礎的社會學文獻和第五類跨學科的個案城市研究有一些不太明顯的關係。由於這些抽樣調查往往是在受重點個案研究的大城市中進行的，第五類文獻實際上為第一類文獻提供了宏觀環境；反過來，第一類文獻則給第五類文獻增加了豐富系統的微觀實證。這兩類文獻的呼應可以更清楚地表明抽樣調查、定量分析和個案研究的代表性和歸納性都有一定的局限。第二、三、四類文獻之間有較強的關係，甚至有一定的重疊。第二類文獻涉及城市化政策對城市的定義、城市人口規模和城市結構的影響。第三類文獻雖側重歸納分析人口數據，但基本上是宏觀層次的分析，和 second 類文獻密切相聯。關於人口遷移的第四類文獻使用人口普查數據和第三類文獻相似，同時也使用第一類文獻的手法對人口遷移做有選擇的實地抽樣調查。

隨着各學科之間更多的滲透和不同學科背景學者間更多的交流，這五類文獻之間的關係和呼應會不斷加強。比如第一類和第四類文獻的結合可以反映在用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的不同理論，對遷移人口適應遷入地社會環境的過程進行研究。把具體城市作為遷出和遷入地的遷移研究可以從第五類的個案分析文獻中獲得宏觀環境的素材。

五 對西方文獻的總評估和今後中國城市化研究的新挑戰

通過本文上面兩節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對中國改革後城市化研究的文獻比改革前和更早期的文獻豐富得多，數量之大、涉及學科之廣、發表渠道之寬，本文只能作一分類介紹和有選擇地簡單評估，一定有遺漏之處，請讀者見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雖用西方文獻這種說法，但相當一部分研究成果屬於在美的華裔學者，特別是近十年來中國在美國大學任教的中、青年社會科學家；另外，還有一些現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的社會科學家也積極地進行獨立或與西方（美國為主）學者進行合作研究，成果發表在英文雜誌上或英文的編著中。本文雖然沒有空間詳細介紹這類文獻，但要提示讀者，Guldin 和 Southhall (1993) 與 Kwok 等 (1990) 的兩部編著代表反映了美國、歐州、香港和中國大陸不同學科的城市問題專家密切合作的優良成果。

本文介紹的西方文獻有一個比較普遍的特點，就是沒能系統地借用西方城市化理論來分析、歸納和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的實際經驗。有所例外的卻是 Skinner (1964) 的早期研究和白威廉與懷默霆關於改革之前的中國城市全貌的一書 (Whyte 和 Parish 1984)。有明確的理論指導是這些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廣泛引用的重要原因。社會學家 (Lin 和 Bian 1991; Bian 和 Logan 1996) 在使用複雜的統計方法分析大規模抽樣調查數據時，注重理論指導和假設檢驗，代表了當今正確的理論性實證研究。

回顧本文第二節介紹的西方古典和新興城市理論，我們不難看到它們對中國改革以來城市化特點和過程進行研究的某些適用性和指導性。改革以來，隨着不同層次的權力下放和市場調節機制的增強，中國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中的社區自主意識逐步強化，活動空間擴大，新建住房、舊房改造則使一些老社區和街道經歷

了空間上的重組和社會經濟上的異化。這些現象可用早年芝加哥學派的社會研究的一些理論假設和操作方法進行分析，比如對居住分布和社會經濟分層的空間描述和因果關係的分析。在這方面，我們應更加重視對中國城市中土地使用和開發的研究（見 Yeh 和 Wu 1996）。在宏觀理論上，我們可用全球城市模型（Sassen 1991）的假設和指標對像上海這樣的新興「全球城市」進行深入的個案研究，從中發現上海和像紐約、倫敦這樣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全球城市有哪些相同之處，又有哪些不同特點，然後再探索導致這些特點的歷史和制度上的特殊原因和先決條件。

既然西方古典和新興理論對中國城市化研究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我們如何「西學中用」，更有效更深入地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和今後城市化過程和趨勢呢？我利用本文收尾之際，提出幾個中國城市化研究面臨的理論、方法和實證上都很重要，但現有文獻還不夠理想的課題。我認為這幾點雖然構成對從事城市問題研究的西方和海外華裔社會學家及其他社會科學家的新挑戰，但卻是在中國的社會學家應接受並有條件和優勢所戰勝的挑戰。

(1) 根據中國城市化近十幾年出現的鄉鎮企業和小城鎮並行發展和大城市重新興起的特點，如何重新分析、確定和解釋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的因果關係和互促機制？西方現代化和工業化理論一直強調工業化導致促進城市化。但反過來，我們應該看到，在不同國家的不同地區處在不同發展階段時，城市系統不只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產物，而且很可能成為這些過程的先決條件和影響因素。在研究這個宏觀課題時，我們應重新認識和瞭解 Skinner 的宏觀區域模式（macroregional model），同時應重視 McGee 提出的連綿大都市區的概念。

(2) 市場改革和對外開放的並行經驗告訴我們應更加重視國家的城市化政策的調整和地方經濟進入世界經濟體系對城市化的

互動影響。中國城市在越來越自立發展的同時，已更直接地面對世界經濟提供的機會和障礙。要想發展和興旺，城市本身必須通過提高人力資源和增加基礎設施來吸引外資和發展出口。我們可使用城市競爭力 (city competitiveness) 的概念來推動這個課題的研究。同時，我們應意識到政府為了促進與世界經濟的正常接軌，不得已調整了一些城市政策，如允許在城市中出現商品和勞務市場（見 Song 和 Timberlake 1996）。

(3) 西方關於改革後中國城市化的文獻明顯偏重宏觀分析，我們面臨如何從宏觀靠向微觀和把宏觀、微觀分析相結合的挑戰。80 年代以來，美國社會學家和中國同行在幾個主要城市進行了大規模的抽樣調查和之後發表的研究成果，已為瞭解街道、單位變化、個人羣體關係和生活質量等微觀社會現象帶來了突破。通過人口普查和其他渠道得來的城市、社區一級的數據也在逐步增加和健全，為和抽樣調查數據綜合起來進行多層次統計分析帶來了新的機會。

(4)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現有西方文獻中明顯缺乏對中國城市問題或城市「弊病」的研究。這類研究課題包括城市犯罪、環境污染、生活壓力等。在這些方面僅有的幾部專著偏重 1949 年前的個別中國大城市如上海（見 Wakeman 1996）或者比較空泛（見 Smil 1984）。西方城市社會學對城市問題研究有着優良的傳統和豐富的理論實踐經驗，在今後謹慎貼切地「西學中用」，一定有助於開創新的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問題研究。

(5) 目前文獻欠缺的，今後應特別加強的一個研究重點就是把中國城市化的特點和過程和其他國家的經歷做全面系統的比較分析。首先，改革近二十年的歷程在很多方面削弱了毛澤東時代形成的「中國模式」城市化的特點，產生了類似其他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和城鄉關係的一些現象（如大量暫住人口流動遷移），使

中國城市化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可比性越來越強。只有通過有理論指導的系統比較研究，我們才能真正清楚認識中國城市的變化程度和沿續特點及其階段性和發展趨勢。本文前面提到的 McGee 關於亞洲城市化的理論觀點（參看 McGee 1991）對開展比較研究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6) 瀏覽西方文獻使我們不難發現現有研究過於偏重中國沿海區域和城市的發展變化，而忽視了對中國內地和邊遠地區的城市的研究。Gaubatz (1996) 一書則是一個很好的例外，通過用歷史學、地理學和人類學的觀點對昆明、西寧、蘭州、烏魯木齊和呼和浩特五個邊遠或邊疆城市的實地比較研究，Gaubatz 發現這些城市雖深受中國漢族城市文明和結構的影響，卻保留了不同少數民族的地方文化、建築布局特點。文化大革命以後，這些邊遠城市中的少數民族文化、宗教和建築風格的復甦，超過了當地的漢族。Gaubatz 的研究應推動我們進一步比較分析中國東部核心城市與西部邊遠城市歷史和現狀的沿續關係。Hsu (1996) 通過對河南省洛陽市和貴州省貴陽市的比較分析，發現過去偏重重工業、輕視消費和服務業的政策禁錮了這兩個內地城市，使它們多年形成的傳統結構和功能難以適應改革後的發展機會。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比較研究的問題，為甚麼沿海城市更容易在改革的新環境中轉型？隨着近些年來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差距不斷擴大，不同地區城市功能結構不斷異化，跨區域地對城市進行系統或個案比較研究越發緊迫和重要。

以上列出的幾個研究課題和方向雖然涉及跨越不同學科，但社會學家應充分發揮自己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之長，同時借助於相鄰學科之見解，在把中國城市化研究在 21 世紀推向新的高潮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8 中國家庭研究的發展與近況¹

臧小偉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一 引言

家庭是每一個社會的基本社會單位。但是在人類社會的諸多文化差異中，沒有比家庭和婚姻制度上的差異更大的了。一般認為，中國家庭在其結構和運作方式上都與西方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國家庭制度在西方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在本章，我就西方對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作一文獻回顧，同時也對在這些研究中所採用的數據和方法論作一考察。在這裏，西方學者指在中國以外工作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包括海外的中國學者。

二 家庭結構

社會學家通常將家庭分為四種結構類型：第一類指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因離婚、未婚或喪偶等原因而單獨生活的家庭類型；第二類為核心家庭，包括一對夫婦和他們未婚的孩子；沒有孩子的家庭或父母一方因離異或另一方死亡同其一個已婚或未婚的孩子生活在一起的家庭也屬於第二類家庭；第三類是主幹家庭，家庭成員包括上了年紀的父母（一方或雙方），一個已婚孩子及他或她的配偶，還可能包括孫子或孫女；最後是擴大型家

¹ 原文為英文，方慧容翻譯。

庭。它同前三類家庭的區別是有兩三對已婚夫婦及他們的孩子和孩子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

西方的現代化理論認為在傳統社會，家庭的形式主要為主幹家庭和擴大型家庭。主幹家庭和擴大型家庭對於維持每一個家庭成員的生存和維持傳統的社區生活方式起着關鍵性的作用。主幹家庭和擴大型家庭發揮着生產、就業（如家庭農場）、生殖、再生產、情感支持、教育、福利（照料老人）和宗教（祖先崇拜）等多種功能（Goode 1963；Smelser 1959）。

但是，在工業社會，家庭喪失了以上的許多功能。一些大的公司企業承擔了就業的功能；正式教育系統負責年輕人的教育，養老的責任則由政府承擔，等等。家庭因此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核心化了。美國學者將這種由主幹家庭和聯合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轉變稱之為「家庭革命」（Goode 1963；Smelser 1959）。

在很長一段時間，五世同堂的擴大型家庭被視為是中國家庭制度的主要形式。許多學者試圖瞭解在中國是否也發生了「家庭革命」，以及如果發生了，是甚麼時候發生的（Cohen 1992a；Lang 1946；Levy 1968；Yang 1959）。一些學者將共產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作為中國家庭革命（婚姻實踐自由和家庭變得核心化）的分水嶺（Levy 1968；Yang 1959；還見 Hsu 1943）。

但是另一些學者論證，在傳統中國，只有少數的家庭是擴大型家庭。現有研究表明，從 20 世紀 40 年代開始，中國最常見的家庭類型就是核心家庭和主幹家庭（Cohen 1992；Hsu 1943；Lang 1946；Zang 1993, 1999）。

更明確地說，在傳統中國，高嬰兒死亡率限制了家庭規模的擴大。家庭組織內部的分化也造成擴大型家庭很難發展。當父母死亡或從家長的位置上退下來，男性繼承人便會分家產，每人獲得相等的份額。每一個繼承者再用分得的家產建立自己的小家

庭。這樣，中國家庭規模總是處於一個循環的過程：首先通過分家形成新的小家庭，隨之家庭發展和擴大，然後又分家，重回到小家庭。由於這一循環過程，大多數家庭在任何時候規模都不大。有些家庭包括父母（或父母中活着的一方）、已婚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另一些家庭只限於父母和未成婚的孩子（Baker 1979；Cohen 1976, 1992a；Fei 1962；Hsu 1943；Lang 1946；Sung 1981）。

比如，Olga Lang 指出中國上層社會的精英家庭模式同中國大眾家庭生活的差距。歷史資料如歷代皇朝人口統計證明中國家庭的平均規模是比較小的。另一些學者，如 Francis Hsu 也得出了相類似的結論（Hsu 1943）。

同時，西方學者還注意到富裕家庭比不太富裕的家庭更能將其孩子撫養成人。由於多妻制的原因（一個人男人同時娶兩個或多個妻子），富裕家庭的出生率也往往比不富裕家庭要高。多妻使多孩子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儘管在舊中國，多妻制是被普遍接受的，但是，只有富裕家庭才供養得起。因此，富裕家庭的家庭規模比一般家庭要大。許多富裕家庭成為擴大型家庭。三代，四代甚至五代生活在一起（Baker 1979；Cohen 1992a；Ebrey 1978；Fei 1962；Grafflin 1981；Lang 1946；Johnson 1977；Pasternak 1972；Tsui 1989；Watson 和 Ebrey 1991；Yang 1959）。

許多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的「家庭革命」始於 19 世紀晚期。他們認為，隨着西方對中國的滲透，在沿海城市出現了一些新的階級：新興資產階級、新興工人階級和新的知識分子精英。這部分人在家庭外就業和謀生，他們的家庭規模隨之顯著降低。受從日本和西方進入中國的那些新的文化力量的影響，他們致力於法律和文化改革，倡導和推行建立在戀愛和自由基礎上的新的家庭類型。在這種新的家庭類型裏，男人和女人在婚姻、財產和繼承

權上完全平等 (Chesneaux 1965 ; Chow 1960 ; Lang 1946 ; Levy 1968 ; Ono 1989 ; Yang 1959) 。這些改革使中國城市中的核心家庭有增長的趨勢，同時男性和女性有越來越多的選擇婚姻的自由。從 30 年代以後，核心家庭結構成為中國城市家庭的主要型式 (Tsui 1989 ; Whyte 和 Parish 1984 ; Zang 1993) 。

西方學者指出 1949 年以後，城市化、迅速工業化及國家政策的支持有力地推動了家庭組織的進一步簡化。核心家庭依舊是中國最基本的社會單位，生產、消費、衣食住行和孩子的撫養均在核心家庭中進行 (Parish 和 Whyte 1978 ; Whyte 1992 ; Whyte 和 Parish 1984) 。

但是，主幹家庭並沒有在中國城市消失。年輕夫婦為了方便撫養孩子，會選擇同退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住房短缺也迫使年輕夫婦不得不和有單位房的父母一起生活，或至少生活一段時間。主幹家庭的數量因此不但沒有下降甚至還有短暫的增加 (Riley 1994 ; Tsui 1989 ; Whyte 和 Parish 1984) 。

西方學者似乎一致認為直到 1949 年，中國農村家庭一直遵循傳統的組織方式。1949 年以前，中國農村經濟完全以傳統的技術和組織為基礎。1949 年以後，傳統家庭型式發生了變化 (Parish 和 Whyte 1978 ; Stacey 1983 ; Wolf 1985) 。二十多年的集體化 (1955 — 1980) 是造成鄉村發生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集體化取消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農民成為中國共產黨組織下的生產隊裏的掙工資者。除非沒有房子或蓋不起新房，兄弟成家後一般會很快分家。但是主幹家庭在集體化時期依舊存在。父母因為年紀大了，需要孩子照顧，或出於其他福利考慮，會依舊同一個已婚的兒子生活在一起 (Cohen 1992a ; Lavelly 和 Ren 1992 ; Parish 和 Whyte 1978 ; Potter 和 Potter 1990 ; Whyte 1992) 。

西方學者觀察到，70年代末起，由政府所發動的非集體化促進了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從80年代早期開始，中國農業再次由個體農戶經營。他們從他們以前所工作的生產隊中租得耕種的土地，租期很長，一般為十五年或二十年。非集體化政策可能使家庭組織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變化。雖然大多數家庭依舊是核心和主幹家庭，在鄉村，富裕家庭重新出現且再次組成聯合大家庭（Cohen 1992b；Judd 1992）。一些學者認為由於包括多個已婚兄弟，這種家庭比一般的家庭規模要大，類似於典型的擴大型家庭（Cohen 1992a；Whyte 1992）。另一些學者對後毛時代的改革會增加中國農村擴大型家庭持懷疑態度（Huang 1992；Watson 1987）。

三 戀愛與婚姻

除了家庭結構，戀愛與婚姻是西方學者在其對「家庭革命」的研究中另一個重要的領域。傳統家庭通過包辦婚姻再生產自身。首先，包辦婚姻使得父母能夠有效地控制其子女的婚姻；第二，包辦婚姻是擴大型家庭獲得家庭成功的一個重要策略：通過婚姻，鞏固和加強了舊的家庭聯盟，又形成新的聯盟；父母的老年保障可以確保；資源從一個家庭向另一個家庭的傳遞得到妥善安排（Croll 1984b；Ebrey 1991；Potter 和 Potter 1990；Riley 1994）。

在工業社會，年青人不再依靠父母就業。他們能夠自由地約會朋友、決定婚姻和組成他們自己的家庭。自由選擇婚姻是擴大型家庭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在「婚姻革命」的研究中，學者們一直非常注意擇偶和婚姻的類型。

這一點，在對中國「家庭革命」的研究中，尤其正確。包辦

婚姻可能是中國傳統婚姻制度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一些西方學者認為直到本世紀初，中國的年青人才可能享有浪漫愛情（Lang 1946）。Francis Hsu 甚至認為「西方的浪漫愛情從沒有對中國的年輕人有很大的影響。」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父母的支配性控制是傳統婚姻制度的重要特徵。年青人對自己的婚姻，無論是結婚的時間還是結婚的對象都沒有發言權。許多婚姻是由父母包辦的。甚至直到結婚那天，新郎和新娘還沒有見過面。童婚很普遍。父母常常在孩子還很小的時候，就安排他們結婚，但直到長大才圓房。所有這些給予父母在安排其子女的婚姻時有很大的控制權力（Parish 和 Whyte 1978；Riley 1994；Salaff 1973；Wolf 1980；Wolf 1985）。

20 世紀初，改革家和革命者強烈譴責包辦婚姻所造成的個人痛苦，父母在婚姻制度中的影響逐漸減弱。城市年輕人尤其起來同傳統的婚姻實踐，如儒教中的孝順觀、包辦婚姻、婦女在家庭中的低下地位，做鬥爭。這些鬥爭導致婚姻制度上的重大變化。此外，從 40 年代開始，戀愛和擇偶自由的觀念變得日益重要（Lang 1946；Witke 1973；Zang 1993）。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政治考慮對戀愛和婚姻有很大影響（Croll 1981）。今天的中國婦女在擇偶上更注重愛情，並且比 80 年代以前結婚的婦女享有更多擇偶自由（Riley 1994；Xu 和 Whyte 1990；Zang 1993, 1999）。

有些研究發現在現代中國城市婚姻制度上有兩個顯著的現象：第一，朋友和同事介紹對年輕人能否找到好配偶十分重要。現有研究表明單位領導人盡量滿足年輕人的需求，包括婚姻需求，以換得他們的政治忠誠和服從。公眾很支持這些由朋友和同事介紹的非正式配對活動。有時找對象會成為一個單位的一項重

要任務。這些責任通常落到諸如共青團、工會、婦聯這些官方組織肩上 (Jankowiak 1993 ; Riley 1994 ; Whyte 1990 ; Whyte 和 Parish 1984) 。

第二，自由約會在 90 年代以前很少。最近的一項抽樣調查表明 90% 的中國婦女除了她的丈夫外沒有其他的考慮結婚的人選。少於 30% 的人婚前有過其他男朋友。許多婦女說他們很少或從未在婚前和他們未來的丈夫約會過，即使那些有過約會的婦女，約會也通常是在做出結婚的決定以後，而不是以前 (Riley 1994 ; Xu 和 Whyte 1990) 。

有些學者認為許多中國年輕人不得不在沒有通過自由約會獲得經歷以前就做出對他們的生活至關重要的決定。有時父母能有相當的影響。美國人類學家 William Jankowiak 80 年代在內蒙古自治區的一個城市做調查，他的報告表明中國母親在其孩子選擇配偶的家庭上有決定性的影響 (Jankowiak 1993) 。

其他研究表明在中國城市，母親經常在許多方面干預她們女兒的生活。這些干預包括介紹或挑選朋友。年輕的女孩可能不會希望父母幫忙找丈夫，但是在中國的城市，這經常很困難。約會的種種便利條件如舞會，包場電影和劇院在 90 年代以前還極不充分。她們不得不依靠周圍的人，如父母、同學、朋友和親屬的介紹找朋友 (Riley 1994 ; Whyte 和 Parish 1984 ; Xu 和 Whyte 1990) 。

美國學者還發現中國孩子通常直到結婚都同他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這一方面是文化規範所期望的，另一方面，住房短缺和政府規定又強化了這種居住類型。政府的規定使未結婚的人很難獲得公共住房。當年輕人選擇配偶時，他們和父母住得很近，因此他們的父母有許多機會遇到和評判他們的女朋友或男朋友。年輕的中國人不希望他們的父母包辦他們的婚姻，大多數父母也不

想包辦婚姻。但是他們並不反對父母對婚姻施加一定的影響和干預，有的人甚至好像歡迎這種影響（Riley 1994；Whyte 和 Parish 1984；Xu 和 Whyte 1990）。

西方學者注意到類似的變化也發生在中國農村。集體工作給予年輕的農民前所未有的日常接觸的機會，這增加了他們選擇和甚麼人結婚的自由。最近的非集體化並沒有減少這種自由。由於年輕的中國農民有了越來越多的選擇自由，在中國農村出現了一些新的婚姻安排。父母可以安排婚姻，但是事先要給予子女同父母所安排的配偶約會的機會，婚姻需經孩子同意。也可以年輕人自己先熟悉起來，再請他們的父母安排婚禮（Harrell 1992；Lavelly 和 Ren 1992；Parish 和 Whyte 1978；Stacey 1983；Wolf 1985）。

80 年代以來，基於父母和朋友介紹的擇偶方式的重要性下降了。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的空間布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的住房、舞廳、電影院，在現有的收入下年輕人可經常光顧的快餐廳、離鄉到外面去工作等等這些新出現的現象降低了家庭和單位對城市和農村年輕人的控制。電影、小說、雜誌等形式更使西方愛情、婚姻的理念滲透於中國。可以預見，未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會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選擇配偶（Zang 1999）。

四 家庭關係

家庭關係是「家庭革命」研究中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傳統家庭組織是以父權制為基礎的。在現代社會，家庭關係則是以夫妻關係（Salaff 1973）及相對親密和平等的父母和孩子間的關係為核心和特徵。

傳統中國家庭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尤其表現在權威的分布、就業方式、居住、繼承、對男性子嗣的偏好，和對婦女的壓制方

面。在中華帝國，即使不識字的農夫也知道宰制婦女的儒家中的「三從」：未婚女子要遵從她的父親，已婚女子要遵從他的丈夫，丈夫死後要遵從她成年的兒子（Lang 1946；Stacey 1983；Wolf 1985；還見 Mann 1987）。

西方學者注意到在 1949 年以前有些貧困家庭虐待女嬰。窮人會在其女兒三四歲時將她們賣掉為僕，或在十二或十四歲時將她們賣掉做妓女（Buck 1930；Johnson 1993；Wolf 1980；Wolf 1985）。婚姻也不會提高婦女在家中的地位。如果一個妻子不能取悅她的丈夫或婆婆，她會被送回娘家。她也會由於經濟壓力被轉讓，借給甚至乾脆賣給一個更富裕的人。一個女人在生了一個或多個的兒子後，她在婆家的地位可能會提高（Wolf 1985；同樣見 Andors 1983；Cohen 1992a；Johnson 1983；Mann 1987；Stacey 1983；Wolf 和 Witke 1975）。

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將對婦女的壓制歸之於儒家的夫權意識形態和婦女對男子的經濟依附（Andors 1983；Johnson 1983；Stacey 1983；Wolf 1985）。隨着 1949 年的共產主義革命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和社會變遷，婦女的屈從地位才開始改觀。但是虐待婦女和性歧視依舊存在（Conroy 1987；Entwisle 等 1994；Gilmartin 1990；Honig 和 Hershatter 1988；Jankowiak 1993）。一些學者認為由於中國共產黨將婦女解放視為資產階級運動及因此不給予婦女運動以充分的支持，婦女地位的改善還遠沒有完成。另外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為了在政治鬥爭中動員男性農民，有意維持農村中的家長等級制。還有一些人也同意由於共產黨幹部的思想方式是建立在家長制的意識形態上的，中國婦女依舊是受壓迫的（Andors 1983；Johnson 1983；Stacey 1983；Wolf 1985）。

總的來說，西方學者同意，明顯的性歧視在共產主義階段顯

著減少了。尤其是，1949年以後，中國城市婦女和男性一起在國家或集體經營的工廠工作，從而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婦女不離家工作在中國城市裏屬於例外（Entwisle 等 1994；Whyte 和 Parish 1984）。

從 1957 至 1976 年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極大的苦難。但其中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就是儒家夫權等級意識形態的衰退，因為儒家傳統是政治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目標。兩性差異的鴻溝縮小了（Zang 1999）。

兩性平等的一個突出例子是婦女在家庭中影響力的逐漸擴大。西方學者認為，同過去男子在家庭中的位置相比，今天的中國男性更尷尬，也更少安全感，婦女在家庭內部事務中有很大的權力，男性沒有甚麼辦法改變這種情況（Honig 和 Hershatter 1988）。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許多中國婦女認為她們同丈夫的關係是家庭中平等關係的一部分。中國城市婦女可以提出離婚，安排星期天去娘家而非婆家幫忙，無視和忽略專橫的婆婆或丈夫（Jankowiak 1993）。

在中國文化裏，理想的母親應具有：慈愛、寬大、保護，甚至溺愛。父親作為一個嚴厲的管訓者，關心財產和生活超過情感，為子女們所畏懼（Bellah 1970；Ho 1986, 1987, 1989）。這種型態包含一定的真實性：西方學者觀察到在現代中國城市裏，母親和孩子的關係很親密溫情，對比之下，父親和孩子則有很大的情感距離，有時甚至很緊張，很對立。中國的母親能在心理上有效地控制她們的孩子，她們是家庭中的溝通中心和聯結家庭的紐帶。中國的年輕人尊敬和孝順他們的母親。兒女在某個時候對他們的父親不禮貌被認為是可以理解接受的，但是這樣對母親則非常不好，兒女們往往會後悔這樣做（Jankowiak 1993）。

中國農村的家庭關係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1949年以前，在

農村家庭中，父親的不可置疑的權威建立在對家庭財產和壟斷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上。1957年集體化運動以後，家庭不再是生產單位。當家庭收入的好壞主要基於家庭個別成員從其集體工作中的勞動所得或家庭之外的其他勞動所得時，父親的權威隨之顯著降低了。吸引成年子女在父親的權威下共同生活的大家庭的財產沒有了（Cohen 1992a）。

父母的權威在集體化時期並沒有完全消失。雖然年輕的情侶可以自己先熟識起來，許多農民的父母依舊強有力地干涉兒女的婚姻。父母對孩子婚姻的權力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婚前給子女方家庭的一大筆財禮通常由新郎的父母支付。這相當於一個家庭若干年的收入。父母的權力還基於他們有責任為他們的兒子和媳婦操辦婚禮和蓋房（Cohen 1992a；Parish 和 Whyte 1978；Whyte 1992）。

五 性關係

性關係對社會有十分廣泛和重要的影響，尤其是當性關係被以家庭的形式制度化後更是如此。他們反映了家庭制度中的權力分配。在傳統中國，裹腳和納妾是婦女受壓迫的兩個最典型例子。婦女的貞節被放在首位（Lang 1946；Wolf 1985）。因此，對性關係的研究可以表明在中國家庭中，尤其是在婦女地位和傳統的男性家長對性的態度上，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但是，對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來說，性是一個很困難的研究課題。在傳統中國文化裏，性是禁忌。在西方出版的研究表明在80年代以前，任何與性有關的材料，甚至裸體畫在中國也被嚴格禁止。中國夫妻間也不討論性。今天，許多人依然避免無論是公開的還是私下的談論性。1990年的一項抽樣調查報告說，一半的回答者從未和他人談論過性（Zhao 和 Geng 1992）。

西方學者注意到中國從 80 年代開始有公開的對性的討論 (Cui 1995; Honig 和 Hershatter 1988)。討論的主題是性純潔和自我性約束，強調如果處理不當，性會損害身體和導致社會敗壞。年輕婦女被告知要控制和引導男性和她們自身的性欲望，推遲滿足性欲望直到適當的求愛和結婚年齡。

西方出版的研究表明在 80 年代許多中國醫療專家勸戒經常手淫的人要極力控制，否則損失精液會有害身體和導致心理失調。許多中國人都同意這一點。1990 年的抽樣調查表明，超過一半的回答者認定手淫是道德敗壞的表現並且有害身體 (Honig 和 Hershatter 1988)。

在西方出版的研究還表明在中國婚前性關係不被稱許。在 80 年代對工廠工人的一項抽樣調查中，五個女工中有四個不贊同婚前發生性關係 (Tsui 1989)。1995 年的一項抽樣調查所報導的有關不贊成婚前性關係的比例與此相同 (Zang 1999)。許多人將貞操視為婚姻關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最近的抽樣調查中，十分之七的男性聲稱，如果他們的新娘不是處女，他們會很沮喪 (Zhao 和 Geng 1992)。

對婦女貞操的高度看重同樣體現在婚禮費用上。在中國的絕大多數地方，新郎的家庭要負擔辦婚禮和修建新房的費用。Xiao Zhou (1989) 的研究指出新郎的家庭願花多少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娘是否是處女。婚禮的費用相當昂貴，娶一個處女要比娶一個非處女花更多的錢。在城市裏，如果一個人婦女同他的男朋友有性關係，婚禮的費用及其他費用就不僅由男方家庭承擔，年輕的一對也要出一部分。在農村，婚前性關係是很少的，失貞的代價比城市更明顯。

Zhou (1989) 認為中國婦女從婚前性關係中失去很多，反之中國男性則有所得。婚前性關係最重要的支持來自男方父母。婚

前性關係不僅減輕了婚禮費用的負擔，而且確保了婚姻。在中國的某些地區，男方母親會把年輕的一對鎖在臥室裏，鼓勵她的兒子與其女友發生性關係。「母親的鑰匙」還不足以導致性關係。一些男性使用間接的和情感的策略，如求援、同情、依戀，勸說女子同他發生婚前性關係。

因此，儘管有很強的對貞操的社會壓力，婚前性關係確實存在和發生。1987年的一項抽樣調查報告，在中國的一個城市墮胎者一半是未婚婦女（Tsui 1989）。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每五個人中有一個人回答他們婚前有性關係。80年代以來一種更自由的婚前性關係的態度有所發展。

西方學者認為，結婚後，中國的妻子在性活動中被要求扮演被動的，等待男人求愛的傳統角色。她們在性交中的任務是滿足她們丈夫的性需求（Honig 和 Hershatter 1988，第 182 頁；Jankowiak 1993，第 233 頁）。儘管許多城市中國人認為當他們的妻子不情願時，丈夫不應該堅持性交，但是在現實中，許多妻子即使並不很情願，也會滿足丈夫的需求。

Jankowiak (1993) 認為中國婦女一般能控制婚姻中性交的頻率。如果妻子感到婚姻關係良好，她會溫情地默許，更積極地滿足她丈夫的要求。反之，她們會假以各種托辭或直接拒絕。在婦女不太喜歡她們的丈夫時，更會這樣。她們不再將注意力放在丈夫身上，轉而關心孩子，或者在家庭之外的朋友那裏尋求感情慰藉。

六 數據

西方學者利用各種數據資料研究中國的家庭系統。Robert Bellah (1970) 依靠對儒教傳統的解釋說明中國的父子關係。Gary Hamilton (1990) 採用類似的方式討論中華帝國下的等級和孝順

關係。Francis Hsu 在他的《美國人和中國人》(*Americans and Chinese*)一書(1981)中，則使用中國的大眾文學作為主要的數據資料。Hugh Baker 的《中國家庭和家族》(*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1979)也是主要基於對現有研究中的二手材料的分析。

有些學者在中國做實地考察。舉例來說，Jankowiak 的《一個中國城市中的性、死亡和等級制》(*Sex, Death, and Hierarchy in a Chinese Society*) (1993)是基於他從1981年8月到1983年11月，及1987年6月到8月在內蒙古呼和浩特所做的實地考察。Myron Cohen (1992b)、Shu-min Huang (1992)、Ellen Judd (1992)、Andrew Warson (1987)走的也是同一條研究道路。

一些學者通過深入分析中國出版的數據或資料進行中國家庭研究。如臧小偉 (Zang 1993)通過分析了1985年出版的《中國城市家庭》²一書的資料得出在30年代中國從傳統家庭制度向夫婦關係的轉型就已經開始了的結論。Emily Honig 和 Gail Hershatler (1988)、Jean Robinson (1985)和 Ming Tsui (1989)也用同類數據進行研究。Nancy Riley (1994)分析了1987年國家統計局所作的生育率的抽樣調查中的數據。

最後，一些學者還在中國做抽樣調查。《中國家庭與社會》(*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Lang 1946)的作者美國社會學家 Olga Lang 就作了這樣的努力。Lang 從1935年到1937年間在中國作實地考察。她的數據包括從北平聯合醫學大學的四千份病案記錄中所得到的歷史案例和統計材料及其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和福建所作的644個訪談，由10個城市中的22所大學、8所高中的學生所填的1700份問卷，對福建和廣東的26個家族的

² 五城市家庭研究項目組，《中國城市家庭》。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

生活所作的調查 (Lang 1946)。儘管量很大，但樣本仍不具有代表性。

懷默霆和白威廉在 1977 至 1978 年訪談了 133 個在香港的中國移民並在他們的《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Whyte 和 Parish 1984) 一書中使用了這些訪談材料。他們大概是第一批使用複雜的統計方法研究中國家庭的西方學者。他們的《當代中國的鄉村和家庭》(Parish 和 Whyte 1978) 一書也是依據對移民的訪談。

80 年代末以後，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被允許到中國作調查。如懷默霆和他的中國合作者 1987 年 5 月在四川成都選了 586 個有代表性的婦女樣本。在這次調查的基礎上，他寫了《成都婚配選擇的變化》(Changes in Mate Choice in Chengdu) (Whyte 1990) 及《戀愛結合和包辦婚姻》(Love Matches and Arranged Marriages) (Xu 和 Whyte 1990) 兩篇文章。第二篇文章運用了複雜的統計方法。Riley (1994) 於 1986 到 1987 年在北京對 700 個未婚和已婚婦女作了抽樣調查。她認為在職業和教育方面，已婚婦女組提供了一個很能代表北京人口的子羣。此外，John Logan 同邊燕傑等中國學者合作在上海和天津抽取樣本研究中國城市的居住情況 (Logan 等 1998)。

七 方法論

西方對中國家庭的研究受到源於儒教傳統和中華帝國的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擴大型家庭理念的影響很大。儒家傳統強調家庭維護中華帝國的農作秩序的重要性。中華帝國王朝對傳統的婚姻制度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儒家所看重的家庭關係和家庭倫理對中國小說和帝國時期的其他歷史文獻有很大影響，後者成為瞭解封建時代中國家庭生活情況的主要資料來源 (Lang 1946, 第 12 頁)。

傳統中國中派生於儒家和大眾文化的理想家庭類型——擴大型家庭——是在一個家庭權威下的五世同堂的家庭。較年輕的一代受孝悌倫理的約束要遵從長輩，尤其是父母和祖父母。中國家庭偏重男嗣，婦女受壓迫很深。父母通過中間人（媒人）安排他們孩子的婚姻（Baker 1968, 1977, 1979；Freedman 1958, 1966, 1968；Watson 1982；Watson 和 Ebrey 1991；Whyte 和 Parish 1984；Yang 1959）。

儘管理想家庭類型反映的主要是中國上層階級的家庭生活（Lang 1946，第 12 頁；Mackerras, 1995，第 51—55 頁），它卻被作為西方研究中國家庭的參照點。如一些美國的女權主義者依靠精英模式理解中國婦女的地位、父母的權威和其他相關的主題（Andors 1983；Johnson 1983；Stacey 1983；Wolf 1985）。William Goode 使用擴大型家庭這一理想類型作為他那本有名的著作《世界革命和家庭類型》（*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Goode 1963）中傳統農戶的家庭類型的一個主要例子。

其他學者從反方向使用中國家庭的精英模式：他們試圖理解中國家庭的精英模式同他們研究中的中國家庭的差異，由此揭示出中國家庭制度的變化。如在《中國家庭與社會》（1946）一書中，Lang 首先討論了中國的這種理想家庭類型，然後指出中國的年輕人變得越來越獨立於他們的父母，不再將他們的父母視為權威人物；現代中國婦女提高了她們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丈夫改變了他們對妻子的態度；建立在情愛上的婚姻增加了。同樣的研究思路也貫穿於在 Salaff（1973）、Parish 和 Whyte（1978）、Riley（1994）、Tsui（1989）、Whyte（1990）、Whyte 和 Parish（1984）和 Zang（1993, 1999）等人有關理解現代中國在自由擇偶、父母權威、家庭結構、家庭關係和家庭制度的其他方面的變化的研究中。

八 總結

以上，我總結了西方對中國家庭，尤其是對中國「家庭革命」的研究。西方學者通過研究中國的家庭結構、戀愛與婚姻、家庭關係和性等問題說明，在中國已經發生了從傳統的中國家庭向以夫妻關係為核心的現代家庭的轉型。這些研究既加深了我們對一般意義上的「家庭革命」的演變過程和發生內容的理解，也加深了我們對發生在中國的這一特殊的「家庭革命」的進程的理解。依我來看，中國家庭結構的研究，無論是從理論建構還是從資料的收集和分析上，都是卓有成效的。同時，由於戀愛婚姻、家庭關係、性是一些比較新的研究領域，對這些問題的研究為學者們提供了建構理論和挖掘新的材料的機會。與這些領域相連的一個有趣的研究主題是在戀愛婚姻、家庭關係、性上所發生的變化如何影響了性平等、家庭社會化和青春期行為等若干社會方面。

另外，我還想指出中國家庭的精英模式以多種方式助益了西方對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但是它也為這個領域的學術考察設置了障礙。大多數西方研究集中於中國家庭結構、自由擇偶、家庭關係這幾個在精英模式中突出的問題，而家庭生活周期、離婚、虐待子女、性虐待、性、家庭暴力、中國人的若干替代生活方式這些在精英家庭模式中不突出的問題則在西方的研究中不太多見。這些領域因不是中國家庭精英模式的一部分而未給予充分的研究。

對這些領域缺乏足夠重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家庭系統在毛時代（1949—1976）變化不大。但是這種狀況在後毛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Zang 1999）。在這種情況下，精英模式雖然依舊還可作為研究中國家庭的參照點，但是，今天的中西方學者有必要超越這一模式去考察中國家庭制度的變遷。

9 人口轉型——中國社會變遷的另一動力： 評述西方人口轉型理論的困境與走向

涂肇慶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一 引言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後，生育率的轉變對人類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在世界上各個角落，人們普遍降低對子女數量的要求，導致社會的基本單元——家庭成員的縮減。有關人類生育繁殖的種種議題也引起人們的注意，進而通過傳播媒體及學術刊物公開討論，以致新馬爾薩斯觀點及環境保護支持者提出第三世界人口過剩是人類未來最大威脅的看法。新的科技與生物醫學知識的突破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性別、家庭、親屬、階層、結構、政府、經濟等等和人口轉型之間的關係。人口轉型不僅受社會、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也會引發一些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遷。畢竟人口轉型是人類各方面變遷的先決條件之一。

新中國於1949年建立之後，曾經舉辦了四次全國人口普查，分別在1953、1964、1982和1990年。對國外人口學者而言，過去這些年來研究中國人口的焦點一直放在人口統計資料的準確性上，發展出多種數理統計方法與模式，針對中國所公佈的人口統計數據進行檢驗與修正，俾能正確瞭解新中國的生育率、死亡率及人口自然增長率的水平及變化，因而尚無暇顧及人口轉型理論在中國的實用性及實證研究。本文基於對此方面的關注，特別針對西方人口轉型理論進行批判性的回顧與評述，進而也討論了當前此理論引發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學的興趣，

以及這些學科對此理論的貢獻。由於此理論缺乏在中國運用，本文在撰寫上與本書中其他章節迥異之處就是引用許多歐美的人口轉型實證研究，作為未來中外人口學者探討中國人口變遷原因，以及人口轉型論在中國運用的參考。

二 幾個重要的人口轉型理論

自 20 世紀 40 年代中開始，探討生育轉變逐漸成為人口學中的主要研究領域，之後，發展出了三個主要理論架構，其中人口轉型理論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成為未來五十年中一枝獨秀的架構，另外一個是新古典轉型理論，一直延續至今，第三個理論是自制度角度探討生育轉變，較少受到重視。

1. 古典轉型理論

古典人口轉型論把人口轉變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轉型前期，人類社會經歷的是高生育、高死亡，因而人口成長十分緩慢。第二階段為轉型期，死亡率開始下降，但生育率仍維持在高水平，因此社會經歷快速的人口成長。第三階段為轉型後期，死亡率與生育率均下降至低水平，人口成長又趨緩慢 (Davis 1945; Notestein 1945)。

當時最重要的研究課題有兩個：

(1) 歐洲人口為甚麼以及如何在 1750 年前由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轉向 1900 年以後的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而其他地區在當時幾乎都尚未經歷此一轉變呢？

(2) 這個轉型過程在甚麼程度上可適用於當前那些正在經歷都市化、工業化和傳播通訊密集流暢的地區呢？

一般認為在此一過程中，現代化，包括都市化與工業化，改變了養育子女的經濟價值觀，降低了人們對子女的需求量，導致

生育率下降。當時學者認為經濟效率提高，鼓勵人們，也使得人們有能力經由提升生育率擴張其家庭人數，但是由於科技創新所具有的報酬遞減原理，促使人們使用各種避孕方法降低出生子女數。之後，學者認為現代化通過公共衛生及其設備的改善、營養的提高、醫療的普及，很快地壓制死亡率上升的趨勢，然後經由小家庭概念和意願的提高，及避孕知識的廣泛散播，生育率開始緩慢地降低。當時爭論焦點集中在現代化中的那些特徵真正起了影響人口轉型的作用。

古典人口轉型論是現代化理論中的一個版本，現代化理論一直是探討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二次大戰後社會變遷的主要理論依據，此一情況在社會科學中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 60 年代末。現代化學派包括了許多學科和觀點，此一理論曾跨越時空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理論架構，它重視社會經濟變遷，而忽略文化與政治層面對變遷的影響力。

此一思潮及其對第三世界變遷和發展的解釋主要源自 19 世紀的演化論。演化論的觀點誕生於工業革命之後，視社會變遷走的是漸進的單一方向，社會由原始的走向工業化的，而且是無法回頭的。因此，Tonnies 提出社區 (Gemeinschaft) 演變到社會 (Gesellschaft) 的概念，Durkheim 提出機械 (mechanical) 和有機 (organic) 團結，Spencer 提出軍隊化和工業化社會等等。

人口轉型論採用了古典現代化理論的一些基本假設。社會學家蘇耀昌 (So 1990, 第 33—36 頁) 列出了所有古典現代化理論的特點。例如，生育轉變具有階段性；社會由原始或傳統的逐漸演變至先進的、現代的；生育轉型是一個單一化的過程，每個社會都向低生育水平轉變；生育轉變是個歐美化的過程；生育轉變是個不可回轉的過程，一旦開始下降，就無法停止；生育轉變是個漸進的過程；生育轉變是個長期的過程。

人口轉型論發展至今，其主要議題仍然集中在如何使今日世界上的貧窮國家能夠經歷那些富有國家的人口轉型經驗。具體的研究議題為：一，在甚麼情況下已婚夫婦會積極地控制生育？二，現代化是否很確切地能引發這些情況的發生呢？三，在甚麼程度上這些情況轉換為政府可行的政策呢？這些情況如何轉換為政府可行的政策呢？

2. 新古典轉型論及其後的人口理論

對古典轉型論的信心與興趣隨着普林斯頓大學的歐洲生育研究的新發現逐漸喪失。歐洲生育研究課題始於 1963 年，目的在依據歐洲七百個省級的歷史資料檢驗轉型理論。其結果令人十分失望，他們發現生育率開始下降的時間與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關係並不一致 (Knodel 和 van de Walle 1979)。

雖然此一研究並未提供支持轉型理論的實證依據，但至少發現生育轉變與文化因素之間具有十分強烈的關係。他們所界定的文化因素包括語言、民族，以及地理區域特質 (Knodel 和 van de Walle 1979; Watkins 1987)。也因此種下了由文化或傳播觀點闡釋生育轉變的種子。依據此一觀點，養育子女的經濟價值的改變是無法解釋為甚麼生育率下跌、何時下跌等疑問。基本上，人們接受生育控制這個觀念的時刻可作為解釋何時生育率開始下降的重要變數 (Knodel 和 van de Walle 1979, 第 239 頁; Cleland 和 Wilson 1987; Cleland 1985; Watkins 1987, 1990, 1991)。

由古典轉型論中強調社會經濟現代化逐漸轉向觀念散播理論 (Diffusion Theory) 中強調生育控制的觀念與態度，以致完全拋棄社會經濟現代化的宏觀考慮，成為過去二十幾年社會人口學所探討的主要理論發展方向。另一理論發展方向則是着重家庭組織的微觀層面的變遷，以及婦女地位的研究。其中以 John Caldwell 的

財富流向論 (wealth-flow) 最為引人注目。他的理論於 20 世紀 70 年代末形成，主要論點認為生育率下降與財富和照顧在代際之間流向有密切關係（由上一代流向下一代），這是依據西方核心家庭觀中以子女為中心所發展出的觀點（Caldwell 1976, 1978, 1982）。由於此理論中許多概念難以操作化 (operationalization)，因而缺乏實證的研究（Thadani 1978；Cain 1982；Schultz 1983）。

雖然古典轉型論與財富流向論均討論到婦女地位的提升可降低生育率，在 20 世紀 80 年代婦女角色與地位已成為若干生育理論研究的重心，其中以 Karen Mason (1986, 1987) 的研究較出色。她提出一些有關婦女地位與生育率之間關係的假設，其中以婦女教育程度和她們在家戶中的地位等變量較重要。因為這幾個變量可改善婦女的自主能力、經濟上獨立能力，以及社會地位，進而改變子女供需狀況及其成本。這些理論架構和以家庭為分析單元的研究有其重要意義，但至今尚未有太多的實證研究結果，而在理論內容的改進、修正及累積方面更缺乏。

除了上述這些自社會學理論觀點發展出的人口變遷理論外，微觀經濟學也提供了不少有意義的觀點。20 世紀 60 年代芝加哥學派以 Gary Becker 為主，依據消費者抉擇理論，引發出一套有關生育的理論 (Becker 1960)。子女如同其他消費品，在養育過程中，需要耗費很多時間和金錢，不過可提供父母心理滿足感。一個家庭依據其所得收入、子女和一般消費品的成本，以及對子女的相對偏好程度來決定生育子女的最佳數量。之後，Harvey Leibenstein 和 Richard Easterlin 把社會和生物因素引入以經濟考慮為主的生育抉擇模式中 (Leibenstein 1975；Easterlin 1978；Easterlin 和 Crimmins 1985)。雖然他們的理論架構遠遠比原來依據消費者抉擇模型所發展出的理論廣泛，但仍然着重自經濟層

面分析生育抉擇過程，忽略了個別家庭在衡量子女與一般消費品之間成本效益中的客觀環境與歷史背景因素所扮演的角色。

3. 制度學派觀點

此一理論觀點源自 Geoffrey McNicoll，他在1975年提出「生育變遷的制度決定因素」(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changes) (McNicoll 1975, 1980, 1984, 1994; Cain 1981, 1986; Lesthaeghe 1980; Potter 1983)。McNicoll 依據經濟學及其他學科中的制度理論試圖解釋為甚麼生育轉變。他認為生育轉變的模式主要是受制於該社會的歷史所繼承延續下來的制度，包括社區結構、家庭組織體系、兩性角色等等，同時也受制於該社會對其成員的期望，而不斷調適的行為模式的制度化。

McNicoll (1980) 詳盡闡釋了兩類制度分析觀點：一為依據 Herbert Simon (1957) 在《行政行為》(*Administrative Behavior*) 一書中的行政人 (administrative man) (有別於經濟人 [economic man]) 的概念。行政人能夠理解所處的世界是一個充滿混亂迷惑的真實世界，依據個人有限的理解能力簡化其世界觀，同時行政人也相信所處的世界中的多數真相與他們面臨的各種特殊情況無多大的關聯。行政人有別於經濟人，經濟人試圖在各種情境中求取最大的滿足，而行政人則試圖以公平的代價、滿意的報酬、固定的市場分攤和安靜的生活做為滿足的標準。個人的理性受到牽制或分割，在任何一個抉擇的關鍵時刻，僅僅有限的幾個選擇能即時的進入人們的腦海，而我們則須在這幾個有限的選擇中進行衡量，進而作取捨。在探討生育轉變過程時，我們可以考慮這些分割的、支離破碎的抉擇情境。人們在社會中有性別上、教育程度上、經濟地位上、甚至出生年輪 (birth cohort) 上的差異，因而會面臨不同的分割的抉擇情境，他們在感性上所設定的分界線

也有差別。當然生育決定及其結果更加複雜，不僅需要考慮上述那些特有的因素，同時也須考慮夫妻雙方在此一決定過程中對彼此的影響力，而這些因素多少受到制度上或經濟上的制約。例如，在中國生育控制的運作牽連到各個省、市、縣及鄉鎮地方的決策考慮，在改革開放之前，甚至試圖削弱或斷決有關生育決定和家庭經濟生產策略之間的關連。對個人而言，這二者之間的分界線十分明確，互換是絕對不許可的。

另一類則是依據 Ronald Coase (1937) 的交易費用 (transaction costs) 論發展出的觀點。因為制度的格局和轉變方向無法提供一個平穩的基礎幫助我們發展一套有系統的理論，那麼我們勢必需要探討制度的背景及其種類和動態。此一觀點引進了兩條理論思路：一為制度結構的交易費用論，另一為制度變遷的經濟理論。

交易費用論試圖把生產組織描述成為一個減低交易成本費用到最小的公司，而這些公司的分界線就是以成本交易做為劃分的標準，因此公司被視為是節省交易費用的工具及策略。一個企業設定其經營活動範圍，在該範圍裏，以企業導向為主所進行的交易兌換取代市場導向的兌換。這些企業在改善市場效率上可帶來利潤，公司也會不斷地擴張，一直到交易費用與其他公司的交易費用或市場上的交易費用相當時，才會停止擴張。

最近有關交易費用理論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基礎，可幫助我們分析人際之間或團體之間的平穩關係，尤其在不同的成本設定和維持上，以及制度需求上。

O. E. Williamson (1979) 鑑定了三個描述交易的特性：一為交易是否為單一的、偶發的，或重複的事件；二為投資在交易上的是否因交易而有別，換言之，交易過程中的互信是如何建立的，信賴感是如何產生的；三為一方在履行交易時，另一方的不

確定性有多大。這三個特性強烈影響制度安置的形成，也就是公司合併的形成。在合併情況下，機構的大小及加入成為成員的標準，在同一制度內的各個交易之間的聯繫等等都是該制度的功能。

與生育理論有關的則包括詳細分析在家庭中和地方經濟裏的重複和特異交易行為與事件（Ben-Porath 1979）。在這個研究領域裏，配偶或對象的認定是交易中必備的要件。一個特定的交易是連續不斷關係中的一個事件而已，對此事件的處理，可引發控制交易均衡的考慮。依據此觀點，家庭被視為是減低一串交易成本的社會手段，而這些交易成本是由一羣被隱含的契約所約束的個人承擔的。

每個社會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制度特性，因此在探討交易性質中，在制度安排的理論闡釋上，很難找到共同性。如果能夠認出交易的根基，則可至少找到制度結構彈性的來源，獨斷干涉，以及制度轉變理論必須考慮的一些重要變數。

如果我們把制度視為附加在一串交易上成本最低的安排，那麼當這些交易改變時（例如，新科技的發明、新資源的供給）則可引發制度在形式上的轉變，而轉變的方向也可在這些情況下瞭解。例如，在農村經濟中，新的交通系統，包括摩托車和小型巴士的引進都會改變當地的市場結構。探討制度中的變動對生育決策的影響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務，因為通過那些特定制度安排所設計的生育誘因會受到這些特定制度本身的影響，生育轉變後果和干擾的策略也會受到這些後果和策略的影響。換言之，任何措施均有其副作用。

制度背景和動態的交易條理在政府企圖改變制度安排的過程中，往往被研究者忽略。中國在1958—60年間努力建立人民公社為集體單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試圖把經濟單元由村莊提

升到一個行政管理的層次。政府的行為使一個呆滯的制度顯得無效，其目的很明顯的具有政治上的意義。一個受到歡迎和重視的新人口情況或多或少是偶然意外促成的。制度的形式和交易的本質之間的關係所包含的範圍很廣，略着邊際的政策干擾機會，尤其有關生育政策方面，在人類社會中是很明顯而且層出不窮的。

McNicoll 檢驗了世界上五個生育轉變模型之後，認為有些社會的制度能促使生育率平穩下降，但有些社會的制度則具有阻礙此一轉變過程的發生的特點。

三 當代人口轉型理論中一些困惑

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狹窄的現代化理論為依據的人口轉型論，缺乏嚴謹的、政治層面的考量，雖然制度論對此有相當的彌補作用，但仍嫌不足。

第一，上述各個理論的分析範疇十分狹窄。微觀經濟理論着重微觀層面，以個別的夫妻為分析焦點。社會學理論在概念上較為廣闊，包括了家庭，親屬，以及個人關係網，但這些變數與宏觀結構之間聯繫仍然不十分清楚。

最令人不解的是文化觀或觀念散播觀的理論架構非常狹窄，這也許是針對古典轉型論的反彈。早期一些支持觀念散播論的學者在他們的分析架構中引進了發展與散播機制等概念 (Retherford 和 Palmore 1983)，最近一些學者走得較極端，試圖以文化觀解釋所有的轉變，甚至捨棄社會經濟因素 (Cleland 和 Wilson 1987)。他們認為生育率下降歸諸科技演進的結果，也就是通過觀念散播使得人們普遍接受現代的一個重要發明——避孕技術。

散播理論的一個優點就是有能力塑造避孕技術散播的社會結構背景。一部分學者認為文化論遠比經濟理論在解釋人口轉型上更適用。文化論強調人們之間有關避孕觀念及技術上的溝通，忽

略了婦女在一齊也會交換有關子女的教育、工作，以及其他有關生育、養育子女的社會經濟層面的看法和經驗。同時文化論過分強調文化、語言共同性的重要性，甚至凌駕於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之上，這就有些走火入魔了。觀念散播論在分析生育轉變上甚至忽視社會變遷的動態性，以及有關避孕技術及觀念溝通時所處的大環境。有關人口轉型的探討，應同時着重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的結構關係，以及它對生育轉變的涵義。

第二，現代化理論對人口轉型理論的持續不斷的影響力，使其甚少受到批判，以致無危急感。例如，多數人口轉型理論在解釋生育轉變時，均認為是由傳統的生育體系轉變為現代生育體系——依據現代化理論中的演化論觀點和以歐洲為中心觀的社會發展理論。同時人口轉型論也認為歷史運轉是單一直線的、預先決定的；歷史僅僅被劃分為傳統與現代兩階段，每個社會的獨特歷史在生育轉變中僅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婦女的地位隨着現代化的演進而改善；生育轉變主要受西方化的影響，進而加速該社會的西方化；而西方的生育觀對人類是有益的。

在社會科學的理論發展過程中，上述這類的假設均已被學者質疑，但對人口學理論的發展似乎尚無大礙。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全球性的政治經濟觀點，諸如依賴論（Dependency Theories）和世界體系論（World-Systems Theories），不斷地向現代化理論挑戰，他們認為西方不斷地捲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社會，所帶來的不是發展，而是發展不足和加深不同地區之間的永久不均等程度。到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理論着眼點轉向文化觀，許多不同的有關現代化的觀點和以歐洲為中心的理論推測面臨競爭與挑戰。

在這一波的學術浪潮中，有些學者（Blaut 1993）開始認清過去許多理論基礎基本上是一個歐洲優越論，這也是觀念散播論的

主要依據。他們把世界分成一為永久的核心地區（歐洲及其屬地），另一為永久的邊陲地區（非歐洲地區）。歐洲意味着進步、現代化，非歐洲地區則代表停滯不進、傳統保守；非歐洲地區的文化變遷通常通過歐洲觀念、科技及其他影響力的散播，然而歐洲觀念散播論並未隨着殖民主義的消失而消失，反而在二次大戰後、經由現代化理論的發展而更加興盛。Blaut 認為殖民時期的古典散播論與二次大戰後的現代化散播論都是錯誤的世界觀。因為它們都是依據缺乏充分實證研究的歐洲文化優越論，強調好的歐洲觀念會散播到世界各地區，視非歐洲民族被動地接受歐洲文化觀的散播，同時這些學者否認本身對自身所屬文化的轉變扮演任何角色。

雖然許多學者對這些理論進行嚴謹的批判，但對人口學者們在人口轉型論的研究上，未帶來太大的影響力，一直到最近這十幾年，一些人口學者開始感嘆人口學在轉型理論上的建樹十分有限，同時也忽略了近十幾年來全球各地的政治與經濟變遷，包括共產國家的巨大轉變。1980年 McNicoll 發表了一些看法：「普遍同意我們並未有一豐富的生育理論，如果理論指的是一套連貫的綱領，它能使社會與經濟、整體與區域的特徵與生育抉擇及其結果串連在一起，它也能經得起實證資料的仔細檢驗」(McNicoll 1980，第 441 頁)。

四 人口轉型論的可能新走向

雖然古典人口轉型論已不再為人口學者致力理論建構的主要依據 (van de Walle 1992，第 488 頁)，但也未有任何其他新理論能取代它的地位。整個學科目前缺乏新的觀點，以致有些人口學者感覺到人口學已失去其領域屬性，任由其他學科滲透、浸潤 (Keyfitz 1984，第 1 頁)。由於此一學科在理論上逐漸萎縮，因

而對近十幾年來各地區政治與經濟上的轉變並未十分注意，而這些政經變遷正可能對人口變遷產生不可思議的影響。蘇聯、東歐的政治解體，經濟重組，中國的改革開放都可能對該社會的人口轉型帶來巨大的效應。因此有些學者認為應把握此一時機，對人口轉型理論進行檢討，並把當前的政經變數整合於理論中，重新開展一些新的理論方向。目前有些對人口轉型有興趣的人類學家開始自人類學的領域探討人口轉型論新的發展方向。由於人類學在研究社會時着重整體概念，試圖由多方面的角度瞭解所研究的社會，因而在生育轉變研究上，他們主張不僅要探討生育行為發生變遷的社會經濟環境，同時也應考慮政治與文化層面。在這方面，他們的研究方式與制度學派 (McNicoll 1994) 有相似之處。制度學派認為歷史背景與社會特殊性在生育轉變研究上十分重要，同時應掌握那些敘述性的解釋，尤其那些有關兩性、權力結構等等過去不易融入人口實證研究中的變數，而這些變數在過去十幾年中已突顯出其重要性。它們之間不同之處在於着重點上，制度學派較注重社會結構，而人類學家則較重視個別的個體作用。

最近 Susan Greenhalgh (1990, 1995) 由政治經濟學、女權主義和建構主義 (Constructionism) 三方面試圖整合生育轉變論。她認為由政治經濟學觀點探討人口轉型是制度人口學派的一種形式，應把注意力放在影響人們生育觀的社區制度及結構上，形成生育觀的區域、全國及全球的過程上，以及與那些宏觀和微觀緊密聯繫的歷史淵源上。傳統人口轉型論僅強調個人層面，忽略歷史與政治層面，同時過分依賴量化資料與方法。由政治經濟層面探討生育轉變，則是多層面的，同時兼顧歷史背景、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與文化因素。它結合社會結構與個別個體層面，也兼顧定量與定性研究。她認為此一多層面的理論架構是一天衣無

縫的完整理論框架，而其目的並非釐清那個層面是基本的，或把此理論體系分割為若干個片面，使有的研究着重社會，有的着重文化，有的則注意政治或經濟，或僅注意生育、死亡、婚姻、遷移。其理論框架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全面瞭解有關生育的制度及行為如何演變，其中各個結構要素又如何相互關聯，此一人口政治經濟理論試圖在一宏觀的時空環境中瞭解生育的動態轉變，同時也強調文化因素對生育的重要性。除此，也注意兩性因素對生育的影響力，畢竟它是一個兩性參與的過程。不過自生理上而言，僅女性具有懷孕能力，但男性必須提供其必備的要件；不過自社會角度而言，婦女通常擔負養育下一代的重任。由此可看出，男女兩性在生育過程中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包括兩性差異，以及兩性在觀念中、資源分配上，和權力結構上的不均等。

社會建構論認為社會組織是人類自行發展出的產物，並非任何社會規範所賦予的，是由人類積極設計形成的，應該設想一些方法探討動態的社會關係與羣體的形成。研究的着重點逐漸由社會規範轉向個別個體的作用，強調結構與活動之間的組織關係 (Berger 和 Luckmann 1967 ; Bourdieu 1977a ; Giddens 1979) 。由於婚姻和親屬是探討生育轉變理論的基本要素，因此社會學與人類學理論很自然地能夠對生育轉變提供其研究方向及方法，可使生育轉變研究由過去過分強調生物學觀點轉向注重社會結構及其演變過程。

過去在探索生育轉變時，人口學家着重一些生物與行為方面的「直接決定因素」(proximate determinants)，而社會與文化因素必須通過這些直接決定因素方能影響生育轉變 (Bongaarts 1978) 。同樣地，在自然生育 (natural fertility) 人口中，生物因素，也就是供方 (supply) 因素是解釋生育的年齡樣式 (pattern) 差異的最主要考慮 (Knodel 1983，第 69—70 頁)，人口學者

一直未曾重視過人類社會中那些有意識的間隔生育行為的重要性 (Ohadike 1977 ; Cashdan 1985 ; Bledsoe 等 1994) 。有關生育子女需求方面的研究，也反映出過去強調生物因素的重要性，一直着重父母養育子女的成本及子女成長後對父母的供養效益 (Bledsoe 1990) 。

當然生物因素在研究生育轉變過程中十分重要，不過社會因素也有其重要性，通過對社會因素的探索，可進一步瞭解生育轉變對社會最基本的制度——家庭變遷的影響。過去這些年，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了許多有關社會與文化因素對人們規範其生育行為的文獻。Bourdieu (1977b) 、 Comaroff 和 Roberts (1981) 、 Bledsoe (1990) 等人認為不僅社會實況 (reality) ，同時人口實況也是社會建構 (construction) 中的重要一環。他們強調基本生物關係的模糊性，重視家戶重組及子女的責任與義務的改變，以及它們對人口轉變的影響，不太重視先天的生物限制或文化規範。

家庭的社會建構在人口政治經濟論中，被視為一個不斷的政治過程。社會中的權力關係在此一過程中影響人們的生殖方法取向，當然也受其影響。這是個動態的過程，家庭在社會中的經營始於為人父母之前，通過婚姻及生育控制的過程，例如避孕和人工流產，一直延續到為人父母之後，經由溺嬰、領養等等方式控制生育。因此微觀的家庭權力結構與其歷史背景成為研究生育過程中的重要層面。

由文化與政治經濟層面探討生育轉變與傳統人口學方式十分不同。幾乎所有非制度性的人口轉型理論，包括古典的與修正的理論，均依據前曾述及的四個重要假定：第一，僅有一個轉變的樣式，而每個社會均須經歷此一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模式；第二，此一轉變樣式是跟隨西方的生活方式，包括了低生育率在內的生

活方式；第三，一旦開始此一轉變，它是無法扭轉回頭的；第四，此一轉變是漸進的，而且是向正面的，好的方向進行。

而文化與政治經濟論則依據完全不同的假定。第一，文化與政治經濟論否定了人口轉型論中單一轉變模型的假定。綜觀全球生殖史，高生育率社會之間的差異性，或者低生育率社會之間的差異性均超過高生育率社會與低生育率社會之間的差異性。全球存在着許多不同類型的生殖制度與樣式，它們都具有探討的價值。第二，否定人口轉型論中所有社會均依照西方樣式的假定。如同制度人口學者的說法，認為人口的動態轉變是依據該社會的文化特點，因而懷疑低生育率是人口史的最終目標，生育轉變視該社會的文化、政治、經濟特點而異。最後，這一學派對生育率下降是好事抱持懷疑態度，好壞的觀點取決於該社會的文化，低生育率也許對西方社會是好的，但未必對非洲也是好的。好壞與否和所處的社會羣體也有關係，少生子女也許對上層社會羣體有益，但未必對中下階層是好的，任何轉變均具備好壞與正反兩面。因此，生育率迅速下降也許提高國民平均所得，但可能影響了人們生活的社會與文化架構。

簡而言之，世界上存在許多不同類型的生育轉變樣式，而其形成均受制於該社會所處的時空與文化背景，如何在一特定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環境下探討該社會的人口與生育轉變是新的理論框架所面臨的挑戰。

五 文化層面

在所有被人口學者所採用的概念中，文化是一直未受重視的一個重要方面。

Anthony Carter (1994) 提出文化與人類作用曾經支配生育研究的思路。為了分析上的方便，他提出在消極意義方面，上述二

概念設想人們無心地遵循文化規則，而在積極意義上，認為人們是有意識的決策者，依據抽象的理性思維選擇他們生育水平。不過，消極的文化概念否定了人們的作用，也就是否定了人們有塑造他們自己生活的能力，而積極意識認為人們是理性的效益極大化者，Carter 並不十分滿意此二概念，因為真正的效益極大化過程是一花時間而又複雜的認知方式。

針對上述缺點，Carter 提出兩個解決途徑，第一個依據 Anthony Giddens 和 Jean Lave 的社會學理論闡釋人類作用並非一系列的、不關聯的、依據個人選擇與計劃行為所構成的，而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具有理性與回溯檢討的行為流量。在此情境中，人們在個人行為與所處環境的論證關係中逐漸形成其行為常規，如此，文化概念（不同行為所具有的價值）和政治經濟（形成大環境的力量）成為行為的主要元素，而人類的作用成為此一大環境中的中心舞台。

第二個途徑由 Jane Schneiders (1994) 提出，她比較關心為甚麼人們陷入在高生育與低死亡的這個圈套中而無法逃脫。她排除了文化主義與勞動力需求模式的觀點，而認為在 Carter 所提出的困境中，理性的訴求受制於權力結構關係，她在西西里的個案研究中，曾指出無田產的勞工階層由於受到階層中主從關係的影響，剝奪了他們對小家庭觀念的想像力，以及達到小家庭的能力，以致無法降低他們的生育水平。

這幾年在人口學文獻中，往常所討論的散播論中文化具有兩重意義：第一，它是避孕概念與知識散播的促進器或障礙，而文化僅由語言、民族和區域作為衡量標準；第二，它被視為評價的機制，人們，尤其婦女，通過它評估避孕方法的取捨 (Watkins 1990)。不過人口學者對文化的界定並不十分清楚 (Kertzen 1994)，一般均根據現存的實證資料而決定如何量化文化概念。

Eugene Hammel (1994) 在他的研究中，開始質疑民族和語言作為解釋生殖變遷的文化指標，他發現民族性作為生育變化的影響力，在引進政治層面之後就消失了。在微觀層面上，他指出經濟因素也較民族因素更能解釋生育轉變，他認為當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被政治精英分派之後，民族性與地方文化此二變數才能突顯出其重要性。

六 歷史層面

大多數有關生育轉型論中，生殖行為的轉變是由其所處的歷史環境中摘取出，然後試圖套進抽象的、類比的概念中，同時認為每個社會都會經歷同一轉型。在這些模式中，每一歷史階段，傳統或現代，有其獨特歷史；在傳統階段，生育與死亡均被描述為穩定而且處在高水平，到了現代階段，它們仍然穩定但維持在低水平。在此二階段，生育與死亡是穩定不變的，僅在轉型階段變遷才會發生。

雖然歷史觀點逐漸引入人口研究 (Lesthaeghe 和 Surkyn 1988; van de Walle 1992) 中，但仍未普及，尤其在微觀層面上，有關生育描述與分析仍然十分欠缺歷史方面的考慮。同樣的，許多跨國的實證研究也認為一個社會的歷史背景在生育水平研究上並不十分重要。但事實上，分析地方上的政治經濟歷史淵源，對當地生活各方面的瞭解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所指的歷史並非傳統的人物與事物史，而是人們所促成的各種事件，而又受制於該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結構的約束 (Thompson 1963, 1978; Roseberry 1989)。政治經濟歷史背景被視為相互連貫的整體，其中不論先進的和落後的，他人的社會和我的社會，均為此一歷史發展中的參與者。Robert Launay (1994) 在他的回族人口轉變研究中，把宏觀政治史放在中心位置，他試圖把逐漸升高的公共非法性歸諸

較廣的政治經濟變遷、地方上的派系政治，以及當地成衣貿易的經濟競爭，逐漸暗中破壞了那些依據龐大的、團結的親屬團體為本的政治與經濟理性思考基礎的影響。控制親屬團體成員不再是策略性的資源，宗親長輩逐漸對人多勢眾的觀念喪失興趣，而對來路不明的子女的合法安排逐漸擱置一邊，不再受重視。

時間，在微觀層面上，對探討個人生活歷程是十分重要的概念。人口學者通常認為人們在進入生育年齡初期開始討論生育指標，一旦決定，終生不變，最多作少許的調整而已。此一說法基本上假定人們不會隨着時間的變化而改變其觀點，但忽略了人們所具備的一些特徵，諸如，自發性、曖昧性、即席而成性、善變性等等可改變他們的生殖與生育觀的變數（Rosaldo 1989，第 91—108 頁）。人們在其一生中不斷的檢視自己的生殖活動，隨着時空等客觀環境的改變，調整和修改他們自己的生育水平概念和行為。

過去這十幾年有關變遷過程的研究，特別着重個人行為所處的世俗組織環境，不再以一成不變的文化規範做為分析重點，而以該社會的常規和習俗所具有的時間序列上的演變過程為主要分析重點。依此觀點，時間不再是人們所生活的歷史，而是成為人們生活建構中的一部分，因此在世俗模式的研究中，有關該社會活動的描述，開始注意隨着時間演變，而且無法迴轉的活動，注意社會成員對時間有策略、技巧的操作行為，以及因時間而獲得行為類型。

Bledsoe (1980, 1990, 1993) 在他的研究中曾指出人們如何不斷的依據生理狀況調適其生殖行為，而該調適過程又依據社會文化思維所具有明確的、重組的時間序列的特性和結構。

Bledsoe 和 Carter 對上述有關微觀史和個人時間及時機的觀點進一步由生殖分析中說明其重要性。他們首先質疑人口學研究

中一直假定自孩童期開始，人們就具有一個相對穩定不變的、單一的家庭數量觀。在研究 Mende 社會時，發現任何一個孩童所具有的家庭數量觀隨着時間會改變，尤其當這些孩童的父母之間的關係，以及母親與其他男性的關係改變時。孩童所具有的家庭數量觀是依據其父母的價值觀而形成的，當然也會隨着父母的離婚或分居而改變。Bledsoe 引進時間序列，把孩童視為成人關係網絡中的重要一環。

Carter 的行為流程 (flows-in-conduct) 概念提供了另外一個探索生殖決策的微觀史的研究方法，依此概念，有關生育的決定是在人們生殖生命週期各個時段中進行的，人們對其生殖決定的干涉僅僅發生在家庭形成過程的不同時間裏。例如，在印度北方，對於生育的決定通常依據當地的文化習俗，月經未準時到來可通過使用墮胎劑規範其經期。Carter 的研究指引出一個當前的生殖活動的研究方向，人們有策略地控制事件的時機，以及所引發的生育後果。

七 兩性關係及女權層面

雖然婦女的活動及生活已逐漸成為人口學中解釋生育轉變的重要變數，但仍不如其他學科那麼重視。20 世紀 80 年代中人口學對婦女變數的重視程度仍滯留在女權主義前期和婦女人口學之間。女性的角色及其經濟特徵已逐漸成為各項研究中的變數，但在人口學領域裏仍僅着重 15 到 49 歲的育齡婦女為研究對象 (Watkins 1993, 第 559 頁)。追根究底，在人口學中有關基本的分析類別的再思索中，並未把女權主義的研究心得考慮在內。

有關人口學中生育的文獻，過去一直僅討論兩個概念：一為婦女的角色 (Anker 等 1982; Oppong 1983)，另一為婦女地位 (Mason 1986, 1987)。婦女地位在人口學定量分析中很容易被融

入其中，但也很容易由統計分析結果中，依據各變數的量化重要性而捨棄婦女地位或角色此二變數。

在 20 世紀 70 和 80 年代時，上述二變數受到許多其他學科的攻擊與批評（Connell 1985；Stacey 和 Thorne 1985；Moore 1988；Ferree 1990），這兩個概念視兩性之間的差異僅屬個別的或家庭內的，而忽略了兩性之間的不平等有其社會制度層面的因素。人口學家一直認為婦女或兩性角色是全球性的一致概念，忽略因文化、階層、民族和國籍所帶來的差異。而目前此二概念均具有強烈的西方文化為中心的意義，不見得適用於其他社會。此二概念具有客觀性，但視婦女為被動目標，任由他人支配，忽略其歷史與政治演變背景，未重視兩性之間權力競爭與衝突（Stacey 和 Thorne 1985，第 307 頁）。

目前各學科在這方面的研究較着重兩性（gender）這個概念，他們的研究兼顧男女兩性，而且考慮各個社會的文化背景，包含權力的差異、與兩性有關的意識形態、物質分配上的不均、社會生活的結構原則等。兩性結構提供了一個探討男女差異及其不平等對生育影響的有力工具，其隱含的研究課題十分廣泛。

雖然到目前我們尚無法全面地瞭解兩性如何在不同的時空塑造其生育觀，但至少應考慮下列三方面：第一，兩性是一個十分普及的，具有影響力的變數，此變數對人們生活的各方面均具有安排的能力，例如通過以兩性特徵為主的網絡，流動人口中的婦女可尋求婚姻對象、人工流產，以及對其子女的看護的協助。婦女不僅比男性更常使用親友關係網尋求協助，而且她們的網絡具有十分突出的女性特質，她們在女性空間中活動，以女性職業為中心，把她們緊緊拴在一齊。

第二，兩性意味着兩個個體。有些人口學者強調第三世界的婦女處在一附屬的地位，以及附屬地位對她們育嬰選擇的局限

性，同時認為她們是在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中的受害者，她們對其人生無太多選擇餘地，僅能依照社會的傳統多生多育（Caldwell 1978；Cain 等 1979）。雖然上述描述多少具有其真實性，不過過分渲染了這些婦女在男權為主的社會中的被動處境。例如，在印度北方，雖然婦女受制於丈夫，但仍然會抗拒丈夫及其夫家親屬的意願，秘密地尋求避孕或人工流產。縱使在中國，婦女受制於政府一胎化政策，但仍然有一部分婦女設法違規超生，甚至經由非正式管道與地方幹部達成基本生育需求的協議（Greenhalgh 1994），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婦女的抗爭，在權力上是無法與政府相比的（Greenhalgh 和 Li 1995）。

許多學科在婦女研究方面，一致認為婦女不僅是社會中的受害者，同時也是一羣運用有限資源設計一些策略去挑戰或修改那些壓制她們的社會制度的女性（Martin 1987；Fuchs 和 Moch 1990；Rapp 1990, 1991）。目前許多社會的婦女經由資訊網絡和互聯網的分享和互助，可解決有關生育方面的疑難，雖然這些網絡不易看見，但確實對世界各地婦女提供了一些保障。

第三，兩性理論中，有關兩性關係的轉變方向和婦女的生活取向，仍充滿了許多未知數。人口生育理論推測只要改善婦女的社會經濟地位，就可促使生育率下降。也許由於人口學研究一直過分依賴以社會經濟地位為測量婦女地位的指標，以致於一向認為婦女的生活會逐漸改善，甚至忽略了婦女與發展研究文獻中指出婦女地位與生活在某些方面已改善，某些方面仍待努力，甚至有相互矛盾的實證研究結果。有些實證研究（Bradley 1994）顯示社會經濟發展可使婦女經由接受教育、就業和發表政治見解改善其地位，但同時也可能喪失其他方面的立場，例如，在工作機會縮減狀況下，對有限資源重新分配時，若強調考慮婦女的利益則會遭致男性的反抗，甚至引發和提升家庭暴力的層次，使女性成

為受害者。Bradley 認為變遷的模式十分複雜，也是多方向的。在廣泛的經濟狀況中，匱乏導致生育率下降，並非授權女性或使女性能力提升導致生育率下降。

八 政治經濟層面

過去人口生育理論在探討生殖過程時一直忽略權力與政治、衝突與不均等的影響力。散播論最能代表此一質樸宜人的、與世無爭的世界觀點（Retherford 和 Palmore 1983），同時在社區與社會層面，生育觀傳播的快速取決於該社會整合的程度，而社會整合則取決於是否擁有好的溝通渠道、共享的價值觀、文化的共同性，以及共同的政治領導羣。小村莊人口通常被認為應有較高度的人口整合，因此較易採用由外面傳播進來的避孕知識。在個案研究上鮮有把避孕技術來源——在現今時代、在國際組織和在政府機構中——考慮在內，但它們被視為有助益的力量。

一小部分研究生育政治的政治學者、政治社會學者和社會史學者對此觀點提出挑戰，主張權力和政治是生殖過程中的重點。這些文獻闡釋政府直接和間接規範家庭生活的種種活動（Gillis 等 1992），以及對有關議題的爭論，諸如人口問題在國際人口社會是如何界定的（Finkle 和 Crane 1975；Finkle 1976, 1985），各國人口政策與規劃的發展方向（Warwick 1982, 1986；Ness 和 Ando 1984；Finkle 和 McIntosh 1994），甚至人口學者所做的人口預測也可成為政治爭論的焦點。

有關的研究趨向着重正式組織（機構）的政治情況，其他學科已說明生育政治可發生在個人的微觀層面、家戶、關係網和社區，以及宗族、階層、兩性羣體和國家等層面。在微觀政治層面，Launay（1994）的研究已說明權力在私生子女中的角色。在 Dyula 這個地方，一個孩子被判定為私生子的過程中較少受當地

文化習俗的影響，多半受當地政治情勢的影響。生殖結果也受制於當地的各個羣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和不均等的程度。在尼泊爾的 Tamang 區，宗族團體中的成員可依據其地位的高低操縱各個宗族團體之間婚姻機率，俾便在勞動力和責任、義務流動上取得最大利益。為了加強他們的地位和資源，婚姻策略也會影響生育結果。在肯尼亞，最近生育率下降並非婦女地位的提高所致，而是因為逐漸蕭條的經濟，迫使男女競爭逐漸萎縮的有限資源。在宏觀層面，政府是推行生育政策的積極行動者，它由於自身的利益監視和控制人口成長。

Hapsburg 政府在巴爾幹地區對生育率轉變扮演過重要角色，在邊界軍事區，生育率很深入地受到奧地利政策的制約，這些政策包括對家戶劃分的控制、緩衝人口受經濟的衝擊，以及在無止境的戰役中仍能充分供給所需求的各種服務項目。

九 人口轉型與社會經濟變遷史

人口學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農業人口如何轉變為都市工業人口。本文所指的農業人口是那些真正從事耕種農產品的人口，他們以農地為生活的主要重心，此類人口有別於所謂的農村人口。

由歐洲人口史研究中，已發現農業人口的家戶（或農業社區）在人口控制上，成為很有效的機制，使婚姻與生育的機會能夠緊密地配合土地所能承擔的。此外，歐洲農村以工資為生的勞動力在都市化蔓延之前已相當普及，而此類勞動力的普及消弱農人所建立的對人口控制體系的效果。當然我們可把此一議題引伸到中國改革開放前後進行探討。不過由歐洲人口史研究上已引發出一個情況，那就是現今世界上貧窮地區已不斷重複經歷過去那些實施社會主義制度的東歐農村人口的經驗。

針對中國改革開放後有關農業人口轉變為都市和工業人口方

面的探索，我們可以很具體提出下列一些課題：到底在生育率和死亡率差異上哪些部分對人口轉變較有影響？在農業和工業，農村與都市人口轉變上到底有多少人口參與，他們的組合又如何？是否在此一轉變過程中，生育率、結婚率和死亡率本身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呢？探討這類問題可幫助我們瞭解人口轉變的三個重要疑問：何時、何地、以及如何。

另一課題則是人口成長與經濟變遷之間的關係。長遠而言，人口成長與經濟擴張相互助長，經濟蕭條與人口萎縮也相互影響。但由短期而言，生育與婚姻隨着經濟上揚而上升，死亡率則下降，而人口轉型隨着經濟增長使得生育率與死亡率均下降。那麼人口成長對經濟可帶來甚麼效果呢？John Habakkuk (1955) 由 18 世紀的英國個案研究中，發現人口成長可引發頗具規模的經濟成長；可帶來充分的廉價勞動力；為了增加資本與自然資源，可激勵人們思索找尋取代勞動力的新方法；激勵投資意願；以及誘導農人加倍努力生產。

Ester Boserup (1965) 在她的農業經濟研究中，曾指出在人口壓力下，勞動力的輸入顯著增加，甚至凌駕因為劣質耕地所取得的報酬遞減，因此人口成長刺激農地的產量。依此推理，人口增加，短期內，壓抑勞工產量，抵銷每一勞力每一小時下降的產量，因為農人會或少吃或更努力工作，Boserup 認為農人會傾向更努力工作。她同時也認為人口密度增加和工作更加努力可提升農業產量，進而提高經濟成長。人口密度高促進分工合作、普及教育和大眾傳播。努力工作有時也能促進採用或發明更有效的工作常規。

Boserup 的研究對今日那些人口成長快速的貧窮國家帶來質疑，答案在於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成曲線關係，過快或過慢的人口成長對經濟發展均有害，也許 Boserup 的觀點是錯誤的。

不論人口與經濟關係如何，在歐美地區學者，已發現農村工業的擴張與人口快速成長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同時農村工業集中程度與農村人口密度也有強烈關係。原始工業化在最初發展時，以增加生產單元數量為主要方式，並非依賴改變技術或提高平均產量。

1850年以前的歐美工業擴張，主要靠原始工業化，而且多半發生在貧窮的農村地區，並非發生在城鎮。原始工業化是歐美人口迅速成長的主要原因，當時農村工業多半在農地貧瘠、就業率偏低，或較易輸送廉價產品到都市市場的地區成長。原始工業化也引發了若干人口上的議題。第一，人口迅速成長如何定期在廉價勞動力通過農村製造業與都市市場聯繫之前就發生了？第二，在農村工業中就業機會能否降低結婚年齡、提高生育率、縮小家庭成員數量，演變到以小家庭為主？第三，上述過程是否不對稱呢？增加就業機會帶來人口快速成長，那麼就業機會縮減是否帶來貧困呢？換言之，依賴工資的工業人口是否較農業人口容易受傷害呢？上述這三個問題到底到甚麼程度能夠檢驗出這些趨勢在農村製造業中顯現得較多，抑或在那些不擁有土地的農村勞動力中顯現得較多，是我們值得思考的議題。1900年以前造成歐洲人口迅速成長的人口轉型主要發生在農村無土地者身上，因此研究原始工業化在人口轉型中的角色可幫助我們瞭解西方的人口轉型。

原始工業化和農業中無土地勞工的增長，使農村人口所經歷的經濟經驗大同小異，愈來愈多的人口同時針對相同的價格、工資和就業機會的浮動作出反應。這類轉變顯示遷移樣式的改變，在歐美並無證據證明大規模的工業化提高人們遷移的頻率，不過遷移距離顯著地增加。

今日第三世界高人口成長率受其本國特殊組織與結構的影響

遠低於受其與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的影響。一些有關生育率與經濟依賴程度的證據，以及第三世界針對主要出口貨品價格浮動在生育率上所顯示的反應，都提供了支持此一說法的有力的證據。

有關人口與經濟關係的研究仍然是西方經濟史所探討的基本議題之一，有關人口轉變過程中的一些假設構成另外一套解釋工業革命的觀點。我們目前對這些人口轉變過程的不確定和忽視對人口研究提供了雙重的挑戰：一為如何詳細解釋和檢驗目前正在使用的各種模式；二為詳細說明轉變為城市工業人口的機制是甚麼？

人口構成要素，諸如生育、死亡和遷移，對人口成長的影響，主要由這三要素的變化情況決定，而這三要素可幫助社會科學分析社會與經濟史中的細節情況。譬如，在西方人口的無產階級化是指那些擁有主宰生產工具及方法的勞動力在比例上下降，同時那些依賴自己體力維生的比例上升，19世紀末之前無田產的勞動力多半發生在那些以工廠維生的無產階級之外的勞動者。正如馬克斯所瞭解的，無田產勞動者的數量在農業或農村工業地區增加，形成了歐洲龐大的無產階級；都市服務業及小規模的製造業佔據了多數非無產階級，受僱於工廠者是以後才產生的。這一類的研究對人口組成成分增長（components-of-growth）分析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到甚麼程度無產階級的成長是由於自然增殖，又到甚麼程度是由於階級流動所造成的？生育率與死亡率對此一情況的貢獻有多少？至於那些經由社會流動而成為無產階級的人，其中有多少是在其事業生涯中改變其職位的？有多少是非無產階級的子女轉變而成的？又有多少是由其他地區遷入到無產階級地區？

另一議題是有關西方的農村人口。西方農村人口是一羣自我管束的人口，他們在人口數量上的約束是通過聯結因婚姻與生育

所繼承的住所或地方而達到。當死亡率高，而其他情況不變時，人們經常開闢新的地方，那麼婚姻與生育率上升。一般而言，一對夫婦在生育上的決策過程可能如下所述：人們一旦能獲得較穩定的生計，即考慮結婚，隨着子女活存機率調整所生育子女數，然後隨着在每個子女身上的投資而調整核心家庭的大小。在死亡率長期下降的情況下，在農村生活的人口開始由高生育水平轉向低生育水平，但向外遷移的機會可使上述由高轉向低生育水平的過程緩慢進行。如果子女能夠找到很好的就業與個人事業發展的機會，那麼可能加速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因而父母開始在生育子女上，重質而不重量。不過農業人口和農村工業勞工又另當別論，如果這些人口在年輕時能獲得永久的生計，而且幾乎每個家戶成員都可找到有報酬的工作，當然多生多育對其家庭幫助更大，因此反而促進人們早婚多育。

中國改革開放後，有的地區走向密集的農村工業，有的地區走向勞力密集的農業和飼養業，但就業機會都逐漸增加，是否在這些地區曾出現早婚多育的情況呢？農村地區生育率又是如何下降的呢？在歐洲於 18、19 世紀時期，生育率在農村地區下降主要是由於農村人口中以工資維生的勞動機會逐漸減少所造成。最初此一情況發生在農村製造業，然後蔓延到農業人口。簡而言之，農村地區生育率下降最初發生在農村工業勞工身上，進而蔓延到農村以工資維生的勞工身上，最後推廣到農人身上。如果農人在死亡率下降的情況下逐漸開始控制他們的生育率，而非農人的農村人口則針對就業機會做反應，其淨效應則應是帶來非常迅速的生育率下降，當然人口外移和社會階層流動性偏高會使上述情況複雜化。

一旦農村的經濟開始發生變化，到底農村以工資維生的勞工以及遷移到城市的子孫的生育率如何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若

要生育率大規模地下降，農村人口必須脫離馬爾薩斯的思維邏輯，他們的生育觀必須與遷移到城市的人口生育觀符合。當然此一轉變是緩慢的，但對那些遷移到城市的人口而言，此一過程則可能很快，因為他們在城市中必須花很大的代價才能扶助他們的子女將來有好的前途。短期而言，有關生育的決策不會改變，但差異在於就業機會可能改變行為；長期而言，社會情況改變很大，因此會改變有關生育的決策。

以上曾述及在人口轉型研究中除了重視個人、家戶之外，也應重視所處的大環境，諸如親屬網等等。

在討論無產階級化時，此一過程完全取消了以就業、家戶地位、婚姻、生育、財產繼承，以及維持家戶的延續所建立的關係。由於關係削弱或取消，保存或繼承家戶財富的壓力也隨之減低，因此對生育的限制也減弱，子女在外就業機會增加，使得家戶經濟情況改善，父母養兒防老的目的更易達到。此一觀點以家戶為分析單元，但在分析過程中未考慮家庭為了保存和節用財產所可能帶來的壓力。

為甚麼父母會擔憂家庭財產的保存與節用或家庭企業的延續呢？其中部分答案是與所生子女有關，部分與父母在有生之年所希望獲得的報答有關，當然有些是我們至今仍然困惑的部分，它們包括一為經濟安全感，目前辛勤工作，老年時有足夠保障；二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相互照應；三為傳宗接代；四為在社會中具有價值的自我感覺。

在人口生育轉變理論討論中，一般把生育情況劃分為無控制和控制兩類型的理想型社會。在前類社會，主要管制生育的是結婚年齡，何人在何時結婚視個人經濟機會與條件、達到婚齡的男女人數和社會壓力而定。生育率間接地針對社會環境的改變而反

應；在後類社會，夫婦依據個人意願和避孕技術決定生育數量，現代化提供了這些技術，使他們的意願能夠實現。

至於前曾述及的「自然生育」是無控制生育社會中的另一版本。作為當前基礎模式，在自然生育狀況下，婦女依據經濟條件、婚姻安排，以及性行為樣式決定生育子女數，但不通過有意識的避孕控制生育。因此，在實際情況中，任何社會越偏離此一模式，則愈具有控制生育的情況。作為歷史模式，在 18 世紀末之前，歐洲僅有少數羣體具有避孕的知識及意願，當時生育率的浮動，主要是取決於婦女生殖狀況的變化、婦女死亡率的升降，以及婚姻率的起伏，至於那些不是因為有意識控制生育的性行為變化對生育率的浮動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一直到法國大革命開始，若干農村地區人口才開始有意識地控制生育，到了 19 世紀，此一風氣才迅速擴大到全歐洲而且是無法逆轉的，這才結束了自然生育的時代，邁入人口轉型期。

有些學者視無控制生育與控制生育社會是由社會控制轉向個人控制的社會，由個人在無意識的理性下符合社會所制定的行為規範裏行事轉向在工業社會中夫婦在有意識的理性狀態下行事。死亡率下降摧毀了工業化前的歐洲社會在無意識的理性下所進行的生育策略，因此死亡率下降幫助生育率的下降。現代化和有意識的，以經濟為主的理性廣泛散播主要是因為新觀念傳播的結果。

在上述轉變中，有一中間過程，其間勞工階層婦女通過就業機會自家庭控制中解放出來，使人們趨向尋求個人滿足為主，同時中產階級婦女在生育控制上起了帶頭作用。在這兩波浪潮衝擊之下，她們打破了過去在婚姻和生育上的約束。中間期始於生育率上升時、性行為增加時、避孕效益尚未改善時，終於生育率下

降時、避孕方法普及時。不過生育率在此期間的上升可能歸諸無產階級化和死亡率下降的短期效應。

過去有關生育轉變的研究多半以家戶為重點，但一般以家戶為分析單元時，多半假定它們以單一效用函數 (utility function) 作為決策判定的依據；此外，家戶通常有意改變其組成，俾便作為改變生育樣式或改變財富和照顧消費模式的另一選擇。

目前有關以家戶為單元的生育研究所面臨理論上的挑戰是過去所提出的那些經濟模式能否適應目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是否需要新的模式，包括多重的效用函數，變化中的家戶組合，新的性行為和組合，生育控制上的區域差異，以及家戶成員的多方面就業機會在內。

受到嚴厲批評的人口轉型論若不着重分析長遠的生育與死亡變遷的話，是無法再受重視。到甚麼程度農人能自我均衡——如果程度很深，那麼其均衡過程如何運作——這個問題對經濟史和當代人口分析都十分重要，與此有關的則是無產階級化是否具有強大的力量提升自然成長率，同時此一觀點能否適用於古今。若能夠，如何適用？人口成長、勞動力的供給、消費者的需求、經濟成長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如何釐清，也是一大挑戰。應仔細地檢驗古今中國在何地、何時生育率下降，以及生育率是如何下降的。是否有些重要的事蹟發生在城市呢？是否有些革命性的態度使得人們迅速地改變有關生育方面的行為方式呢？而這些革命性的態度又是些甚麼呢？(Lavelly 和 Wong 1998；Lee 和 Campbell 1997；Harrell 1995)

針對那些都市化和工業化為主的社會，當初由農業人口轉向都市工業人口時是通過甚麼人口過程達到呢？甚麼因素導致生育率長期的轉變，又在同一地區甚麼因素影響生育率的浮動呢？針對這兩個重要問題，社會科學發展出兩套理論：第一套認為新舊

體制之間無連續性，因此演變出三個說法，一為探索傳統或工業化前的人口體系的動態情況；二為探討現代或工業化人口體系的動態情況；三為探索上述二類之間的過渡情況。在探討都市工業人口時，最典型的模式包括一個農業經濟所要求的勞動力、大規模工業生產所需求的勞動力，以及一個現代化的模式——包括傳播、資本累積、企業的創辦、組織結構上的創新、技術上的改進。在探討生育率轉變上，則包括自然的社會控制或傳統的生育行為、個人控制或現代的生育行為，以及一個由後者取代前者的過程，這個過程基本上是意識形態上的改變過程，技術提升的過程，或者其他過程。

第二套理論視長期與短期的動態變化皆為同一基本規則的結果，因此強調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連續性。在探討都市工業人口時，科技發明、資本累積、投資、組織結構轉型，由內部動態變化或外部，包括死亡率的改變、所造成人口組成的改變、大眾傳播的改善、制度產權的轉移，以及政治權力的改變均應同時在分析中兼顧。在探討生育率變遷上，包括那些依據一套不常改變的效用函數擴大個人或家戶利益，而這些效用函數又因社會受到不同的限制，在短期和長期內均可能改變。

如何在這兩套理論上取捨則視各個理論中所考慮的變數之間的關係是否很迅速地由一個領域改變到另外一個，迫使我們針對這兩個領域發展新的理論。主張有延續性的學者認為這是一個實證問題，也就是，如果一個模式在第一個領域中非常適用，是否同樣的在第二個領域中有效地適用呢？他們也認為這是圖其方便，也就是在那一個通則層次，它是最容易或最有效提供說服力呢？而那些主張無延續性的學者則認為所有的理論模式均受當時時空及起源限制，質疑這些模式所依據的假設、實證研究的含義在新領域或現象中的適用程度。任何模式內部的運作會約束新模

式內部的運作。因此所有的發展模式在描述每個不同的人口時，基本上認為這些社會均以同一方式經歷同一套變遷是違反了那些主張各個社會有異的原則。事實上，我們需要的理論應該使該人口的經驗在同一時間關聯到若干個不同的人口所經歷的過程。我們不希望看到學者依據一般西方國家的經驗推斷出一套標準化的人口轉型順序，而且運用到今日發展中國家；希望喚起學者注意無產階級化在全世界人口轉變過程中的角色，尤其當世界上各個地區的相互依賴程度已增加；我們希望看到那些探討都市—工業轉型和生育轉變模式的研究中能夠考慮到不同人口之間相互依賴的形式及程度。簡而言之，我個人較偏好理論的延續性，但必須把時間序列考慮在內。

樂觀論者認為世界人口有能力自我節制，而悲觀論者對今日第三世界中那些尚無法有效控制生育的高生育率國家抱持懷疑態度，不過仍相信只要現代化一旦開始，生育率將會自動下降。

十 總結

人口轉型論由 Warren S. Thompson (1929) 提出，不過當時未受到重視，一直到 Frank W. Notestein (1945) 和 Kingsley Davis (1945) 重新提出後，不斷地受到人口學者的討論與修改，主要原因有下列幾點：一，20 世紀 50 年代社會學界有關現代化理論受到 Parsons 的結構功能觀點的影響，而倡導人口轉型論的 Notestein 在 1949 年開始修改轉型論時無形中也受到 Parsons 觀點的影響，因此人口轉型論對現代化理論中的一些理論也有其貢獻。但是社會學家 Robert Nisbet (1969) 早已指出 Parsons 以進化論觀點為依據的功能主義學派，在實證探討社會和歷史變遷中的因果上是不適當的，同時還具備錯誤的方法論架構。Parsons 分析社會變遷的架構僅是 19 世紀社會進化主義觀點而已，主要依賴陳舊不可

靠的比較方法，而該方法試圖把人羣或社會依據一條時間序列的直線加以分類，但無法提供一個既豐富又具有啟發性的有關具體社會的實際和歷史變遷的實證研究，主要在於該方法僅能在抽象的類型和時期上做文章。簡而言之，Parsons 所發展出的變遷理論並非探討變遷，僅是把變遷的類型加以劃分而已。現代化及其理論依據——功能主義——在 20 世紀 50 年代到 70 年代毫無疑問地主宰着當時社會科學的主流發展，人口轉型論的發展也深受此一趨勢的影響。

二，統計分析技術在社會科學實證研究中很受到重視，而人口學在社會科學中又特別重視量化實證研究，再加上電腦科技的迅速發展，都使得量化實證研究成為一時風尚。但是探測宏觀關係的統計方法一直無法成為嚴謹的探討因果關係的依據。自機率和歸納觀點而言，統計分析僅能告訴我們變數之間可能具有的相關程度，但無法幫助我們決定其因果關係。而二次大戰後依據 Notestein 等人的人口轉型論，在研究生育率轉變以及概念架構上，均無法引發有關變遷起源的可駁斥的實證假設。更重要的是以現代化為主的人口轉型論本身在概念發展上就是含混的，它無法形成有關生育率轉變的明確和能檢驗的可能因素的種種假設，因此在此一不得要領的理論架構中所產生的各種實證研究成為無止境的迷陣。而那些探討生育率下降因素的人口學者們則陷入是經濟因素抑或文化因素較重要的論戰之中。

三，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和雄厚財力支持的國際上對轉型論的需求，這些國家及國際組織需要依據轉型論推論出有關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與貫徹方法。人口轉型論在此情況下繼續不斷為實踐主義者提供政策上的理論基礎，同時也成為各種政策效果之下預測未來人口的方便工具。

Dennis Hodgson (1983) 和 Paul Demeny (1988) 均意識到，

在過去三四十年之間人口科學的不良發展趨勢，受到短暫的、目標狹窄的、政策導向的研究影響。他們注意到人口學領域中存在着那些着重政策為目的的研究與追尋科學知識為目的的研究之間的緊張關係。

對Notestein而言，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人口轉型論不僅可說明在西方已發生的人口變遷情況，同時強烈地隱含在其他區域可能發生的變遷，進而也指出在其他地區變遷應走的方向。他的觀點主要依據美國長期的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利益以及他個人自人道立場的考慮。

這些考慮觸發我們思考科學研究的意義為何，尤其以社會和人口問題為研究課題。20世紀50年代時人口學者們多半以實證主義觀點做為理解人口變遷的依據與探討方法，基本上是符合具有前提的演繹論思路。做為以經驗視察為主的實驗方法的版本之一，此一思路在本質上是與牛頓當初用來分析地球引力的方法相似，後來由John Stuart Mill加以整理編纂發表於1843年的《邏輯系統》(*System of Logic*)一書中。

此一思維方式假定可以預先詳細說明所有限制研究主題的初始狀態，因而可想像為一閉鎖的體系。而方法本身則有能力推出標準化的有關體系內各實體之間因果關係的資料。在原則上，此一思維方式並不認為研究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具有任何差別，認為解釋與預測應是一物的兩面，因此對某一現象有解釋的能力就能產生支配及控制的力量。

雖然此一思維方式在社會科學中繼續不斷地被人們採用，但它僅是科學研究中的一個概念和觀點而已，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的人口學者基本上以此思維方式做為理解科學的依據。不過發展至今至少有三大思維學派存在於社會科學研究之中，它們是：演繹論(deductionist)、情境闡釋論(contextualist或inter-

pretative 或 hermeneutic) 和各種形式的寫實論 (realist) (Szreter 1993)。我們已大略討論了演繹論的觀點，情境闡釋論完全否定演繹論所依賴的各種前提的論點，尤其認為在探討社會現象時，更不能預先設定前提。他們認為對指定的初始情況不應設定任何假設；研究的現象與研究者之間相互影響對方，因此都成為變數；有關目的、動機、意義和符號的材料都是研究的基本議題。此一學派覺察到那些支配社區中各個行動者生活的概念及其內在意義均為研究分析的重要材料。

寫實論觀點主要認為個人與其所生活的社會之間相互影響，因果關係是相互的。個人與他生活的社會和接觸的文化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和依附的。它們引發也轉移和改變現存的制度結構，而這些制度結構對它們有制約作用，也是變遷的泉源。若要達到因果瞭解的目的，僅由社區成員內心中的概念世界去探索是不足的，因為他們所處的自然與文化環境或受到的衝擊本身都可能是重要的因果影響力。寫實論者認為排除對信仰、觀念和意圖之間的互動的理解是誤導，是不正確的。

情境闡釋論者與寫實論者都一致認為社會問題的本質在於它的產生是公開的、不定的，以及多變的，因此必須研究這些特質，不能像實證論者所倡議的，僅僅做一些假設。科學研究與闡釋的目的，以及所採用的方法都是為了達到理解的目的，並非為了預測與控制。

本文已討論了最近研究生育轉變和人口轉型的思想史和「科學」研究的得失，尤其在考慮研究目的上，是為了科學知識的累積抑或為了政策干預或操縱社會走向。由過去三四十年中人口轉型論的發展可看出它的主要長處及功能一直是在提供一個以圖表為主的、描述和預測長期的人口變遷模型。但是正如同 Nisbet (1969) 所言，此類總結性的描述無法提供必須的協助和洞察力，

以便幫助我們解釋這類變遷是如何發生的，或者在哪種情況下發生的。

生育轉變的研究需要自抽象的人口概念或生育轉型以及其他有關的概念中解脫出。這個領域應該對目前社會和歷史學所追尋一些較廣闊的科學方法加以重視，本文已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具體的建議。我們需要的是耐心，對情境的謹慎研究、對社區中生育轉變的調查項目的設計與探索，同時不要對生育轉變的形式有先入為主的看法。如此才能對各個社區的生育行為的轉變進行探討，才能通過地方、文化和制度，包括語言、價值觀和角色種種因素檢驗所發生的經濟和政治變遷力量。若欲全面瞭解生育轉變，必須由歷史資料重組當時在某些具體情境中，人們如何衡量生育子女的相對成本，而改變其生育觀念與行為。對各種變遷的發生過程，必須能夠詳細正確地掌握，這才是研究人口轉型與生育轉變的正確方向。我個人認為未來在研究生育轉變的原因上，較有前途的方式應該是以廣闊的寫實論方法為主的歷史與實證研究，徹底地探索和瞭解生育子女相對成本觀轉變的來龍去脈。

部分西方中國問題學者中外文姓名對照

Deborah Davis	戴慧思
John King Fairbank	費正清
Philip C. C. Huang	黃忠智
Richard Madsen	趙文詞
Ethan Michelson	麥宜生
Victor Nee	倪志偉
Jean Oi	戴慕珍
Michel Oksenberg	歐邁可
William Parish	白威廉
Thomas Rawski	羅斯基
Jonathan Unger	安戈
Ezra Vogel	傅高儀
Andrew Walder	魏昂德
Martin King Whyte	懷默霆

英文參考文獻

- Alexander, Jeffrey C. 1990. Analytic Debates: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Culture. In Jeffrey C. Alexander and Steven Seidman (eds.),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msden, A. 1979. Taiwan's Economy History: A Case of 'etatisme'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 *Modern China* 5: 341-79.
- Andors, P. 1983. *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Anker, Richard, Mayra Buvinic, and Nadia H. Youssef (eds.). 1982. *Women's Roles and Population Trends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Croom Helm.
- Arato, Andrew. 1981. 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Poland, 1980-1. *Telos* 47: 23-47.
- Arkush, D. 1989. Love and Marriage in North Chinese Operas. In P. Link, R. Madsen, and P. 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 Arrow, Kenneth J. 1974.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NY: Norton.
- Ashton, B., Piazza, A. Hill, and R. Zeitz. 1984. Famine in China, 1958-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 613-45.
- Baker, Hugh. 1968. *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77. Extended Kinship in the Traditional City. In G.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79.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anister, J. 1987.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rert, R. and M. K. Whyte 1982. Dependency Theory and Taiwan: Analysis of a Deviant Ca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1064-89.
- Becker, Gary S. 1960.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 Conference of Universities — National Bureau Committee for 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p. 209-31.
- Beijing Review*. 1995. China's Current Marriage Patterns. (August 14-20), p. 11.
- Bellah, Robert. 1970. Father and Son in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In Robert Bellah. *Beyond Belief*. New York, NY: Harper and Row, pp. 76-99.

- Ben-Porath, Yoram. 1979. Family Functions and Structur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xchange.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ssues for the 1980*. Liege: IUSSP.
- Berger, Peter L. and Thomas Luckmann.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NY: Doubleday.
- Bernstein, T. F. 1977.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84.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Theory and Society* 13: 339–77.
- Bian, Yanjie. 1994a. *Guanxi* and the Allocation of Jobs in Urban China. *China Quarterly* 140: 971–99.
- . 1994b.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June): 266–85.
- . 1998. Getting a Job through a Web of *Guanxi*. In Barry Wellman (ed.),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Boulder, CO: Westview, pp. 255–78.
- and John R.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739–58.
- and Soon Ang. 1997. *Guanxi* Networks and Job Mobility in China and Singapore. *Social Forces* 75: 981–1005.
- Blau, Peter M. and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 Blau, Peter M. and D. Q. Ruan. 1989. Social Mobility in Urban China and Americ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Blau, Peter M., Danqing Ruan, and Monika Ardel. 1991. Interpersonal Choice and Networks in America and Urban China. *Social Forces* 69: 1037–62.
- Blaut, J. M. 1993.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Blecher, M. 1976. Income Distribution in Small Rural Chinese Communities. *China Quarterly* 68: 797–816.
- and White, G. 1979. *Micro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hite Plains, NY: Sharpe.
- Bledsoe, Caroline. 1980. *Women and Marriage in Kpelle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0. The Politics of Children: Fosterage and the Social Management of Fertility Among the Mende of Sierra Leone. In W. Penn Handwerker (ed.), *Births and Power: Soci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p. 81–100.

- . 1993. The Politics of Polygyny in Mende Education and Child Fosterage Transactions. In Barbara Diane Miller (ed.), *Sex and Gender Hierarch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70–92.
- , Allan G. Hill, Umberto D'Allesandro, and Patricia Langerock. 1994. Constructing Natural Fertility: The Use of Western Contraceptive Technologies in Rural Gamb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 81–113.
- Boisot, Max and John Child. 1988. The Iron Law of Fiefs: Bureaucratic Failure and the Problem of Governance in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3: 507–27.
- . 1996. 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 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 600–28.
- Bongaarts, John. 1978.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Proximat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 105–32.
- Boserup, Ester. 1965.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Chicago, IL: Aldine.
- Bott, Elizabeth. 1957.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 Roles, Norms, and Relationships in Ordinary Urban Families*. London: Tavistock.
- Bourdieu, Pierre. 1977a. Marriage Strategies as Strateg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 R. Forster and O. Ranum (eds.), *Family and Society: Selections from the Annal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117–46.
- . 1977b.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adley, Candice. 1993. Altered Promises and Changed Expectations: Fertility and the Decline of Bridewealth in Kenya.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meetings, Washington, D. C.
- . 1994. Declining Fertility and Wealth Flow in Maragoli. In Thomas Weisner, Candice Bradley, and Philip Kilbride (eds.), *African Families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 Change*. Westport, CT: Greenwood.
- Brandon Tuma and Phyllis Moen. 1997.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Shift Patterns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339–65.
- Buck, J. L. 1930. *Chinese Farm Economy*. Nanking: University of Nanking.
- Burns, John P. 1988.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t, Ronald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M. Minor (eds). 1983. *Applie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Cain, Mead. 1981. Risk and Insurance: Perspectives on Fertility and Agrarian Change in India and Bangladesh.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7(3): 435–74.
- . 1982. Perspectives on Family and Fer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opulation Studies* 36(2): 159–75.

- . 1986. The Consequences of Reproductive Failure: Dependence, Mobility, and Mortality Among the Elderly of Rural South Asia. *Population Studies* 40(3): 375–88.
- , Syeda Rokeya Khanam, and Shamsun Nahar. 1979. Class, Patriarchy, and Women's Work in Bangladesh.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5(3): 405–38.
- Caldwell, John C. 1976. Toward a Restatement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3/4): 321–66.
- . 1978. A Theory of Fertility: From High Plateau to Destabiliza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4): 553–77.
- . 1982.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 London: Academic Press.
- Calhoun, Craig. 1994.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rter, Anthony T. 1984. Sex of Offspring and Fertility in South Asia: Demographic Variance and Decision Procedures in 'Joint Family' Households.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9: 273–90.
- Cashdan, Elizabeth A. 1985. Natural Fertility, Birth Spacing, and the Fir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87(3): 650–3.
- Cauley, Jon and Todd Sandler. 1992. Agency Theory and the Chinese Enterprise Under Reform. *China Economic Review* 3, 39–56.
- Chamberlain, Heath B. 1993.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19 (2): 199–215.
- Chan, Anita. 1985. *Children of Mao*.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 1994.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in Search of a Solution. In David S. G. Goodman and Beverley Hooper (eds.). *China's Quiet Revolution: New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p. 162–93.
- ,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1984.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hina Quarterly* 83: 397–446.
- Chan, Kam Wing. 1994.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6. Post-Mao China: A Two-Class Urban Society in the Ma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 134–50.
- and Xueqiang Xu. 1985.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1949: Reconstructing a Baseline. *China Quarterly* 104: 583–613.
- Chemmanur, Thomas J. and Paolo Fulghieri. 1994. Investment Bank Reputation,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49: 57–79.

- Chen, Chih-jou Jay. 1999. Lo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 Southern Fujian. In J. Oi and A.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press.
- Chen, Xiangming. 1987. Magic and Myth of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China.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2 (3): 57-77.
- Chen, Xiangming. 1988. Giant Cities and the Urban Hierarchy in China. In Mattei Dogan and John D. Kasarda (eds.), *The Metropolis Era: A World of Giant Citi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pp. 225-51.
- . 1991. China's City Hierarchy, Urban Policy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in the 1980s. *Urban Studies* 28 (3): 341-67.
- . 1994. The New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mmodity Chains in the Greater South China Economic Region. In Gary Gereffi and Miguel Korzeniewicz (eds.),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p. 165-86.
- . 1998. China's Growing Integration with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In Arif Dirlik (ed.), *What Is in a Rim?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acific Region Ide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187-217.
- and William L. Parish. 1996. Urbanization in China: Reassessing an Evolving Model. In Josef Gugler (ed.),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1-90.
- Chesneaux, Jean. 1965.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ild, John and Yuan Lu. 1996.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Economic Reform: The Case of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China. *Organizational Science* 7: 60-77.
- Chin, Ai-li S. 1966.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Family Relations: Analysis of Kinship,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Communist Stories*. Cambridge, MA: M. I. 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 Chow, Tse-tsung. 1960.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aller, Walter. 1972. How I Discovered the Theory of Central Place: A Report About the Origin of Central Places. In Paul Ward English and Robert C. Mayfield (eds.), *Man, Space, and Environment*.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01-10.
- Cladwell, John C., P. H. Reddy, and Pat Caldwell. 1982. The Causes of Demographic Change in Rural South India: A Micro Approach. *Population Development Review* 8 (4): 689-727.
- Cleland, John. 1985. Marital Fertility Declin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ories and Evidence. In John Cleland and John Hobcraft (eds.), *Reproductive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sights from the World Fertility Surv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3-52.
- and Christopher Wilson. 1987. Demand Theories of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An Iconoclastic View. *Population Studies* 41(1): 5-30.

- Coase, Ronald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386–405.
- Cohen, Myron. 1976.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1992a. Family Organization in China. In M. Cohen (ed.), *Case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NY: Sharpe.
- . 1992b. Family Management and Family Divis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China Quarterly* 130: 357–77.
- Coleman, James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95–S121.
- Comaroff, John and Simon Roberts, 1981. *Rules and Processes: The Cultural Logic of Dispute in an African Contex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nnell, Robert W. 1985. Theorizing Gender. *Sociology* 19: 260–72.
- Conroy, Richard. 1987. Patterns of Divorce i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7: 53–75.
- Croll, Elizabeth. 1981. *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4a. Marriage Choice and Status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J. L. Wats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5–7.
- . 1984b. The Exchange of Women and Property: Marriage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In R. Hirschon. (ed.), *Women and Property—Women as Property*. London: Croom Helm.
- Cui, Lili. 1995. Sex Education No Longer Taboo. *Beijing Review* (April 3–16): 15–8.
- Davis, Deborah S. 1988a. Unequal Chances, Unequal Outcomes: Pension Reform and Urban Inequality. *China Quarterly* 114: 223–42.
- . 1988b. The Impact of Post-Mao Reforms on Job Mobility in Chinese Citi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ed.). 1999. *The Chinese Consumer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hcoming.
- ,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J. Perry. 1995.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Kingsley. 1945. The Worl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237: 1–11.
- Davis-Friedmann, Deborah. 1983. *Long Lives: 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85.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ie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1: 177–201.
- . 1991. *Long Liv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Graaf, Nan Dirk, and Hendrik Derk Flap. 1988.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Social Resources as an Explanation of Occupational Status and Income in West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67: 452-72.
- Demeny, Paul. 1988. Social Science and Population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3): 451-79.
- Ding, X. L. 1994a. Institutional Amphibiousnes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The Case of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3)(July, 1994): 293-317.
- . 1994b. *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China: Legitimacy Crisis, 1977-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gan, Mattei and Dominique Pelassy. 1984. *How to Compare Nations: Strateg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 Easterlin, Richard A. and Eileen M. Crimmins. 1985. *The Fertility Revolution: A Supply-Demand Analysi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asterlin, Richard. 1978. The Economic and Sociology of Fertility: A Synthesis. In Charles Tilly (ed.).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anging Ferti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57-133.
- Eberstadt, N. 1988. *The Poverty of Commun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Ebrey, Patricia B. 1978.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1. Introduction. In R. Watson and P. Ebrey. (eds.).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isenstadt, S. N. 1996. *Japanese Civilization: A Comparative View*.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lvin, Mark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1974.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ntwisle, Barbara, Gail Henderson, Susan Short, Jill Bouma, and Zhai Fengying. 1994. Gender and Family Businesses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No. 1: 36-57.
- Erzioni, Amatai. 1961.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Eysenck, H. 1976. *Sex and Personality*.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Fairbank, John King. 1986.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NY: Harper and Row.
- Falkenheim, Victor. 1978.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Problems of Communism* 27(3): 18-32.
- (ed.). 1987. *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Fan, C. Cindy. 1996.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Internal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8(1): 28-45.

- Fei, Hsiao-tung. 1962. *Peasant Life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Fei, Xiaotong. 1992 [1949].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erree, Myra Marx. 1990. Beyond Separate Sphere: Feminism and Family Researc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4): 866–84.
- Fillis, John., Louise A. Tilly, and David Levine (eds.) 1992.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of Declining Fertility, 1850–1970: The Quiet Revolution*. Cambridge: Blackwell.
- Finkle, Jason L. 1976.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Population Issue: Organizational Valu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 (3/4): 367–93.
- . 1985. Ideology and Politics at Mexico Cit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198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1 (1): 1–28.
- Finkle, Jason L. and Alison McIntosh (eds.). 1994. The Politics of Family Planning in the Third World. Supplement to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
- Finkle, Jason L. and Barbara B. Crane. 1975. The Politics of Bucharest: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1): 87–114.
- Foster, Harold D., David Chuenyan Lai, and Naisheng Zhou (eds.). 1998. *The Dragon's Head: Shanghai, China's Emerging Megacity*. Canadian Western Geographical Series, Vol. 34, Western Geographical Press.
- Francis, Corinna-Barbara. 1996. Reproduction of Danwei Institutional Featur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The Case of Haidian District's Hi-Tech Sector. *China Quarterly* 147: 839–59.
- Freedman, Maurice. 1958.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 .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London: Athlone Press.
- . 1968.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eman, Linton C. and Danching Ruan. 1997.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and Role Relationships. *L'Année Sociologique* 47: 89–115.
- Fried, Morton H. 1969 [1953].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in a Chinese County Seat*. New York, NY: Octagon Books.
- Friedmann, John.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 (1): 69–84.
- Fuchs, Rachel G. and Leslie Page Moch. 1990. Pregnant, Single, and Far From Home: Migrant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Par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5: 1007–31.
- Gaubatz, Piper Rae. 1996. *Beyond the Great Wall: Urban 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Fronti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lls, John R., Louise A. Tilly, and David Levine (eds.). 1992.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of Declining Fertility, 1850-1970: The Quiet Revolution*. Cambridge: Blackwell.
- Gilmartin, C. 1990.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J. Lipman and S. Harrell (eds.), *Violence in China*.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Goffman, Erving. 1961. *Asylums*. London: Penguin.
- Gold, T. B. 1985. After Comradeship: 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104: 657-75.
- .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Y: Sharpe.
- Goldstein, Sidney. 1988. Level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 Mattei Dogan and John D. Kasarda (eds.), *The Metropolis Era: A World of Giant Citi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pp. 187-224.
- . 1990. Effects of Migration and Reclassifica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6(4): 673-701.
- Goldthorpe, J. E. 1984. *The Sociology of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ode, William. 1963.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Goodman, David S.G. 1989.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ouldner, Alvin W. 1955. Metaphysical Pathos and the Theory of Bureau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9: 497-507.
- Grafflin, D. 1981. 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9: 31-64.
- Granovetter, Mark. 1995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80.
- . 1974.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 Greenhalgh, Susan. 1990.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Fertility: 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6(1): 85-106.
- . 1994. Controlling Births and Bodies in Village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s* 21 (1): 3-30.
- (ed.). 1995. *Situating Fertility: Anthropology and Demographic Inqui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Jiali Li. 1995. Engendering Reproductive Policy and Practice in Peasant

- China: For a Feminist Demography of Reproduction.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0(3): 601–41.
- Griffiths, Franklyn. 1970. A Tendency Analysis of Soviet Policy-Making. In G. Skilling and F.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335–77.
- Guldin, Greg and Aidan Southhall (eds.). 1993. *Urban Anthropology in Chin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E. J. Brill.
- Guthrie, Douglas. 1997. Between Markets and Politics: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Refor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1258–1304.
- . 1998.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China Quarterly* 154: 254–82.
- Habakkuk, John. 1955. Family Structur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5: 1–12.
- Habermas, Jü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by Thomas Be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 M. I. T. Press.
- Hamilton, Gary. 1990. Patriarchy, Patrimonialism, and Filial Piety: 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Western Europ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1 (March): 77–104.
- Hammel, E. A. 1968. *Alternative Social Structures and Ritual Relations in the Balkans*. Englewood Cliffs, CA: Prentice-Hall.
- . 1985. Short Term Demographic Fluctuations in the Croatian Military Border of Austria, 1830–47.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1: 265–90.
- . 1994. Economics 1, Culture 0: Fertility Change and Differences in the North-west Balkans, 1700–1900. In Susan Greenhalgh (ed.), *Situating Fertility: Anthropology and Demographic Inqui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25–58.
- Harrell, Stevan. 1992. Aspects of Marriage in Three Southwestern Villages. *China Quarterly* 130: 323–27.
- (ed.). 1995. *Chinese Historical Microdem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nderson, G. E. and Cohen, M. C. 1984. *The Chinese Hospital: A Socialist Work Uni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nderson, Jeffrey. 1991. Urbanization in the Hong Kong-South China Region: An Introduction to Dynamics and Dilemm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5 (2): 169–79.
- Ho, D. 1986. Chinese Patterns of Socialization. In M. H. Bond (ed.).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87. Fatherhood in Chinese Society. In M. Lamb (ed.). *The Father's Role*.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 . 1989. Continuity and Variation in Chinese Patterns of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149–63.

- Hodgson, Dennis. 1965. English Popul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David C. Glass and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Chicago, IL: Aldine, pp. 269–84.
- . 1983. Demography as Social Science and Policy Scienc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9(1): 1–34.
- . 1988. Orthodoxy and Revisionism in American Demograph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4): 541–69.
- . 1991.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7(1): 1–34.
- Hodgson, Geoffrey M. 1994. The Return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N. J. Smelser and R.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58–76.
- Honig, Emily 1988. Women and Work in Urban Chi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and Gail Hershatter. 1988. *Personal Voic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ok, Brian (ed.). 1998. *Shanghai and the Yangtze Delt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ugh, Jerry F. 1977a. The Bureaucratic Model and the Nature of the Soviet System. In Hough. *The Soviet Union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49–70.
- . 1977b.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In Hough. *The Soviet Union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9–124.
- Hsu, Francis. 1943. The Myth of Chinese Family Siz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8: 555–62.
- . 1981. *Americans and Chinese*. Honolulu, HA: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su, Mei-Ling. 1996.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Luoyang and Guiyang. *Urban Studies* 33 (6): 895–910.
- Huang, Shu-min. 1992. Re-Examining the Extended Family in Chinese Peasant Socie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 25–38.
- Hwang, Kwangkuo. 1987.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4): 944–74.
- Ikels, Charlotte. 1996. *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cobs, J. Bruce. 1979. A Preliminary Model of Particularistic Ties in Chinese Political Alliances: *Kan-Ch'ing* and *Kuan-Hsi* in a Rural Taiwanese Township. *China Quarterly* 78: 237–73.
- and Lijian Hong. 1994. Shanghai and the Lower Yangzi Valley. In David S.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s.), *China Deconstructs*. London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pp. 224–52.

- Jameson, Frederic. 1987. The Politics of Theory: Ideological Positions in the Postmodernism Debate. In Rabinow and Sullivan (1987), pp. 351–64.
- Jankowiak, William. 1993. *Sex, Death, and Hierarchy in a Chinese Ci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Jefferson, Gary H. and Thomas G. Rawski 1994.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 47–70.
- Jensen, Michael and William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305–60.
- Johnson, Chalmers. 1970. Comparing Communist Nations.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32.
- Johnson, D. 1977. The Last Year of A Great Cl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7: 5–102.
- Johnson, Graham. 199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Guangd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Gregory Eliyu Guldin (ed.). *Urbanizing Chin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p. 185–219.
- Johnson, Kay Ann. 1983.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93. Chinese Orphanages: Saving China's Abandoned Girls. *Australia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July): 61–87.
- Johnson, Linda Cooke. 1993.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Judd, Ellen. 1992. Land Divided, Land United. *China Quarterly* 130: 338–56.
- Kasarda, John D. and Edward M. Crenshaw. 1991. Third World Urbanization: Dimensions, Theories, and Determinants. In W. Richard Scott and Judith Blake (e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Palo Alto, CA: Annual Reviews Inc., pp. 467–501.
- Kassof, Alex. 1964. The Administered Society: 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 *World Politics* 16: 558–75.
- Keister, Lisa A. 1998. Engineering Growth: Business Group Structure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404–40.
- Kennedy, Scott. (1997). The Stone Group: State Client or Market Pathbreaker? *China Quarterly* 152: 746–77.
- Kertzer, David I. 1984. *Family Life in Central Italy, 1880–191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Keyfitz, Nathan. 1984. Introduction: Biology and Demography. In Nathan Keyfitz (ed.). *Population and Biology*. Liege: Ordina Editions, pp. 1–7.
- King, Ambrose Y. C. 1985. The Individual and Group in Confucianism: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In Donald J. Munro (ed.).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fu-*

- cian and Taoist Values*.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p. 57–70.
- . 1988. Analysis of *Renqing*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Renqi Guanxi Zhong Renqing Zhi Fensi*). In Kuoshu Yang (ed.).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Zhongguren de Xinli)*. Taipei, Taiwan: Guiguan Press, pp. 319–45.
- Kirkby, Richard J. R. 1985.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 AD*. London: Croom Helm.
- Klatt, W. 1983. The Staff of Life: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977–81. *China Quarterly* 93: 17–50.
- Knodel, John. 1983. Natural Fertility: Age Patterns, Levels, and Trends. In R. A. Bulatao and R. D. Lee (eds.).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I.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pp. 61–102.
- and Etienne van de Walle. 1979. Lessons from the Past: Policy Implications of Historical Fertility Stud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5(2): 217–45.
- Kojima, Recitsu. 1995.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XXXIII* (2): 121–54.
- Krackhardt, David. 1992. 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 The Importance of Philos in Organizations. In Nitin Nohria and Robert G. Eccles (eds.).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pp. 216–39.
- Kraus, R. C. 1981.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1983. The Chinese State and its Bureaucrats. See Nee and Mozingo 1983, pp. 132–47.
- Kuan, Hsin-chi (ed.). 1994.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okyo: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 Kwok, R. Yin-Wang, William L. Parish, Anthony Gar-On Yeh, and Xueqiang Xu (eds.). 1990. *Chinese Urban Reform: What Model Now?* Armonk, NY: Sharpe.
- Lace, Jean. 1988. *Arithmetic Practices and Cognitive Theory: An Ethnographic Inqui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g, Olga. 1946.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rdy, N. R. 1983.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4. Consumption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978–83. *China Quarterly* 100: 849–65.
- Lasch, C. 1977.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Launay, Robert. 1982. *Traders Without Trade: Responses to Change in Two Dyula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4. The Power of Names: Illegitimacy in a Muslim Community in Côte

- d'Ivoire. In Susan Greenhalgh (ed.), *Situating Fertility: Anthropology and Demographic Inqui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8–129.
- Lavelly, William and R. Bin Wong. 1998. Revising the Malthusian Narrativ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pulation Dynam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3): 714–48.
- Lavelly, William and Xinhua Ren. 1992. Patrilocality and Early Martial Co-residence in Rural China, 1955–1985. *China Quarterly* 130: 378–91.
- Lee, Hong Yung. 1978.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 James and Cameron Campbell. 1997.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e, Keun. 1991. *Chinese Firms and the State in Transition: Property Rights and Agency Problems in the Reform Era*. New York, NY: Sharpe.
- Leibenstein, Harvey. 1975.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9: 1–31.
- Lesthaeghe, Ron J. 1980. On the Social Control of Human Reproduc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6(4): 527–48.
- and Johan Surkyn. 1988. Cultur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Theories of Fertility Chang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1): 1–45.
- Levy, Howard S. 1966. *Chinese Footbinding*. New York, NY: Walton Rawls.
- Levy, Marion. 1949 (1968). *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NY: Atheneum.
- Lewis, John Wilson (ed.). 1971.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Ling Hin. 1996. *Privatization of Urban Land in Shangha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 1983. *Son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NY: Knopf/Random House.
- Liang, Shuming. 1949. *The Essential Meanings of Chinese Culture*. Hong Kong: Zheng Zhong Press.
- Liang, Zai and Michael J. White. 1997. Market Transitio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1983–1988.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5: 321–39.
- Lieberthal, Kenneth G. 1992. Introduction: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nd David M. Lampton. 1992.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n, Na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Peter Marsden and Na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pp. 131–47.
- . 1990. 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al Mobility: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tatus Attainment. In Ronald Breiger (ed.).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47–71.
- . 1995.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24: 301–54.
- . 1998a. *Guanxi: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 Alvin So, Nan Lin, and Dudley Poston (eds.). *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Westport, CT: Greenwood.
- . 1998b. Social Exchange: Its Relational Basis. Paper read at the Sunbelt XVIII International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 May 28–31, Sitges, Spain.
- and Wen Xie. 1988.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793–832.
- and Yanjie Bian. 1991.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657–88.
- , John C. Vaughn, and Walter M. Ensel. 1981. Social Resources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Social Forces* 59: 1163–81.
- , Walter M. Ensel, and John C. Vaughn. 1981.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 of Ties: Structural Factors in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393–405.
- Linge, Godfrey (ed.). 1998. *China's New Spatial Economy: Heading Towards 20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k, Perry,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Pickowicz (ed.). 1989.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 CO: Westview.
- Lipton, Michael. 1977.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ogan, John R., Fuqin Bian, and Yanjie Bian. 1998.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Chinese Family: The Cas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Social Forces* 76(3): 851–82.
- Logan, John R. and Yanjie Bian. 1993. Inequalities in Access to Community Resources in a Chinese City. *Social Forces* 72(2): 555–76.
- Logan, John, Fuqin Bian, and Yanjie Bian. 1998.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Chinese Family. *Social Forces* 76(3): 851–82.
- Lowenthal, Richard. 1970. Development versu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3–116.
- Luo, Qi. 1997. Shanghai: The 'Dragon Head' of China's Economy. *Issues and Studies* 33(6): 17–32.

- Ma, Laurence J. C. and Chusheng Lin. 1993. Development of Town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3): 583-606.
- Mackerras, Colin (ed.). 1995. *Eastern Asia*. Melbourne: Longman.
- Madge, Charles. 1974. The Relevance of Family Patterns to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In Robert J. Smith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nthrop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dsen, Richard. 1984.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95.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98. *China's Catholics: 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nion, Melanie. 1996. Corruption by Design: Bribery in Chinese Enterprise Licensing.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2: 167-195.
- Mann, Susan. 1987. Widows in the Kinship, Class, and Community Structures of Qing Dynast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1): 37-56.
- . 1984. Urbaniz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China. *Modern China* 10(1): 79-113.
- March, James G. and Johan Olsen. 1984.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 734-49.
- Marsden, Peter V. 1990. Network Data and Measure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453-63.
- and Karen E. Campbell. 1984. Measuring Tie Strength. *Social Forces* 63: 482-501.
- and Jeanne S. Huribert. 1988. Social Resources and Mobility Outcomes: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Social Forces* 66: 1038-59.
- Martin, Emily. 1987. *The Women in the Body: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 Boston, MA: Beacon.
- Mason, Karen Oppenheim. 1986. The Status of Women: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Demographic Studies. *Sociological Forum* 1(2): 284-300.
- . 1987. The Impact of Women's Social Position on Fer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ciological Forum* 2(4): 718-45.
- McGee, T. G. 1991. 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s in Asia: Expanding a Hypothesis. In Norton Ginsburg, Bruce Koppel, and T. G. McGee (eds.),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Honolulu, H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3-25.
- McKenzie, R. D. 1927. The Concept of Dominance and World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28-42.

- McNicoll, Geoffrey. 1975. Community-Level Population Policy: An Explora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1): 1-12.
- . 1980.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Chang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6(3): 441-62.
- . 1984. Notes on the Local Context of Demographic Change. In *Fertility and Family: Proceedings of the Expert Group on Fertility and Family*. New York, NY: United Nations.
- . 1994.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 Kerstin Lindahl-Kiesling and Hans Landberg (ed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Alfred G. 1970. Theories of Convergence.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13-41.
- Meyer, John and Brian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340-63.
- Milgrom, Paul, 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0.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 The Law Merchant, Private Judges, and the Champagne Fair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 1-23.
- Montgomery, James D. 1992. Job Search and Network Composi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Hypothe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586-96.
- Moore, Henrietta L. 1988. *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urphey, Rhodas. 1974.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71.
- . 1980. *The Fading of the Maoist Vision: City and Country in China's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Methuen.
- . 1988. Shanghai. In Mattei Dogan and John D. Kasarda (eds.), *The Metropolis Era: Mega-Citi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pp. 157-83.
- Naughton, Barry.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e, Victor. 1973. Revolution and bureaucracy: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Nee, V. and Peck, J. (eds.), *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New York, NY: Pantheon, pp. 322-414.
- . 1983. Between Center and Locality: State, Militia, and Village. See Nee and Mozingo 1983, pp. 223-43.
- . 1985. Peasant Household Individualism. See Parish 1985, pp.164-90.
- . 1988. From Redistributive to Transactive Markets: Who Gets Rich First in a Socialist Mixed Econom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 1989a.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663-81.

- . 1989b. Peasant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in China. In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 (eds.),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9–207.
- .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663–81.
- . 1992.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 1–27.
- .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908–49.
- and James Peck (eds.). 1973. *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New York, NY: Pantheon.
- and Mazingo, D. (ed.). 1983.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nd Rebecca Matthews.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 401–35.
- Ness, Gayl D. and Hirofumi Ando. 1984. *The Land Is Shrinking: Population Planning in Asi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Nisbet, Robert. 1969.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Aspects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Development*, Part I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Y: Norton.
- .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Robert 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testein, Frank W. 1945. Population—The Long View. In Theodore Schultz (ed.), *Food for the Worl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36–57.
- O'Brien, Kevin. 1996.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22: 28–61.
- Osborne, Michael. 1986.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aris: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hadike, P. 1977. Socio-economic, Cultural, and Behavioral Factors in Natural Fertility Variations. In H. Leridon and J. Menken (eds.), *Natural Fertility*. Liege: Ordina, pp. 285–313.
- Oi, Jean C. 1985. Communism and Clientelism: Rural Politic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37, 2: 238–66.
- . 1986. Peasant Households Between Plan and Market: Cadre Control over Agricultural Inputs. *Modern China* 12: 230–51.
- .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99–126.
- . 1993. Reform and Urban Bia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9(4): 129–48.
- Oksenberg, Michel C. 1968. Occupational Group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in Review*.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Ono, Kazuko.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1850–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Oppong, Christine. 1983. Women's Roles, Opportunity Costs, and Fertility. In R. A. Bulatao and R. D. Lee (eds.),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I.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pp. 547–89.
- Orleans, Leo A. 1982.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Concepts, Conglomerations, and Concerns. In U. 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Washington, D. C., pp. 277–83.
- and Ly Burnham. 1984. The Enigma of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Asian Survey* XXIV (7): 788–804.
- Palmer, Michael. 1995. The Re-emergence of Family Law in Post-Mao China: Marriage, Divorce and Reproduction. *China Quarterly* 141 (March): 110–34.
- Pannell, Clifton. 1984. China's Changing Cities: An Urban View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Norton Ginsburg and Bernard A. Lalor (eds.), *China: The 80s Era*. Boulder, CO: Westview, pp. 192–221.
- Parish, William L. 1975. Soci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famil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 613–30.
- . 1981. Egalitarianism in Chinese Society. *Problems of Communism* 29: 37–53.
- .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 Wats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4–120.
- (ed.). 1985.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Y: Sharpe.
- . 1987. Urban Policy in Centralized Economies: China. In George S. Tolley and Vinod Thomas (eds.), *The Economics and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pp. 73–84.
- and Ethan Michelson. 1996. Politics and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042–59.
- and Martin Whyte. 1978.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Xiaoye Zhe, and Fang Li. 1995. Nonfarm Work and Market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China Quarterly* 143: 697–731.
- Park, Robert E. and Ernest W. Burgess.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rsons, Talcott. 1951.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 1966.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 1971.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Pasternak, B. 1972. *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dolny, Joel M. 1993. A Status-Based Model of Market Compet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829–72.
- Polanyi, Karl. (1944)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 Beacon.
- Potter, Joseph E. 1983. Effects of Societal and Community Institutions on Fertility. In R. A. Bulatao and R. D. Lee (eds.),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II.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pp. 627–65.
- Potter, S. and J. Potter. 1990.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Qian, Wenbao. 1996.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rookfield,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 Rabinow, Paul and William M. Sullivan (eds.). 1987.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Second Loo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pp, Rayna. 1990. Constructing Amniocentesis: Maternal and Medical Discourses. In F. Ginsburg and A. L. Tsing (eds.), *Uncertain Terms: Negotiating Gender in American Culture*. Boston, MA: Beacon, pp. 28–42.
- . 1991. Moral Pioneers: Women, Men, and Fetuses on a Frontier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In Micaela di Leonardo (ed.), *Gender at the Crossroads of Knowledge: Feminist Anthropology in the Postmodern Er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383–95.
- Rawski, Thomas G. 1994. Chinese Industrial Reform: Accomplishment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271–75.
- Retherford, Robert D. and James A. Paimore. 1983. Diffusion Processes Affecting Fertility Regulation. In R. A. Bulatao and R. D. Lee (eds.),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II.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pp. 761–96.
- Riley, Nancy. 1994. Interwoven Lives: Parents, Marriage, and *Guanxi* i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6: 791–803.
- Riskin, C. 1987.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Jean. 1985. Of Women and Washing Machines: Employment, Housework,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hood in Social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101: 32–57.
- Rona-Tas, Akos.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40–69.

- Rosaldo, Renato.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MA: Beacon.
- Roseberry, William. 1988. Political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161–85.
- . 1989. *Anthropologies and Histories: Essays in Culture,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Rosen, Stanley. 1982.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Boulder, CO: Westview.
- Rozman, Gilbert. 1974.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uan, Danching. 1998. The Content of the GSS Discussion Networks: An Exploration of GSS Discussion Name Generator in a Chinese Context. *Social Networks* (forthcoming).
- , Linton Freeman, Xinyuan Dai, Yunkang Pan, and Wenhong Zhang. 1997. O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China. *Social Networks* 19: 75–89.
- Salaff, Janet. 1971. Urban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 the Wak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John W. Lewis (ed.),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89–323.
- Salaff, Judith. 1973. The Emerging Conjugal Relationshi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5: 704–17.
- Sassen, Saskia.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hambaugh, David (ed.). 1994.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Schneider, Jane. 1984.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in a Sicilian Rural Town.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9(3): 245–73.
- Schotter, Andrew. 1981.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ultz, T. Paul. 1983. Review of John C. Caldwell,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9(1): 161–8.
- Schurmann, Franz. 1968.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71.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2nd edi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elden, M. 1985.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State. See Parish 1985, pp. 193–219.
- . 198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Socialism*. Armonk, NY: Sharpe.
- Selznick, Philip. 1952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A Study of Bolshevik Strategy and Tactics*. New York, NY: McGraw-Hill.
- . 1957. *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and Co..

- Shapiro, Carl. 1983. Premiums for High Quality Products as Returns to Reput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6: 659–79.
- Shenkar, Oded. (1996). The Firm as a Total Institution: 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 Studies* 17: 885–907.
- Shi, Tianjian. 199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irk, Susan L. 1982. *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84. The Decline of Virtuocracy in China. See Waston 1984, pp. 56–83.
- . 1993.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imon, Herbert A. 1957.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2nd edition). New York, NY: Macmillan.
- Siu, Helen F. 1989. *Agents and Victims: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90. The Politics of Growth: Pearl River Delta Experiences. In Kwok, R. Yin-Wang, William L. Parish, Anthony Gar-On Yeh, and Xu Xueqiang (eds.). *Chinese Urban Reform: What Model Now?* Armonk, NY: Sharpe, pp. 197–212.
- Skilling, Gordon. 1966.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18 (3) (April 1966): 435–51.
- . 1970.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Some Hypotheses. In H. Gordon Skilling and Franklyn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9–46.
- Skinner, G. Williams. 1964.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IV(1): 3–43.
- (ed.). 1977.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klair, Leslie. 1985. Shenzhen: A Chinese 'Development Zone' in Glob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6: 571–602.
- Smelser, Neil J. 1959.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mil, Vaclav. 1984. *The Bad Earth: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China*. Armonk, NY: Sharpe.
- Smith, Carol A. 1985. Theories and Measures of Urban Primary: A Critique. In Michael Timberlake (ed.).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Economy*.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pp. 87–117.
- Smith, David A. and Bruce London. 1990. Convergence in World Urbaniza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25: 574–90.
- So, Alvin Y. 1990.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World-Systems Theori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Solinger, Dorothy J. 1995. China's Urban Transient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ist 'Urban Public Goods Regime'. *Comparative Politics* 27(2): 127–46.
- Song, Fengxiang and Michael Timberlake. 1996. Chinese Urbanization, State Policy, and the World Economy.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18(3): 285–306.
- Stacey, Judith.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nd Barrie Thorne. 1985. The Missing Feminist Revolution in Sociology. *Social Problems* 32(4): 301–16.
- Stack, Steven. 1994. The Effect of Geographic Mobility on Premarital Sex.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6(1): 204–08.
- Sung, Lung-sheng. 1981. Property and Family Division. In E. Ahern and H. Gates.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zelenyi, Ivan.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 63–87.
- and Eric Kostello.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082–96.
- Szreter, Simon. 1993. The Idea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the Study of Fertility Change: A Critical Intellectual Histo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4): 659–701.
- Thadani, Veena N. 1978. The Logic of Sentiment: The Family and Social Chang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3): 457–99.
-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NY: Pantheon.
- .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Thompson, Warren. 1929. Pop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4(6): 959–75.
- Thurston, Ann. 1987. *Enemies of the People*. New York, NY: Knopf.
- Tian, Gang. 1996. *Shanghai's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Westport, CT: Praeger.
- Treiman, Donald J. 1970.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E. O. Laumann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 and Kam Bor Yip. 1989.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21 Countries. In M. L. Kohn (eds.). *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pp. 373–94.
- Tsui, Ming. 1989. Changes in Chinese Urban Family Structu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5(1): 737–47.

- Unger, Jonathan. 1982.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nflict in Canton Schools, 1949–1980*.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1984. The Class System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See Watson 1984, pp. 121–41.
- . 1985. Remuneration, Ideology, and Personal Interests in a Chinese Village, 1960–1980. See Parish 1985, pp. 117–40.
- and Anita Chan. 1995.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3: 29–53.
- Uzzi, Brian and James J. Gillespie, 1998.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Corporate Financing: The Benefits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Acquisition and Cost of Capital.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Networks, Duke University, October 3 to November 1.
- van de Walle, Etienne. 1992. Fertility Transition, Conscious Choice, and Numeracy. *Demography* 29(4): 487–502.
- Vermeer, E. B. 1982. Income Differentials in Rural China. *China Quarterly* 89: 1–33.
- . 1988.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ovincial China: The Central Shaanxi Since 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ogel, Ezra F. 1965.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21: 46–60.
- . 1967a. From Revolutionary to Semi-Bureaucrat: The 'Regularisation' of Cadres. *China Quarterly* 29: 36–60.
- . 1967b. Voluntarism and Social Control. In D. Treadgold (ed.),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 168–84.
- . 1969.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71. Preserving Order in the Cities. In John W. Lewis (ed.),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5–93.
- . 1989.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keman, Frederic, Jr., 1996.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der, Andrew G. 1978. *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 1979.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China. *Modern China* 5: 233–72.
- . 1982. Some Ironies of the Maoist Legacy in Industry. In M. Selden and V. Lippit (eds.),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Armonk, NY: Sharpe, pp. 215–37.

- . 1984.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49–1981. *Modern China* 10: 3–48.
- . 1985.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mmunist States: Reflections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1: 101–17.
- .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87. Wage Reform and the Web of Factory Interests. *China Quarterly* 109: 22–41.
- . 1989. Factory and Manager in an Era of Reform. *China Quarterly* 118: 242–64.
- . 1992.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524–39.
- . 1995a.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309–28.
- . 1995b.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263–301.
- . 1995c. The Quiet Revolution from Within: Economic Reform as a Source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Andrew G.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24.
- . 1996.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060–73.
- . 1997. Does China Face an Unstable Future? On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Rapid Growth. In Maurice Brosseau, Kuan Hsin-chi, and Y. Y. Kueh (eds.), *China Review 1997*.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327–48.
- and D. Q. Ruan. 1988. Wage Differences in Urban Tianjin, 1976 and 1986.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Wank, David L. 1993. *From State Socialism to Community Capitalism: State Power, Social Structure, and Private Enterprise in a Chinese City*.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 . 1995. Bureaucratic Patronage and Private Business: Changing Networks of Power in Urban China. In Andrew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53–83.
- . 1996. The Institutional Process of Market Clientelism: *Guanxi* and Private Business in a South China City. *China Quarterly* 147: 820–38.
- . 1999.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rwick, Donald P. 1982.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in Eight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6. The Indonesian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Government Influence and Client Choic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2(3): 453–90.
- Watson, J. L. (ed.). 1984.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tanabe, Shin. 1987. *Job-Search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le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 Watkins, Susan Cotts. 1987.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Europe and the Third World Compared. *Sociological Forum* 2(4): 645–73.
- . 1990. From Local to National Communit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mographic Regimes in Western Europe, 1870–196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6(2): 241–72.
- . 1991. *From Provinces into Nations: Demographic Inte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1870–196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1993. If All We Knew About Women Was What We Read in Demography, What Would We Know? *Demography* 30(4): 551–77.
- Watson, Andrew. 1987. The Family Farm: Land Use and Accumulation in Agricultur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7: 1–27.
- Watson, James. 1982.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 *China Quarterly* 92: 589–622.
- Watson, James L. (ed.). 1984.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tson, R., and P. Ebrey (eds.). 1991.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gener, Bernd. 1991. Job Mobility and Social ties: Social Resources, Prior Job, and Status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60–71.
- Weitzman, Martin and Chenggang Xu. 1994. Chinese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 1994.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8: 121–45.
- Wen Zai Bao* 1995. Survey on Marriage, Sexuality in Beijing. March 12, p. 3.
- White, G. 1987.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owar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apitalism. *Modern China* 13: 411–40.
- White III, Lynn T. 1976. Workers Politic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6: 99–116.
- White, Harrison C. 1981. 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517–47.
- Whyte, Martin. King. 1973. Bureaucracy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Maoist Critiqu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149–63.
- . 1974a. Iron Laws vs. Mass Democracy: Weber, Michels, and the Maoist Vision. In J. C. Hsiung (ed.). *The Logic of 'Maoism'*. New York, NY: Praeger, pp. 37–61.

- . 1974b.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75.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64: 685–711.
- . 1981. Destratification and R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G. Berreman (ed.) *Social Inequality*.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pp. 309–36.
- . 1984. Sexual Inequality Under Socialism: The Chinese Case in Perspective. In J. L. Wats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8–238.
- . 1985. The Politics of Life Chan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Y. M. Shaw (ed.),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PRC*. Boulder, CO: Westview, pp. 244–65.
- . 1986. Social Trends in China: The Triumph of Inequality? In A. D. Barnett and R. Clough (eds.), *Modernizing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p. 103–23.
- . 1989. Who Hates Bureaucracy? A Chinese Puzzle. In D. Stark and V. Nee (eds.),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0. Changes in Mate Choice in Chengdu. In Deborah Davis and Ezra Vogel (eds.),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Cambridge, MA: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 1992. Introduction: Rural Economic Reforms and Chinese Family Patterns. *China Quarterly* 130: 317–22.
- and William L.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E. F. Vogel, and William L. Parish. 1977. Social Structure of World Regions: Mainland Chin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 179–207.
- Williamson, Oliver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 1979.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 233–61.
- .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Witke, R. 1973. Mao Tse-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Marilyn Young (ed.), *Women in China*.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Wolf, A. 1980.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lf, M. (ed.). 1970.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Roxanne Witke (eds.). 1975.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85. *Revolution Postpone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lfe, Eric. 1966. Kinship, Friendship and 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Complex Societies. In M. P. Banton (ed.),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Complex Societies*. London: Tavistock, pp. 1–22.

- Wong, Linda. 1994. China's Urban Migrants—The Public Policy Challenge. *Pacific Affairs* 67(3): 335–55.
- Wu, Harry Xiaoying. 1994.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Quarterly* 39: 669–98.
- WuDunn, Sheryl. 1991. China's Castaway Babies. *New York Times*, 26 February.
- Xie, W. and N. Lin. 1986. The Process of Status Attainment in Urban China. New York, NY: Presentation at Annual Meeting, American Sociology Association.
- Xie, Yu and Emily Hannam. 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1): 950–92.
- Xu, Xiaohe and Martin Whyte. 1990. Love Matches and Arranged Marriages: A Chinese Replic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709–22.
- Xu, Xue-qiang and Si-ming Li. 1990. China's Open Door Policy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 49–69.
- Yamamoto, Tadashi (ed.). 1995. *Emerging Civil Society in the Asia-Pacific Community: Nongovernmental Underpinnings of the Emerging Asia-Pacific Regional Community*. Singapore and Tokyo: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Jap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 Yan, Yunxiang. 1996.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g, C. K. 1959.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M. I. T. Press.
- Yang, C. K. 1965 [1959]. *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 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 Cambridge, MA: M. I. T. Press.
- Yang, M. 1986.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Exchange in China.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Yang, M. 1987.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ness in a Chinese Socialist Factory*. Boston, MA: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Yang, Mayfair Meihui. 1994.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Yang, Xiushi. 1994. Urban Temporary Out-Migration Under Economic Reforms: Who Moves and for What Reason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3: 83–100.
- Yeh, Anthony Gar-On and Fulong Wu. 1996. The New Land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 (2): 330–53.
- Yeung, Yue-man and Yun-wing Sung (eds.). 1996. *Shanghai: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China's Open Polic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Yusuf, Shahid and Weiping Wu. 1997. *The Dynamics of Urban Growth in Three Chinese C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ang, Xiaowei. 1993.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Marriage in Urban China: 1982.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4(1): 35-43.
- . 1999. Family and Kinship. In Robert Gamet (ed.).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Zhao, Bo and Geng Wenxiu. 1992. Sexuality in Urba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8: 1-20.
- Zhou, Qingsheng. 1993. Capital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nd its Region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2): 1-11.
- Zhou, Xiao. 1989. Virginity and Premarital Sex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15: 279-88.
- Zhou, Xueguang. 1993. 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54-73.
- . 1995. Partial Reform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in the Post-Mao Er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8: 440-68.
- . 1999.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ata. Forthcoming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 Nancy Brandon Tuma, and Phyllis Moen. 1996. St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 *Social Forces* 28: 440-68.
- , Nancy Brandon Tuma, and Phyllis Moen. 1997.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hift Patterns in Urban China, 1949 to 1994.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339-65.
- Zweig, D. 1986. Prosperity and Conflict in Post-Mao Rural China. *China Quarterly* 105: 1-18.
- . 1989. *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1968-198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